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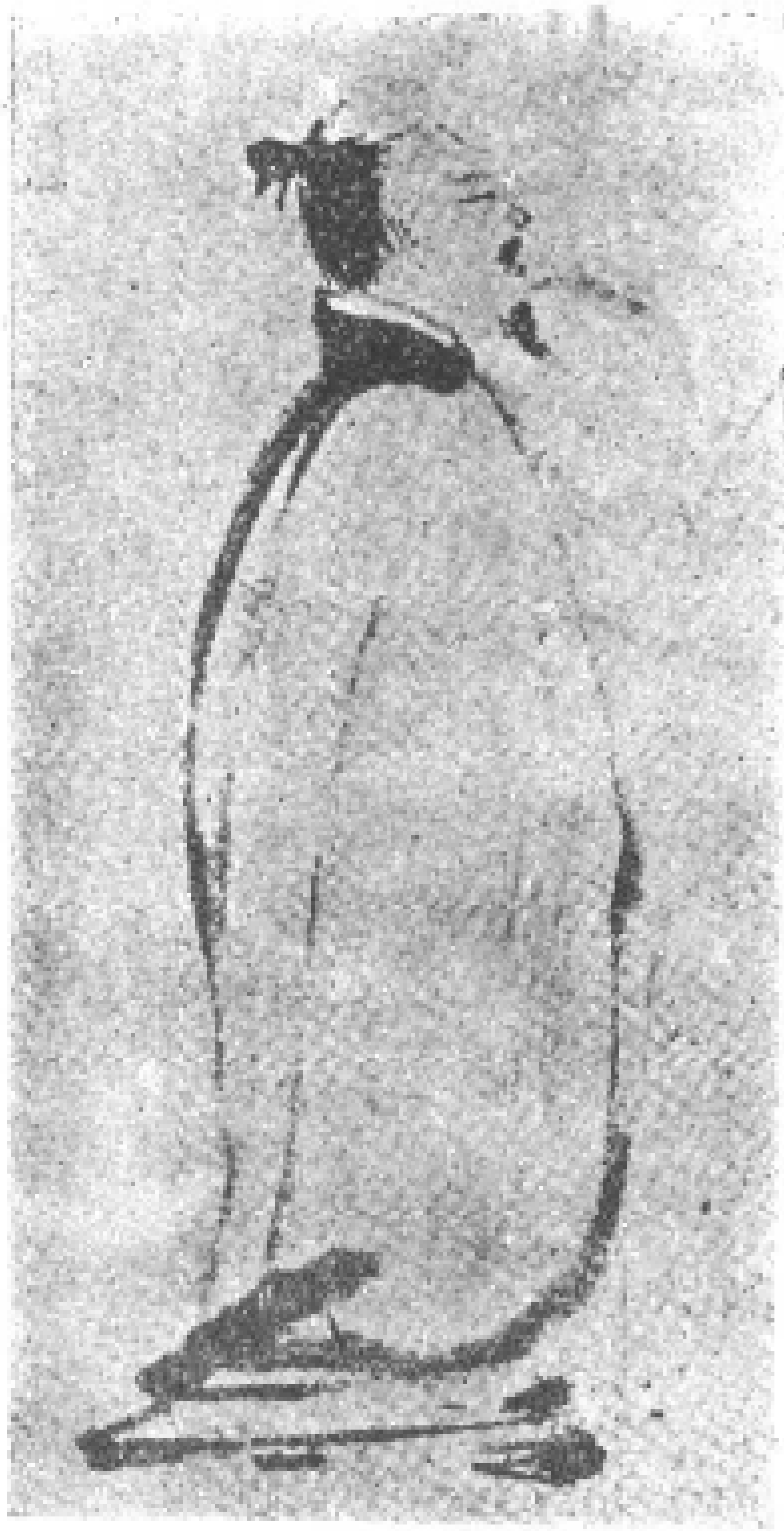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

沈雲龍主編

萬竹樓隨筆

左舜生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宋梁楷畫太白行吟圖

萬竹樓隨筆

目錄

一	雜談李白	一
	李白年譜簡編	二三
二	畧談杜甫	三〇
三	讀『小山詞』	五四
四	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王昭君	六四
五	春風燕子樓	七五
六	蘇家三父子	八四
七	黃遵憲其人及其詩	九四

八	文人兼經師的王闓運	一二三
	附錄一：關於楊度	一三一
	附錄二：記齊白石	一三二
九	亢直敢言的王先謙	一三五
一〇	戊戌得罪的皮錫瑞	一四五
一一	遊戲召禍的葉德輝	一五〇
一二	西洋文學翻譯者林紓	一五五
	附錄一：辜鴻銘與嚴復	一五九
	附錄二：嚴復與袁世凱	一六一
	附錄三：嚴復論康梁	一六六
	附錄四：嚴復與白話文	一六八
一三	我眼中的梁啟超	一七一

附錄一：梁啓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一七六
附錄二：梁啓超與清末言論……………	一八九
附錄三：梁啓超手寫康有爲的詩……………	一九二
附錄四：釋譚嗣同獄中題壁詩……………	一九三
一四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	一九六
附錄：關於劉師培……………	二〇四
一五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	二〇五
一六 記梁濟的自殺……………	二一六
一七 厭世自沉的王國維……………	二二二
附錄一：王國維與沈曾植……………	二三〇
附錄二：王國維評紅樓夢……………	二三二
附錄三：王國維的詞……………	二三七

一八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	二四四
一九	張謇及其事業	二五一
	附錄：張謇與沈壽	二五七
二〇	梁士詒之一生	二六六
二一	民初被刺的宋教仁	二七六
	附錄：黃遠庸論袁世凱	二八〇
二二	為爭人格而討袁的蔡鈞	二八三
二三	以身殉職的陳布雷	二八六
二四	書生建黨的曾琦	二九〇
	附錄：曾琦的遺囑與絕筆	三〇一
二五	記盧作孚之死	三〇四

二六 太平天國史話六篇：……………三〇九

一、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三〇九

二、長沙在包圍中八十天……………三一四

三、太平軍第一次破武昌……………三一九

四、太平軍怎樣得到了他們的「天京」？……………三二四

五、太平天國在南京的設官分職……………三二九

六、太平軍對女性的蹂躪……………三三五

二七 關於『義和團』的史料……………三四一

二八 讀『庚子西狩叢談』……………三四四

二九 讀『驢背集』……………三四七

三〇 曹亞伯與『武昌革命真史』……………三四九

三一 假定魯迅還活着……………三五一

三二	郁達夫與徐志摩	三五四
三三	謝六逸與『日本之文學』	三五九
三四	關於田漢	三六八
三五	談『西林獨幕劇集』	三七三
三六	談『雷雨』	三七六
三七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	三八三
三八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	三八八
三九	梁祝影片及其他	三九二
四〇	哥德論革命	三九五
四一	關於『威廉退爾』劇本	四〇〇
四二	關於『茶花女』劇本	四〇三

四三	談『溫莎公爵自傳』	四〇六
四四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四一一
	一、西施	四一一
	二、虞姬	四一三
	三、李夫人	四一五
	四、卓文君與紅拂	四一七
	五、班昭與蔡琰	四二二
	六、二喬的故事	四二七
	七、綠珠與石崇	四三〇
	八、江采蘋	四三五
	九、才女李清照	四三八

附插圖十六幅：

- 一、宋梁楷畫太白行吟圖
- 二、蘇軾繪像
- 三、黃遵憲肖像
- 四、王闡運繪像
- 五、王先謙繪像
- 六、嚴復肖像
- 七、梁啓超逝世前一年造像
- 八、戊戌時代的康有爲
- 九、譚嗣同遺像
- 十、蔡元培肖像
- 十一、王國維壯年造像
- 十二、張謇晚年造像
- 十三、梁士詒六十五歲造像

十四、宋教仁遺像

十五、陳布雷肖像

十六、曾琦編醒獅週報時造像

雜談李白 (701—762)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上面這首詩，是白居易讀過李白和杜甫的詩集以後寫下來的。李白(701—762)約長於杜甫(712—770)十二歲，大約在李白的四十以後，杜甫的三十以後，他們便做了很好的朋友。儘管在中國的詩壇，自來是李杜並稱；儘管他們所遭遇的困厄，乃至垂老不得志而客死異地，也有不少之相似之點；可是他們兩位的人生態度與作品內容，却彼此保有一種迥然不同的氣象。照白居易的解釋，把他們兩位擺在那樣一種時代，只是天意，好像要他們專爲人間產生幾首好詩。這就詩人的本身說來，也許是不幸；但就我們讀詩的人說來，除在欣賞他們作品的時候，也多少爲他們

的處境有些扼腕以外，却未嘗不爲我們有機會讀到這些好詩而感到愉快。

十三年前，我曾在成都瞻仰過工部草堂，在那裏塑得有我們三位詩人的肖像。中間一位，自然就是我們的杜子美先生，其餘兩位却是黃山谷和陸放翁，當時會引起我一種感想：四川的朋友真是好客，他們對於這三位外來的詩人，表示這樣的尊重，但何以對於一位確確鑿鑿生長在四川的李白乃獨付闕如呢？我想，假如在杜黃陸三位塑像中間，同時也把這位李先生塑上，身着錦袍，高舉酒杯，表示他以地主資格，在那裏招待這三位遠客，甚至連東坡先生也以主人資格一同塑上，成爲一個「唐宋五詩人祠」，豈不更爲圓滿？何況李杜和蘇黃，生前本來又都是好友呢？我想我這個設計是不錯的，假定三五年後，能把今天在大陸的這羣土匪肅清，我還是要把這個建議向我們的四川朋友們鄭重提出的。

我在香港住下來，一瞬間又快到三年了，平日除寫些不相干的文字換取一點稿費以外，多的是時間；假如我沒有一個歡喜讀讀書的習慣，我真不知道如何去銷磨這個漫長的歲月。一提到香港的文化水準，我真有點悲觀：最近一兩年，我還是照

常的跑跑書店，大致香港九龍兩地，大大小小的書店，也有四五十家（自然專賣外國書的還不計算在內），可是不幸得很，香港確實是一個缺少書籍的地方，其情形和臺灣不相上下，甚至我把這四五十家書店跑遍了，想找一部像樣子的杜詩也不可得，但無意中却得了兩部『李太白詩集』，這已經令我喜出望外了。我這篇『雜談李白』的筆記，便完全是爲我自己想多了解一點李白而記下來的，我想對於一個已有研究的讀者，是不會有多大的貢獻的。

說李白的少年時代，是在四川度過的，考之於他自己的作品，這已經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關於李白真正的籍貫，却自來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或者說是隴西（甘肅），或者說是四川，或者說是山東，甚至還有人懷疑他是外國人的。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這是李白自己『與韓荊州書』所說的。他的同時人李陽冰爲他撰『草堂集序』，也說他是『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又李白自己『上安州裴長史書』說：『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因爲『金陵』兩字，有人懷疑這封信是僞托，清乾隆間

王琦所作『李太白全集』的補注，則解釋『金陵』兩字或爲『金城』之誤，我想這是很合理的。『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李白是『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所謂『興聖皇帝』便是李暠；所謂『神龍』，乃是唐中宗的年號。依上述種種，李白的原籍是隴西，即今天的甘肅，大致是很確定的了。

明楊升庵（慎）有一篇『李詩選題辭』，說明李白生長於四州，甚爲詳盡，他說：『「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表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鄒谷詩所謂「雲下文君沽酒店，雪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薦疏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

，卽其事也。……」又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裏也說：「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其時李白已和許圜師的孫女結了婚，住在湖北的安陸（卽他岳家的所在）已經有三年之久，這件事在他上裴長史書裏，也說得很明白。可是在他結婚許氏以前，他已經有過「南窮蒼梧，東涉溟海」的事實；在揚州不到一年，便花了三十餘萬；又同一位四川朋友吳指南遊過洞庭，吳死以後，他又到過金陵。由此推算，他離開四川的時候，大致在二十以後，最遲也不會遲過二十四五。他離川以後，便沒有回去過，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凡他在四川寫的一些詩，都是他早年的作品。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這首詩題是「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而所謂「戴天山」，就是李白故鄉彰明縣的康山，然則這首詩是他少年時期的作品，是毫無可疑的了。（參看李長之所寫的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大致便是我們這位青年詩人最初離開四川到達湖北的得意之作。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這無疑更是他晚年流寓宣城懷念他故鄉的作品了。

又在李白所有的作品中，詠到月亮，提到峨眉的地方，往往都是最優美，最自然：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像這樣的句子，尤其是我們這種會到峨眉山看過月亮，也會在青衣江（即平羌江）上坐過木船的人所最能欣賞的了。

根據上面所述的種種，則李白故鄉之確爲四川，還更有什麼疑問呢？

在這一節中，我還有附帶的幾句話想說一說：去年李長之先生所出版的這本『李白』的小冊子，他把『聽蜀僧濬彈琴』這首詩，也作爲是李白少年時期的作品，我看似乎可以斟酌，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蜀僧抱綠綺，（琴名）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不說技術這樣老到不像是少年之作，假定說這也是在他未離四川以前作的，根本也就無所謂『客心』了。

『舊唐書』以李白爲山東人，大致是根據元微之（稹）『杜工部墓誌銘』的兩句文字：『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而微之之文，大致又根據杜甫的兩句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李白住在山東很久是事實，但『舊唐書』說李白『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却是很可疑的：范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叙述李白的家世，明明說：『隋末多

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按碎葉爲西域城名，隸安西都護府。）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籍。神龍（唐中宗年號）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同時我們在李白的作品中，也很難發見提到他父母的話，這可看出李白的家世，確有幾分神秘，而說他的父親做過『任城尉』，當然是更不可靠了。

有人懷疑李白是外國人，這大致是由於陳寅恪先生一篇『李太白氏族之疑問』的文字所引起。（原文見清華學報十卷一期）這篇文章我不曾見過，或見過而沒有留意，現在手邊又沒有，陳先生的論點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懷疑李白是外國人，也許比懷疑墨翟是外國人更不爲無理：一、根據他同時人李陽冰的紀載，曾說他是涼武昭王暠的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再根據稍後於他的范傳正所紀載，也說他家因『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假定李白的家庭曾竄居西域是一事實，則自隋末到唐中宗的神龍之初，所經過的時

間，約爲七十年左右，至少他家最初遷去西域的時候，決不是李白的父親，可能是他的祖父或曾祖父。李白的先人既是因罪而「謫居」，而「被竄」，則攜帶家眷一同前往的機會總是很少的吧，然則儘管李白的祖父若是中國人，但他的祖母和母親是外國人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李長之先生在他所寫的一本「道教徒的詩人李太白及其痛苦」的小冊子上，指出李白是「華僑」，但我還想假定李白是一個混血種。二、還有關於李白曾草「答蕃書」的一種傳說，他的家庭既竄居異域達七十年之久，則李白因家庭關係自幼便通習當地的語言文字，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稀奇了。三、再看李白的樣子，我覺得也是很可注意的：賀知章一見李白而歎爲「謫仙人」；他的朋友魏萬，也說他「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我們試想想，一個混血兒的最大特點，不往往就在他的兩隻眼睛嗎？四、李白的孩子們，有的叫「頗黎」，有的叫「明月奴」，叫「天然」，他並且還有一個妹妹叫「月圓」，我們也覺得有些異樣，現在久居外國或信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中國人，也往往要取一個「若瑟」、「保羅」、「瑪利亞」、「惠靈吞」這類的名字，可見李白的家庭確也是洋氣十足的。五、

李白究竟姓李不姓李，根本也還有問題，據李陽冰所說：「神龍之初，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可見李白之姓李，原是臨時指定的，我們看到李白許多贈人的詩，凡是遇着一個姓李的，他總歡喜和他們攀本家，這也確實是一種可疑的心理。

凡上述種種，我並沒有意思一定要附會李白是一個外國人，不過爲實事求是起見，我們不能不明白這些事實就是了。即令李白是一個「僑民」，或如我所假定是一個「混血兒」，但他既已回到中國，長於中國，讀中國書，在中國結了婚，也在中國服過官，又有無數的中國朋友，而且一千多年以來他成爲一個中國人所最歡迎的詩人，則我們把他的家世弄得清楚一點，也不過和他增加一點更親切的關係罷了。

李白自從離開他的故鄉四川以後，便一直過着一種漫遊生活，以當時的交通情況，他所到過的地方也算不少了。

從他的作品看，我們知道他住得較久的地方爲湖北、山東、河南；因爲一度非

正式的從政，住在長安有三年之久；此外他的遊蹤所及之處，則有湖南、山西、河北、江蘇、安徽、浙江，……最後乃死在安徽的當塗。他之認識孟浩然，是他出川不久在湖北時候的事；他之和杜甫做朋友，則是他退出長安，年齡已在四十四五歲的時候了。

李杜這兩位詩人，不僅在他們的作品上表現一種不同的情調，實際則他們兩位的個性，也顯然不一樣。李白的出發點是道家、縱橫家、遊俠；他所崇拜的人物，爲范蠡、魯仲連、侯嬴、朱亥、張良、謝安。杜甫則爲純粹的儒家，他所崇拜的人物，乃爲『伯仲之間見伊呂』、『萬古雲霄一羽毛』的諸葛亮，而他最大的抱負，乃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李白並不是不熱心於功名富貴，但他對於做官不過是取快一時，無論成功或失敗，他總是要走，決不是一個官可以把他拘束得了的，因爲他還有一個更高的目的，乃在求仙學道。杜甫却真有一腔忠君愛國的思想，對當時一般流離困苦的人民，以及他的妻子和兒女，他也確實抱着無限的同情，假定他做官做得很順手的話，他是不難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在杜甫的集子裏涉及李白的詩，一共有一十五首，我們可以看出老杜對李確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具有一種深厚的友情，但他却也不是一味的恭維，帶一點規勸的話也還是有的，例如他說：

『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這不是於開頑笑之中多少帶了一點責難意味嗎？至於李白對於杜甫又怎樣呢？自然也是很好的，李白有一首『沙邱城下寄杜甫』的五律說：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

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這不也可看出李白對杜甫友情的自然流露麼？相傳李白也有一首和杜甫開頑笑的詩說：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來作詩苦！』

李白懂得杜甫的詩是從苦吟而得的，但杜甫却說：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究竟詩還是應該苦吟的好，還是自然流露的好呢？這是關於作者性分的一個問題，只好聽其「各顯神通」，絕對無法強其趨於一致的啊！

「政治者俗人之事」以李白這樣一個浪漫派的詩人而要他去玩政治，其失敗是「理有固然」的。可是李白對這一點却有他的自信：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

封昆季）

「……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鄴中贈

王六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世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上李邕）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永王東巡歌）

他不僅有着這樣的抱負，而魯仲連、張子房、謝安石……更是他所崇拜的對象，本來這幾位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富有詩一般的意味啊。

等到唐玄宗的天寶元年（七四二），即李白四十二歲的時候，他的政治機會果然來了。當時他有一位在會稽認識的道友吳筠，因爲玉真公主的關係，應召到了長安；李白也就因吳筠的關係，被引薦而出仕，當時李白有幾首『別內赴徵』的詩，內中有一首說：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同時在一首『南陵別兒童入京』的詩裏他也說：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我們只看他這種語氣也可想像李白當時的心情，是如何的躊躇滿志了。果然，到了長安以後，唐玄宗待他總算是不錯的，一見面便對他說：『卿是布衣，名爲

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這樣一來，李白便做了一名「翰林供奉」。所謂「翰林供奉」者，就好比有錢人家所豢養的一種清客，無非是拿來換換口味，開開玩笑的。自來做皇帝的人，對於這類文學侍從之臣，往往是以「倡優蓄之」，自司馬遷，司馬相如以來已經是如此，他們決不會承認一個文人會有什麼「拯物情」，更會有什麼「濟時策」的；於是乎李白想做魯仲連、張子房、謝安石的一些抱負，便只好歸於幻滅，惟有縱情詩酒，和光同塵的與當時的宮廷和當時長安的一般文人學士，來共同過一種糜爛生活了。

原來在唐玄宗的開元一期，文治武功是頗有可觀的，可是進入天寶以後，却一天天趨於腐化，因為有了一個一代尤物的楊太真，再加上楊家的一羣兄弟姊妹，乃把這位皇帝弄得神志昏迷，卒致釀成一幕「安史之亂」，同時把我們這一代詩人的李杜，也就弄得苦不可言了。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這是老杜描寫當時楊氏姊妹的想像之辭（麗人行）。『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這是老杜於楊太真死後所

表示的悼惜之意（哀江頭）。總而言之，老杜對於和他同時代的這羣尤物，是從來沒有機會接觸過的。李白却不然，他有名的三首『清平調』，和現存的八首『宮中行樂詞』，都是當時被召到宮裏去當着玄宗的面寫出的，即令說楊貴妃爲他磨過墨的話不可靠，但看見這個女人的機會卻是有的，因此他一則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宮中行樂詞第二首）再則曰：『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清平調第二首）假定不是看見，他的分數會打得這樣正確嗎？至於說：『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這更不待言，是他遠遠望見楊貴妃的亭亭倩影，倚在沉香亭的闌干站着，才能引起他的這種『烟土披里純』哩！

據一般的紀載，李白每次入宮，總是醉得醺醺然的，其實據我看，也未必盡然，他不過借着酒興對統治階級發揮他的一種野性而已。試想，高力士在當時，本來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李白居然翹起一隻腿，叫他脫靴子，當時在皇帝身邊的太監，決不止高一人，他不叫張三脫，李四脫，而獨叫高脫，你能說他當真醉了嗎？後來雖因此而遭讒間之口，因此而不能不離開長安，這在李白看來，正所謂求仁得

仁，實際是毫無所謂的。中國文人對於統治階級，自來都是歌功頌德，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今天的郭沫若，總也不能不勉強算他是個文人，可是他拍毛澤東的馬屁不夠，一定還要倒在史太林的懷裏去叫爸爸，則李白人格的峻潔，真可說是獨步千古，足以一雪中國文人的奇恥大辱啊！

關於李白參加永王璘的一幕，一般都說他是被迫，被劫持，即李白也未嘗不以此自解。事實上也未必如此；李白本來是一個縱橫家的底子，再加上一套道家的人生觀，他之願意玩玩政治，不過是發揮他過剩精力的方法之一種，在他看來，皇帝原不一定要姓李的才能做的，即令說非姓李的不可，則李隆基（玄宗）可以做得，李亨（肅宗）也可以做得，何以李璘獨做不得？我們現在看看他所寫的『永王東巡歌』、『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以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這類的作品，態度都很自然，即在潯陽繫獄，放出以後，又被放逐去夜郎，他對這件事也依然沒有什麼悔意，照常讀他的書，（他曾在潯陽獄中讀留侯傳，）喝他的酒，做他的詩，自然他也不想死，但要他對這件事如何認錯，却是沒有的。我覺得這種地方

也最足以表現李白的偉大，本來，皇帝比之於一個偉大的詩人，算得什麼東西！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這是杜甫所寫『夢李白二首』第二首裏面的句子，這兩句詩作爲老杜的『夫子自道』自然也很恰切，但不幸李白的命運，却真也和杜甫沒有什麼區別。

李白經過四十年漂泊流離的生活以後，於唐肅宗寶應元年（762）的十一月乙酉，死於安徽的當塗。李陽冰在『草堂集序』裏面說：

『……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

據此，可見李白確是病死的，關於『捉月』墮江的一種說法，實爲無稽。但我們讀杜甫關於李白的詩，一則曰：『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再則曰：『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以上見夢李白二首）三則曰：『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天末懷李白）可能當時確有李白沉江的一種傳說，杜甫因懷念他的這位老友，既已形諸文字，後人或卽以此加以附會耳。

根據李白的好友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上所說，李白一共結過四次婚：第一位夫人姓許，即我前面已經提到的許圜師的孫女，生了一女一男，女的叫平陽，男的叫伯禽，又叫明月奴。次合於劉；劉離以後，又合於山東一婦人，生了一個兒子叫頤黎；終娶於宗，李白『竄夜郎留別宗十六璟』詩，所謂『令姊忝齊眉』者是也。（按魏序宗作宋，茲據王琦注）此外李白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天然，則不知爲誰氏所出。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杜甫這首『月夜』，對他家人的懷念，可以說是一種至情的流露。李白的集子裏，也有若干首『別內』『寄內』的詩，可是我們看不出他對任何一位夫人，有怎樣了不起的一種情感，這大概是緣於李白對性生活的態度，根本便與杜甫不同。可是李白對於他的孩子們，却是異常愛惜的。他有一首『寄東魯二稚子』的詩，是我所歡喜唸的，詩曰：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尙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字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誰復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汝陽川。』

他在『送楊燕之東魯』的詩裡說：

『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又他在『送肅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的一首裏也說：

『我家寄在沙邱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我們讀了這些作品，還能說李白的情感果不及杜甫的濃厚嗎？

李白的墓，原在當塗的龍山東麓，唐憲宗的元和十二年（817）正月二十三日，乃改葬於青山之陽，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改葬的經過是這樣的：其時范傳正任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與李爲通家，按圖訪得李白的墳墓在當塗屬邑，因

令禁樵採，備灑掃。又訪得李白遺有孫女二人，其一適陳雲，其一適劉勸，均農家子。『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引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原文）范和李白這兩位孫小姐談話的結果，知道李白的兒子伯禽（即明月奴），早於唐德宗的貞元八年（792）死去，他們倆原有一個哥哥，（即李白的孫子）可是已出游十二年，不知下落，剩下他們伶仃孤苦，不得已才嫁了這兩個農夫。他們說祖父的遺命，原要葬在青山，現在葬在龍山東麓，不是他的本意。范聽了這番話，乃有將李白遷葬青山的決定，當時的當塗令諸葛縱，對這件事也極熱心，乃由他經紀其事，這件改葬的工作，因以完成。

范又問這兩位李小姐是否願意改嫁士族？他們倆乃義正辭嚴的回答說：『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非所忍聞！』范深爲這番話所感動，便只好把他這個提議自動撤回。李白有兩個這樣的孫女，總算很不錯了。

自來憑弔李白墓地的詩，多至不可勝數，但我所最歡喜的，却只有兩首，其一是南宋詩人陸放翁的，其一是清代詩人黃仲則的，現在我便把這兩首詩錄在下面，作爲我這篇『雜談李白』的結論罷。

陸游『李弔翰林墓』詩云：

飲似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驥勇奔泉，客從縣令初何有，醉忤將軍亦偶然。駿馬名姬如昨日，斷碑喬木不知年，浮生今古同歸此，回首桓公亦故阡。（桓溫墓亦在當塗）

黃景仁『太白墓』詩云：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擊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即今遺蹟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惟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此間地下

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流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空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即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李白年譜簡編

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最近因讀李太白全集，乃把李白的時代及其生平，畧畧加以檢討，因而寫了近一萬字的『雜談李白』，這對於我自己頗有益處，因而想到要澈底了解中國文學史或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這類的工夫實在是不可省略的。

我平日有一種歡喜閱讀年譜的習慣，據近人李士濤所著『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雖不見得便怎樣完備，但已有一千二百餘種。李白年譜見於他這本

目錄的，共有三種：第一種爲宋薛仲邕所編，（按薛關中人，宋紹興間爲右奉議郎，李書誤宋爲明。）第二種爲清乾隆間王琦據薛譜所改編，第三種則清代李調元鄧在珩所合編。我現在手邊所有的只王琦這一種，大體似乎是很好，但文字仍微嫌繁富，爲便省覽，茲據王書再寫成一『李白年譜簡編』如下：

李白年譜簡編

唐武后天足元年（701）

太白生，名白；青蓮居士，酒仙翁，皆其所自號。白父名客。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

太白年五歲能讀六甲。

唐睿宗景雲元年（710）

太白年十歲，據所自述，已能通詩書，觀百家。

唐玄宗開元三年（715）

太白年十五歲。據白上韓荊州書：『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又白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

開元八年（720）

太白二十歲。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見益州長史蘇頲，頲稱其天才英麗，若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

與東巖子隱居岷山，（楊升菴謂東巖子即趙稭）數年不入城市，養奇禽千計，可呼就掌取食。郡守舉二人有道，不起。

開元十三年（725）

太白二十五歲。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

開元十八年（730）

太白三十歲。白上韓荊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又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枕籍，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

矣。』

開元二十三年（735）

太白年三十五歲。遊太原，識郭子儀於行伍，言於主帥，脫其刑責。携妓遊晉祠，浮舟弄水。即於是年去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

開元二十八年（740）

太白四十歲。是年孟浩然卒，年五十二。

天寶元年（742）

太白四十二歲。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玄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讀其『烏棲曲』，謂可以泣鬼神，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帝嘉之，以七寶床賜食，親手調羹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

天寶二年（743）

太白四十三歲。留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張旭、焦遂等縱情詩酒，有酒中八仙之目。

天寶三年（744）

太白四十四歲。仍留長安，數應召侍宴賦詩。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乃摘其『清平調』中『可憐飛燕倚新粧』句以激太真妃，謂賤之已甚，妃深然之。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為張垙讒譖，太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乃賜金放歸。

杜甫寄太白二十韻詩，有『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之句，是知李杜訂交，在太白離長安後不久也。

太白出京後數年，其蹤跡殆以在梁齊之間為多。

天寶十三年（754）

太白五十四歲。遊廣陵，與魏萬（即魏顥）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

與萬相別，復往來宣城諸處。

天寶十四年（755）

太白五十五歲。在宣城。

肅宗至德元年（756）

太白五十六歲。自宣城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時永王璣爲江陵府都督，充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重太白才名，辟爲府僚佐，及璣擅引舟師東下，脅以偕行。

至德二年（757）

太白五十七歲。永王璣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以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推覆得釋，若思並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

乾元元年（758）

太白五十八歲，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

乾元二年（759）

太白五十九歲。未至夜郎，遇赦得釋。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

上元二年（761）

太白六十一歲。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

寶應元年（762）

太白六十二歲。在當塗，依當塗令李陽冰。十一月以疾卒，即葬其地。

略談杜甫 (712—770)

因爲想好好的把杜詩溫習一遍，現在先就杜甫的一生，來作一次初步的檢討。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像杜甫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假如我們對他所處的時代和他一生的經歷，不有相當的了解，便想進而欣賞他的作品，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杜字子美，本襄陽人，曾祖依藝，曾作河南的鞏令，因徙居鞏，因此杜甫的出生地乃在河南的鞏縣。依藝生審言，初唐有名的詩人；審言生閑，終奉天令（陝西乾縣），便是子美的父親。

子美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712），卒代宗大歷五年庚戌（770），歷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得年五十有九。他的母親出於清河崔氏，但在子美幼年便已死了，因此我們在子美的詩中只看見他提到他的舅父和表弟們，絕沒有看見提到他的

母親。

子美在唐肅宗的至德二年（757），曾任過短時期的左拾遺，（官不大，但可接近皇帝說說話。）所以有不少的人稱他爲『杜拾遺。』代宗的廣德二年（764），嚴武表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大家又稱他爲『杜工部。』在長安南五十里，爲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稱杜陵（見漢書地理志杜陵注）。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爲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子美曾在這附近住過，因此他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約後於杜甫九十年，我們又得着一位天才詩人杜牧，因此大家又稱甫爲『老杜』，而以牧爲『小杜』。這些都是讀杜集的時候，所應當首先知道的。

李白和杜甫，都是生有夙慧的人，李白自己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又說：『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這與杜甫自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篇；』可以看出他們自小便都是自命不凡的。本來，一個偉大詩人的成就，假如他

們不是具得有過人的天才，確實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哩。

李杜所處的時代相同，兩人的遭遇，相似之點也不少，但究竟因為他們的所學不同，因此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態度，也有了很大的差別。我們讀李白的詩，總覺得他有一種『飛揚跋扈』的氣概，浪漫的色彩甚濃；杜甫則一生謹慎小心，好像終日都是愁眉苦臉。因此論到能使人胸次開朗，似乎是杜不如李；能使人情感深厚，又似乎李不如杜。我們要超脫時代而不為時代所苦，宜於讀李；要理解時代，因而激發自己的同情，則宜於讀杜；在今天，則確實兩者都有需要。至於他們兩位作品的優劣，實在是『見智見仁』，要自己去領悟，強為軒輊，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因為把杜甫的一生在我腦子裏描繪一個輪廓，乃引起了我一種感想，這個感想儘管還沒有成熟，但在大體上是不會錯到那裡去的。據我想：中國的讀書人，在過去好像是以做官為惟一的出路，一直到最近五六十年，才開始在這裏起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是變得很慢，不要說一般研究文哲或社會科學的人還沒有完全脫出從前那條歷史的老路，乃至研究一種應用科學或自然科學的人，也還是多少不能自外。

在清朝末年，一個從外國學牙醫的回來，只能做一個縣長；就到了民國的四十年代，一個搞地質的人，似乎也還以做到一任行政院長爲榮。儘管近年的風氣是在這裏變，可是研究學問或從事藝術的人想要離開政治的圈子獨立生活，依然還是很難很難。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台灣演說，好像曾提到他從前辦雜誌做文章不拿稿費的話，我自己確也曾以這種辦法爲相當高尚，而不大以目前這種按字計值的辦法爲然。現在仔細一想，覺得這個意思不對：無論你講學也罷，賣稿也罷，假定是以你最善的努力去換得一碗飯吃，便沒有什麼不妥，更沒有什麼不高尚，惟有把所有的讀書人一律趕到政治一方面去求生存，這才是一個最要不得的現象，而且會把政治永遠弄得不上軌道，文化的各方面，也不會得着健全而均衡的發展。

中國的偉大詩人像陶潛、李白、杜甫之類，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都是應該在社會上各有其崇高的地位的，可是非所論於舊日的時代，（就在今天，一個純粹的詩人，又何嘗活得下去？）假如你真不願『爲五斗米折腰，』你就得去討飯，陶潛有一首『乞食』詩便這樣說：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吃了別人一頓，乃至發願以『冥報』相貽，其心情是何等的慘痛！李白在少年時代是闊過的，入中年以後，也偶然得意過，但也還是靠做官，到他晚年客死當塗，其情況也就很慘了。杜甫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情況，我們知道得很少，但因為他的父親杜閑做過開封尉，武康尉，兗州司馬，因此當他離開洛陽未到長安以前，在齊趙吳越一帶漫遊的一段，似乎生活還可以過得去，例如他在『登兗州城樓』那首五律所說：『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的時候，也就要算我們這位詩人相當舒適的時候了。他後來回憶少年時代的一段生活，居然有：『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壯遊詩）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一生中總算十分難得。

唐朝以詩賦取士，一般有志於功名的人，當然對於詩賦一道十分的講究。杜甫生長於一個讀書的家庭，而且是一個以官爲業的家庭，因此他到了開元二十三年（

735)，其時正是他的二十四歲，他自己覺得已經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了，於是他到當時的東都洛陽，去應了第一次的進士考試。

這次的考試雖然是失敗，但他的年紀還很青，氣還很盛，並不因此而怎樣懊喪，依然繼續他的漫遊生活。大致從開元二十五年，到天寶五年，（737—746）他的行踪，總在山東河南一帶，也隨時回到他所住的洛陽。

在這一段期間，於杜甫的一生有一件重大的事，便是他和李白（701—762）的見面。李白本來大於杜甫十一二歲，在天寶元年，（742）他便已到了長安，而且毫不費力的便已取得了一個『供奉翰林』的位置，可是李白得意的時間並不太長，到第三年便已自翰林放歸，從此遊於河南山東一帶者，也歷數年之久。天寶三年，杜甫在東都——大致李杜的見面便在洛陽或另在河南境內的某一地點。杜甫贈李白的第一首詩是這樣的：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

拾瑤草。』

在杜甫集子裏面涉及李白以及若干專爲李白而作的詩，共有一十五首，我們知道在天寶三年以後到天寶五年杜去長安以前，他們有若干的時候同在一塊兒遊，一塊兒喝酒，一同去訪朋友，至於在一塊兒談詩論文，當然更不在話下。杜有一首『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的詩是這樣說：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我們從這裏可看出他們兩位的交情，是何等的深厚，李白爲人灑灑落落，對杜甫自然也很好，可是比起杜甫那些『懷李白』，『憶李白』，『夢李白』的真摯之感，我們不能不承認老杜實在是千古的多情種子之一。

此外我還有一種臆見：我總覺得杜甫在未見李白以前，他的作品帶得有傳統或因襲的臭味很重，自與李白發生交往以後，實在使得他在詩體上得到一大解放。自然，時代和杜甫的身世也是使得他的詩在形式上與內容上發生變化的原因，但我總

覺他受了李白的影響不小。這個話我決不敢自以為是，不過我把杜甫初期的作品和他後來的一些名篇鉅製一比較，確實有這一種直覺而已。

從玄宗的天寶五年（746），一直到肅宗的乾元元年（758），前後歷十二年之久，杜甫的生活與活動，實以長安為中心。中間雖然也偶然回到東都，到天寶十四年以後，他又曾赴奉先，往白水，往鄜州，並謁肅宗於鳳翔，但一直到他出任華州司功以前，他全部的精神總是繫於長安的。

杜甫之到長安，所追求的無非想在當時的政府中，找得一個位置。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這是他所自信的本領；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贈韋左丞丈）

這是他的目標；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詠懷）

這是他一貫的態度；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贈韋左丞丈）

『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投簡咸華二縣諸子）

這是他實實在在所得的結果。

原來到了這個時候，唐代統治的權威，已走向下坡；李隆基這位老先生，到了晚年乃變得大墮落而特墮落，他所寵信的，不外李林甫楊國忠這類的小人，他所追求的也不出一種本能的享受，而楊氏姊妹，乃尤為煊赫一時。我們的詩人，不度德，不量力，更不懂得現實，既不能師李白之遠走高飛，又不能效高適岑參之暫甘小就，而一定要『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的向長安這個臭水缸裏跳，其一碰釘子，再碰釘子，以至於弄得狼狽不堪，平心而論，也實在是自取之也。

一直到天寶十年（751），因為玄宗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和天地，杜甫乃獻了三大禮賦，這一次居然為玄宗所賞識，召試文章，把他『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可是一等再等，又等了四年，一直到天寶十四年（755），才給了他一個『河西尉

』，算是縣衙門裏一個屬員，他覺得太無聊，畢竟辭謝了；再改，也不過改了一名『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其職務是看守兵器，管理門禁鎖鑰，他雖勉強接受了，但對於我們的詩人，實際仍是一種侮辱。

杜甫的家屬從洛陽搬到長安，大致是天寶十年以後的事，在長安住過一個時期，因為他實在負擔不了，才不得已把他們送往奉先。杜甫的夫人姓楊，其時的奉先令也姓楊，可能是他的親戚，而他的舅父崔瑒，又任着白水尉，白水正是奉先的鄰縣，他覺得那裏有親戚可依，總比較在長安好，所以他才採了這樣一個辦法。

有人把杜甫的詩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造反以前，其時杜甫住在長安歷十年以上，他的年齡由三十幾到了四十幾，正是人生大可有為的一個時期，而他也抱着濟世之心甚切，但不幸玄宗昏瞶於上，李林甫及楊氏兄妹專擅於下，同時對外還要黷武窮兵，弄得民不堪命，我們這位詩人對政治的抱負雖是一籌莫展，但他目擊當時這種景象，却增加了他不少的詩料，如大家所熟悉的『麗人行』、『兵車行』這類的名篇，便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第二期是天寶之亂

以後，杜甫乃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且曾一度陷在賊中，他既體驗了亂離的慘痛，又親見親聞了當時人民那種流離顛沛的情形，於是他以悲天憫人的心情，產生了不少長歌當哭的鉅製，例如『哀江頭』、『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乃至『北征』那樣的傑構，而我個人所特別愛好的，尤其在他『紀行』那類的雜詩。第三期是乾元二年（759）他到達四川以後，其時他的年齡已快到五十，總算在成都有了一個安定的住所，時局也在逐漸好轉中，雖說依然還是窮困，但究竟多得了幾個朋友的照顧，於是他的心情也安定了許多，像少年時期那種好談天下大事的氣概已不復存在，作品如『美嚴中丞』、『夜歸』、『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以及其他若干有名的五律七律，也就大體上趨於平淡的一路了。

現在我只想舉出『麗人行』，（天寶十三年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十四年作）和『北征』（至德二年作）這三首爲例子來談一談。

『麗人行』是顯然諷刺楊氏姊妹和楊國忠的一首詩。杜甫所寫的詩在當時雖不

一定出版，可是依然有人在口頭傳誦，在他『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首詩裏，他便說這位韋老先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可見得他的詩便在當時的官場也是很流行的。可是老杜並沒有因此得罪，這足以證明就在一千多年前那種君主專制時代，中國人也還是有言論自由的。

在『詠懷』這一首詩裏有這樣的句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悵惆難再述。……：』

這不更是明明白白責備當時的統治階級，把人民的東西搜括得來，過這種窮奢極慾的生活，而使得多數的人民簡直無法生活下去嗎？然而我們的詩人還是這樣大膽的寫下來了，也並沒有人去加以干涉！

至於『北征』這一首，自來研究杜詩的人，莫不一致推爲是老杜的代表作，

也決無異辭；但從前總是泛泛的讀過，從來沒有好好的去加以詠味。現在我把這首詩分成五段來看，便覺得是層次井然，有敘景，有議論，把時代的艱難，和個人所遭遇的痛苦，莫不表現得明明白白，杜詩之所以得稱爲『詩史』，這一篇當然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從一開始『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一直到『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算是第一段。便是敘述他何以離開當時肅宗所駐的行在鳳翔，把他的身分，他的心情，以及對當時政局的看法，已經作了一個概括的提示。

從『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一直到『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算是第二段。他敘述道途所見的種種，覺得自然還是那樣的美麗，而人民經過兵燹之後，却陷於這樣的慘境，俯仰天地，不由得不憂從中來，從他的文辭之美，更可看出詩人的憂思之切。

第三段從『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起，到『新婦且慰意，生理焉得說』止，是寫他回到家裏那種悲喜交集的心情，和孩子們看見爸爸回來那種手舞足蹈的景

象。杜甫之所以被稱爲『詩聖』，『情聖』，乃至『寫生聖手』，我們讀到了這種地方，還能提出什麼異議呢？可惜中國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油畫家，假如有的話，只要他能把這篇『北征』作爲題材，繪成若干鉅幅，我可保證他與老杜一樣的名垂千古！

第四段從『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起，到『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止，對於當時時局的好轉，我們的詩人雖表示了他高度的信心，但對於借助回紇，他卻依然抱着非常的憂慮。杜甫之所以成爲一個愛國詩人，我們從他這種嚴華夷之防的態度，也可看得非常的清楚。

從『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直到最後『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爲止，這是在追溯既往，但並沒有把匡復之功完全歸之於李光弼郭子儀，而認誅楊國忠與楊太真的陳元禮才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當時肅宗初立，玄宗仍在，像這樣一種露骨的批判，我們的詩人真可算得是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了。

在一篇牽涉到各方面的詩歌，寫得這樣周到，這樣生動，這樣有力，這樣大膽，我在古今的詩人中，實在舉不出這類同樣的例子來。這一千多年來中國民族的墮落，可以說到今天已達了極點，像郭沫若這類的東西，根本就不懂得詩是怎樣一回事，但也居然濫竊了一個『詩人』之名，我們且看他對於他的『親愛的鋼』之捨他而去，又將表示一種怎樣涕泗交流的醜態吧！

杜甫以至德二年（757）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房琯，幾乎得罪；卒於是年八月，放還鄜州，省妻子，這便是我上面舉的那篇『北征』之所由作。是年九月，收復長安，老杜在家住了兩月，便又趕回鳳翔，隨着肅宗一陣還京，仍舊做了半年以上的拾遺；到第二年的六月，（乾元元年758）便出爲華州司功。到華州後除曾一度回到洛陽以外，他便永遠沒有再到長安了。乾元二年（759）春，他由洛陽回華州，這個時候，依然還是一個飄搖不定的局面，他在路上目睹不少的慘象，於是他寫了『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六首有名的傑作。其所描繪當日老百姓的遭遇，雖然還趕不上今天

「抗美援朝」的十一，但也就足夠表現人世的慘痛了。

他回到華州約半年，正遇着關輔大饑，不得已棄官西去，客秦州；十月，往同谷縣；住同谷不一月，便自隴右入川。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尙安宅？始來茲山中，（指同谷）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

所謂「一歲四行役」者，便是說明他在乾元二年這一年中，春天由洛陽回華州，秋自華州客秦州，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入川而言。我在前面提到我最歡喜老杜紀行一類的詩，這個時候，他的年齡已經四十八，未老先衰，復爲饑寒所困，逼得他不能不是這樣東奔西走，白居易所謂「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大概詩人的大不幸，乃正是我們後代這些讀詩者的大幸了。下面我就姑舉幾個例子來供大家欣賞吧。

「……靡靡踰阡限，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邪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滲，猛虎立我前

，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想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這便是『北征』篇中的一段，詩人的心情是那樣的抑鬱，環境是那樣的悽苦，而風景卻是這樣優美，去鳳翔愈遠，去鄜州愈近，曲曲寫來，無一景不明，無一筆不暢，如以不高明的散文出之，真不知要費幾許筆墨也。

杜甫由秦州赴同谷，再由同谷赴成都，各有紀行詩十二首，他在經濟萬分艱難的情況之下，不得已攜帶家小，作此長途旅行，心理上雖不無鬱鬱，但究竟還有一種詩人的浪漫情緒，因此他把所遭遇的困苦，一切發之於詩，雖是那樣的陰沉，卻仍是那樣的凄艷。

『……日色隱孤戍，鳥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發秦州）

這是描寫他秦州出發時的那種情景和心境，態度畢竟是很雍容的。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然村墟迴，烟火何由追？……」（赤谷）

「……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鐵堂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沍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寒硤）

「……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瑟寒籟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法鏡寺）

「……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青陽峽）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雪雲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臯，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龍門鎮）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颯颯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積草嶺）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工。不畏道途遠，乃將泊沒同，白馬爲鐵驢，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泥功山）

他所走秦州到同谷的一段，我不知道自來的詩人還有人走過沒有？經他這樣一寫，乃如一幅一幅的畫圖，逐一展開在我們面前，至今猶不難閉目凝想他當日所遭遇的那種苦況；可是我們的詩人呢？他還是一則曰：「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再則曰：「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忘了自己的痛苦，去想像別人的痛苦，真所謂「溫柔敦厚」之至了。

杜甫住在同谷不到一個月光景，乃起程入川。他在同谷的這一期間，生活依然無着：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指他手裏那把鏟黃精的長纜）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窮到靠採集一點野生的橡栗黃精來果腹且不可得，其艱苦情況，以我們今天這些流亡人士和他去比一比，豈不仍有天淵之別？然而他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詩人，其對我們民族一種精神上的貢獻，真是無可比擬，假如我們在這種小不如意的情況之下，不能堅其固窮之節，動輒還要怨天尤人，對着我們的詩人，寧不愧死！

他在『同谷七歌』的最後一首說：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黃天白日速！」

注意：老杜甫到這樣一種境地，他卻只說到『仰視黃天白日速』為止，以我們

的近代詩人黃仲則處此，他便不能不叫出：『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了，這種地方也正看出杜老先生的修養爲如何啊！

據老杜自己說，他從同谷赴成都，在『乾元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正是一個天寒地凍的季節，所以他走到隔同谷二十里的『木皮嶺』便說：

『……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

繼此以往，他所經過的『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均一一有詩，以描繪途中所歷的艱苦，一直到經過了『鹿頭山』，隔成都只有一百五十里了，才漸入佳境，所以他說：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濶。……』

及至到達成都，他的心境更是豁然開朗，其地去長安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去東都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他回顧這樣一段艱難的旅程，居然携妻帶子到了這樣一個暫

可小休的所在，安得不心花怒發？我們再來欣賞他這一首初到成都的詩吧！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出月不高，衆星尙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杜甫到達成都後（759），生活總算是比較的稳定了一點：第一，他在浣花溪之西，百花潭之北，靠近錦江的所在，經營了一座『草堂』，雖說是樸素簡單，和他一個詩人的身分卻還相稱；第二，朋友和親戚也多一些，假如不得着這些人的幫助，便連這座草堂也不見得能够成功；第三，他還有兩個關係較密的朋友，其一爲高適，其一爲嚴武，也先後到了成都。高適做過彭州刺史，蜀州刺史，也暫代過一時期的成都尹；嚴武則於上元二年（761）正式做了成都尹；這兩個人對他有些幫助，而且都到草堂去和他喝過酒。

可是這種情形，也不長久，到第二年（寶應元年 762）玄宗死了，肅宗也死了

，嚴武被召還京，而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忽然發生叛變，杜甫不得已又避地到梓州閬州一帶，一直到廣德二年（764）的春天，嚴武再鎮成都的時候，他也才再度回到他的草堂。

他這次回到成都，居然到嚴武的幕府裏做過一個短時期的事，武還表薦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可是到第二年春天他便辭了，仍回草堂。不幸嚴武乃於是年的四月死去，而高適也正是這一年的正月死的。老杜和嚴武的交情，我們只看他們倆的往還唱和的詩，大體總算是不壞的，但舊唐書的杜甫本傳，卻說老杜酒後有對武很不客氣的舉動，甚至還有人說武也曾有一度要殺老杜的意思，嚴武之爲人如何且不去管他，以老杜的性格，且證之於他的作品，大概這些都是莫須有的。現在我把老杜這首『哭嚴僕射歸襯』的詩錄在下面：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匣，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教見君情。』

詩不太好，但足證他們兩人的交情是生死不渝的。

老杜之再回成都，本來是以嚴武再度鎮蜀之故，現在嚴武死了，他更不能不離開四川。於是他乃於是年的五月，拋棄他的草堂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再至忠州，在雲安縣住過一個時期，到大歷元年（766）才到夔州，在夔州差不多住了兩年，然後出川入鄂，由鄂入湘，這已經是大歷三年（768）冬天的事了。流寓湖南將及兩年，卒於大歷五年（770）死在耒陽。中國幾個最偉大的文人，屈子沈於汨羅，賈誼終於長沙太傅，杜甫又死在耒陽，湖南之於文人，大概算是一個不祥之地了。

杜甫死的時候才五十九歲，因為他的生活情形太壞，而且又常常在流離轉徙之中，已經弄得遍身是病，本來隨時都可以死，而好事者卻要造作謠言，說他一夕啗牛肉白酒而卒，還有人是說他是淹死的，這大概都是不可靠的了。

讀『小山詞』

晏同叔（殊）叔原（幾道）父子，同以詞名，以處境不同，其所表現於詞者，亦差別甚大。

同叔生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卒仁宗至和二年（1055），得年六十五。歷事真宗仁宗兩朝，官至宰相。生平好客，未嘗一日不燕飲。歐陽修稱其『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酒相對歡如也。』所爲詩文甚富，多不傳，（宋詩鈔即無晏殊詩）惟所遺『珠玉詞』一卷，至今猶膾炙人口。胡適之先生稱其詞：『閑雅富麗之中帶着一種凄婉的意味，風格自高。』然余終覺其富貴氣太重，如頌聖祝壽諸作，尤意味索然。

叔原爲同叔第七子，官不過監穎昌府許田鎮。少時襲父餘蔭，處境甚優，惟晚年則似頗潦倒。近人宛敏灝所輯晏殊年譜，（見宛著二晏及其詞）甚詳密，叔原生

卒，則終無法考定。但『小山詞』有兩首『生查子』提及李師師，宋徽宗兩度幸李師師家，在大觀三年四年，（1109—1110）其時去同叔之死已五十五年，叔原之年齡，至少已近六十。這兩首『生查子』的下半闕是這樣的：

『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徧看潁川花，不似師師好。』

『幾時花裏閒，看得花枝足，醉後莫思家，借取師師宿。』

少年狂態，頗不類六十老翁之作，然則吾人只能假定叔原之見師師，當在徽宗幸師師家以前；而叔原之卒年，亦不能假定得太高，最多或不能超過七十也。

『小山詞』原名『樂府補亡集』，作者的生平既非吾人所得而詳，則我們要了解『小山詞』的風格，最好先看叔原自己所寫的這篇跋：

『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醜解慍，試續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叙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遊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竊以謂篇中之意，昔人所不能遺，第于今無傳爾。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

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以爲笑樂。已而君寵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于人間。自爾郵傳滋多，積有竄易。七月己巳，爲高平公綴緝成編。追維往昔過從飲酒之人，或壠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紀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憮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

讀了這篇短跋，不僅可以知道叔原寫詞的背景，也可畧見宋時士大夫生活之一斑，東坡教朝雲歌『枝上柳棉』，白石吹簫，小紅低唱，大率皆此類也。

近人朱古微先生選『宋詞三百首』，錄『小山詞』『臨江仙』以次十八調，其分量僅次於周邦彥與吳文英，這可看出朱先生欣賞的重點所在。胡適之先生的『詞選』，則選叔原的『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一調，『生查子』『墜雨已辭雲』一調，『清平樂』『幺絃寫意』一調，『玉樓春』『雕鞍好爲鶯花住』『當年信道情無價』兩調，『菩薩蠻』『個人輕似低飛燕』一調，『點絳脣』『花信來時』一調，『采桑子』『秋來更覺銷魂苦』一調，共得八首，共同於朱選者，僅『臨江仙』

『一調而已。』

關於文學的欣賞，依於讀者的修養，性分，以及某一時期的心情而有所不同，原無一定尺度。現在所流行的『小山詞』，計二百六十餘首，（宋六十名家詞本爲二百六十二首）其嘔心之作，決非朱胡兩家所選的這二十五首所能盡，自屬顯然。以我現在的心情來說，例如八調『臨江仙』，除朱胡同選的『夢後樓台高鎖』一首而外，至少『身外閒愁空滿』『淺淺餘寒春半』這兩首我也很歡喜。『蝶戀花』十五調，除朱先生所選的『夢入江南煙水路』和『醉別西樓醒不記』兩首我無異辭外，至少『卷絮風頭寒欲盡』，『喜鵲橋成催鳳駕』，『千葉早梅誇百媚』，『碧玉高樓臨水住』，『笑艷秋蓮生綠浦』這幾首，我也很難割愛。如『新酒又添殘酒困』，『今春不減前春恨』，『月臉冰肌香細膩，風流新稱東君意』，『月細風尖垂柳渡』，『夢魂長在分襟處』這類的句子，豈止讀來爽口，確實也足以沁人心脾啊！

『淮海詞』有一首『鵲橋仙』，其詠牛郎織女這一故事是這樣的：

『織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小山詞』以『蝶戀花』來表現這同一的題目，寫來却又是這樣：

『喜鵲橋成催鳳駕，天爲歡遲，乞與初涼夜。乞巧雙蛾加意畫，玉鉤斜傍西南掛。分鈿擘釵涼葉下，香袖凭肩，誰記當時話？路隔銀河猶可借，世間離恨何年罷？！』

雖不一定說是異曲同工，但至少可看出文人的錦心繡口真是無所不可。我想，一個初讀詞的朋友如果能採用我這種比較方法，或許能得到不少的啓發。

近人吳瞿安（梅）著『詞學通論』，於北宋僅推晏同叔（殊），歐陽永叔（修），柳耆卿（永），張子野（先），蘇子瞻（軾），賀方回（鑄），秦少游（觀），周美成（邦彥）爲大家，然論及艷詞，則仍以『小山』居首。

前舉叔原所自寫之跋文，所謂蓮、鴻、蘋、雲其人者，於『小山詞』中實屢見不一見，而小蓮與小蘋殆尤爲叔原所鍾情，茲舉數例以見其概。如『蝶戀花』云：『笑艷秋蓮生綠浦，紅臉青腰，舊識凌波女。照影弄粧嬌欲語，西風豈是繁華主

！可恨良辰天不與，纔過斜陽，又值黃昏雨。朝落暮開空自許，竟無人解知心苦！』

又玉樓春（卽木蘭花）云：

『小蓮未解論心素，狂似鈿箏絃底柱。臉邊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殘人欲去。舊時家近章台住，盡日東風吹柳絮。生憎繁杏綠陰時，正礙粉牆偷眼覷。』

此外如：『梅蕊新妝桂葉眉，小蓮風韻出瑤池。』『手撚香箋憶小蓮，欲將遺恨倩誰傳？』（以上『鷓鴣天』）又如：『記得青樓當日事，寫向紅窗夜月前，憑誰寄小蓮！』（破陣子）『時候草綠花紅，斜陽外，遠水溶溶。渾是阿蓮雙枕畔，畫屏中。』（愁倚闌令）殆無一而非爲此君發也。

其涉及小蘋者，自以『臨江仙』一調爲最有名，詞云：

『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却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此外還有兩首『玉樓春』，其描寫小蘋之美，與小蓮又自不同。詞云：

『小顰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晚紅初減謝池花，新翠已遮瓊苑路。 湔裙曲水曾相遇，挽斷羅巾容易去。啼珠彈盡又成行，畢竟心情無會處。』

『瓊酥酒面風吹醒，一縷斜紅臨晚鏡。小顰微笑盡妖嬈，淺注輕勻長淡淨。 手按梅蕊尋香徑，正是佳期期未定。春來還爲箇般愁，瘦損宮腰羅帶剩。』

上所舉例，以涉及蘋，蓮兩人者爲限，其餘提到小鴻，小雲乃至小梅，小杏，小蕊，小瓊，小謝，阿茸者尙有多首，姑從闕如。綜叔原之一生，殆全部於脂粉叢中斷送，然他在一首『醉落魄』的詞中說：

『天教命薄，青樓占得聲名惡，對酒當歌尋思著，月戶星窗，多少舊期約！』是其心情，仍不能無十年夢覺，薄倖名存之感也。

『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這是東坡摘取秦少游和柳耆卿的詞句去品題他們兩人詞的風格的。（前者見秦的一首『滿庭芳』，後者見柳的一首『破陣樂』。）

賀方回（鐫）一首『青玉案』的下半闕云：

「飛雲冉冉衝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這却正是黃山谷推重賀這首詞的評語。

清代康乾時代的詞人厲樊榭（名鶚，字太鴻。）有一首絕句評『小山詞』云：『鬼語分明愛賞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間不少分襟處，月細風尖喚奈何！』原來叔原有一首『蝶戀花』，其全文是這樣的：

『碧玉高樓臨水住，紅杏開時，花底曾相遇。一曲陽春春已暮，曉鶯聲斷朝雲去。
○ 遠水來從樓下路，過盡流波，未得魚中素。月細風尖垂柳渡，夢魂長在分襟處。』

樊榭這首小詩，便正是指此而言。但何以又提到所謂『鬼語』呢？因為叔原有一首『鷓鴣天』，詞云：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原來我們的道學先生程伊川（頤），他對這類小詞也居然能夠欣賞，當他讀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這兩句的時候，不禁莞爾笑曰：『此鬼語也』。樊榭詩所云云，當然就是指程老夫子這句話而說的。

詞人多墮綺障，即蘇辛放翁亦不免偶作艷詞，其他更何待論。我讀『小山詞』，決不否認他的好處，可是究竟覺得他的方面過於單調；叔原這二百六十幾首詞，除一二例外，而且不類他的手筆而外，幾乎沒有一首可以離得開女人，終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短處。但話仍得說回頭：叔原作艷詞，一首却有一首的意境，他不從正面去寫艷事，而只從側面去寫艷情，而且詞旨悽惋，艷儘管是艷，但只是哀艷，淒艷，這便正是他的詞品高潔處。『淮海詞』與『片玉詞』，其地位遠在『小山詞』之上，可是『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這幾句詞見譏於東坡，即少游亦無以自解。周美成有一首『青玉案』，詞云：

『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

玉體假人情何厚，輕惜憐轉啣輕囀。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憐憫！」

小晏雖專作艷詞，但他何嘗有這樣的作品呢？

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王昭君

(中國文學史上的故事之一)

胃病鬧了兩個多月，換言之，便是從去年鬧到今年。在這一期間，不僅文字不能多寫，比較正常一點的工作也無法進行。不得已，便只好唸唸詩，看看小說或筆記。南宮搏先生去年出版的一本『王昭君』，便是我在病中所看過的小說之一。

中國古今的文人，真不知爲王嬙這個女人費了多少的筆墨：詩歌，小說，戲劇，……可以說不勝枚舉。可是在這些作品中，有一個共同之點，便是對這位弱女子的遭遇，都表示了他們高度的憤慨，深切的惋惜：他們抱怨漢元帝，痛恨毛延壽，討厭大鼻子，尤其鄙視匈奴那種兒子可以娶後母的陋俗。總而言之，在中國文人們的筆底，算借了『昭君和番』這樣一個題材，充分的鼓起了漢民族對於侵入中國的蠻族一種仇恨，尤其對從北方侵入中國的蠻族爲然。

在中國一種較早的文學選本『文選』上，錄了石季倫（崇）的一首『王明君辭』，據說這是石崇寫出教他的愛妾綠珠在舞蹈的時候所歌唱的。清代詩人趙甌北（翼），在他所寫的詩話上，有『明妃詩』一條，舉了歷代詩人少數幾首詠王昭君這一故事的詩，而逐一加以批判。他對石季倫這首『王明君辭』，僅僅摘出了如下的四句：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便輕輕以四字斷定：『語太村俗』，我覺得這是不太公道的。石崇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把這首詩分析來看，前八句是敘述昭君辭別漢廷前往匈奴一種內心的哀感。次八句乃敘述她到達匈奴後的一切遭遇，像那樣一種殊風異俗，當然足以引起她的不安。不安到極點，自然可能萌起她的自殺之念；可是殺身既不可能，飛鴻又不我顧，最後的歸結，便只有出於委心任運的一途了。一首史詩，能寫得這樣完整，我們何忍以『村俗』兩字，便把古人的作品加以一筆抹煞呢？

唐人詠王昭君的詩，自應推老杜的一首七律爲冠冕，這首詩本來是大家所爛熟的，但爲青年讀者們得到一次溫習的機會，我還是把它錄在下面：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昭君本南郡秭歸人，據說她的父親名襄，她選入漢宮的時候，還只十七歲。昭君村有兩處：其一在原屬宜昌府的興山縣南，其一則在巫山十二峰之南，神女廟下。老杜另有詩云：『若道巫山女麤醜，安得此有昭君村？』又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回。』均指在巫山者而言，老杜在這首七律中所指

的，似亦如此。江淹的『恨賦』上有一段說：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紫臺』猶言紫宮，指漢廷而言，老杜不只是用了這兩個字，全首詩的韻味，也正和江淹這段文字是相通的。

此外唐人中如儲光羲、白居易、郭震、東方虬等還用了同一題材寫過幾首很好的絕句，在普通選本中不容易看到，現在我也錄在下面：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帳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儲光羲）

這首詩的好處，在能想像昭君居匈奴中，一種日常可能有的生活，不言哀怨，而哀怨自在其中。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錦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白

居易)

清代爲白香山詩作箋注的汪立名，引『詩人玉屑』批評這兩首詩的第二首說：『古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樂天一絕，其意優游而不迫切。……』說這首詩『優遊而不迫切』是對的，可是昭君之去匈奴，係中國皇帝一種公然的賜予，嫁了別人的老子，還繼續嫁了別人的兒子，其地位且貴爲閼氏，這與後來蔡文姬因兵亂而被擄去者，其情況完全兩樣，因此文姬可贖，昭君却是贖不來的啊！樂天寫這兩首詩的時候，還只十七歲，已能逞其豐富的想像力如此，可見一個偉大詩人的成就，有賴於天才者十之七八，其根於學力不過十之二三，笨伯而想作詩人，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畫師，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

厭踐冰霜域，嗟爲邊塞人，思從漠南獵，一見漢家塵。(郭震)

不能重返漢家，能望望漢家的塵土也是好的，詩人對民族情感的真摯，比較那些自命詩人而高呼侵畧中國的禍首罪魁作『爺爺』作『爸爸』的爲何如呢？

漢道方全盛，朝庭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

揜淚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胡地無花草，春來不似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東方虬）

這三首我尤其歡喜第三首，所謂『怨而不怒』者，此類是也。

在宋人中，王安石和歐陽修唱對臺，各有『明妃曲』兩首。

王詩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語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

歐詩云：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近人陳石遺（衍）的『宋詩精華錄』，只選了王安石的這兩首，歐陽修的却没有選。他對王詩並且加以批評說：『二詩荆公自己寫照之最顯者。』又說：『漢恩二句，卽與我善者爲善人意，本普通公理，說得太露耳。』我自來也很歡喜荆公這

兩首詩，不單只是欣賞他的意境新奇，鑄辭優美，也正因為他能借題發揮，充滿一種傲岸不平之氣，最足以代表這位『拗相公』的個性。可是在當時，爲這兩首詩，却曾引起了不同的看法：黃山谷（庭堅）最稱道第一首，說它『可與李翰林（白）王右丞（維）並驅爭先。』當他在潁州遇着他的前輩王深甫（名回，福建侯官人，王安石的好友。）的時候，又提到王的這首詩，『以爲詞意深盡無遺恨。』可是這位深甫先生却不以爲然，他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這個意思是責備王安石以南北對舉而不分夷夏是不應該的。當時黃山谷雖以孔子欲居九夷這個意思去爲安石辯護，却依然不能動搖深甫的這一基本觀念，他儘管覺得山谷是一個『持論知古』的可愛青年，但仍没有得到明師畏友相夾輔的必要哩！（這個故事根據黃山谷對王安石這首詩的一篇跋文，見宋人李壁王荊公詩箋注所引。）

稍遲一點，又遇着一位范冲，他對第二首更痛詆不遺餘力。他曾對宋高宗說：『……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爲

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原來范冲是范祖禹的兒子，祖禹修神宗實錄，責安石甚至，因此見惡於安石的女婿蔡卞，坐謫死嶺表，因為有這種仇恨，所以借着這首詩又把王安石大罵一番。一個是女婿替丈人報仇，一個是兒子替爸爸洩恨，中國文人的事，確實是不好辦的！（同上見李壁箋注，參看宋史卷第一百九十四范冲傳。）

平心而論，王回和范冲所講的是夷夏之防的大道理，而王安石則重在做詩，做詩在獨闢蹊徑，能道前人所未道，拿一種大道理去作批評的出發點，有時候是不大妥當的，至因此而懷疑到安石的心術，那自然是更加過分了。

此外東坡在二十四歲的時候，也就這一題材寫過一首古詩，（題爲昭君村）雖然是他的初期作品，但已有一種不可掩的清新之氣，我還是把它錄了下來：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至於比較更近代一點的，我却愛唸吳梅村的一首『出塞』：『玉關秋盡雁連天

，磧裏明駝路幾千，夜半李陵臺上月，可能還似漢宮圓？」着墨不多，意境和音調都十分可愛。

上面拉拉雜雜寫了許多，實際都是南宮搏這本小說給我勾引出來的。南宮近年寫了這類歷史故事的小說不少，我看過的也很多，但這本『王昭君』，我却不能不特別加以推荐。一般看南宮小說的人，多半只欣賞他筆觸的輕鬆，想像的豐富，但在他着手一種作品以前一段長時間的慘澹經營，却似乎爲大家所忽視了。好比他寫『桃花扇』，我知道他看過不少有關南明的史料，然後才開始着筆。看了他這部小說，再去看孔尙任的那部傳奇，我相信一定能引起更多的趣味。他這本『王昭君』的事實，係依據『漢書』的『匈奴傳』和『後漢書』的『南匈奴傳』，……可以說一字一句都有來歷；他說昭君在未去匈奴以前，已經和漢元帝有過關係，這大致是受了元人馬致遠『漢宮秋』雜劇的影響；至於最足以刺激他的想像的，自然還是我前面所錄的王安石那兩首詩。他把昭君去匈奴以後的生活寫得那樣豐富，甚至於想像到在呼韓邪單于未死以前，她已經和他的兩個兒子有了情愫，這真是以前的人

所不敢存想的。在我看來，這也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像蔡琰那樣一個才女，也還得安然的和胡人結婚生子，贖回以後，依然也還要嫁人；再像蘇武那樣的孤忠勁節，過着那種非人的生活，一個胡婦究竟也還是不可少的；人生對於飲食男女之間，有時候本來不是一種『大道理』所能規範得了，大家總還是自然一點好吧！

四十四年二月

春風燕子樓

(中國文學史上的故事之二)

白居易的「長慶集」，有詠燕子樓的三首絕句，從他這幾首詩的序文裏，保存下一個很有趣而帶悲劇性的故事。序文說：

「徐州故張尙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尙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邇來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尙書既沒，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幽獨塊然，于今尚在。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我們要了解白居易這三首絕句，應該先讀一讀張績之的三首原唱，張詩是這樣的：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
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逼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珠網任從灰！

白的和作如下：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
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烟，幾回欲着卽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一本作二十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又居易另有「感故張僕射諸妓」一首，詩云：

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堯山堂外紀」云：「此詩爲諷盼盼而作，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

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恨歛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白居易序文中所說的「張尙書」，一千一百多年以來都一直相沿以爲指的是張建封，（字本立，舊唐書說他是兗州人，新唐書說他是鄆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實際新唐書是對的。）例如近年在中國流行最廣的這部「辭源」，在「關盼盼」一條，便作如下的記載：

「唐時徐州妓，貞元中張建封納爲妾，築燕子樓居之，建封卒，樓居十五年不嫁，後不食而死。」

實際這一紀載是與事實不合的。

張建封在唐代藩鎮中，算是一位有才氣而比較識大體的人物，唐德宗的貞元四年（七八八），他由濠壽廬觀察使，轉任徐泗濠節度使，坐鎮徐州凡歷十一年以上，到貞元十六年（八〇〇）他便死了，年六十六。

我檢查白居易的兩種年譜，（其一爲宋陳振孫編，其一爲清汪立名編。）他任「校書郎」的時代是唐德宗的真元十九年（八〇三）到順宗的永貞元年（八〇五），其時白居易的年齡是三十二到三十四，去張建封之死，已經有三四年了，即令張建封在當時的軍閥中算是最歡喜結納文人的一個，但他那裏還有機會延請我們這位詩人到他那節度使的官邸去喝酒呢？白居易在貞元二十年（八〇四）把他的家口由徐州遷移到秦中，卜居渭上，這次接家眷的工作，可能是由他親身前往的，因此他在這一年可能確實在張建封的舊官邸中喝過酒，看見過關盼盼，而且主人也確實是姓張，不過不是張建封本人，而是張建封的兒子張愔就是了。

原來張建封死了以後，徐州這個地方會經過一度小小的紛擾，但結果仍由建封兒子張愔承襲了他父親的這個職位，他的官是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不久進武寧軍節度使，到唐憲宗的元和元年（八〇六），他病了，請求發表他的替人，朝廷乃召他爲工部尚書，他還不會出徐州境便已死了，朝廷又加贈他一個右僕射的名義。張愔在徐州凡七年，時間是貞元十六年到元和元年（八〇〇—八〇六）。

根據以上的敘述（新舊唐書大致是一樣），我們可看出下面的幾點事實：

一、白居易作「校書郎」的時期是八〇三到八〇五，而他在八〇四這一年，又可能親到徐州去接家眷，因此，在徐州請他喝酒的乃是張愔而決非張建封。

二、張愔在死前曾發表為工部尚書（舊唐書作兵部尚書），白在序文裏稱他「故張尚書」並沒有錯。

三、張愔死後又曾追贈「右僕射」，白在另一首絕句的詩題上稱他為「故張僕射」也沒有錯。

四、細檢新舊唐書張氏父子的這兩篇合傳，在張建封時代好像還沒有「武寧軍」這一名義，一直到張愔，才正式被任為「武寧軍節度使」。白在前面那篇序文裏，說他的朋友張績之「從事武寧軍累年」，可見張績之所知道關盼盼的始末也正是張愔時代的事，而非張建封時代的事。

由此，我們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白居易確曾見過關盼盼，但盼盼不是張建封的妾，而是張建封的兒子張愔之妾

，自來關於燕子樓這一故事的紀載，在事實上都是錯了的。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像這樣一種很顯然的錯誤，竟積重難返可以延續到一千年以上，其原因究竟在那裡？我的假定大致是這樣的：

一、張建封在徐州的時間（十一年）比他兒子的時間（七年）長，名氣也比較大，史稱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於時。」（見新唐書。舊唐書也有類似的紀載。）大家覺得：張建封既是這樣愛重文士，居然能把許孟容，韓愈延攬到他的幕府，那末白居易以一個詩人而兼「京官」的資格到了徐州，由他請去喝喝酒，並且把他所畜的歌妓叫出來「佐歡」，自然是太可能的事。可是「老帥」是這樣一位人物，這位「少帥」正也有乃父之風，這却是大家所忽畧了的。

二、韓愈在徐州幕府，其時間是貞元十五、六年之交（七九九—八〇〇），去張建封的死已經不遠，但在他的文集裏有四篇文章却是與張建封有關的：（一）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二）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三）上張僕射書，（

四）上張僕射第二書。從這幾篇文字裏，我們不僅知道張建封能寫文章，並且他還歡喜打一種「馬毬」，即此可證張建封確是一位「風流人物」，因此把盼盼這一重公案記在他的頭上，也是無怪其然的。

三、「張僕射」這一稱號，三見於韓愈的文章，而白居易的詩題却也用了「故張僕射」這一稱號，因此而發生誤會，這也是可能的。殊不知張建封在生前固然「檢校尚書右僕射」，張愔在死後却也追贈了「右僕射」，因此「僕射」這一名稱用在張建封固然沒有錯，就用在他的兒子也還是沒有錯的。

四、燕子樓這一故事的錯誤，在陳振孫所編的「白文公年譜」原已發現了，可是陳譜說張建封的官「爲司空非尚書」却又不對。舊唐書明明說張建封在貞元「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新唐書雖然記載得攙統一點，但也明明有「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這一筆。陳譜不能就白居易作「校書郎」的時期與張愔在徐州的時期，確切的作一推算，則後人依然把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文裏所稱的「故張尚書」誤會爲張建封，豈不也是情理之常嗎？

元人侯克中（字正卿，號良齋先生，真定人。）有「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王靜安先生的「曲錄」有存目。據吳瞿安（梅）的「顧曲塵談」說：「正卿以散曲得盛名，其『醉花露』良夜迢迢一折，元曲中不可多得之作。惜『燕子樓』一劇，散佚不傳，至爲可歎。」又近人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在燕子樓一條，錄有「見山樓叢錄」一則，據說：「元王仲謀撰『秋澗集』有『燕子樓傳』，序次詳贖，侯正卿『燕子樓傳奇』之所本。」我手邊沒有「秋澗集」，前天在某書店，取出這部書大致檢查了一遍，（四部叢刊本，二十四冊。）却沒有發見這一篇「燕子樓傳」，但「見山樓叢錄」的作者既已提到這部書，可見得「叢錄」關於燕子樓這一條，可能正是根據「秋澗集」，其內容更是錯得不可思議，因此我對「秋澗集」也就懶得去細檢了。

文學史的考證與文學創作是兩件事：考證是要確確鑿鑿懂得一件事實，創作却可聽憑作者的天才任意爲之。例如元曲裏「江州司馬青衫淚」這一雜劇，作者馬致遠便可硬派潯陽江上彈琵琶的這位商婦，乃白居易在長安本來就有關係的一個妓女

，殊不知「琵琶行」這首傳誦一千多年的長詩，乃正是白居易借題來發洩自己一吐皮的牢騷，當日是不是真有這樣一位彈琵琶的女子已屬可疑，更那裡談得上和他有什麼關係？因此，侯正卿這個「關盼盼春風燕子樓」的劇本，即令就還存在，其內容如何，也是與我這篇文章沒有什麼關係的。（四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蘇家三父子

(中國文學史上的故事之三)

東坡生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一〇三七)，卒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一〇一)，得年六十有六。

他大於他的弟弟子由三歲，但子由却活到七十四歲才死(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二二)。他們兄弟兩個是同在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舉進士及第的，其時東坡的年齡是二十二，子由是十九。現在流行的古文選本中，有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便是東坡舉進士的應試之作；另有一篇『上樞密韓太尉書』，便是子由在這一年成進士後寫給韓琦的。

他們兄弟兩個的教育，以得自他們的父親蘇明允洵者爲多，『宋史』裏面蘇軾蘇轍的兩篇傳都寫得不壞，而且很詳細，可是沒有蘇洵的傳。我們要翻一翻明允自

己的詩文集（嘉祐集），歐陽修一篇『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和曾鞏的一篇『蘇明允哀辭』，才能畧畧懂得明允之爲人，同時也才能對子瞻子由兄弟更多有一些了解。現在我把歐陽爲明允寫的這篇墓誌銘的序文節錄一段在下面：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問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卽宋真宗的景德四年到神宗的熙寧五年）在當時，是一位領袖文壇主持風會的人物，因爲他的立言非常矜慎，不肯隨意標榜，因此凡經過他獎拔的文人，大抵能够享盛譽於當時，傳聲名於後世，蘇家三父子，也

就正是這一時代中所孕育出來的人才。

因為他們父子同以『文章擅天下』，當時的人爲分別起見，往往稱明允爲『老蘇』，子瞻爲『大蘇』，子由爲『小蘇』，這種稱謂，經過了九百年，一直到現在不廢。實際講來，當『大蘇』『小蘇』成進士之年，『老蘇』的年齡不過四十九歲，經過九年，到英宗的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老蘇』死了，得年才五十有八。以他們父子所享的壽數看來，所謂『老』者固不必『老』（五八），『大』者亦不必『大』（六六），反而是這位小弟弟，後來居上，倒多活了若干年（七四），這也是很有趣的。

蘇老先生本來有三個兒子，最長的一個名景先，早死了，剩下軾轍兩個，老先生乃十分愛惜：對他們的教育，固然下了不少的工夫，乃至對他們的命名，也包含得有一種教訓。在『嘉祐集』的第十四卷，明允有一篇『名二子說』，全文只有幾十個字，現在把它錄在下面：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

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軾轍兄弟，不單只有這樣一位賢明的父親，便是他們的母親，也不失爲一位賢母。『宋史』蘇軾傳，載有如下面的一個故事：

當蘇軾還只有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游學四方，家居的時候很少，軾轍兄弟的教育，便由他們的母親程氏擔任。每逢着母親對他們談到歷史上的有名故事，軾對於古今成敗得失，往往能懂得其中的要點。有一天，程氏讀了東漢的『范滂傳』，便把這個悲壯的故事講給她的兩個孩子聽：『范滂是一個慷慨正直的人，當時因被誣而牽入黨錮之禍，已問成死罪。在臨刑以前，他的母親攜帶孫兒（滂子），和他去作最後的永訣。范滂對母親說：「弟弟仲博，（滂字孟博）一定懂得孝敬你老人家，我呢，便去追隨老父於地下。這樣一來，可以說生死各得其所，我總希望老人家不必爲這件事過於悲痛。」他母親聽了這幾

句話，臉上泛起一種慘痛的微笑，慷慨的回答他說：「你現在已經與李膺杜密齊名，像這樣的死法，還有什麼不值得？一個人既要享大名，又要長生不死，天地間那有這種便宜的事？」范滂跪着聽了他母親這番有力的教訓，乃向她磕了兩個頭，就此告別。回頭看見他自己的兒子也站在傍邊，究竟父子之情，不能無動於中，乃感慨的對他的兒子說：「要我教你爲惡嗎？則惡不可爲；教你爲善嗎？可是我並不爲惡呀！」當時圍在路邊眼看着這一幕活生生悲劇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爲他們母子和父子流淚。范滂死的時候還很年青，只得三十三歲。」程氏把這個故事講完，乃不勝唏噓慨歎，蘇軾畢竟小三歲，反應得比較的慢；蘇軾聽了，乃立即問他的母親說：「假如軾願作范滂，母親，你准許嗎？」程氏回答說：「你果然能作范滂，難道我就不能作滂母嗎？」（參看『宋史』列傳卷第九十七，『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七，我是加了十之一二的想像使這個故事具體化了的。）

像四川眉山那樣一個偏僻的地方，在去今九百年前，居然有一個這樣理想的家

庭，能醞釀出父子兄弟三個，同時成爲中國歷史上，尤其文學史上了不起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尤其是四川人值得驕傲的事。

軾轍兄弟不單只在文學上有了輝煌的成就，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很可注目；當時反對王安石一派改革運動的人們，分裂成爲洛、蜀、朔三派，東坡先生還隱然是蜀派的領袖哩！不過我這篇文章側重在記述與他們文學有關的故事，對他們那種焦頭爛額的政治生活，只好一筆畧過不提。可是我仍得聲明：像東坡在政治上所遭受殘酷的打擊，對他的文學修養，却不是沒有關係的。

中國研究古文的人，有所謂『唐宋八大家』一說，這雖不見得怎樣妥當，亦自有其意義。這八個人，唐代兩個，都是北方人，韓退之昌黎，柳子厚河東，同時，而且私交甚厚；宋朝六個，則江西與四川兩省平分，（歐陽永叔廬陵，即今江西吉安，王介甫臨川，曾子固南豐。）也同時，除蘇家三父子不用說外，這六個人的關係也都甚爲密切。從研究文學史的見地，看他們的時代、地域，以及私人關係，大致是似偶然而不盡偶然的。

老蘇學成甚晚，享壽也不高，有意仕進，官却不大。留下的作品，比他兩個兒子的少得多。現存的『嘉祐集』，有文十四卷，詩一卷。文甚精鍊，由苦學揣摩而出；詩雖只有二十多首，但可看出他在這方面也下過很大的工夫。

『雀殼含淳音，竹萌抱靜節，』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

這是東坡一首和陶詩（和郭主簿）的首四句。據東坡自注，雀殼這兩句，便是他父親少年時所寫的，但全詩已不存在。這兩句的意思是說：一隻初出殼的雀子，他的音很淳和，一竿初出土的竹子，它的節很靜穆，如果不是經過苦思苦吟，如何會有這樣的意境呢？更如何會令他這個了不起而且年過六十的兒子，讀來還肝肺爲之澄澈呢？現在我再把老先生的一首四言兩首五言錄在下面，以增加讀者對他更多的了解：

朝日載昇，萋萋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

所處我？（朝日載昇）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剗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醪，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

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礎，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藤樽）

子由的『樂城集』，合後集三集計算，共八十四卷。就大體說來，畢竟是文優於詩。據子由自己說：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見『樂城後集』卷二十一）。

東坡稱道他老弟的話，容許是帶得有幾分的鼓勵，但子由確有好詩，乃是事實。現在只錄他的四首絕句在下面，以見一斑：

逍遙堂與兄子瞻會宿二首

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官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因臥紙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淒淒！

涿州寄子瞻兄四絕（錄二，按子由時在出使契丹途中。）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這四首詩子瞻都有和作，我們看東坡全集和樂城集，他們兄弟的唱和之多，就我所知，除掉元微之和白樂天外，好像是沒有人可以和他們相比的。元白是朋友，二蘇雖是兄弟，但風誼却也在師友之間，東坡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他有這樣一個老弟，子由也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他有這樣一位哥哥，東坡在一首送他們朋友李公擇的詩裡，有這樣兩句：「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又當他四十四歲這一年，因政治關係入獄，以不堪獄吏虐待，自分必死，作了兩首七律，交給看守他的獄卒梁成，寄與子由，有沈痛的兩句：「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讀之更使人增友于之感。

東坡天才橫溢，文是大家，詩也是大家，詞與稼軒齊名，更爲宋詞放一異彩，字寫得不壞，還能畫幾筆，在生活修養方面，更有工夫，真可算是興趣多方，我在另一篇『蘇軾與陶潛白居易』的短文裏，想比較詳細的談一談，這一篇便暫止於此了。（四十四年一月）

黃遵憲其人及其詩

(1848—1905)

與其說我如何歡喜人境廬詩，毋寧說我比較更歡喜黃公度這個人。

我有一種自己也認爲不太好的習慣：即我平日無論讀前人或同時人一篇文藝作品或一篇普通論文，我總感到有先知道作者是怎樣一種人的必要，假定我對一個人完全不了解，或了解而其人乃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對這個人的任何作品，或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便懶得去理會；即偶然有機會接觸到，也無論如何不會使我對它有親切之感。

公度先生的詩，大致在四十年前，我已經在梁任公的「飲冰室詩話」中讀過一部分，但在當時我對它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印象，即在後來讀他全部的詩集亦然，原因很簡單：第一、儘管作者說他所作的詩是一種『新詩』，乃至梁任公和胡適之兩位也對他這一點會予以高度的評價；可是細細讀他全部的作品，真正能做到如他自

己所說「我手寫我口」這一主張的，在他的十一卷「人境廬詩草」中，最多也不過佔十之一二，其餘的則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還是十足道地的舊詩；甚至從某一觀點上說，他也和中國過去若干舊時代的作家一樣，歡喜在他們的作品中，搬弄許多生僻的故典，如果不加注釋，便是今天在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也未必能完全了解。

第二、公度先生的詩，普遍被一般的文藝批評者稱為「詩史」。公度先生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只活了五十八歲。他生存的這個時代，正是中國遭遇內憂外患的一個多事之秋，他的詩篇確實能對這一時代的陰影給以充分的反映；尤其對於甲午中日戰爭，戊戌維新失敗以及庚子拳變的經過，他所留下的鴻篇鉅製和許多慨當以慷的短什，合計起來，何止兩百首以上。這裏面披露了當時許多政治的內幕，對他同時的人物或師友也給了一種很生動的素描，尤其對他自己晚年的身世，更發瀉了不少的牢騷抑鬱。我近年因為曾在幾處學校担任過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程的講授，對於甲午、戊戌、庚子這幾幕的史料

，多少有些接觸；公度先生的朋友如梁任公（啓超）、徐君勉（勤）、狄平子（葆賢）、俞恪士（明震）、熊秉三（希齡）等，我後來也曾在一種偶然的場合見過；加上錢仲聯（萼孫）在民國二十五年出版的這部『人境廬詩草箋注』，尤其在卷首所附的一篇公度先生的年譜，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在近來再翻翻這部詩集，覺得比較四十年前要親切得多了。因為讀人境廬詩同時我也想到：我覺得古今爲陶潛、爲李杜、爲韓柳這班人的作品做箋注的人，往往只是就詩解詩，就文論文，很少有人能就他們所生存的時代以及該一時代所給予他們作品的影響，作出一些條理明晰的敘述；因此大家儘管是一樣的讀陶、讀李杜、讀韓柳，所了解的往往只能在他們的技術與意境之間，很少能接觸到每一作家的心靈深處。近年因爲多少受了西洋文藝批評和傳記文學的影響，風氣已經漸漸在變，關於這一方面的寫作，已漸漸有些可看的東西，我覺得這樣一個趨勢很重要，今後要好好向前發展。

第三、公度先生的少年時代，也和當時一般普通的讀書人一樣，只能埋頭做做八股文，希望從科舉方面找到一條出路。可是他畢竟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對於這

類無聊的勾當，內心老大的不願，「謬種千年鬼國冊，此中埋沒幾英豪，國方年少吾將老，青眼高歌望爾曹，」我們只看他在戊戌後所寫懷念幾個湖南青年（李炳寰，蔡鏗、唐才質）的這首絕句，便可知他對於八股文是何等的厭惡。因此，在他二十歲考得秀才，二十九歲又考得舉人以後，便毅然決然放棄了這種應試生活，而入貲捐了一名道員。便在他中舉的這一年（光緒二年），他在烟台認識了當時一位留心洋務的張蔭桓，張和他很談得來，彼此會有唱和之作。在同年同地，他又第一次會見了李鴻章，（李此時是以和英使威妥瑪會商雲南馬加里案到烟台來的）李對他也很有賞識，事後對人談起，居然對他以「霸才」見許，像這樣恭維一個初次見面的後進，出之於平日對人相當傲慢的李鴻章，確實是不太容易的。黃後來和李還有過多度的接觸，光緒二十七年李死以後，公度有挽李的四首七律，最後一首有兩句說「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便是由於和李第一度見面而來，黃對李在中日戰後所抱的聯俄政策儘管極端不贊成，但他對李個人，却是不無知己之感的。公度先生何以會從一個做八股文寫試帖詩的舊書生，一變而成爲一個清末外交界

錚錚有聲的人物？可能是受了張李這班人多少的鼓勵，這也是在我知道他畢生經歷以後然後才明白，對於進一步理解公度的詩，這一點不能說沒有相當的關係。

光緒三年（1877），公度隨中國第一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到日本任了一名參贊，這便是他從事中國初期外交生活的開始。其時公度的年齡剛剛是三十歲。以他汪汪的風度，斐然的文采，在他這一任四年以上的留日時間，（日本的明治十年至十五年）他不僅結交了日本朝野不少的賢豪，（如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大山巖諸人，都和他有交往。）對明治維新初期的經過有了深刻的認識，即對他作詩的興會，因環境和題材等等的關係，也得到了了一種新的鼓舞。公度對於歷史本有高度的愛好，這便從他所作的詩裏也可以看得出來；當他留在日本有了相當的時間，他便發願寫一部『日本國志』。後來這一部四十卷的大著，雖一直延到光緒十三年當他留在國內的時候才告完成，但在他留日的期間，早已開始着手。梁啓超說：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羣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

先見。」（見任公所撰嘉應黃先生墓誌銘）

公度在留日期間所作的詩，除「日本雜事詩」兩卷另有單行本外，保留在「人境廬詩草」中的，約有五十首左右。有人說他的「日本雜事詩」是他搜集日本史料的一種副產物，這個話大致是不錯的。就詩論詩，「雜事詩」原不怎樣重要，但從他所加的那些「自註」，却可看出他研究日本歷史和一般社會情況的努力。留在「詩草」中五十首左右的詩，在他這個集子裡，却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其時他初出國門，無論在眼光上或心境上都得了一種新的解放，因而表現於這些作品的氣象，乃自自然然的有了一種異國情調和新的意境。舉例言之，如「西鄉星歌」、「近世愛國志士歌」，這是寫日本維新前後的故事的；如「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是寫日本歷史上那種武士道的神的；如「不忍池晚遊詩」、「櫻花歌」、「都踊歌」，是寫日本一般風土人情的。可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公度所寫這類的詩，總處處表現他對日本歷史知識的豐富。胡適之先生很歡喜他的「都踊歌」，我有同感；但說到用力甚大，而詩也確實寫得不壞的，我卻還是要推薦他的這首「赤穗四十七義

士歌。』。武士道本來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種道德，在今天的日本，也沒有什麼人特別去加以提倡，可是以生龍活虎的筆墨，寫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詩總不失為好詩。這好比我們在今天也沒有人提倡遊俠，提倡刺客，但誰說司馬遷寫遊俠寫刺客寫得不好呢？可惜這首詩的前面有一篇一千三四百字的長序，不看這篇序文，詩的好處便不能完全表現，因此不錄。現在還是把『都踊歌』錄在後面，讓大家欣賞欣賞黃公度一派的所謂『新詩』吧。

『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

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

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

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

回黃轉綠兮按莎，荷荷；

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

貽我釵鸞兮鮑我翠螺，荷荷；

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

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

鷄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

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

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

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

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

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

今日夫婦兮明日公婆，荷荷。

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

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

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我想，假如一個人會看過日本式的舞蹈，能欣賞他們的音樂，和服，同時又能

了解他們的男女關係，一定更能懂得這首詩的好處。

胡適之先生爲「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冊寫的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黃公度「做過三十年的外交官」，這句話是不合事實的。實際公度在日本任參贊只有四年零三個月，接着任舊金山的總領事三年半，回國住了四年多，到光緒十六年（1890），才跟薛福成到英國任駐英使館的參贊，留英不到兩年，又被調到新嘉坡任總領事，留新近三年，因爲中日戰爭爆發，張之洞由湖廣總督移署兩江，便電奏調他回來幫忙，可是他和張處得不怎樣好，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便加入了康有爲等所主持的強學會；二十二年，他和梁啓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發起「時務報」（旬刊）；從二十三年的六月到次年的四月，他留在我們的湖南，這一段時間，在他的歷史上很重要，我留到下面詳說。本來在光緒二十二年，清廷會任命他做出使德國大臣，二十四年又任命他做出使日本大臣，但都沒有成行，而戊戌黨禍已經爆發，他也幾乎不免，因爲外面得着伊藤博文，內面得着袁昶等的援救，才得冒放歸，而他的政治生涯便也從此結束，其時他的年齡已經五十一歲，他的自然生命也

只剩下最後的七年了。綜計他一生的經歷，他正式做外交官的時間總共不過十二年而已。

「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號風波民，百年過半洲遊四，留得家園五十春。」這是公度先生所作『己亥雜詩』八十九首的第一首。己亥是光緒二十五年，也正是他因戊戌黨禍得罪家居的第二年，其時他已經是五十二歲。這八十九首雜詩歷叙他的生平，故鄉的風土，朋友的交遊，尤其十二年的國外生活，更爲他所津津樂道。關於他在日本所作的詩，前面已經提過，至於他在美洲，留英倫，遊歐陸，住南洋，所作的詩也在百首以上，但我在這裏却只想提出他『錫蘭島臥佛』六首五古來談談。梁啓超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公度雖於學術無特殊貢獻，但却是在這一時代潮流中感染最深的一個傑出人物，因而他對佛學確也下過一番工夫，這一點，只要我們一讀他這六首五古便可完全明白。『錫蘭島本名楞伽，佛說楞伽經處也。山中拔海三千尺，有勝區曰坎第，有湖作牛角形，周遭可十里，故宮在焉，宮外一寺，人境廬詩所詠臥佛，即

供養此中。」（見梁著『歐遊心影錄』）公度從光緒十六年隨薛福成使英，路過錫蘭，會到此一遊，因而才有這六首長詩的創作。當時他在旅行的途中，不見得攜有多種書籍，但他在寫這幾首詩的時候，運用了無數有關佛學和佛教的故事，却如數家珍，隨着他那種悲歌慷慨的心情，一一湧現於筆底。從正面詠臥佛的，僅佔六首中的一首（第二首），其餘各首，則在慨歎佛教的盛衰，印度的滅亡，以及佛教流行於亞洲各國的梗概，從這一角度，他能使我們深切感到西力東漸以後有色人種種遭遇的可悲，而佛教的衰微，又不過是其中的一端而已。假如遇着一個平凡的詩人，碰到這樣一個題目，我想可能只用幾十個幾百個字來抒寫他自己的一點感想，也許還會涉及當地環境的清幽，或進一步頌揚一番佛法的偉大，也就够對付了。可是公度先生寫這六首長詩，却是以他洋溢的熱情，充沛的精力，夾叙夾議，首尾一氣貫注，一共用了二千五百字左右，這確是道咸以來數以百計的詩人所絕無僅有的。現在我把這六首中比較短一點的第二首錄在下面，讓一班不曾細讀過人境廬詩的青年朋友們鼎嘗一榷吧。

「浩浩象口水，流到旻伽山，（案旻伽卽楞伽）遙望窣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鬢雲堆華鬘，大青髮屈蠶，圍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顛？或言佛涅槃，波羅雙樹間，法即茶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踞兩山巔，至今雙足蹟，尙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漸次成市廛，此亦妄造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真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過三千年？」

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人中真正能了解日本的，殆莫如公度。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公度因張之洞的奏調，到了南京，可是當他見着這位名士而兼大官的時候，「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一反普通屬員拜見上司的常態。（見康有爲『人境廬詩草』序）張之洞本來也自命不凡，同時又最講究官場的『過節』，甚至送客

送到何處爲止，也必須隨被送者的官階而定，（此說得之余倦知姑丈）因此對公度並不怎樣重視，而以閒散置之。後來公度在『己亥雜詩』中有一首追述他當時一種鬱鬱不得志的心境說：

「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茫茫人海浮沉處，添得閒鷗又二三。」

他度着這種「閒鷗」似的生活，一直有兩年多，在他的詩集中有關甲午一戰的各篇，如「悲平壤」，寫我陸軍在朝鮮的失敗；「東溝行」寫海軍的敗績；「哀旅順」寫旅順要塞的陷落；「哭威海」寫海軍最後的被殲；「降將軍歌」寫丁汝昌的自殺與乞降；「台灣行」寫台民的始而反抗終於屈服；大率都成於這一時期，真可當得起「詩史」兩字而無愧。尤其「度遼將軍歌」一篇，寫一位歡喜搜集金石的湖南巡撫吳大澂，因爲得了一顆僞造的度遼將軍漢印，高興得不得了，以爲是萬里封侯之兆，因而慷慨請纓。其時與日本作戰的大率爲滬軍，既已屢屢挫失，清廷也雅有起用湘軍之意，因而命大澂督率魏光燾李光久等所帶的二十三營出關，不幸牛莊一戰，魏李等也依然慘敗，大澂狼狽逃歸。公度寫這首詩，莊諧雜出，把吳大澂形

容得淋漓盡致，而一字一句又確係根據當時的事實，在公度寫中日戰爭的各篇中，更允推傑作。

公度到我們湖南去做長寶鹽法道，這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天的事。原任鹽道的本來是李經羲，因為升了湖南的按察使，到北京「陛見」去了，因此公度一到長沙，便署理了李這個按察使的職務。其時湖南的巡撫是陳寶箴，他是二十二年到湖南的，年齡已六十六，因感於對日的失敗，求改革之心甚切，他的兒子陳三立，又多方贊助之，更加上兩任以新學誅士的學台，前任江標，後任徐仁鑄，於是湖南的學風乃漸漸起了變化。自從公度到了湖南以後，譚嗣同也回了長沙，同年十月，梁啓超又被聘來湘講學，地方紳士如熊希齡、皮錫瑞、唐才常等，更莫不同心協力以改革湖南為職志。因此，湖南自二十二年以後，所倡辦的新事業如內河小輪、商辦礦務、湘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衛局、南學會、湘學報、湘報，乃次第出現。其維新的成績，在當時的各個省區中，確實是首屈一指。

所謂「南學會」，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學會，當時主持這件事的人，確想把這個

學會逐漸擴大，成爲地方自治的基礎。他們每七天必開會一次，由公度及梁啓超、譚嗣同、皮錫瑞、唐才常等輪流出席講演，凡國際大勢，中外學術，行政原理，都可作爲他們的講題。會議是公開的，自巡撫、學台、各司道，以及地方人士，均可出席聽講。不過從實際講來，當日南學會這般人，除一個黃公度以外，都不曾讀過外國書，更不會到過外國，無論他們是怎樣熱心，所提出的主張，終不免支支節節，只有黃公度，他確實在東西洋各國住過一十二年，美、英、法各國政治的精神所在，他確能洞見本源。因此，當光緒二十三年他還留在北京的時候，便對當時日本駐北京的公使矢野文雄說過：『二十世紀的政體，必爲英法的民主。』他一到湖南，便極力提倡人民自治。我們現在看他在南學會第一二次的講稿，他曾大聲疾呼對當時到會的聽衆說：『所求於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矣！某利當興，某弊當革，學校當變，水利當籌，商務當興，農業當修，工業當勸，捕盜當講求，……以聯合之力，收羣謀之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邇治，臻大同之盛軌。』（這篇講稿，登載當時的『湘報』，後錄入梁

啓超的「戊戌政變記」。可看出他對民主政治有何等的篤信。

公度在湖南，不到一年的工夫，光緒二十四年的四月，他便因病解除了他的職務。在這短短的十個月，他所竭全力以赴的，不外三件事：第一、教育，如辦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之類，實際上梁啓超到時務學堂講學，便是由他勉強拉去的；第二、設保衛局，保衛局誠然包括了現在警察所做的事，但是以地方人士爲主體，官方僅僅處於輔助的地位，實際乃是一種地方自治的機構；第三、改進裁判，整頓監獄，刪除淫刑，這都是他做按察使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我們試想：發展教育，加強自治，改革司法，這些不都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國家最基本的工作嗎？可是公度先生在今六十年以前，便已抓住了這些要點，不能不說是眼光如炬。我常說：中國最早從事改革運動的，有四個最重要的人物，都是生於廣東：孫中山，廣東香山；康有爲，廣東南海；梁啓超，廣東新會；黃遵憲，廣東梅縣；這真是廣東朋友值得誇耀的地方。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公度奉了充任出使日本大臣之命，延至八月政變以後，他

還滯留上海，當時有人傳說，康梁便藏匿在公度的住所，清廷因命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鈞，張大其事，派兵兩百名圍守，如臨大敵。實際公度當時所住的地方是上海道公所，而康有爲已到香港，梁啓超已去日本，清廷所以要這樣做，因爲他們確認公度乃是參與維新運動的一個要角，乃不惜架詞誣陷，想把他逮捕到北京去問罪，幸而得着中外人士的多方援救，才倖免於難。

戊戌改變這一幕，除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康梁遠逃異國而外，李端棻張蔭桓則遣戍新疆；徐致靖則下獄永禁；陳寶箴、江標、徐仁鑄、文廷式、陳三立、熊希齡等則革職永不叙用，甚至連一個經師，僅僅在南學會演過幾次說的皮錫瑞，也被革去舉人。這些人大率是公度的好友，有的還在湖南和他共過一時的事，因此，公度儘管得旨放歸，但精神上所遭受的打擊卻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他爲這件事，爲這些朋友，也寫過不少的詩，有一首題爲「仰天」的七律，乃更足以表達他滿腔的孤憤。詩曰：

「仰天擊缶唱烏烏，拍遍闌干碎唾壺。病久忍摩新髀肉，劫餘驚撫好頭顱；篋

藏名士株連冊，壁挂羣雄豆剖圖；敢託鳩媒從鳳駕，自排閭閻撥雲呼！」

公度這種憂國家愛朋友的孤憤，是不是可以到此爲止呢？不然：從戊戌的八月，到庚子的七月，不到兩年工夫，慈禧太后和載漪、徐桐、剛毅這般頑固的王公大臣，因爲痛恨維新之故，仍在繼續不已的拚命反動。當時他們集矢於光緒帝，決心非把他廢掉不可。可是這一舉既得不到國際的贊同，而康梁等的保皇運動反得着外人的庇護，同時地方上有力的總督，（如劉坤一）和民間的知識分子，（如上海的經元善蔡元培等）也都不以廢立爲然，聯合多人，通電反對，因此頑固派被逼得只好採取緩進步驟，乃有立溥儀爲大阿哥的一幕出現。可是頑固派決不死心，他們既已發覺外國人是使得他們的計劃無法實現的最大障礙，其時對外人的一種嫉視心理，乃如憤火中燒。拳匪起於山東，不久即蔓延於直隸，以「扶清滅洋」爲稱召，以神權煽惑愚民爲方法，以一種帶有若干宗教色彩的秘密組織作爲他們活動的骨幹，而甲午戰爭以後列強加緊對中國的侵畧，又確實給予他們一種排外的最好口實。慈禧和載漪、徐桐、剛毅這般人的頭腦，確比拳匪中的「大師兄」如張德成曹福田之

類高明不了多少，因此一拍即合，乃有庚子一幕的悲劇演出，清廷固因此而陷於非亡不可，而整個國家也因此幾乎陷於萬劫不復。

其時公度住在他的家鄉，一天天聽到這種來自北方的惡劣消息，只是束手無策，不得已乃把他哀時念亂的悲憤，一一托之於詩。計自拳亂初起，迄次年和約成立及慈禧和光緒帝的重回北京，他爲這件事一共寫了八九十首的古今體詩。儘管措辭相當含蓄，可是對於慈禧及當時的首惡諸人，確曾顯明的加以指斥。他所寫『五禽言』的第四首，便是明指慈禧的專橫誤國，因爲寫得生動有趣，且極合當時的事實，現在我把它錄在下面：

『阿婆餅焦，阿婆餅焦，阿婆年少時，羹湯能手調；今日阿婆昏且驕，汝輩不解事，阿婆手自操。大婦來。口讒譎；小婦來，聲囂囂；都道阿婆本領高！豆其然盡煎太急，炙手手熱驚啼號，阿婆餅焦！』

『婆餅焦』是一種山鳥。『阿婆年少時』兩句，是說慈禧年青時佐咸豐帝平定太平天國是相當能幹的。『今日阿婆昏且驕』以下三句，是說她晚年糊塗而且驕傲，總

覺得別人不行，非由她來獨裁不可。『大婦來』以下五句，是說她受着羣小包圍，這般人大抵都向她歌功頌德。『豆萁』以下三句，便是說火燒的太大，手燙了，她哭了，餅子也給她燒焦了！

另有一首『京師』，是寫北京亂後一般的景象的。詩曰：

『鬱鬱千年王氣盛，中間鼎盛數乾嘉；可憐一炬成焦土，留與東京說夢華。鸚鵡來巢公在野，鴟鴞毀室我無家，登城不見黃旗影，獨有斜陽咽暮笳。』

羅惇齋在他所寫的『庚子國變記』裏說：『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幾句話，正好引來作公度這首詩的註脚。

庚子這一幕，公度在一方面固然爲着國家的前途感到無限的傷心，但尤其使他痛心的，乃是他的幾個最好的朋友也是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中被犧牲了的。在『人境廬詩草』中，有三首寫得非常沉痛的五古，題曰『三哀詩』，便是爲他的三個好友而作的。第一個是袁爽秋（昶），第二個是吳季清（德瀟），第三個是唐韞臣（才常）。

這三個人中，吳季清在浙江西安縣任上爲亂民所殺，雖說與當時的拳亂不無關係，但與整個大局的關係則甚輕微，這裏可以不說；至於袁唐兩位的死，則極爲重要，現在我把他們兩人和公度的友誼，簡單的敘述如下：

袁昶，字爽秋，一字重黎，浙江桐廬人，光緒六年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追諡忠節。少習詞章，繼乃博覽諸子，推原理學，旁及佛老，著有『漸西邨人集』。光緒十五年，公度在北京，便已和爽秋認識。這一年，公度奉命隨薛福成出使英國，爽秋寫了十首絕句送他，以國器相期許，並極推重他著的『日本國志』。光緒二十一年，公度應張之洞之召到了南京，爽秋又和他在南京見了面，其時『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爽秋對公度說：「假如你的『日本國志』早已印行，便可省去這次的賠款二萬萬兩。」原來公度在光緒十三年把他的『日本國志』寫成以後，並未付印，僅僅抄了四份，一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送李鴻章，一送張之洞，他自己留下一份。送總理衙門的這一份，寄到後即被束之高閣，無人過問，只有爽秋看過一遍。甲午之後，翁同龢、文廷式、張謇等，主張對日作戰最力，可是他們對日本維新以

後的國力，並無何等了解，貿然主戰，以致弄到割地賠款了事。爽秋的意思：假定當日文張諸人也能有機會讀到公度這部叙述日本國情的大著，則他們對翁的進言，可能較爲慎重，李鴻章主和的意見，或不至爲翁所壓倒，而國家也或許不會受到這樣重大的損失。這雖是爽秋對公度一種過度推許之辭，但公度對爽秋，則不勝知己之感。

爽秋以反對拳匪殉國，其剛直敢言，在清季確爲疾風勁草；尤其以他與許景澄連名痛劾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毓賢、裕祿、董福祥，並且直指載漪等庇匪誤國一疏，爲當時極有關係的文字。公度在『三哀詩』第一首悼爽秋的裏面有一段說：

『……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指之洞），青梅雨飭條，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携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今日讀公疏，倘得行公意，四百五十兆，何至貽民累？不獨民累祛，中國咸受惠，即彼附賊徒，亦緩須臾斃，斥公助逆人，黃泉

見亦悔。……」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的憂國之誠，其互相推重之意，也就不覺溢於言表了。

唐才常字毅臣，一字佛塵，湖南瀏陽人，拔貢，兩湖書院高材生，與譚嗣同同鄉，年相若，（譚長於唐兩歲，其死年均爲三十四）交情也最深，當時有瀏陽二生之目。光緒二十一年，梁啓超與嗣同初見面，問譚誰是他最好的朋友，譚答：「二十一年勿頸交，毅臣一人而已。」任公與才常訂交，則是二十三年他到湖南講學時候的事。戊戌嗣同殉國，才常慟哭辭家，準備到北京收葬，到達上海，嗣同的靈柩已經南下，才常因去日本會見康梁，有所策劃。才常有悼嗣同的輓聯一首，曾傳誦一時，聯云：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携二十年勿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他這種許友以死的精誠與血性，便在今天讀來，也還是使人自然流淚。

黃公度也是到湖南才和才常認識，但對他了解頗深，戊戌公度回家鄉以後，第二年己亥所寫的『續懷人詩』，有一首便是因懷念才常而作，這首詩是這樣的：

『頭顱碎擲哭瀏陽（指嗣同），一鳳而今曠楚狂，龜手正需泚澗藥，語君珍重百金方。』（才常在長沙『湘學報』撰文，其筆名為泚澗子。）

我們讀這首詩，便知道公度非常明白才常的性格，他預料嗣同一死，才常一定準備拚命，詩中的『珍重』兩字，含得有深切的勸慰和愛惜之意，決不是尋常泛泛的應酬話。

才常於庚子七月自立軍一役為張之洞所捕殺，據當時在漢口所搜得的證據，實與康梁關係甚密，其宗旨確為『請光緒帝復辟』；但重要同志中有少數抱革命主張的，也是事實。公度在『三哀詩』的第三首中說：『人言秘篋中，別藏法三章。意實主民權，假託尊王綱。……是皆莫須有，秘獄誰能詳。』又說：『明明勤王師，轉以賊名揚。』這是辨明才常的行動，確與康梁保皇的主張一致，與當時『興中

會』的關係畢竟是微乎其微。

此外公度爲庚子一役所寫的詩，還有一首『聶將軍歌』，也至今爲人所愛讀。這首詩是爲淮軍名將聶士成而作，當拳匪初起時，士成奉命相機勦辦，等到聯軍攻陷大沽，士成又奉命赴前敵對外作戰。羅惇齋在『庚子拳變餘聞』裏說：

『聶軍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之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責之。』

公度在這首詩裏，有幾句描寫聶將軍作戰猛勇的情況，真寫得虎虎有生氣，讀之使人神旺：

『……大沽昨報礮台失，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咄咄起，起處無處覓，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槍雲黑，百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去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

聶士成便是在這種內外交逼的形勢下，壯烈的犧牲於前敵的。

公度在去世前的幾個月（光緒三十年冬），還寫了三首詩寄給梁啓超，題爲『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其時立憲與革命的論戰已大起，公度這三首詩的第一首，有幾句托爲夢中任公向他訴說的口氣，便是反映當時這一事實的：

『……君言今少年，大罵余非夫，當服九世讎，折筮答東胡，逐逐揮日戈，彎彎射天弧，孰能張羅網，盡殺革命徒？汝輩主立憲，寧非愚欲迂！……』

這可看出公度所寫的詩，始終都是和他所生的時代息息相關的。

最後，我應該在這裏說明：黃公度決不是一個甘心做一個詩人了事的人。自從光緒二十四年他回到他的家鄉以後，一直到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死去，差不多還有近七年的時間。在這七年的歲月中，他依然有一種『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氣象。不幸因爲時局一天天更趨於惡化，使得他無所措手，然後才齎志以歿。在他臨死以前的一個月，他有一封信寫給他的朋友狄平子，內中有幾句說：

『……自顧弱質殘軀，不堪爲世用矣，負此身世，感我知交。……』

還有一封寫給他五弟遵楷的信裏也說：

「……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望矣。……」

所謂『生平懷抱』，究竟他所懷抱的是一些什麼呢？在這裏我可以舉出在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月他寫給梁啟超兩封論學論政的信，便可看出一個大概。

第一封是因為當時梁任公打算寫一部「曾國藩的傳記」，寫信給公度，請他批評批評曾國藩的學問，事功和人品。他在回信中對曾的學問批評說：

「……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哲學未夢見也。……」

論到曾的事功，他說：

「……其功業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弼爲尤甚，然彼視洪楊之徒，張（總愚）陳（玉成）之輩，猶僭竊盜賊，而忘其爲赤子爲吾民也。此其所盡忠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

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

說到曾的人品，他說：

「……論其立品，兩廡之先賢牌位中，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
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

又說：

「……佛言謗我者死，學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

第二封信裏有一段，表示他對中國政治前途的一種看法，他說：

「……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公言中國政體，徵之前此之歷史，考
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爲師，是我輩所見畧同矣。時勢所激，其鼓盪推移
之力，再歷數十年或百餘年，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
皆未可知。然而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

注意：公度在這兩封信裏所表示的意見，都是一九〇二年所說的，隔現在已經

有五十五年了，我們看看目前的情形怎樣？公度在五十五年以前，便已鄙棄中國的考據，詞章，義理，而目爲『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其立言容有過激之處，但這些東西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寶貝，可以用來救亡圖存，總是事實。但不幸今天却還有不少學人，拼命要把許多青年領導着往故紙堆裏去攢，究竟能攢出一些什麼，不是大大的疑問嗎？公度在五十五年以前，已知道提倡民權自由，並且斷定在最短期間，『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不幸到了今天，却還有多少的老年人青年人打成一片，視民主自由如毒蛇猛獸！中國人之不容易長進，真是太可驚了啊！

不幸公度只活到五十八歲便死了，假定活到六十五歲以上，他一定會贊助辛亥革命；假定他能活到七十五歲左右，他一定會參加五四運動；這是從他那種熱烈蓬勃的性格，和敏銳透澈的思想，可以深信不疑的。（四十六年四月一日）

文人兼經師的王闓運

(1832—1916)

湖南爲近代人才之淵藪，自咸同以降，以迄民五之擁袁倒袁，包括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吾湘人殆無不居於領導地位。其間以文人而兼經師，著作甚富，享年最高，其影響直接及於湖南四川，間接且及於全國者，殆莫如王湘綺先生。

湘綺先生名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生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卒民國五年丙辰（1916），得年八十有五。身歷道，咸，同，光，宣五朝，以迄民國，所經事變之繁，與所接觸人物之多，近世殆罕其匹。

商務所印行之『湘綺樓日記』，始同治八年己巳（1869），迄民五丙辰，凡歷四十八年，共訂三十二冊。其內容或記家居讀書，或記出遊講學，凡交遊之樂，遊覽之迹，或偶抒懷抱，或偶發奇想，無不纖悉畢載，間亦錄存未入專集之書札，詩詞，尤足珍貴。涉獵一過，於此半世紀間學風之遞嬗，人物之消長，社會之變遷，

均可窺見其梗概。其敘述湖南當時各方情況，余讀之倍覺親切有味，而老輩用力之勤，尤足使吾人感奮興起也。

予讀陳壽『三國志』，雖亦敬諸葛亮之爲人，然終感不足，壽譏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但予之觀點則不在此。亮在建興五年所上疏（即所謂出師表），其對後主所推薦之人物，不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四人，郭無傳，向亦無專傳，行事不詳；費董雖有可稱述，亦平平不足道。而亮所必欲鋤而去之或竟置之死地者，則爲劉封彭羸廖立李嚴馬謖之流。亮之於封，則慮其『剛猛難制；』於羸則認爲『心大志廣，難可保安；』而廖立之罪名，更不過『坐自貴大，滅否羣士。』至於李嚴馬謖，則本爲亮所推重之人，亮之譽嚴，則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亮之於謖，則以『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此數人者，俱各具有過人之秉賦，亮苟有以誘掖之，不難蔚爲人才，爲國棟幹，然卒無一能盡其用。予初求其故而不得，閱『湘綺樓日記』有說法家一段，其言曰：

『管仲鄭僑諸葛亮，皆法家也，法家自用而不用賢，所用者皆不如己者也。彼

必以供驅策贊歎悅服者爲可委任，賢者又安肯履其廷干其忌乎？且法家唯自用乃能成功名，若知有賢於己者及與己等者，已非法家之法。……後世功名之士，大抵皆名法家。」

凡余平日所不滿於亮者，讀湘綺此說，蓋得一印證焉。

湘綺曾兩度入川，主講於尊經書院。抗戰中予三至成都，每至必於書肆中訪求湘綺在川所刊行之遺著，所得頗多，而最爲予所寶重者，爲『獨行謠』與『王志』兩小冊。『獨行謠』爲絕句六十首，所詠乃太平天國一時期之故事，始金田舉事，迄大亂弭平，凡『湘軍志』所不能詳者，均於詩之附註中委細述之。近年有關太平天國之史料，經多人熱心搜集，已蔚爲大觀，予涉獵所及，似未有提及湘綺之『獨行謠』者，可怪也。

『王志』兩卷，湘綺弟子桂陽陳兆魁編輯，大抵爲湘綺先生筆答及門問難之作，亦偶存筆記或其他短論。其『論咸同以來事』凡十則，所記當時故事與他家頗多出入，特舉數例如下，以資參證：

一、記曾李關係云：『李少荃（鴻章）平生服事翁二銘（心存），於曾蔑如也。後爲翁叔平（同龢，心存三子）所排，至興大役，欲致之死。……余嘗謂之：「君推崇翁二銘過曾滌生，顛倒是非，故其子以此報。」李但笑不答也。』

二、記駱秉章與曾左關係云：『……湖南空虛，萬事莫辦，曾侍郎（國藩）獨立治軍，（駱）不惟不助之，反多方以扼之，官士承旨，視曾軍如土寇。其用左郎中（宗棠），由張石卿（亮基）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爲起，見必垂手侍。……』（按此條記左入駱幕情形，與薛福成所記完全相反，或此特初期事實，後乃有所改變耳。）

三、記左李出處云：『世皆言左由曾薦，當密寄問曾時，曾覆奏左未能當一面，恭王違衆用之。李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快望，後以沅浦俊臣俱辭避，李乃自請行，（指鴻章赴上海治軍事）非曾意也。』

四、其論曾胡云：『曾起農家，胡稱貴胄，諸所措置，曾不及胡。而同時名人，希與胡接，由其少無邊幅，又荒於學涉故也。使曾有胡材略，胡有曾聲望，則豪

俊效用，規模宏遠。中興之業，實成自胡，而外議不知所由，或謗成諛，皆非事實。……』

『湘綺府君年譜』六卷，爲湘綺長子代功所述，叙事謹嚴，文字簡潔，不愧爲名父之子。

譜中有三處述及湘綺與梁任公（啓超）宋遜初（教仁）蔡松坡（鏗）之關係，頗可注意。

一、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月，湘綺留杭州。（時年六十九）譜云：『十二日，梁卓如來訪，論公法及時事，有出位之言，語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傑，尙未教以思不出位也。……』予前者知任公會於庚子歸國有所策動，然不知其曾至杭州，且曾於杭州與湘綺討論時事也。

二、民國元年十一月，湘綺至長沙，（時年八十一）譜云：『桃源宋遜初教仁，自上海歸湘來謁，國民黨領袖也。初致敬愛之誠，繼言民國設史館必須府君受職之意。大要言清室三百年事，今人已多不知之，且清爲金後，盛京石刻，證據分明

，而『東華錄』及言滿洲掌故諸書，皆未言及，今值絕續之交，幸遇三長之才，及時不圖，後悔無及矣。』

三、民國三年，湘綺在北京。（時年八十三）譜云：『七月朔日，蔡松坡錫來，論徙民實邊，議尙可行，令其條陳各事，以備采覽。』此二三兩節，可見宋蔡兩先生對國事能從大處着眼，與當時一輩以官爲業者，固自不同也。

湘綺以民國三年應袁世凱召至北京，任清史館館長。袁於其未至前，則連電促行，詞旨謙抑，及其既至，則亦泛泛視之，此於是年十一月湘綺至漢口所作別袁一書可見，書云：

『前上啓事，未承鈞諭，緣設立史館，本意收集館員，以備咨訪，乃承賜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時支領，又不時得，紛紛問索，遂至以印紙抵借券，不勝其辱，是以陳情辭職，非畏寒避事也。到館後，日食加於家食，身體日健，方頌鴻施，故欲停止兩月經費，得萬餘金，買廣廈一區，率諸員共聽教令，方爲廉雅。若此市道，開自鯁生，曾叔孫通之不如，豈不爲天下笑乎？前擬將頒印暫存夏內史處，又嫌

以外干內，因暫送敵門人楊度家，恭候詢問，必能代陳委曲，閻運於小寒前由漢口還，待終牖下，奉啓申謝，無任悚愧。」

袁決意稱帝，湘綺實不贊成，其列名勸進，係他人所盜竊，非湘綺意也。先是籌安議起，袁氏以湘綺國老，懼持異議，乃囑楊度致書，微示以意，湘綺答哲子函，有「總統爲人民公僕，不可使僕爲帝」之語，其不贊成可知。又湘綺爲此事有上袁氏一書，措辭更婉而厲，書曰：

「前上一牋，知荷鑒督，籌安參議，禮宜躬與，天氣尙寒，當候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外間傳言，四國忠告，想鴻謨專斷，不爲沈惑也。但有其實，不必有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毫末，廣詢民意，轉生異論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征禪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羣言淆亂，何足問乎？閻運在遠，未知近議所由發生，及明意之所左右，然聞羣疑，當據一得，輒因湘使，齋函上聞。」

惜袁氏終不能悟，自誤亦以誤國也。

湘綺一代才人，其細行頗不謹飭；流傳之故事甚多，即在其日記中，亦毫不掩飾，近予友雷嘯岑君告予：嘗樊樊山任陝藩司時，湘綺有西安之遊，眷一妓曰秋雲，情好彌篤，翌年再往，則秋雲已物故，湘綺於郊外覓得其葬地，題一聯於其墓門，聯曰：

竟夕起相思，秋草獨尋人去後。

他鄉復行役，雲山況是客中過。

集句而渾成如此，信非湘綺莫辦。

又『湘綺樓日記』一則云：

『一日偶談司馬長卿卓文君事，念司馬（遷）良史而載奔女，何可以垂教，此乃史公欲爲古今女子開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即傳遊俠之意』云云。湘綺並有一詩詠此事云：

『厮養娶才人，天孫嫁河鼓，一配忽忽終百年，淚粉蕙花不能語，君不見卓女未尙長卿時，容華傾國不自知，簪玉鳴金厭羅綺，平生分作商人妻。良史賤商因重

俠，筆底琴心春疊疊，一朝比翼上青霄，闕下爭傳雙美合。使節歸迎駟馬高，始知才貌勝錢刀，古來志士亦如此，膠鬲遷殷援去鷲。卓鄭從今識文理，有女爭求當代士，錦水鴛鴦不獨飛，春來江上霞如綺。得意才名難久居，五年俸仕謝高車，華陽士女論先達，唯有臨卽一酒爐。』可見湘綺對男女關係，絕不受傳統思想之拘束也。

附錄一：關於楊度

鄉人楊哲子先生（度），爲湘潭王壬老之高第弟子。以擁項城稱帝，乃大不見諒於國人。顧其人辯才無礙，文采斐然，要爲一代之才士。光緒三十一年，中山先生至日本，時哲子亦正留學東京，以與某博士辯論一教育問題，文譽大噪。中山愛才如命，雅欲羅致之以張其軍。哲子以不願革命辭，中山問其理由，則答以中國革命成功，滿蒙必不能保。中山強之再四，哲子乃介黃克強先生與中山晤談，孫黃之攜手，實以哲子爲之媒介也。此事余親聞之哲子，時在

坐同聞此一段故實者，爲章太炎先生，趙夷午先生，哲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

梁任公之喪，上海一部分任公之友人，爲位公祭於靜安寺，余以私淑任公之故，亦往與祭，主祭者爲孫慕韓寶琦，讀祭文者爲張菊生元濟。輓聯可百餘幅，殊少佳構，楊哲子一聯最後至，文曰：『世事亦何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此聯以哲子之地位輓任公固佳，他人以此輓哲子，殆亦可以適用也。

附錄二：記齊白石

余少時卽耳齊白石之名，且知其爲湘綺弟子，後乃於若干畫展及友人家中，時見其作品。偶與徐悲鴻談及當代畫人，悲鴻於老人必揄揚備至。去年劉大悲君（厚）自北平以兩畫貽余，其一爲悲鴻之馬，其一卽爲老人之蒲桃，余笑謂友人曰：『天馬蒲桃入漢家』，實爲余簡陋之客室增光彩不少也。

余此次隻身避難來臺，滬寓所藏書萬餘冊，均無力攜帶。余生平無他好，平日偶有餘錢，即以購書，歷年所藏，一度毀於抗戰時期之轉徙，再度被竊於重慶之冷水場，此次殆又不能免矣，思之可爲浩嘆。頃旅居臺北已十日，無事可做，無書可讀，精神上乃痛苦不堪，日昨偶至商務印書館，購得齊白石年譜一冊，係胡適之黎劭西鄧恭三三君所合編，述老人生平頗詳盡，因撮其概要，以實吾隨筆。

老人湖南湘潭人，名璜，白石山人其別署也。幼貧，無力讀書，隨家人耕種，牧牛，十五六以後，學爲木匠，繼乃能雕花，因選花樣，得見芥子園畫譜，酷好之，遂一一摹繪。年二十七，始從師習畫，且學爲詩文，三十七，乃以詩文爲贄，師事湘綺，湘綺謂其『文尙成章，詩則似薛蟠體』。其實老人不獨以畫與刻印名，偶作詩文，亦天才橫溢。其記民八避難北遊時之心緒云：

『臨行時之愁苦，家人外，爲予垂淚者，尙有春雨梨花。過黃河橋時乃幻想曰：『安得手有贏氏趕山鞭，將一家草木同過此橋耶？』』

七十四遊川，有過巫峽詩云。

怒濤相擊作春雷，江霧連天掃不開，欲乞赤烏收拾盡，老夫原爲看山來。
又有客成都留別余生詩云。

不生羽翼與身仇，相見時難別更愁，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勸再來遊。
均足表見其獨有之風格。

老人在抗戰八年中均居北平，雖不得已仍爲人作畫，然避不與敵僞南方接觸。今年老人已八十七，乃又見此文化藝術之故都，陷入共黨之手，且毛澤東亦湘潭人，與老人同縣，不知其遭遇與心境又何如也。

老人有借山吟館詩一冊，白石詩草八卷，余均未見。

亢直敢言的王先謙 (1842—1917)

當清季同光之際，吾湘人殆無不知有二王先生者。余前年所印行「中國現代名人軼事」一小冊，於湘綺先生之生平，已畧存梗概，茲請再一述葵園先生。

葵園先生名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後湘綺十年；卒民國六年丁巳（1917），後湘綺一年；故湘綺得年八十有五，葵園得年七十有六。葵園家世業儒，早歲家境清貧，其父錫光（字載之），課徒自給，時虞日食不繼。四歲，從其大兄先和（字會庭）學；至十歲，文已完篇。載之能詩，著有「詩義標準」六十卷，其自序畧云：「……人無論何時何地，皆當思有以自盡；一命之士，心存君國；韋布之儒，躬踐仁義；無鄙俗之念，無願外之思。發而爲言，自有安雅恬愉之致，故未有志不正而能爲詩人者。今取自漢迄明諸家詩，采其精粹，得若干首，凡繫倫紀切己身者，列爲內編；詠古詠物爲外編，區分子目，附

綴評論，總六十卷，命曰「詩義標準」，聊示兒輩，俾知詩之爲道，與立身相表裏，爲之者皆有扶世翼教之責，毋徒以風雲月露模山範水爲觀美也。」

葵園上有兩兄，除大兄先和外，次兄名先惠字敬吾，下有一弟名先恭字禮吾，三人皆秀才，均早卒。惟葵園以大師名世，享年亦最高。年十六入縣學，二十三鄉試中式第四十名，次年連捷成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自二十八迄三十八，十年之間，歷任國史館協修，雲南鄉試副考官，國史館纂修，功臣館纂修，會試同考官，右中允，實錄館協修，江西恩科鄉試正考官，國史館總纂，文淵閣校理，浙江鄉試副考官，實錄館纂修兼總校，左中允，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右春坊右庶子。三十九轉補左春坊左庶子，升補國子監祭酒。四十一，丁母鮑太夫人憂回籍。光緒十年甲申，年四十三，是年六月服闋，九月挈家由海道北上，十月抵都，據葵園自述云：「寓爛麵胡同原任刑部尙書齊公（承彥）寓宅，前棟出租，凡三院，中院大槐樹一，左院海棠樹二，右院寬濶，頗蒔雜樹。余邀家蓮生再從叔（文彬），族慧英弟（先慎）偕于都中，余住

眷屬於中右兩院，三人讀書左院，商榷文藝，興趣不孤，海棠盛開時，置酒其下，尤足樂也！」

十一年，仍任國子監祭酒，同年八月，出任江蘇學政，撰「勸學瑣言」，就江陰南菁書院開設南菁書局，彙刊先哲箋注經史遺書，捐千金爲倡，有名之一皇清經解續編」，即成於是時。首尾耗時三載，刊書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合之阮元所刊「皇清經解」一書，殆有清一代經解之總匯也。

十四年冬，自蘇請假回籍。次年二月，乃請湖南巡撫代奏開缺。此後即卜居於長沙之古荷花池，不復再出。蓋自二十八歲至四十八歲之二十年間，爲先生登第後服官之年；自四十八歲迄其逝世之二十八年間，則純爲先生在籍講學著書之年也。

綜葵園之一生，在光緒十四年回湘以後，雖爲一純粹篤舊之學者，然其前此服官之一段，固極留心時事，亢直敢言。光緒五六年之間，葵園有論俄事三疏，其時正值崇厚辦理伊犁交涉失敗回京，而曾紀澤尙未前往，中俄關係，不絕如縷，葵園所論種種，於堅持強硬之中，仍保留迴旋餘地，即在今日視之，亦不爲不見。至光

緒十四年在江蘇學政任內劾李蓮英一疏，則尤爲言人之所不敢言。先是咸豐帝以十一年崩於熱河，同治嗣位，即由慈安慈禧兩太后垂簾聽政。同治八年，內監安得海在山東伏誅，原出慈安之命，慈禧實敢怒而不敢言，迄光緒七年慈安死去，李蓮英乃更爲慈禧所寵信。十三年，蓮英奉命隨醇親王奕譞巡閱海口，自北洋海軍將領視之，其聲勢殆高出奕譞之上，御史朱一新以各直省水災，奏請修省，辭及李蓮英，即因此被黜，則蓮英之炙手可熱可知。顧葵園能不畏強禦，仍於十四年三月，嚴辭劾之，其原摺云：「爲太監招搖請旨懲戒事，臣維宦寺之患，自古爲昭，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政之事。皇太后簾聽以來，辦理一稟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爲太監者，宜如何小心謹慎，痛戒非爲？乃有總管太監李蓮英，稟性好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迹，臣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等給使官禁，得以日近天顏，或以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事招搖，致太監皮硝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卽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墜冰」，漸也，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動求夙夜，遇事防

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臣雖職守攸攝，何敢稍存瞻顧之私，緘默姑待以負聖朝？謹專摺糾參，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一則曰「肆無忌憚」，再則曰「大事招搖」，三則曰「不安本分」，四則曰「宵小橫行」，其措辭之強硬，不惟有古大臣風，確亦不失湖南人本色。自此疏上後不報，葵園知天下事已不足有爲，設再戀棧不去，或更召致小人之傾陷亦未可知，此殆即葵園托辭請假回籍，於翌年二月，即自動請求開缺，不復再出之由來也。

清史稿葵園有傳，列在儒林，居俞樾王闈運之後，孫詒讓之前，所舉葵園著作，僅（一）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二）三家詩集義疏二十八卷，（三）漢書補注一百卷，（四）荀子集解二十卷，（五）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六）外國通鑑三十卷，（七）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等七種，其實不止此數，且所舉亦不甚得要，頤也。

葵園有自定年譜，分上中下三卷，爲「葵園四種」之一（其他三種爲虛受堂文集、詩存、書札）。

葉德輝有跋「葵園四種」一文，於葵園回籍後之著作生涯，及其晚年所遭遇種種，敘述頗詳，茲錄於下：「長沙王閣學葵園太夫子，一代儒宗，年未五十，自江蘇學政解組歸，閉戶著書，矻矻窮年，無間寒暑，時余同居會城，辱公紆尊，每撰一書，必持稿相商榷而始定著。二十餘年，無日不從事文字之役，而遊燕之樂，亦盛極一時。宣統庚戌，米荒獄起，同爲當事羅織，里吏議。回憶戊戌政變，與公同持正義，觸忤異己，雖幸免於禍，至是十三年，卒罹黨錮。朝綱陵替，羣小鴉飛，逾年而有辛亥之奇變，此固公所不及料，而亦非所忍見者也。自是公遁迹山林，罕與人世相接，余則還居吳門故籍，不相見者五六年。丁巳公歸道山，曾爲詩輓公，畧抒知己之痛，書諭兒輩往奠。詢公遺著，知「後漢書集解」已脫稿付梓，而「新舊唐書合注」在上海繆藝風先生處見經籍藝文兩志底本，託先生校補；不久先生亦物故，後遂無從問訊矣。辛酉余客都門，友人詢公詩文集，僉謂此海內爭覩爲快者。又聞公有「自定年譜」，亦無從購取。公昔在湘，與湘綺先生有二王之目，身後之名，乃遠出湘綺上。世之慕公者，咸以不得讀公遺書爲恨，知公學問文章，其感

人之深，過於湘綺，固自有其本末也。去年余由蘇還湘，見兒輩案頭有公年譜及詩文集各一部，因轉告嗣君湘閣等，屬其彙印，以答同人景仰之意。嗣君曰諾，乃並書札合爲四種，而以序引相屬。余侍公久，辱知深，於公學行未窺萬一，何敢妄下己意，更贊一辭？惟余生得見公著述風行，楹書有託，是固衰年一快事也。故不辭譏陋，輒述其始末，以爲附驥之幸云。時癸亥穀雨，門下晚生葉德輝謹識。」

葉文中所謂：『戊戌政變，與公同持正義，觸忤異己』云云，係指當時王葉等排斥康梁思想，及與時務學堂衝突一段公案而言。所謂『宣統庚戌，米荒獄起，同爲當事羅織，呈吏議』云云，係指宣統二年，長沙飢民譁變，焚燬撫署、學堂、教堂，而結果則湖廣總督瑞澂，歸咎王葉及其他若干長沙紳士而言。此兩者均清末湖南之大事，前者以蘇輿所輯『翼教叢編』一書紀述最詳，後者則爲余前日擊，而『虛受堂書札』及葵園年譜均可參證，茲特畧記其梗概如下。

梁啓超應聘至長沙時務學堂講學，爲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事，其留湘之時間不過。時陳寶箴（字右銘）任湖南巡撫，江標（字建霞）徐仁鑄（字研甫）先後任

學政，黃遵憲（字公度）以長寶鹽法道署臬司，咸主維新；而譚嗣同、熊希齡、皮錫瑞、唐才常等，則以地方人士資格，贊助甚力。啓超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唐才常、韓文舉、葉覺邁諸人任分教。據梁自述云：

「……啓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劄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鐸稱高材生焉。啓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掎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報），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佈，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衆；於是湖南新舊派大闢。」（見清代學術史概論）

啓超所指舊派，實以蔣園爲首領，而葉德輝尤剽悍。凡康有爲所著書，啓超所

批學生劄記，及時務報（上海出版），湘報，湘學報諸論文，德輝無不一一予以痛斥，其文字均見『翼教叢編』。葵園則以嶽麓書院院長資格，爭之於寶箴，仁鑄，其往還文字，均存於『虛受堂書札』。而嶽麓書院諸生賓鳳陽等，更對時務學生醜詆不遺餘力。此一鬥爭，蓋至戊戌八月政變後始告一段落焉。

宣統二年三月，長沙發生米荒，飢民聚衆圍撫署，實爲三月初五；巡警道賴承裕（？字子佩），於初四日卽已被毆，飢民並將該道之髮辮，繫於南門外鰲山廟一柳樹上，事後長邑學校國文教員王某有竹枝詞詠此事，所謂「鰲山廟內垂楊柳，不繫青鬃繫賴公」者是也。初六日撫署衛兵開槍，擊斃多人，致激衆憤，痞棍乘機，放火焚署，並有焚燬學校及搶劫教堂等事，以致全城罷市。時任湘撫者爲西林岑春煊，事前措置失當，臨事更過度張皇，當事急時，乃以印交藩司莊廣良，由莊率同紳士數人，步行勸諭開市，並格殺數人，事乃平息。先是初五日飢民包圍撫署時，湘省在籍紳士七人，曾電鄂督瑞澂，請代表撤換岑撫，另易委員，該電係由若輩假借葵園名義，傾銜發出。事後清廷命瑞澂查奏，瑞乃歸罪諸紳，葉德輝、孔憲教、

楊鞏等均因此得罪，葵園亦不免焉。葵園曾嚴劾李蓮英，又因招商局事嚴劾盛宣懷，而已則爲瑞所劾，瑞字莘儒，卽辛亥武昌起義，聞砲先逃之湖廣總督也。李、盛、瑞三人，與清室之速亡，均不無關係，乃先後均牽及葵園，亦人事上之巧合也。

戊戌得罪的皮錫瑞 (1850—1908)

三十年前，余讀太炎『衡經師』一文，始知有『善化皮錫瑞』。稍後，讀皮先生自著之『經學通論』與『經學歷史』，僅爲治史之一助，未遍讀其『師伏堂叢書』也。近閱皮名振氏所著『皮鹿門年譜』，則先生一生志節，及其講學著書之經歷，乃更得略知梗概。先生爲清季經學大師，以參與維新罹黨禍，尤爲治近代史者所不可不知之一事實，茲特依『年譜』畧述其生平如次。

先生名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姓皮氏，湖南善化人，以崇拜伏生之故，顏所居曰『師伏堂』，學者因稱師伏先生。生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卒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得年五十有九。年三十三，中光緒壬午科順天鄉試，如文廷式（道希），端方，陳伯嚴（三立）諸人，皆與同科。三試禮部，均報罷，乃潛心講學著書。光緒十六年，曾一度主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十八年，移主江西南

昌經訓書院，先後凡七年，以治經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詔學者，一時高才嶺秀，咸集其門，江右學風，因之丕變。庚子以後，國內以興學育才爲救國急務，光緒二十八年夏，先生彼聘創辦善化小學堂，錄學生六十餘人，如周鯁生（原名覽），楊端六（原名冕），即此次錄取之高材生也。翌年，湖南設高等學堂及師範館，先生主講倫理經學；後更歷主中路師範，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及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纂修，蓋自創辦善化小學迄先生逝世之歲，其盡瘁於桑梓教育事業者，先後凡歷五年；清季長沙教育之發達足與江蘇比美，其學風尤敦厚樸實，論者謂先生與有力焉。當京師大學堂初成，以經史文三科講座需人，曾三電請先生北上，先生以培育地方後進爲念，謝未往也。

先生著作之印行者，有『師伏堂叢書』十八種；後更就叢書中之經考，重印爲『皮氏八種』一集。近年商務所排印之『經學通論』與『經學歷史』二書，尤爲初學治經者所必讀。先生工駢文，有『師伏堂駢文二種』，凡六卷；詩詞則有『師伏堂詠史』一卷，『師伏堂詞』一卷，『詩草』六卷，均合刊於『師伏堂叢書』。

萍鄉文廷式，曾爲光緒帝珍瑾二妃之師，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文以被議歸南昌，先生作『摸魚兒』一闋贈之，詞云：

『恨春殘蕭條風雨，幾翻愁見花落；鳳城桃李凋零盡，一點又飄紅萼。天漠漠，空夜奏綠草，無奈芳枝弱。封姨太虐，任巧囀鶯簧，苦啼鵲淚，有酒更斟酌。銷魂處，回首五雲樓閣，衣香猶染京洛。蛾眉見嫉尋常事，泉水漫分清濁。情不薄，雖潛處太陰，尙望微波託，承恩似昨，待買賦長門，回心舊院，莫遽怨謠諑。』

此詞佳處，非略明當時宮庭鬥爭內幕者，殆不能知，讀此，可見先生文學之名，實爲經學所掩也。

中國自甲午戰敗，外患日急，變法維新之議，雖自康有爲倡之，但朝野有識之士，和者實不乏其人。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湘撫陳右銘（寶箴）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梁啓超任總教習，李維格講西學。（李字繹琴，江蘇吳縣人）唐才常，楊自超，韓文舉，歐榘甲，葉覺邁諸人任分教。同年十一月，更創湘學報，以熊希齡，譚

嗣同，唐才常，蔣德鈞，鄒代鈞，王銘忠，及梁啓超，李維格人諸董其事，湖南守舊之風，一時爲之丕變。皮先生雖與王先謙，葉德輝諸篤舊者相友善，但心善維新之議，知講求新學之決不容緩，於梁李等有所往還，與譚嗣同過從尤密。二十四年正月，長沙復創設南學會，時嘉應黃遵憲（字公度）任長寶道兼署臬司，元和江標（字建霞），宛平徐仁鑄（字研甫）相繼爲學政，咸主維新，因與陳寶箴及其子三立（字伯嚴），熊希齡，譚嗣同諸人，有此學會之創設。學會講習計分四門：曰學術，曰政教，曰天文，曰輿地。因留先生居湘，任學長，主講學術，其餘講政教者爲黃遵憲，講天文者爲譚嗣同，講輿地者爲鄒代鈞。二月初一日，學會開講，首先由先生講學會宗旨，先生憫亂憂時，暢論講學之必要，持論侃侃，官紳士民聽者三百餘人莫不爲之感動。計自二月迄四月，（是年閏三月）共講十二次，莫不貫穿漢宋，融滙中西，持改判變法甚力，雖葉德輝三次移書相訾議，先生僅以時事方亟，不宜互爭意氣答之，仍力行不顧也。至四月二十日，仍赴江西主經訓書院講席。

是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復垂簾聽政，新政全部推翻，楊銳，劉光第，林旭，

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逮交刑部，光緒帝亦被幽於瀛台。十四日，陰風怒號，天地愁慘，先生徬徨繞室，是夜五鼓，忽夢譚嗣同來，先生訝其何以得出，並問何人誤事。譚僅答有人作祟。十七日聞楊等六人同遇難，先生痛哭失聲，於枕上作哭譚復生（嗣同字）詩五首。其一：竟酒衰宏血，難完孟博軀，南冠已共惜，西市更何辜？濁世才爲累，高堂淚定枯，榮華前月事，緩步入中樞。其二：同歸首未白，相見眼誰青？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楓林忽魂夢，天道有神靈，一自沈冤後，朝朝風雨冥。其三：穉康養生戮，何事說延年，渺矣匡時畧，淒其懷舊篇。孝忠難喻俗，成敗總由天，自古如絃直，紛紛死道邊。其四：九關屯虎豹，一夜變龍魚，李杜死何恨，佞文謗是虛。焙茶嗟未試，芳草痛先除，尙有湘人士，來披鄴架書。其五：君非求富貴，富貴逼人來，詎意山公啓，翻成黨禍胎，曾無執袴習，竟枉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

次年春，先生亦以被議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自是杜門著書，三年，始得開復。

遊戲召禍的葉德輝

民國十年冬，予始於上海余堯衢（肇康）姑丈席間得一見葉德輝。

葉字煥彬，以面麻，湖南人大率以『葉麻子』呼之而不名。其人郁郁多文，辯才無碍，精版本學，藏書甚富，而於清代人物之著作，蒐集尤爲完備。平日將所有藏書之善本，閉置一樓，不輕以示人，亦不肯出借，嘗書一字條貼於書櫥：『老婆不借書不借』，可想見其詭僻之一斑也。有著作多種，統名曰『葉氏叢書』，而以談版本源流之『書林清話』一書尤有名。喜干預政治，民五袁稱帝，葉曾以地方紳耆之資格，領銜勸進；又兼營商業，有自設之商店，且任長沙總商會會長有年。性保守，於維新革命兩派人物，均詆之不遺餘力。其反對康梁之文字，見葉『郇園書札』，及蘇輿所輯『翼教叢編』。民國元年，黃克強回湘，湘人爲紀念此革命元勳，易長沙一繁盛市街之名『坡子街』者爲『黃興街』，葉爲文反對甚力，謂長沙街

名只有「鷄公坡」，「鴨婆橋」，不聞以人名名街也。又性喜漁色，其晚年在上海，猶偕其弟子曹某同住宿娼，曹且因此染有惡疾，此其人親舉以告余者。其長沙居室中懸有仇十洲畫一幅，羅帳低垂，榻前置男女鞋各一雙，一小貓躑躅帳外，圓目凝注，舉爪攬帳，使人會心於意外，足徵其好尚之所在也。

辛亥湖南獨立，唐才常之子唐麟，任都督府軍政部部长，以葉平日反對革命，且聞與其父之被害有關，首拘捕之，擬置之死地，章太炎去電力保，且目葉為讀書種子，始得省釋。民三，太炎為袁世凱幽禁於北京之龍泉寺，葉曾往慰問，葉盛譽章之「國故論衡」，章亦頗讚煥彬之「葉氏叢書」，其交情殆即原於辛亥救護之一電也。

余見葉時，葉年已在六十左右，貌清癯，似未留鬚，仍意氣甚豪，談鋒甚健，批評時政，臧否人物，終席娓娓不倦。余所記憶者，葉謂：「清末有四人同講公羊，王壬老（閻運）講公羊，廖季平（平）講公羊，康有為講公羊，我也講公羊，但我們各有各的公羊，內容絕不一樣！」又云：「戊戌後，我在湖北任存古學堂總教

習，一日張香帥（之洞）在「抱冰堂」宴客，我在座。香帥於康梁初不甚拒，且於康所發起之強學會畧有資助，維新失敗後，張乃多方洗刷，力證其與康梁無關，時梁啓超亡命日本，於「清議報」發表與張之萬言長書，於大阿哥一案對張攻擊無所不至，我一切裝作不知，乃故意向張大開頑笑：「香帥，你這個「抱冰堂」與「飲冰室」有多少關係吧？張乃連聲答曰：「我的在前，我的在前。」」其富於幽默如此。

民十六年，葉卒爲長沙農民協會之共產黨員所殺，時余不在國內，其死狀至今不詳，傳聞係以罵農民協會一聯賈禍，聯云：

農運宏開，稻梁菽，麥黍稷，盡皆雜種，

會場廣濶，馬牛羊，鷄犬豕，都是畜生。

『雜種』『畜生』長沙最流行之罵人口語也。吳瞿安（梅）『霜崖詩錄』，有哀葉五律兩首，頗能狀葉之生平，詩曰：

目空天下士，爲我偶垂青，豈意一朝別，南天見落星。恢諧得奇禍，刑辟

失常經，安得中郎筆，重書有道銘。

大名垂四海，小隱寄三吳，曾造通儒第，如披博古圖。奇文蒐紫簡，餘技事丹爐，竟殺讀書種，天高何處呼。

此葉死後余所僅見有關葉氏之文字也。『葉氏叢書』已不易購得，茲錄『郇園書札』兩通于後，以見其文字與思想之一斑。

與劉先端黃郁文書云：

『超回邁賜之名，遍於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於湖湘；蒙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艱，皆學堂十六齡之童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槍砲也，製造也，非回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所學非所用，夫子自道也。』

又與戴校官書云：

『康有爲何足言學，一二徒黨攀援朝貴，簞鼓無學之人。其門徒之寓上海者，

恆稱其師爲孔墨合爲一人，有人言孔者孔方兄，墨者墨西哥，聞者無不笑之。迹其生平，無一日一時不奔走呼號於天下，既不容於鄉里，又不齒於京師，其流毒獨吾湘受之，此則鄙人所必爭，而不僅在於學術矣。」

此兩書均寫於戊戌以前，卽爲排斥康梁而發也。

西洋文學翻譯者林紓 (1852—1924)

林琴南名紓，號畏廬，別署冷紅生，晚年亦偶署踐卓翁，閩縣人也。生清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卒年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得年七十有三。中國近代有以譯述著名之三人，其一嚴又陵（復），其一辜鴻生（鴻銘），其一即林琴南，均籍福建，此一可注意之現象也。

琴南以二十年之時間，共譯小說一百七十一部，計英國九十九部，美國二十部，法國三十三部，比利時一部，俄國七部，西班牙一部，挪威一部，希臘一部，瑞士二部，日本一部，不知國名者五部，都二百七十九冊，殆不下千餘萬言，其精力過人可驚也。

自新文化運動既起，白話文風靡一世，琴南以古文所譯之小說，乃不復爲人所重；若干文藝批評者，並謂林自身不通西文，其所取材之原著，大率由口譯者選擇

，致一部分不必翻譯之書亦往往參雜其間；然名作家如莎士比亞，迭更司，司各德，歐文，斯拖威夫人，仲馬父子，巴爾札克，托爾斯泰，德富健次郎等諸人之作品，爲琴南所介紹者亦復不少；尤以「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滑鐵盧戰血餘腥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畧」，「迦因小傳」爲有名。白話文倡導者胡適之謂林琴南「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並謂「自有古文以來，從未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可見於琴南之勞績亦未嘗一筆抹煞。早年魯迅兄弟所譯之「域外小說集」，蘇曼殊陳獨秀所譯之「悲慘世界」，大抵亦爲林譯風氣所支配，其他更無論矣。要之，遠在光宣之交，即去今約五十年前，使中國若干不通西文的讀者，即有與西洋文學接觸之機會，藉以窺見西洋風俗習慣之一斑，以增進其對西方文化之了解，琴南實與有力焉。

琴南最初所譯者，即小仲馬之「茶花女遺事」，由其友王壽昌君口述，林筆受，其文格胎息史漢，而以唐人小說之風韻出之。當譯是書時，林新喪偶，牢愁寡歡，意藉此以遣岑寂，初不在博得稿費，故能以悱惻纏綿之筆，曲達男女苦戀之悲，

每譯至最傷心之處，口述者與筆受者輒相對大哭，聲徹戶外，即令譯文與原作不無出入，要其感人之深，某君詩所謂「傷心一部茶花女，蕩盡支那浪子魂」者，確爲一種事實也。是書出版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民國二十七年春，余由武漢回長沙，偶於舊書攤以法幣一元，購得是書一冊，則光緒二十七年「玉情瑤怨館」之木刻本也，竟體完整，校對無誤，在抗戰中余所搜集之書，以此冊最爲別致矣。

琴南自述之「冷紅生傳」，叙其身世及性格頗詳，且涉及其譯著，茲錄於下：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蹶踣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資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之。一日，羣飲紅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悖，逼而見之，生遂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願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

能諒之，故寧早日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不與情爲仇也耶？」

可見茶花女一書，爲林氏譯著中最得意之書，其自狀其個性，又何其類似書中男主人公亞猛其人耶？

琴南不獨擅古文，詩亦清腴可誦，畫尤有名，三十年前，東方雜誌曾載鄭孝胥（蘇戡）贈琴南詩一首，頗能概其生平，爲海藏樓詩集所未載，茲錄於後：

文如至寶丹，筆若生姜白，一篇每脫稿，舉世皆俛首，紛紛野狐羣，忽值獅子吼。京師奔競場，暮夜孰云醜，畏廬深可畏，斧鉞書在口。隱居名益重，方使薄俗厚，奈何推稗官，母乃喪此叟。歛才偶作畫，石谷輒抗手，亦莫稱畫師，掩名究無取。

琴南之於科第，不過一舉人，且生平未服官，但晚年乃以遺老自居，曾數上崇陵，對清室似不勝其依戀，果忠於清室耶？抑憤時嫉世藉此以自抒其反抗之情緒耶？

？是則非余所敢知也。

五四後文言白話之爭，琴南曾致書北大校長蔡子民（元培），爲古文辯護甚力，又自撰「荊生」小說一篇，對當時提倡新文學諸人尤詆毀備至，殆亦「木強多怒」之個性使然，不足怪也。

琴南自著之小說，余所見者僅「金陵秋」，「京華碧血錄」，「技擊餘聞」等二數種，所得印象，遠不如其譯著之深也。

附錄一：辜鴻銘與嚴復

辜鴻銘字湯生，別署「漢濱讀易者」。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兩人同爲清末民初中國留學生之前輩，且同爲西洋文化具有深切了解之人。

進一步比較此兩人之身世，則相似之點更多：辜籍福建廈門，嚴籍福建侯官，其出生之省籍同也。辜生於清咸豐七年丁巳（1857），卒於民國十七年戊辰（1928），享年七十有二；嚴生於咸豐三年癸丑（1853），卒於民國十年辛

西（1921）享年六十有九；其年輩之先後亦相若也。辜治文學，其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時，年甫二十一；嚴習海軍，造詣甚深，亦頗見稱於師友；是其青年時代所受之教育及其所濡染西洋社會之環境，殆又同出一源也。

辜歸國後，曾任張之洞之文案十七年，此外則余僅知其曾一度執教鞭於北大，一度任某英文報紙之總編輯。西洋學術界之知有辜氏其人，乃以其曾翻譯中國若干種舊籍於歐洲出版，且偶有介紹中國文化之西文著作發表也。辜氏之西文著作，余僅見一『中國民族精神』之法譯本，其比較中英德法四國民族之異同有曰：「英國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國人精深而欠博大，既博大而又精深者其惟中國與法蘭西乎！」（原文頗長，括其大意如此。）此種攬統之論斷，自屬毛病甚大，然可窺見其論調一斑也。二十年前，余偶於武昌某舊書店，購得筆記一冊，約五六萬言，作者署名「漢濱讀易者」，內容多記張文襄幕府逸事，亦談西洋文學，且涉及希臘詩歌，余疑非辜氏莫辦，但余在當時固尚不知「漢濱讀易者」即辜氏之筆名也。此筆記久已遺失，並書名亦已忘之，余生平所

見辜氏之中文著作，僅此一小冊而已。

嚴於歸國後，曾有一時期從事海軍教育，且曾一度出長北京大學，但其用力最勤，耗時最多者，則在介紹數種西洋名著於中國，抗戰前商務印書館所出嚴譯八種，（一、赫胥黎天演論，二、斯密亞丹原富，三、甄克思社會通詮，四、穆勒羣己權界論，五、孟德斯鳩法意，六、斯賓塞羣學肄言，七、耶方斯名學淺說，八、穆勒名學）即彙集嚴氏歷年所譯，而以一种叢刊之形式出之者也。

辜晚年以復辟黨人自居，不惟留辮，乃至讚美小脚與納妾制。嚴之列名洪憲六君子，容或出於楊度之挾持，但其平日言論，固不諱言主張君憲，且晚年復染有阿芙蓉癖甚深。保守本人類之一種美德，若兩先生者，殆保守而失之太過者也。

附錄二：嚴復與袁世凱

光緒辛丑以後，袁世凱在清末政治上之地位，名與實均取李鴻章而代之，其任北洋總督一時期，聲勢尤爲煊赫。世凱雅慕嚴復名，欲以禮羅致其幕下，顧聘之再四，嚴終不肯就。於是袁於失望之餘，對嚴乃深致不滿，嘗向人云：「嚴復縱是聖人復生，我也不敢再用他了。」及光緒帝與慈禧先後殞落，載灃當國，未及一月，即命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病，（其時袁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而嚴乃爲袁大抱不平，謂：「世凱的才幹，一時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及得到。」以是袁又引嚴爲知己。

民國告成，袁任總統，首聘嚴任京師大學堂監督，去職，又改聘其任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並先後聘其參加約法會議，政治會議。嚴受英國教育文化薰陶甚深，原主保守，其心目中之理想政治，殆爲一種類似英國之虛君共和，革命非所贊成者也。

迄民四八月帝制議起，袁以嚴老成碩望，學貫中西，非網羅不可，於是場度乃一再奔走於西城舊刑部街嚴氏之門，曉譬百端，必欲得嚴參加「籌安會」

之發起，嚴婉辭拒絕，僅允作一會員。並保留在會中可提出不同之意見。是月某日，嚴忽得一晚餐請帖，署名者除楊外，尚有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人，嚴知與籌安有關，託病不去；楊往面約，亦謝不接見。迄夜半，楊着人送一信來，信云：

「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峯旨與公商榷，極峯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即逝，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矣。」

嚴閱後不知所措，但卒以年老力衰，哮喘時作，既不能當夜出亡，又不能登報否認，惟有隱忍聽其擺布。明日籌安會啓事登出，嚴名列第三，其住宅門首，且有荷鎗實彈之兵士兩名站崗，以資保護，即欲出亡，亦無可能矣。

啓事登出後六日，梁啓超反對帝制「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即已發表，全國聳動。袁認非由嚴作文反駁，不足以壓倒梁文之聲勢，因命內史夏壽田往見嚴，請即提駁議，並出一紙四萬元之支票爲酬，但卒爲嚴所拒，故當時駁

梁文者非嚴而孫毓筠也。

吾人進一步觀察，袁於嚴雖屢欲藉其位望以資號召，而嚴於袁之能力與行爲則深表不滿，當民四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嚴對袁曾有批評云：

「大總統（指袁世凱）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耳。願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歎也。」（見學術雜誌第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抄十二）

又袁生平喜以暗殺手段誅鋤異己，此亦嚴對袁極端不滿之一端，與熊純如札中有云：

「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興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

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涇上之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見同上第十期第二十一）

嚴熟治西史，平日主張君憲而不能衷心贊成袁氏稱帝，雖深有感於舊君統既毀，新君統建立甚難，蓋亦深知袁之爲人，早已斷其決不能有成也。及梁蔡起而討袁，各省紛起響應，乃至如陳宦湯壽潛銘爲袁宿所培植者，亦起而反戈相向，袁雖欲不死，不可得矣。嚴於袁死以後，曾以三詩輓之，於公於私，亦可窺見嚴對袁持論之平允也。詩云：

『近代論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爲辨賢奸。』

『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灑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嵩室暮，極眼望雲駟。』

『夙承推獎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屢拂衣。持顛終有負

，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

嚴以民國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病沒於福州，年六十九，其去袁氏之死，蓋已逾五年矣。

附錄三：嚴復論康梁

『譯才並世數嚴林』，我僅僅從康有爲一首送林琴南的詩裏讀過這樣的句子，知道康對嚴復是相當稱許。至於梁啓超，他却自來對嚴就非常佩服：梁少年時候有一首仿杜的『八賢歌』，列舉當時他所欽佩的八個人加以一番讚歎，好像這首歌的第一句，便是『哲學初祖天演嚴』；我知道梁在上海辦時務報的時候，嚴便和梁通過信，對梁的言論有所批評；民國二年，正是嚴的六十歲，我記得在某雜誌上，還讀過任公一首『壽幾道先生六十』的詩，對嚴也恭維備至；凡此均足證梁嚴間的交情不壞。

可是，到了嚴復的晚年，他却對康梁師徒抨擊不遺餘力，均見與熊純如書

札中，惜其文太長，茲僅節錄一二於此，以見其概：

「……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覽之士，愀然恆以爲難，不敢輕以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倏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然爭爲破壞矣。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

以上是他批評康梁早年言論的話，至於任公參加實際政治，他也認爲毫無成績，他說：

「（任公）好爲可喜新說，嘗自詭可爲內閣總理，然在前清時不論，其入民國，一長司法，再任幣制，皆不能本坐言以爲起行。至爲鳳凰（指熊希齡）草大政方針，種種皆成紙上談兵，於時事毫無裨補，侘際去位。此雖洵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謀國，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

國民程度之不及，則其人非實行家，而畢生學問皆爲紙的，不灼灼彰明較著也哉？」

他在另一封信裏，更責康有爲對戊戌一幕爲「魯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歛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對於任公，他也認爲『清議』『新民』『國風』各報的言論，對當時的政府太不肯留餘地，以致君主立憲也不能有成，此則嚴氏之立場使然，然以之責任公則未嘗無理也。

附錄四：嚴復與白話文

三十年前，胡適陳獨秀諸人提倡語體文，白話詩。語體文爲中國所固有，提倡者不過以標點符號及西文句法稍稍改易其形貌，今尙風行；白話詩亦曾流行一時，但尙少佳作。當時反對此一運動最力者，莫如林琴南，余別有記；茲再錄嚴又陵反對意見如次，亦治中國現代文學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北京大學陳胡諸教授主張言文合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于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皮簧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見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抄第六十四）

又嚴序『涵芬樓古今文抄』有云：『物之存亡，係其精氣，……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爲存也，乃人之不能爲不存也。……夫帖括講章，向之家呶唔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嚴氏乃以八股未足以亡古文，用證白話風行亦無害於古文之存在，其言甚辯。以事實言之，當日語體文提倡者，亦未嘗教人盡廢古書不讀；卽在今日共產區，莘莘於線裝書之蒐集與保存者，聞亦尙有其人；然此究屬少數人之事，必強多數青年學子，浪耗精力於舊籍與古文之鑽研，則固大可不**必**，且亦爲事實所不許也。

我眼中的梁啓超

(1873—1929)

梁啓超字卓如，一字任公；「中國之新民」，「飲冰室主人」，「滄江」，均其別署也。廣東新會人。生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與黃克強先生同歲）卒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得年五十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議和約於巴黎，任公會以國民資格赴歐，作會外策動，著有「歐遊心影錄」。民國十年春返國，予曾與友人王光祈君，一度晉謁先生於上海中國公學，先生知王君與予曾先後主持「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因詢學會狀況甚詳，實際則學會之發起，亦以先生之感召力為最多也。時先生已近五十，體格甚健，是日在中國公學講演，歷兩小時無倦容，不幸以微疾為庸醫手術所誤，致促損其天年，實中國學術界一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任公年十九，即從康有為學於萬木草堂，在戊戌以前，任公之思想，大抵不出

康氏「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書」等之範疇也。戊戌以後，任公亡命日本，眼界爲之一擴，思想乃大動搖：康極不以革命爲然，任公則一度與中山接近，徐君勉（勳）函康，所謂「變入行者圈套」者是也。康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祀孔諸議，任公則於「新民叢報」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以駁之。康於海外設保皇會，奔走宣傳甚力，任公居東，則以讀書辦報爲主，除早年所著「戊戌政變記」一書於光緒帝頗致其眷戀之忱以外，其後於保皇說殆亦不甚理會之。民國以後，康氏爲頑強之復辟黨人，梁則聲言：「立憲黨人，祇問政體，不問國體。」民五倒袁，康與袁一書，勸袁自退，此似與任公之護國無異，然其跡近同，心理實不同也。民六張勳復辟，康實慫恿之，且赴北京躬與其役，任公則贊助段芝泉（祺瑞）督師馬廠，起而討張，使民國危而勿墜。凡此，均康梁師徒治學與應事始合終離之點也。

任公批評其師之言曰：「有爲之爲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甚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

學問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又曰：「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語均見「清代學術史概論」）此不獨可見任公自知之明，亦知師莫若弟之一證也。康於民六復辟失敗後，深致憾於任公，曾有詩云「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落日淚潛潛。」於詩題中竟至目任公爲「賊」，亦可見有爲成見之深之一斑。然任公感情中人，講學論事固多與有爲立異，私人情感，則未嘗一日自絕於師。民國十六年（丁卯），有爲七十生日，任公壽以聯云：「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致歡忻於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距稱觴未及一月，有爲卽病歿於青島，任公復輓以一聯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覩斯民魚爛陸沉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政恐天之將喪，不獨動吾黨山頽木壞之悲。」均至情流露之作，所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以任公當之，殆可無愧。

任公卒後數年，國民政府曾有褒揚令之頒布，但令文專就其講學誘掖後進立言

，於民五六兩度維護民國之功，乃隻字不及，不知令稿出於誰氏之手筆，果置事功不談，而專言學術，則嚴又陵王靜安輩之可褒揚者，又豈在任公下乎？是知黨見中人之深，雖至今猶無藥可醫也。

自甲午對日戰爭失敗，迄庚子拳變，此六七年間，爲中國新舊衝突最激烈之一時期，爭於中央，爭於地方，戊戌以前，在地方爭之最力者，殆以湖南爲首屈一指。先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任公應聘講學於長沙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時陳右銘（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伯嚴（三立）佐之，黃公度（遵憲）任鹽法長寶道，署臬司；江建霞（標），徐硯夫（仁鑄）先後任學政，咸主維新。地方人士之有力者，如熊秉三（希齡），譚復生（嗣同），唐佛塵（才常）等亦主張革新不遺餘力。湖南人之性格，敦厚簡樸，新者固能真新，舊者亦能真舊，當時所謂新學如「康學」者，既風靡於全湘，於是篤舊之士如王益吾（先謙），葉煥彬（德輝）等，乃起而予以抨擊。新者以時務學堂爲大本營，以南學會爲別動隊，以「湘學報」「湘報」等爲宣傳機關，而地方政府復予以相當維護，故其勢甚張；顧王葉等之於舊學，亦

造詣甚深，葉尤剽悍，初非梁及韓文舉輩所能搖撼，（韓亦康有爲弟子，與梁偕入湘，任時務學堂分教習。）且擁有嶽麓，城南，求忠三書院學子以爲其羣衆，而社會舊勢力復助之張目，因之勢亦不弱。此一鬥爭，迄次年戊戌政變始告結束，舊者似取得一時之勝利，其所排斥新者之若干代表作品，具見於蘇輿所輯「翼教叢編」一書。吾人今日讀之，猶可想見當時新舊思想作殊死鬥之一斑，其時首當其衝之任公，實不過一二十四五歲之青年也。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同盟會機關雜誌「民報」出版於日本東京，任公所主編之「新民叢報」，實爲「民報」筆戰之主要對象，民報發行歷時二年有餘，先後主筆政者有章太炎（炳麟）汪精衛（兆銘）胡展堂（漢民）諸氏，太炎學問淵博，精衛尤稱鬥士，亦任公生平在文壇上所遭遇之勁敵。湖南一幕爲舊與新之爭，東京一幕，則革命派與立憲派之決鬥也。

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梁任公曾在北大以公開講演方式批評之，除自抒其不同之意見外，大體多贊許之辭。在梁著「清代學術史概論」中，亦

有一處涉及胡者，則異常簡畧。先是梁著在印單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當時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改造」雜誌發表。時予在中華任編輯，兼理雜誌事項。一日，任公忽自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頗以爲怪，蓋予於任公僅有一面之雅，平日雖素敬其人，但從未以一書致候，在誼固不應由任公先施也。及折閱，則親筆竟兩紙，首對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託予將其所寫「清代學術史概論」中之一段有關胡先生者如另文代爲改正。現在單行本中，提及適之先生者，僅有如下之二十五字，卽：「而續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是也。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畧十餘字，此等處可見任公對於同時代人有所稱許，其態度固異常矜慎也。予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先後凡十年，所見當代學人自書稿件之最整潔者，得三人焉，其一梁任公，其一馬君武，其一則予友王光祈。近年所見青年投稿，類多潦草不可辨認，及出版後發見紕繆，乃多委其責於手民，此雖小事，亦可以覘世變也。

附錄一：梁啟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在最近三十年去世的有名人物中，我所接觸過，或對其生平具有相當了解的，也不算太少；但令我至今感念不忘，好像他們依然活着，而我對其驟然死去乃抱着莫大的遺憾，在我的同輩中，以王君光祈（字潤嶼，一字若愚，四川人，留德專攻音樂）爲第一，在我的前輩中，則以梁任公先生首屈一指。

假如有人問我：你個人平日選擇師友的標準如何？這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回答，我確有一定的尺度：

第一，一定要其人坦率真誠，我不能看出他半點的做作或虛偽。

第二，無論對於治學，治事，或爲人羣服務，他能够始終不懈，數十年如一日，即令不能完全無私，但爲公者往往居十之八九。

第三，其人必具有豐富的感情，多方面的興趣，在性格上不流於涼薄，在知識上也不流於淺薄。

第四，必其人能有一種『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神態，使得像我這樣一個不甘心歸於下流，而又隨時容易跑出軌道的人，一念其人，即

能保持着幾分的忌憚。

我之所以未能忘情於光祈，尤其未能忘情於任公先生，便正是因為他們兩位的是爲人，於我上舉的四個條件大體上都能照合。

關於光祈的生平，我曾於民國二十四年寫過一篇紀念他的文字，發表於當時在上海出版的『國論』月刊，裏面錄有他的幾首舊詩，足以表現光祈對中國文學的造詣，可惜現在這本雜誌已經不容易找到了。

在我寫的隨筆中，已曾有過若干關於任公先生的記載，但不曾寫好，而且小有錯誤。最近因爲趙滋藩先生叫我寫一本『戊戌維新小史』，因此有機會把任公早年的著作重檢一遍，同時還參看了有關他師友的若干著作，乃引起了我爲任公作傳的野心，現在我在這裏所寫的，只是他童年和少年時期的一個片段。

關於任公的生平，以他乃弟啓勳一篇短短的記載最爲扼要，現在不妨把它全部錄下：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年十六，入學海堂爲正科生。十九，入萬木草堂。甲午以後，加入國事運動。年二十四，創時務報於上海。翌年冬，主講長沙時務學堂。年二十六，值戊戌政變，走日本。又二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漢口之役，抵滬而事敗，避地澳洲，旋適日本。四十歲，始歸國參與民國新政。洪憲及復辟兩役，奔走反抗甚力。歐戰起，主張加入協約國。年四十六，漫遊歐洲。翌年東歸，萃精力於講學著述。卒於民國十八年己巳，溯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得年五十六。」

新會縣正當西江流入南海的口子，口外有小島七，其中之一名熊子，實爲任公的出生地，因此任公自稱他是中國極南的一個島民。他生長在一個耕讀自給的家庭。祖父名維清，字鏡泉，秀才，祖母姓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在鄉裏教書，母姓趙。

任公生於同治十二年的正月二十六，出生甫一月，他的祖母便已去世，他的祖父和父母雖然都很愛他，但對他的教育却非常嚴格。從四五歲開始，他的

祖父和母親便已教他讀四書詩經。正當他進入六歲這年的某月，其時他的父親已到廣州去應試，任公偶然犯了一次過失，乃引起他母親的震怒。本來，犯罪的事實他的母親已經全盤知道，可是當他被叫到房裏跪下考問的時候，他看見母親正在盛怒之下，乃嚇得矢口不敢自承，而且不知不覺地還撒下了一個大謊。於是他的母親怒不可止，乃把他翻伏在膝前，重重地搥了十幾下，又罰他一直跪到半夜。任公在四十以後，追述他母親當時教訓他的一段話，讀之確實使人感動，現在把它節錄在下面：

「汝若再說謊，汝將來便成竊盜，便成乞丐！……凡人何故說謊？或者有不應爲之事，而我爲之，畏人之責其不應爲而爲也，則謊言吾未嘗爲；或者有必應爲之事，而我不爲，畏人之責其應爲而不爲也，則謊言吾已爲之；夫不應爲而爲，應爲而不爲，已成罪過矣；若己不知其爲罪過，猶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則改焉而不復如此矣。今說謊者，則明知其爲罪過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爲得計

也。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以爲得計，則與盜竊之性質何異？天下萬惡，皆起於是矣。然欺人終必爲人所知，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說謊話之人也」，則無人信之，既無人信，則不至成爲乞丐而不止也。」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名人，往往得力於母教，任公也是一個最適宜的例子。任公六歲以後，改由他的父親課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開始爲文，九歲便能寫成千字左右的短篇，因此到十二歲他便進了學。這個時候的所謂作文，當然以八股文爲主，可是任公却能以八股自限，自入學以後，他對於所僅能得到的幾部書，如『史記』『漢書』『姚選』『古文辭類纂』，以及『綱鑑易知錄』等，都會一一加以精讀，『史記』能背誦者，且居十之八九！年十三，他已知道有段王訓詁之學，等到十六歲進了廣州的『學海堂』，乃專力從事於訓詁詞章。其時廣州有五大書院：曰『學海堂』，曰『菊坡精舍』，曰『粵秀書院』，曰『粵華書院』，曰『廣雅書院』。任公爲『學海堂』的正班生

，同時又爲『菊坡』『粵秀』『粵華』的院外生。這種書院的制度，每月都有月考，訂有一種獎賞辦法，名曰『膏火』，依試卷等第以爲厚薄。任公的成績既佳，因此得的這種『膏火』銀子確也不少，他卽用以買書，每屆年假，往往總是捆載而歸，如『正續皇清經解』『四庫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書』『粵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等等，都是這個時候購入。任公後來之所以成爲一代文豪，與他童年和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博覽經過，當然有極密切的關係。

任公十七歲中了舉，主考李端棻（字苾園，貴州人，官至禮部尙書），對他非常器重，不久便把他的妹子嫁給了他。戊戌李得罪遣戍新疆，雖由於他對維新贊助甚力，與任公的親戚關係，大致也是原因之一吧。

任公十八歲，由他的父親帶到北京去會試，下第歸廣東，路經上海，購得道光年間徐繼畲所著『瀛寰志畧』讀之，我們的這位青年舉人，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其時上海的製造局已譯有西書若干種出版，他很想購買，以無力

量而罷。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光緒十六年八月），任公始由陳千秋（字通甫，又字禮吉）之介，往謁康有爲，任公自述他第一次見康的情形說：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熹，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兼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任公年十九，他便和陳千秋請康正式講學於萬木草堂（其址在廣州長興里），康乃爲他們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他們便把所聽來的寫成劄記。其常課除公羊傳外，同時還點讀『資治通鑑』『宋元

學案』『朱子語類』等，可是任公和千秋對這些還不滿足，更自動地治周秦諸子和佛典，又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書，有所疑滯，則一一就有爲取決。有爲著『新學僞經考』，任公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任公並從事分纂；草堂頗有藏書，他更得到了一個泛覽的機會；像這樣學於草堂者凡三年，任公一生學問的得力，大概以這一時期爲最。

任公的捲入政治漩渦，自甲午中日戰爭始（光緒二十年，任公年二十二），其時他携着他的李夫人住在北京（時結婚已近三年）。大體當時的譯書，兼治算學、歷史、地理。到戰事爆發，他對時局也有所表示，不過究竟人微言輕，引不起何等的重視，不久便回到廣東。第二年乙未，中日和議告成，這年的春天，他又以會試到了北京，首先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痛陳和約利害；繼又參加康有爲所發起的全國公車上書；雖於當時的已成之局無所補救，而對促起國人覺醒，却影響很大。

七月，康有爲等發起『強學會』，任公奔走甚力，即任會中書記。這個會

雖然僅僅只有三個月便已封閉，但任公却盡了他最大的努力：

第一，這個會發起以後，頗向一班熱心贊助的人捐了若干的款子（袁世凱即首先捐助五百元），他們即利用這筆錢設了一個會所，買了若干的書籍，還辦了一份很可笑的報紙！這個報名叫『中外公報』，日出一小張，用粗木版雕印（其時北京的知識份子，還不知道印報的機器是什麼東西）；內容僅有論文一篇，別無其他的紀事；不收費，即委托售京報的人隨同『宮門鈔』附送（實際也無人買）。這篇幾百字或上千字的論文，多數都是由任公執筆，我想也不會比今天大學生的『壁報』高明多少吧！這個報出了一個多月，居然每天印到三千份，這可以說是任公一生以言論報國的一個開始啊！

第二，會裏所賣的書雖不很多，可是當時可能搜集有關時局的書和各種譯本也算應有盡有。（他們原有逐漸構成爲一個圖書館的意思。）任公是一個天生好學的人，在會內住了幾個月，這些譯本他幾乎已全部翻閱。

第三，強學會關閉後，餘下的款子二千四百元，任公即攜往上海創辦一個

『時務報』（旬刊），任公初期著作中有名的『變法通議』，便是在這個報上發表的。批評當時腐敗的政治無所不用其極，而以廢科舉興學校作為他的結論，這大致也就是戊戌維新一類的主張。

光緒二十一年任公在北京所新認識的朋友已經不少，據他晚年追述，以夏曾佑（字穗卿，自號別士，浙江杭州）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給予他的影響最大。二十二年到上海辦『時務報』，所認識當時的新人物乃更增多。『時務報』館在四馬路石路，任公住泥城橋梅福里，而馬良（相伯）馬建忠（眉叔）弟兄，則住在新馬路口，彼此很近，因此任公和麥孟華（儒博）晚上總到馬相伯家裏去學拉丁文。又因為馬先生弟兄的關係，如嚴復（又陵）徐建寅（仲篋）盛宣懷（杏孫）以及江南製造局和漢陽鐵廠這班通西學辦洋務的人們，也都和任公認識了。這時嚴先生譯的『天演論』，馬眉叔著的『馬氏文通』，任公都得有一讀初稿的機會，其所得印象，自然另是一種境界。馬相伯先生覺得任公還很年輕（時任公二十四），宜先學好一種西文以進窺西學，不宜用世

太早；而任公另外一位朋友吳少村，正在做錢塘縣長，也和馬先生同一見解：自願拿出一筆錢，在杭州西湖租一所房子，買一批書，聘英法文教員各一人，至少把任公在西湖關上三年再說！同年十月，伍廷芳（秩庸）任出使美國大臣，也決心要把任公拉去當參贊，連一千元的治裝費也交了任公，任公自己也很願出國；可是吳馬和伍博士這兩個計劃都沒有成功，而任公卒由他的朋友黃遵憲（公度）拉到我們的長沙去辦時務學堂去了。這兩幕也算是任公一生中的大關鍵。換言之，假如任公不轉入戊戌一幕的政潮，能出去當幾年外交官，或打好一兩種外國文字的基礎，早到外國去留學，則任公對國家的貢獻，和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便可能兩樣，不過後來影響的大小，也很難假定就是了。

任公到長沙係光緒二十三年的冬初，其時任公二十五歲，大致在時務學堂講課不過三個月左右，第二年正月，因重病到上海就醫，病好以後，便到北京參加了戊戌維新一幕。任公留在湖南的時間雖這樣短，可是影響却很大，而且和湖南的舊學者王先謙、葉德輝等發生過一幕很激烈的衝突，其詳細經過，從

蘇輿所輯的『翼教叢編』，王先謙的『虛受堂尺牘』裏，都可看出一個大概，說來話長，在這裏我只好從略。當時時務學堂學生聽過任公講學的不過四十人左右，內中有好幾位，便死於光緒二十六年八月漢口唐才常的一役。入民國後做過一任教育總長的范源濂（靜生），民五起兵討袁的蔡鍔（松坡），也都是任公的及門弟子。

戊戌維新一幕的成敗得失，知道的人很多，坊間也很多這類的參考資料，在大學讀書的諸君，也多聽過『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程，已用不着在這裏多說。可是有一點我必得指出：在戊戌這個時候儘管已經是康梁並稱，可是戊戌以前畢竟還是康有爲的時代，任公的重要性，乃在戊戌以後的三十年，在清末民初，至少有十五年，全國的言論界，十之七八都在任公的影響之下，關係是非常重大的。任公去世已經二十七年，假定他現在還活着，也不過八十三歲。他是澈頭澈尾反共的：他活着，固然站在我們這一邊；他死了，精神也還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四十五年三月）

附錄二：梁啟超與清末言論

當民國元年梁任公初回國的時候，曾在北京報界歡迎會發表演說，歷述他自己辦報的經過。

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戰爭爆發，結果中國失敗，次年乙未三月，乃訂立馬關條約。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強學會』，其第一件重要工作，便是向各方面募集捐款。據任公說，最初所捐得的，總共不過一千餘金，這個數字，還包括袁世凱個人捐出的五百在內。

他們有了這筆錢怎麼辦呢？首先為他們所想到的，便是設一個會所，辦一個圖書館，出一張報。說來可笑，所謂圖書館，便是從上海買來了幾十種翻譯的新書；所謂出報，便是每天用木版雕刻一小張『中外公報』。（其時北京還不知道有謂印報的機器。）這張報紙，並無新聞，每天照例只登載一篇幾百個字短論，而担任這篇短論撰述的大主筆，便正是梁任公先生。到這年的十一月

，「強學會」被封禁，報紙當然也隨同壽終正寢，可是發行的數字，却居然到達了三千份左右。（每天夾在宮門抄附送，當然是不賣錢的。）這便算是任公辦報的開始，其時任公的年齡是二十三歲。

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月，任公應黃公度之招到了上海，乃有『時務報』的創設。他在這個報館大致有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如『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作，便都是這個時候寫的，一直到二十三年冬天，他應了湖南時務學堂的聘，才離開上海。

據任公自述，他當時也不知道學堂應該如何辦，時務學堂一共只有四十個學生，他每天批答學生的劄記，動輒便是萬數千言，名雖講學，實際也是以辦報的精神出之。

戊戌九月，任公出亡日本，同年十月，『清議報』即已在橫濱出版。以言論過於激烈，內地嚴禁發行，不得已停辦，但仍出了一百冊以上。

『新民叢報』出版於光緒二十七年冬天，其時經過了一度大反動的拳匪之

亂，清廷創鉅痛深，人民也深感國亡無日，因此叢報大受歡迎，銷行最廣，影響也最大。

除叢報外，二十八年的秋間，更有新小說月報的發行，任公自己寫的一篇『新中國未來記』，便是在這一刊物上發表的。但這個報好像支持得不太長久。

光緒三十三年，『政聞社』成立，其機關報曰『政論』，仍由任公主編，結果『政聞社』被清庭禁止，『政論』亦告停刊。

最後的『國風報』，發行於宣統二年，這可以說是清末立憲運動的一個司令塔，而任公所撰有關憲法經濟財政的文字，也以在這個報上發表的為最多。民國以後所出的『大中華』，名義上雖仍由任公主幹，但用力似不及以前之專，除對日本二十一條的駁斥，及反對帝制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外，我們的印象便也不及以前的深刻了。

綜計任公的一生，其貢獻於言論者，殆歷二十年；其言論的內容亦隨其個

人的進步以爲進步；即以量來說，到今天爲止，似乎也還沒有第二人可以趕得他上。

附錄三：梁啟超手寫康有爲的詩

梁任公會手書康南海詩集，截至光緒三十四年爲止，當時已印行若干部，但余未見，民國三十年商務所印者，則爲崔斯哲君所手書，末附有南海女公子同璧一跋，則南海入民國後所爲之詩已全數錄入。全集凡十五卷，曰延香老屋詩集，曰汗漫舫詩集，曰萬木草堂詩集，曰明夷閣詩集，曰大庇閣詩集，曰須彌雪亭詩集，曰逍遙遊齋詩集，曰寥天室詩集，曰避島詩集，曰漪漣詩集，曰南蘭堂詩集，曰憩園詩集，曰納東海亭詩集，曰美森院詩集，曰游存廬詩集。按南海生清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卒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得年七十。始爲維新運動之鉅子，卒爲復辟黨之渠魁，戊戌以前，以趨新爲舊黨所仇，入民國以後，又以篤舊爲後生所謗，前後不過三十年，其個人所得之毀

譽已懸殊若此。然不論事功與學術，南海要爲近代史上一極有關係之人物，無可致疑。其門人東莞張伯楨君所述『南海康先生傳』，都數萬言，狀南海之學術思想及一生事蹟，最爲詳盡，清史以南海與張勳合傳，爲光宣朝列傳之最末一卷，卽以張氏此傳爲藍本。余讀南海詩集，不甚好之，蓋以其好爲大言，喜標榜，與余之個性，實格格不入，且以此懷疑其一生於政治上無所成就，或與其性格亦不無關係也。

附錄四：釋譚嗣同獄中題壁詩

譚嗣同字復生，別署壯飛，湖南瀏陽人，爲戊戌維新殉國六君子之一。少時儻有大志，爲文奇肆，其學以日新爲主，視倫常舊說若無足措意者。其遺著見近人所輯『譚瀏陽全集』，而『仁學』一書，於清末革命運動尤有甚深之影響。余年十四，讀書長邑高等小學，歷史教員曹先生（秩庸），曾書復生『獄中題壁』一絕示學生，故余至今尙能成誦，詩曰：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

當時曹先生於『杜根』爲何如人，『兩崑崙』何所指，均未詳加解釋，度今日青年，亦正未必了了，茲特爲詮釋於次：

按後漢書卷八十七，杜根以漢安帝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刑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復甦，因得逃竄。及鄧氏誅，乃得徵詣公車，拜侍御史。譚蓋以鄧后擬貪位戀權之慈禧，安帝擬光緒，而已則不望爲倖免之杜根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云：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康南海，其一指俠客大刀王五（正誼），譚少時嘗從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譚與王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譚被逮，王仍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爲義和團所戕，齋志以歿。此一說也。

近人陶菊隱，著有『新語林』一書，（中華版）則謂除王五外，另有胡七

其人，亦任俠者流，與王同與譚友善，譚入獄後，胡曾百計營救，終未得間，其所習武術，與王五同屬所謂「崑崙派」云云。是則「兩崑崙」爲指王胡，而於康無與。此又一說也。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 (1868—1936)

余於中國近代發起改革運動之名賢長德，嘗以未得一見康南海與孫中山，引爲生平憾事。二次大戰巴黎和會結束後，梁任公歸自歐洲，余曾偕友人王光祈君得一度晉謁梁先生於上海中國公學，並承先生期許甚至，勉勵有加，至今感念不忘。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余以友人之介，始得識章太炎先生，自是每週必一次或兩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廬，就國事向先生有所請益，歷時凡兩年有餘，迄先生移家蘇州講學，始告中斷。此實余生平親受前輩教益最多之一時期。先生以二十五年病逝蘇州，得年六十有九，其遺著『章氏叢書』，及晚年之『太炎文錄』，已非今日青年所能句讀。茲記其逸事數則於後，以寄個人思慕之忱，亦或可資崇拜先生者之談助也。

余對章先生之第一印象，覺其爲一慈祥和藹之老人，但仍步履康強，精神飽滿

，吾人平日想像中之『老師宿儒』，先生正其典型人物也。先生籍浙江餘杭，談話多雜土音，初聽時，每苦不盡明晰，既久，則亦了無不懂之處。先生雖爲一純粹之學者，然喜談政治，其於當代諸賢之身世及其與革命之關係，往往能詳其始末，其褒貶亦頗異時流，惜余當時未存筆記，否則可供治現代史者之參考資料當不少也。

先生所居爲一雙開間之衙堂樓房，書房兼會客室，爲樓上右手之一統廂房，開間頗大，但光線不佳，室內陳設，亦了無現代色彩，不失學者與初期革命家之本色也。

余每至先生處，恆在午後四五時左右，以其時余正在中華書局編輯所供職，每日必在午後四時始得下班也。時先生雖已屆六十五歲之高齡，然能縱談二三小時不倦。章夫人湯國黎女士，偶出點心餉客，爲一種糯米所製之小餅，蒸食，黏性頗大，失之太甜，余見先生食之津津，亦不能不食之津津也。先生述一故事，往往枝葉扶疏，能使聽者如親接故事中之人物，躬履當時之境地，不願聽其中斷，章夫人恐先生過勞，每一再催用晚膳，但先生不顧，余不待其辭畢，亦決不敢興辭也。

先生嗜紙烟，往往一枝尙餘寸許，又燃一枝，曾見其歷三四小時不斷。所吸以當時上海流行之美麗牌爲常，偶得白金龍，卽爲珍品，蓋先生爲人書字初無潤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卽以紙烟若干聽爲酬，故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余初不嗜此，後在上海編日報半載，往往社論，短評及第一版新聞，均出余一人之手，且非看過大樣以後，不敢離去編輯所，不吸烟實無以振刷精神，於是乃嗜之成癖。及爲先生座上客，爲時近三年，每至，先生必縱談不斷，吸烟不斷；余則靜聽，亦吸之不斷；余至今仍非每日四十枝至五十枝不能盡興，蓋與先生之一段因緣，不無關係也。

先生爲人書字，以鐘鼎爲常，喜以一人牽紙，振筆疾書，一日，章夫人立先生後，指點某字不佳，先生回頭笑謂夫人曰：「你不懂得寫字囉！」其實夫人雅擅詩文，字亦端秀，先生之爲此語，足證其伉儷間雅興不淺也。

民元，先生與夫人結婚上海，羣弟子請先生與夫人卽席賦詩，先生口占兩絕，其一云：「我身雖稊米，亦知天地寬，攝衣登高岡，招君雲之端。」夫人以無此

捷才辭，僅錄舊作七律一首，亦娓娓可誦。此事載當時上海「民立報」，一時佳話也。

民二二次革命後，先生被袁世凱幽於北京之龍泉寺，憂憤欲死，曾有致其夫人家書兩通，區處後事，中有涉及其身世及所學之處，辭旨嚴正而淒惋，令人不堪卒讀。夫人亦有一書致袁，爲先生請命，措辭不亢不卑，深得立言之體，其涉及與先生結合一層，有「結襦一年，誓共百歲」之語，殊足激動讀者之同情，宜乎項城卒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

余見先生有一七八齡之少子，爲湯夫人所出，韶秀活潑，不類常見。見先生常爲人寫字，亦自訂一潤格，張於樓下之壁間，有七言聯一幅，皮球一個；單條一幅，火車頭一個云云。一日，余在先生處晚餐，此聰慧之稚子，忽問先生曰：「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還沒有出齊嗎？」先生笑領之，余則殊訝其早熟。今此君殆三十許人矣，惜余不能舉其名字，亦不知其近作何狀也。

張敬堯在北京東交民巷爲人所暗殺，先生作小詩一首以詠其事，詩曰：「金丸

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爲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一日，余至先生處，先生作此詩正屬稿甫就，並將第三句『試問』之『試』字塗去，改一『爲』字。余問先生『沙門』何指，先生笑謂余曰：『古人作詩亦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者，何必深問？』余亦一笑而罷。

『一二八』之役，翁照垣以守吳淞得大名，當戰事正酣之際，余往謁先生，請書數字贈翁以資鼓勵，先生領之。次日余往索，先生則出文一首，長約千餘言，且親筆以宣紙楷書，譽照垣甚至。余大喜過望，即持至中華印刷所，託余友袁聚英君製成珂羅版，印三百份，分寄全國各報館。時天津大公報，即據余所贈，複製鐸版，刊諸報端，於是照垣之名更大噪於南北。余友常燕生兄，讀先生此文，乃繼黃公度『聶將軍歌』後作『翁將軍歌』一首，長達數十韻，亦爲時人所傳誦。時余與照垣，初無一面之雅，後晤於上海，乃覺其人爲一純粹軍人。近年聞其鬱居港澳間，飽歷世變，其修養或當有進境也。

宋哲元以大刀隊在長城抗日，殺敵過當，國人頗壯其所爲。一日薄暮，余走謁

先生，先生正憑窗檢閱地圖。見余入，乃謂余曰：『長城竟有這許多的口子？』余笑應之。私心自忖，先生於學所涉甚廣，且生平崇拜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之顧炎午，又曾一度任籌邊，何獨於長城諸關隘不甚了了耶？

先生曾以『江左夷吾』許宋遯初（教仁），及宋被狙擊，梁任公亦於當時在上海出版之『大中華』雜誌爲文弔之，謂宋有政治家風度。蓋梁宋間在民國元年固曾有互相維繫之要約，支持袁世凱以求得和平統一者也。惜宋能容袁，而袁不容宋，卒至造成民國二年之悲劇，而袁氏之敗，亦以此一役發其端，趙秉鈞輩妬賢害能之小人，誠不足齒也。

中山先生以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先生曾以一聯挽之，風調實爲當時挽孫諸聯之冠，聯曰：『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初萌，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是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聯意僅在反對當時之孫段張三角聯盟，於中山初無貶辭，聞孫先生治喪處諸人，得此聯未敢懸掛，不解何意。

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碩學通人，亦往往不免。先生一代大師，文宗漢魏，

持論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處每發前人所未發。嚴又陵（復）林琴南（紆）與先生同時，均雅擅古文，並各以譯述自顯於當世，顧先生於嚴林之文，乃深致不滿，其言曰：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紆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紆視復又彌下，……浸潤唐人小說之風，……與蒲松齡相次，……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

嚴先生持論矜慎，不聞於先生有所詆謫，林則反唇相稽，於先生之文亦抨擊不遺餘力，其言曰：

『……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以擗搯爲能，以餽飭爲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墍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不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僮人入城，購搢紳舊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卽以搢紳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視之，章先生既非庸妄鉅子；畏廬譯西洋小說百餘種，使國人畧知異國

情調，實亦未可下儕於談狐說鬼之蒲松齡；嚴又陵功在介紹一時期之西洋思想於中國，初非以文字與人爭短長，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評之旨趣衡之，均非持平之論也。

余平日在先生處所聞，以明末遺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爲多，蓋前者爲先生革命思想之所自出，後者則先生曾躬與其役者也。一日，先生問余近讀何書，余告以正看陳壽三國志。先生曰：『此書簡練謹嚴，如能同時細看裴注，則可悟古人運用史料之法。』余於此書曾翻閱三四過，得先生指示之力爲多也。

先生原名絳，後改炳麟，字太炎，生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卒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得年六十九。

附錄：關於劉師培

近世文人，學富而命嗇，名高而運蹇者，殆莫如劉師培。師培字申叔，又名光漢，別號左盦，江蘇儀徵人。生民前二十八年甲申（1884），卒民國八年

己未（1919），得年僅三十有六。其學術途徑與太炎同，其早歲排滿，旨亦與太炎符合，故章劉交甚篤，雖中更齟齬，劉絕章，章未絕劉也。黃季剛年輩與劉相若，但季剛既師太炎，亦師申叔。申叔以其妻何震之切持入端方幕，復以楊度孫毓筠之句引，爲帝制張目；但蔡子民長北大時，仍聘申叔任教授，蓋重其學也。其遺著凡七十四種，論羣經及小學者二十二，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羣書校釋二十四，詩文集四，讀書記五，學校教本六。至民國二十五年，始得其摯友南桂馨氏爲之印行，錢玄同氏實負整理之責。申叔身長玉立，癯瘠秀削，睹其遺像，卽知其爲絕頂聰明人也。其叔富會，謂其『得名太早，厥性無恆，好異矜奇，悞急近利，』或近似之。當世亦不乏聰明特達之士，其性近學術與文藝，惟於現實政治，則不甚了了。乃亦爲人所牽引，投入亂流，悵想劉氏生平，亦不禁爲此輩惜也。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

(1868—1940)

民國八年的『五四』，隔現在已經是三十二年，當日曾直接間接參加過這一幕的青年人，除一部分已經死亡以外，其存在者，大率也都是五十六十的老頭，經過三十年以上時代的煎迫，有的是壯志銷磨，有的是銷聲匿跡，還有不少的是腐化惡化，墮落不堪，其能不背初衷，堅守着自己學術或事業的崗位，仍在繼續奮鬥，苦苦掙扎者，大概已如鳳毛麟角。

所謂『五四運動』，有兩個顯然的含義：其一是政治的，其一是思想文化的。中國人受着外來的影響，起而謀政治的革新，與思想文化的改造，在『五四』以前，已經過悠長的歲月，出現過無數承先啓後的鬥士，然而關係之大，入人之深，甚至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那樣的波瀾壯闊，從某一意義上看來，也不能與『五四』相提並論。此何以故？

因爲戊戌一幕，僅僅是中國少數的士大夫，多少受了一點西洋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啓示，感於當時那一套陳腐的，因襲的治理國家的方式，已經完全不能適用，因而倡率徒衆，投袂奮起，提出了中國歷史上那種書生式的改革要求，以當時的環境，其失敗是必然的，也正因爲是失敗了，所以才能在中國革新運動的過程上，留下一份頗高的歷史價值，假定他們不遭遇殘酷的打擊，而有局部的成功，則以當時各方配合的困難，想求得如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成績，也斷不可得。

辛亥革命是合政治與種族的兩個因素而形成的，其成功只限於種族的一面，政治則四十年來並沒有表現什麼顯著的成績。我們細檢革命前後的史實，沒有發見怎樣了不起的政治家，即令就有，他們也從來沒有得着一個從事政治建設的機會。他們似乎是並沒有準備一套具體的政治方案才開始革命，是革了命才去找政治方案。革命成功可能發生的後果，立憲派的想像還較爲正確，革命派則過度的偏於樂觀。截至今天爲止，由辛亥革命所留給我們這輩孤臣孽子的，似乎已經只剩下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此外大概也就沒有什麼了。

『五四』不然，當時的爭外交與打賣國賊，這僅僅是引起這個運動的導因，如果只此一點，也就不過是一種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而已，雖然在意義上也相當嚴肅，但內容究竟簡單，其影响決不會如此的深刻。惟其把這個運動的範圍，擴展到了一般的思想文化，然後才把它的色彩，渲染得異常的強烈。後來有人把這一運動的目標，歸納於『民主』與『科學』，雖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狹隘：『五四運動』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種熱情，它的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對文學藝術要求的熱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種運動中所沒有的。單調的民主可流於形式，單調的科學可陷於枯澀，賴文藝有以潤色之，然後才做到篤實光輝，使人不倦。戊戌辛亥的外表，自然也側重在趨新，但戊戌的手段爲『託古』，辛亥的號召爲『光復』，其本質却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然後才是一個現代中國的奠基，才是把中國推進現代文化羣團中的第一步。『五四』決不反對歷史文化的回顧，但着眼在舊文化價值的重估，其精神是進取的，決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決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不只『中體

西用』之說，與『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國本位』之說，也與『五四精神』杆格不入。

領導戊戌一幕的是康有為，領導辛亥一幕的是孫中山，領導『五四』的却是蔡元培。我們要就這三幕研究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與價值，必於這位領導者的性格，修養與活動求得充分的理解。因為我們知道：規範一種運動的形態及其進展，依於其領袖人物的性格，修養與活動方式者是非常密切的。研究康孫不在這篇文章的範圍以內，為追懷『五四』，我只在這裏談談蔡元培。

嚴格的講起來，我不是一個適於談蔡元培的人，可是在我同時代而年輩較早於我二三十年的若干人物中，蔡先生却是很歡喜的一個。他生平的言論，行事，以及若干種已印行的著作，我大致沒有多少遺漏都曾加以注意。尤其他所實踐的一種生活態度，也似乎給了我一個有力的啓示。記得有一次，我大概是搭最早一班的火車由上海去杭州，當我走進車站的時候，正看見蔡先生坐在月台上一張給旅客休息的長櫬上，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夾長衣，一手捏着個小紙包，一手抓着紙包裡的東西

往嘴裏送。其時車站上的人還沒有幾個，我着實看了他幾眼，因為我在注意他，也引起他望着我，這是蔡先生給我第一回的印象，看樣子他最多不過六十，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我已不能確指了。另一次，我剛剛跳下上海靜安寺最後一站的電車，向百樂門的一方走去，遠遠看見蔡先生攜着他的周夫人緩步而來，走進了百樂門隔壁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其時我並不要買書，但也跟着進去，看見他東望望，西望望，選購了好幾本新出版的哲學書，內中有兩本，我知道譯者本領並不高明，但他還是買了去，當下我頗懷疑，他為什麼要買這種東西？近年我有一位朋友，能暢讀英德文的名著，他自己譯的書也不少，因為他平日不歡喜翻閱別人的中文著作，乃至累得自己的幾句中文，也愈來愈不圓熟，在他的譯著中許多極尋常的人名地名，往往也要自出心裁，運用一些面生可疑的字眼，因此我才感到蔡先生把別人那種譯得不大的書也買去翻翻，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這次我看蔡先生的容色很好，衣履也很整齊，其時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已遷居在靜安別墅的時候，他的年齡已在六十六七，態度多少有點龍鐘了。還有一次，這是一個比較更早的時候，我偶然在上

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內容大概是鼓吹『戀愛至上』一類的東西，淺薄而頗有力。第二天，在同一報上便有一篇文字駁我，措辭很溫婉，態度很嚴肅，還引了柏拉圖的一番說法，頗引起我的注意。同一天的下午，該報的副刊編者老友崔萬秋走來問我：『你知道今天駁你的那篇文字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蔡子民呀！』『哦！』在我是那樣輕率，蔡先生却是這樣的不肯馬胡，這實在使我非常感動，今天更從何處可找着一個這樣青年人的領導者呢？

蔡元培也只是一個書生，但是一個很像樣子的書生；他也是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的一個人物，但別人過渡或者永遠在過渡中，或者永遠渡不過去，而他却是一個真正渡過去了的人物！

以翰林而參加革命，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畢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他也是最徹底的一個。

看蔡先生的樣子似乎也很平凡，但他實際有過人的智慧。他十七歲補諸生，二

十三二十四便以聯捷成了舉人和進士，二十六得了翰林院庶吉士。自從他二十八歲在李慈銘家裏當塾師算起，中間經過担任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南洋公學的教員，愛國學社的總理，愛國女學的校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上海『警鐘日報』的編輯，自民國六年開始任北大校長，實際上名義上繼續到民國十五年才正式擺脫，一直到二十九年三月五日他在香港去世以前，他還是遙領了一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他曾以很短的時間做過官，但他不是爲做官而做官，是爲他的教育與文化事業而做官；他曾不斷的到德國到法國去留學，也不是爲成就他自己一個純粹學者的地位而留學，還是爲他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而留學；別人有他這樣的恆心，不必有他這樣的學問；有他這樣的學問，也不必有他這樣的眼光和魄力！『爲之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臨大節而不可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細細檢討這五十年來的人物，惟蔡先生庶幾近之。

他在四十一歲才開始到德國去讀書，他是從中國傳統的博學風氣裏面陶鎔出來的一個人，對學問的興趣非常廣泛，凡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實驗心理學

，美學，……他都去聽講，去作實驗。從這一次起，他前後曾三次去德，兩次去法，所花在國外讀書的時間，凡十三年。他在留學的時候，沒有忘記國內的事業；做事的時候，也決不肯拋開學問。他的著作和譯述雖在十種以上，但他沒有集中精力，寫出一種較大的東西，環境限之，事務擾之，從他的性格上說，這要算是他個人的一種損失，可是也正因為他是一面學，一面教；一面做事，一面讀書，其所留給一般後輩的影響，乃決不在梁啓超，嚴復，王國維諸人之下。

他在民元教育總長任內所公布的教育宗旨，即提倡美感教育，後來他自己也在北大講美學。民國六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論文，到十一年『非宗教大同盟』起來了，他更主張教育應該離開宗教而獨立，持美育代宗教之說更堅。他這一說能否站得住姑且不談，但這個強調美育的新風氣却是由他所倡導，而教會在中國所辦的教育，因此受了絕大的影響，不能不改弦更張，却是事實。

蔡先生處理北大的行政，是最能表現一種民主作風的。他實行了教授治校的辦

法，教務分任，事務合議。聘教員只問學力，不講資歷，也不問思想的派別，保持了講學的絕對自由。在他所聘的教授中，有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章士釗這類的舊人，也有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李大釗這類的新人。只問是非，不問新舊，合文理一爐而冶，一以研究的旨趣出之，假如我們說，一直到了蔡先生，中國才開始有了像樣子的大學出現，這決不是過譽。

蔡先生之爲人，有他狂的一面，也有狷的一面；他的學風，有他高明的一面，也有他沉潛的一面。狂與高明的一方面，受中國文學和法國啓蒙時期以來思想的影響最深；狷與沉潛的一面，受中國儒家，理學，乃至德國學風的影響也不小。我究竟沒有親炙過蔡先生，也許我這個話多少有些近於模糊影響，很希望蔡先生的朋友們，學生們，能給我以更親切的指教。

『五四運動』的爆發，是蔡先生長北大兩年半以後的事，蔡先生是一個革命者，愛國者，從這方面他給了青年們一種打破當時政治現狀的感召；他又是一個強烈的知識追求者，從這方面他做了青年們向思想文化方面努力的一個引路人。中國是

應該固持着『五四精神』向民主，科學，文藝方面去求發展的，但不幸過去二十年的政治環境，沒有使這種精神得着適當的保育和發揮，現在更不幸遇着這一羣淺薄的，狹隘的，殘酷的共產魔術家，更使得這種精神遭遇着空前的威脅。但我相信蔡先生的精神不死，『五四精神』也決不會夭折的。

有人說，蔡先生曾講演過『科學的社會主義概論』；（二十二年在上海青年會）他也說過不該因反共也反對研究馬克斯；同時他在軍閥的高壓下更曾高呼過『勞工神聖』；假定蔡先生在今天還沒有死，他不過是八十五歲的高齡，他是不是也會如張元濟之流的向共產黨去靠攏呢？我的回答是：不會，決不會！蔡先生酷愛自由，尤其酷愛學術思想的自由，他也講社會主義和不反對研究馬克斯，但完全是從學術自由的觀點出發。他是十六年提議國民黨實行清黨的一人，可見他對研究共產主義與實行共產是絕對不會混爲一談的。他在民國二十年前後特務橫行的時候，曾依據民主主義與人道主義發起過『民權保障同盟』，他在提倡革命的時候，即曾在『蘇報』發表過『釋仇滿』一文，以駁正鄒容在『革命軍』上那種『殺盡胡人』的說

法，你說他眼看見今天共產黨在大陸上這種無法無天的集體大屠殺，他還能夠容忍嗎？他對國民黨專政時代那種侵犯人民權利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尙且主張加以廢止，他對中共今天這種變本加厲的所謂『懲治反革命條例』，還能夠加以附和嗎？總之，蔡先生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而正誼感極強的人，他只能服從理性，決不會屈於威武，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儘有多少是偏左的，但決不是今天的中共和靠攏分子所得而假借。

記梁濟的自殺

(1859—1918)

我知道有梁漱溟其人是很早的事了，但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卻從讀了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開始。後來又看過他一本談印度哲學的書，（書名好像是『印度哲學概論』吧？）和不少關於鄉村運動的文字和書籍，我對他乃有了一較深的印象。一直到抗戰開始，我才和他正式見面。他對繼續八年的『國民參政會』是始終其事的一人，我也始終和他同事。到民國三十年，我更和他以及張君勱章伯鈞等幾位，發起了一個『民主政團同盟』；等到親共分子混入『民盟』搗亂，我決定把『民盟』的秘書長辭去，並同時和一部分青年黨的同志宣告與『民盟』脫離，漱溟還拉了我在鮮特生的花園內作過一度長談，苦苦勸我不可輕於退出，但我知道『民盟』的命運已定，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三十五年十月，第三方面人士對國共作最後一次的調停，我又和漱溟在一道，關於這一幕，我在『近三十年見聞雜記』裏面已有較

詳的記載，在這裏恕不多贅了。（該項雜記，曾在新聞天地週刊發表，後由自由出版社出單行本）從這次分手以後，至中共進佔四川以前，聽說他是住在重慶北碚勉仁中學的。我前年來香港，由友人張君從重慶帶來了他的兩本近著：其一、『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成都龍山書局出版）其一、『中國文化要義』，（十二章的油印本）知道他還是那樣認真，那樣努力，因此依然沒有動搖我對他的信任。去年聽說他到了北平，還聽說他曾到河南去視察過『土改』，有文字發表，這些經過我便完全不知道，他的文字我也不曾看見。我想：以漱溟的個性，和他過去的所學，所主張，他究竟如何可以和中共靠得攏？翁文灝不足道，假定像漱溟這樣一個人，也被迫上了梁山，在我便覺得是很可惜的。

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一字漱溟，後以字行。以與張鎔西（耀曾）有感誼，故民五張任司法總長時漱溟一度任司法部秘書，其任北京大學講師，係民國六年冬間事，時漱溟年僅二十五也。

漱溟之父名濟，字巨川，光緒乙酉舉人，原籍廣西桂林，然自巨川之父寶書（

道光庚子進士）迄漱溟，居北京已三世矣。

巨川歷官內閣中書，晉侍讀，改官制後，調民政部供職，迄清之亡，名不甚顯。至民國七年十月七日，乃投身北京的積水潭，以自殺殉清聞，其臨死前所遺『告世人書』有曰：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初年所學爲本位。』

『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爲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爲也。清朝者，一時之事耳；殉清者，個人之事耳；就事論事，則清朝爲主名；就義論義，則良心爲通理。設使我身在漢，則漢亡之日必盡忠；我身在唐，則唐亡之日必盡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爲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爲本位，非以清爲本位也。』

『且諸君亦知鄙人何爲硜硜拘執以行此義乎？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

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爲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爲人，國焉能成爲國？欲使國成爲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爲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爲國性一線之存也。』

其言可謂深切著明，雖今日讀之，猶凜凜有生氣。邵力子，張治中，翁文灝之流，於國民黨則爲要人，於中華民國則居顯位，在一旦共黨毀國，乃復從風而靡，責以『轉移無定，反覆無常，面目靦然，不知信義爲何物，』尙復何說？即在漱溟，假令偶一憶及乃父臨死之遺言，亦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巨川成仁後七年，即民國十四年，漱溟始與其兄煥黼（字凱銘）編印乃父之遺著問世，題曰『桂林梁先生遺書』，內容凡六種：一、遺筆彙存一卷，二、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三、侍疾日記一卷，四、辛壬類稿上下卷，五、伏卯錄一卷，六

、別竹辭花記一卷。予所見者爲十六年商務印行之初版，分訂四冊，第一冊卷首有漱溟兄弟爲巨川先生所編之年譜，及影印梁任公覆漱溟書一通，均極重要。從巨川日記，辛壬類稿，伏卵錄中，可看出清末民初北京社會各方實況，及當時政治方面各種醜惡情形，予治現代史者之幫助不少。巨川爲殉清之人，而對當時遺老及參與張勳復辟一幕的若干人物，乃批評甚爲嚴格，且其自身更根本反對復辟，此不失爲一種獨立正確之見解也。

巨川於辛亥以後，卽蓄志殉清，然對民國仍存有若干希望，甚至對袁世凱趙秉鈞之流，也希望他們振作有爲。後來看見情形愈來愈糟，他始感到生命已無久延之必要。民國七年十月七日，是他六十歲的誕辰，他決心不過六十的生日，卽於七日這一天的清晨，投水自殺了。巨川幼承母教，持身謹嚴，處事處人，各有一定分際，純粹爲一種中國固有之優良作風，從他的遺著中，更可看出他無日無時不以救世救人爲念，其人爲一卓然有道之君子，無可疑也。

巨川傾慕梁任公數十年，任公歸國後，卽踵門往謁，並請爲寫扇聯，歷五次未

得一見，扇聯亦迄未寫。後見任公題譚鑫培（卽小叫天）刺綉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之句，以爲「任公有暇爲叫天題詩，無暇爲我寫字」，乃大失望，於「伏卵錄」中紀此事經過甚詳。遺著印行，漱溟卽以一部贈任公，並爲書道意，任公讀之大慙，卽覆書漱溟，自承「無狀」，謂巨川死後，於報中讀其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並請漱溟「於春秋絜祀時，得間爲我昭告，爲言啓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服善之勇，與漱溟之以直道待任公，兩俱足稱也。

厭世自沉的王國維 (1877—1927)

(台北國民出版社，把王靜安先生早年所寫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和『茗華詞』，合成印一小冊，題曰『王國維先生三種』，該社社長要我寫幾句關於王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的話，作為重印這本小書的導言。以我來談王先生的著作，確實是不甚相宜的；但重違該社的雅意，好在這三種東西我却是在三十年前便已讀過的，只好就手邊所有的資料，拉雜的寫成了這個短篇，聊供讀者參考而已。)

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陰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個午前，一位學者形態的老者，身着中國服裝，鼻樑上架着深度的近視眼鏡，僱好洋車，從清華學校出發，一直到達頤和園。購好門票入園，步行到排雲殿西的魚藻軒前，面對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態度異常鎮定，還從懷裏掏出煙盒，取紙煙一枝，吸之至盡，然後向湖

內聳身一躍！園丁聽見有人落水，便連忙跑去，把他救了起來，但不到兩分鐘，已氣絕身死。

這便是一代學人王靜安先生的一個最後歸宿。

入殮時，在他的裡衣中，發見他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紙，紙已濕透，但字跡完好。這遺書的全文是這樣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先生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他的家庭並不怎樣富有，只是勉強可以過活，因此他一生的學問，都是由苦學得來，除掉日文、英文和幾種理科方面的科學會從師補習以外，幾乎全是由於自學。在同時的學人中，他和羅叔言（振玉）先

生的關係最深；三十九歲以後，和沈子培（曾植）先生定交，受着他的啓示也不少。

王先生生於前清光緒三年丁丑（1877）十月二十九日，到他死的這一年（1927），纔得五十一歲。他一生結過兩次婚：第一次，二十歲，娶的是莫夫人，生了二個兒子；第二次，三十二歲，潘夫人，生了七個子女。爲了教養子女的負擔很重，使得王先生不能不於治學以外，隨時担任一些有收入的工作，不過他所任的工作，也大率於他的學問修養有多少關係就是了。

關於王先生的家世，生平，治學的次第和變化，以及他全部著述的列舉，有他的高足趙萬里先生所寫的『王靜安先生年譜』，『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以及吳其昌先生寫的『王觀堂先生學述』等篇言之最詳，我不想在這裏複述。但爲閱讀這本小冊子所重印的這三種東西——『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苕華詞』——了的讀者參考起見，卻有一點必須指出：即王先生在三十五六歲以前，其治學的重點在哲學、文學；三十五六歲以後，則重點全在史學是也。

『紅樓夢評論』寫成於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時王先生年二十八歲，其立脚點全在叔本華的哲學。以現代哲學、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的觀點，就我國這部傑作加以深刻的批判者，以王先生爲第一人。同時，對『紅樓夢』作者姓名及作書年月應加以考證，也以王先生提倡最早。

『人間詞話』寫成於宣統二年庚戌，（1910）時王先生年三十四歲。這篇東西是他讀諸家詞集的一種心得，醞釀的時間頗長，在這篇東西以前，他曾寫過『文學小言』十七則，與話詞是有密切關係的。

『茗華詞』原名『人間詞甲乙稿』，大部寫成於光緒三十一年迄宣統二年（1905—1910）之間，王先生對他所填的詞自視甚高，在他的『自序』中曾說：『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焉，則填詞之成功是也。余之於詞，雖所作尙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媿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

統括王先生前後期的學術思想而給以一個總評價的話，我覺得以梁任公和陳寅

恪兩先生說得最好。

梁先生說：

「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墟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蹟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史若然改觀。若創治『宋元戲曲史』，蒐述『曲錄』，使樂劇成爲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度越其範圍。若精校『水經注』，於趙、全、戴外別有發明；若校注蒙古史料，於漠北及西域史實多所懸解；此則續前賢之緒，而卓然自成一言。其他單篇著錄於『觀堂集林』及本專號與夫羅氏哈同氏諸叢刻者，其所討論之問題雖洪纖繁簡不一，然每對於一問題，蒐集資料，殆無少遺失，其結論未或不歷心切理；驟視若新異，反覆推較而卒莫之能易。學者徒歎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也。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脚，而從精微處着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

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於箇別問題，爲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飾，望者輒疑爲竺舊自封矜，顧其頭腦乃純爲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爲前人所嘗道者，輒棄去，懼蹈勦說之嫌以自點污。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顯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節錄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序文）

陳先生說：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蠻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

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日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又「宋元戲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遺書所以爲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節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我想，凡是一個對王先生遺著有過一番接觸的人，決不會感到梁陳兩先生這兩段推許的話，有什麼溢美之處。

王先生的憤世自沉，是一件可痛惜而又不平凡的事，在當時不免引起種種的議論或看法，我覺得從根本上探索王先生的死因的，也以陳寅恪先生的說法最爲允當。陳先生有一篇「王觀堂先生挽詞」，詩是近代詩壇一篇傑作，羅叔言先生說它「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決非過譽。詩前有一篇序，即說明王先生死因的，我覺得尤其重要，可惜文長不能全錄，只能把它的要點摘出在

下面，即作爲我這篇文字的結論。

陳先生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我們試想：王先生遺囑中所謂『經此世變』云云，不正是陳先生所指的這一『鉅劫奇變』還是什麼呢？

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港。

附錄一：王國維與沈曾植（1850—1922）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清道光三十年（1850），卒民國十一年（1922），得年七十有三。清末官安徽布政使，民六，曾與張勳復辟之役，詔授學部尙書。其人雖爲一澈底之復辟派，然實有清三百年學術史上之殿軍。

民國四年春，王國維歸自日本，曾謁子培於上海麥根路寓廬，質古音韻之學；民五以後，更與子培時相過從；國維所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文（見觀堂集林卷五），實自子培啓之。民八，國維有『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之作，暢論清代三百年學術變遷之迹，於子培推崇甚至，未可以尋常酬應文字視之也。

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國初一變，創之者顧亭林（炎武），以經世爲體，以經史爲用；乾嘉一變，創之者戴東原（震）與錢竹汀（大昕），以經史爲

體，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道咸以降又一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爲前人所不爲，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國維贊美子培之言曰：

『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俛俛無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爲亭林東原竹汀儔也。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愴，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

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因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子培著述多未出，即偶印行者，今亦不易得，然讀王先生此文，及王蘧常君所爲「沈寐叟年譜」，亦可窺見其梗概也。

附錄二：王國維評紅樓夢

近五十年來，中國談紅樓夢的有三位有名的學者：最早的王國維，他寫了一篇「紅樓夢評論」；其次蔡元培，他寫了一小冊「石頭記索隱」；又其次是胡適，他做了「紅樓夢考證」。

蔡先生的『索隱』，着重在闡證本事，他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說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他說林薛諸人，一一影射着當時的若干名士。

胡先生的『考證』，着重考出作者的姓名，作者的時代，因之對於紅樓夢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作者高蘭墅的略歷，都下過不少的工夫。（我現在手邊獨缺少胡先生的考證。）

王先生這篇『評論』，大致是他三十歲以前的作品，其時他正以最高的熱度，作哲學與文學的追求，且有志於戲劇的創作。因之，他這篇評論的出發點。既不同於蔡，也不同於胡，（儘管他也強調應該考證作者的姓名和著書的年月，但他自己却沒有做這種工夫；類似蔡先生那種闡證本事的考據，他以爲沒有必要。）而是以哲學、美學、倫理學乃至心理學的觀點，從紅樓夢這部大著裏去探討人生的究竟。

我近來稍稍涉獵王先生遺著中關於哲學和文學的研究，以及他的詩詞，我總覺得王先生的天分，比之他同時代的人來得高，假定他後來不把學問的興趣移到別的方面去，而一直向哲學和文學去發展，我真不敢測度他可能及於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影響，將是何等的偉大。即以他這篇『紅樓夢評論』而論，儘管是他早年的著作，但足以給予玩索這部大著的人們一種新的啓示，仍屬毫無疑義。

他這篇論文共分五章：一、人生及美術之概觀；二、紅樓夢之精神；三、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四、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五、餘論。全文約一萬四五千字，我現在只想把其中確能幫助我理解這部書的一部分，在這裡述一述。

把王先生主要的意思概括起來，大致是這樣的：

人生之所欲，無過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不外乎苦痛。世界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其所欲亦彌甚。『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而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以前者為無盡的，後者為有限的；前者為形而上的，後者為形而下的也。苦痛之度，與生活之欲之度為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於後者之苦痛。而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王先生既認定紅樓夢是一部歷盡人生苦痛而求得解脫之道的書，但所謂解脫，從性質上看來有不有什麼差別呢？王先生解答這個問題大致是這樣的：

「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其所以得到解脫的出發點，又有兩種不同：「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因此，他覺得紅樓夢上的人物，如金釧之墮井，司棋之觸牆，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並不是真正的解脫，因為他們只是對於某一種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而不是從根本上放棄了生活的欲求。因看着他人的苦痛而自己得到解脫的，只有惜春和紫鵲，因覺着自己的苦痛而得着解脫的，則僅僅只有一個賈寶玉。惜春紫鵲的解脫是超自然的，神明的，宗教的，平和的；寶玉的解脫，則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

的，悲壯的。因而也就是文學的，詩歌的，小說的。紅樓夢的主人公之所以是寶玉而不是惜春紫鵲，其原因就在此。

王先生又認定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這裏他用叔本華的說法來加以解釋。

叔本華分悲劇爲三種：第一種是由極惡的人極其所有的能力以交構而成；第二種則由於盲目的命運；第三種乃由劇中人物的位置和關係而不得不然，其人物與境遇都很普通，而且明知其有害，又交施之而交受之而各不任其咎，因此，其感人的程度，乃較爲前兩種遠爲深刻。

紅樓夢這一大悲劇的形成，係由於寶玉黛玉之終於無法結合，可是這個實的演進却是很自然的：賈母歡喜寶釵的婉順，而不大歡喜黛玉的孤僻；王夫人自然親薛而不親林，同時也太不够了解她那樣一個兒子；鳳姐操持家政，當然不能不忌黛玉之才；襲人鑑於尤二姐和香菱之事，又聽黛玉說過『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自然也感到非常危懼；如此一來，黛玉從四面八

方遭受打擊的這一趨勢，已經是無法變更。可是賈母和王夫人，畢竟是深愛寶玉的，假定他能把這件事叫穿，不濟則拚着一死，也不見得沒有挽回的餘地，可是這又爲當時的道德觀念所不許。這樣一種做法，已經不能望之於寶玉，黛玉自然更是無能爲力了。

像紅樓夢這樣一種悲劇，在我想來，在宋以前大致是不會發生的。假定在漢在唐，處在寶玉黛玉這樣地位的兩個男女，男的儘可以作司馬相如作張生，女的儘可以作卓文君作鶯鶯，何至於束縛到死而不敢表示絲毫的反抗？可是中國的禮教和大家族制發展到了清初，則雖欲跳出這一樊籠而勢有不能，於是乎林黛玉不得不死，而寶玉的苦痛，也就到了不得不自求解脫的境地了。構成這個悲劇的時代因素，爲王先生的「評論」所不及，我不敢自信這個看法很對，姑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附錄三：王國維的詞

陳寅恪先生序王靜安先生的遺書，把王先生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概括於三個項目：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獫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

經陳先生這樣一指點，進而讀王先生的全部遺著，我覺得眉目是異常清楚的。

據王先生所自述，他早年治學的途徑，是「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其所以移於文學之故，是「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他又說：

「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焉，則填詞之成功是也。余之於詞，雖所

作尙不及百閱，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媿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以上所引，均見王先生的自序第二篇。）

以王先生之絕頂聰明，而又好學深思不倦，何以於詞獨表示這樣自信的堅強？我是這樣假定過：也許他這兩篇『自序』是他剛過三十的時候寫的，多少難免有點少年人的誇大？及進而略涉他對於詞所下過的工夫，及他對於詞的基本見解，更進而玩索他自己的作品，乃不能不把我這個假定完全放棄，覺得他的話乃是確有把握之言，普通少年人的誇大習氣，在他是完全沒有的。

王先生論詞主『境界』，或云『氣象』；其品第詞格之高下，則有所謂『隔』與『不隔』。

何謂『境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寶簾閒挂小銀鈎」，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

何謂「氣象」？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闢千古登臨之口。……」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雪紛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何謂「隔」與「不隔」？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畧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以上釋例，均見王先生的『人間詞話』。這個小冊子有單行本，雖只寥寥萬餘言，非欣賞古人之作別具會心，何能道得出隻字？

王先生自己所作的詞，見『觀堂集林』卷二十四者，凡二十三闋；另『茗華詞』一卷，凡九十二闋；比之前代作者，誠不爲多。然寫景必豁人耳目，如鶴唳晴空；言情必沁人心脾，如寒蟬夜泣；「楚靈均後數柴桑，第一傷心人物

！』殆先生之自道也。茲錄數闕於後，以見一斑。

（好事近）夜起倚危樓，樓角玉繩低亞；唯有月明霜冷，浸萬家鴛瓦。

人間何苦又悲秋，正是傷春罷，却向春風亭畔，數梧桐葉下。

（採桑子）高城鼓動蘭釭施，睡也還醒，醉也還醒，忽聽孤鴻三兩聲。

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

（點絳脣）萬頃蓬壺，夢中昨夜扁舟去，縈迴島嶼，中有舟行路。波上

樓台，波底層層俯，何人住？斷崖如鋸，不見停橈處。

（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

綠窗春與天俱暮。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

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又）黯淡燈花開又落，此夜雲蹤，知向誰邊着？頻弄玉釵思舊約，知君

未忍渾拋却。妾意苦專君苦博，君似朝陽，妾似傾陽著，但與百花相鬥

作，君恩妾命原非薄。

（鵲橋仙）沈沈戍鼓，蕭蕭廐馬，起視霜華滿地；猛然記得別伊時，正今日郵亭天氣。北征車轍，南征歸夢，知是調停無計，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却『無憑』兩字。

王先生這一百一十五闕詞，蝶戀花計得二十五闕，幾乎每一闕我都歡喜，實錄不勝錄也。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 (1844—1916)

盛宣懷字杏蓀，晚號止叟，別署愚齋，江蘇武進人，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卒民國五年丙辰（1916），得年七十有三。其服官經歷，以同治九年（1870）入李鴻章幕府爲始，至宣統三年（1911）革命爆發罷免郵傳部尙書告終，先後凡四十年。其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於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而所從事建設各端，對於國家貢獻之大，猶遠非李張輩所能及。世徒以其鐵道國有政策爲引起革命之導火線，乃並其一生之功績而忘之；又以其身後頗爲富有，甚至以之與今日毫無建樹但有貪污之腐敗官僚相提並論；真可謂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爲世道人心計，不能不有所矯正。余因次其一生事蹟之有關建設者，以實吾隨筆，俾今日談建設者有所借鏡，而使一輩大言炎炎其實毫無事業可稽者得稍知愧怍，或於挽回風氣一點，不無若干裨益也。

盛遺著有奏議二十卷，又電奏稿及朋僚函稿八十卷，都凡百卷，統名之曰「愚齋存稿」。凡余所記，大抵自其遺著中鈎稽而得，並傍及其他記載之有關者，僅存概畧，未能詳也。

吾人談盛氏之建設事業，大致可分兩段言之，其一段在甲午以前，一段在甲午以後，而清廷對建設意義之認識，亦實以甲午一役爲之樞紐。盛在甲午以前，地位不過一關道，然甚得直督李鴻章之信任，其見事之明與任事之勇，亦確有足以博得李鴻章信用之道。

同治十一年（1872），盛即向李鴻章沈葆楨建議造商船，由官設局，招收商股，以成一官督商辦之形式，是即中國有招商輪船局之起源，而盛即由李劄委爲該局會辦。先是洋商旗昌怡和太古各公司輪船，已久在長江及閩粵津滬海面往來如織，及招商局起，洋船乃大跌水脚，併力傾我，盛則日與其同事苦心擘畫，勉撐危局。至光緒二年，更以銀二百二十二萬兩，收買旗昌，驟增巨輪十數，而各埠碼頭堆棧，亦次第建立，於是乃得與怡和太古，並駕齊驅，有三公司之目，而招商之名且駸

願爲其上焉。至光緒十九年，三公司訂立合同，息爭均利，於是招商之地位乃得更趨穩固。入民國以後，日事內爭，未遑建設，而招商一局，亦隨時局遞嬗，往往握於一輩有特殊關係者之手，不惟內容爲外間所不得盡知，即或盈或虧，亦在不明不白之際，抗戰八年，招商更遭受空前之打擊，今雖勉圖恢復，而准許外輪暫行內河之議，又已甚囂塵上；加以今日官僚辦事之無一可恃，一更爲國人所腐心。追念七十年來創業之艱難，卽此一端，吾人亦不禁爲盛氏叫屈也。

除輪船外，在甲午前爲盛所創始經營者，厥爲電報。先是在中國未自辦電報以前，英國已由香港敷設海線至廣州，復循通商各口以達天津。至光緒六年（1880），更援前案引線達上海，且先在香港對岸設陸線至九龍；而丹麥海線亦由吳淞上岸設陸線，勢且經上海以延入內地。是年秋，盛乃亟請於鴻章，仿招商辦法，招商集股，設津滬陸線，以通南北兩洋之郵，兼遏洋線潛侵之患。並請卽設電報學堂，以培育人才。繼復以兩年折衝之力，先後拆去丹麥在上海，英國在九龍所設之陸線，而兩國之海線，則俱以到達吳淞爲限度，並會訂水線相接合同。迄光緒七年冬，津

滬陸線工峻，鴻章即奏請派盛爲電局總辦。於是電報與招商，同爲官督商辦之兩大局，而實以盛一人總其成。光緒十年五月，鴻章奏以盛署天津海關道，而是月閩粵陸線亦告工峻，南北既已貫通，全國亦次第敷設，時至今日，雖有線電之重要已遠不如前，然華路藍縷，功不可沒，蓋盛總司兩局，招商始同治十一年，電報始光緒七年，迄光緒二十八年始同時交卸，先後實歷三十年之久也。

光緒十二年，盛轉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在任凡六年，除仍續輸電兩政而外，其建設事業之最可舉者，莫如振興東省之水利，尤以開濬小清河一事爲功在地方，蓋小清河爲東省一大幹河，多年淤塞，東撫張曜，於十七年奏請開濬，即以盛董其事，以工代賑，歷時一年，糜款無多，而成效大著。迄十九年十一月，全功告成，時盛雖已去職，而仍被推爲功首。民十九，余遊濟南，友人導余參觀一小清河之水閘，時余不知此一段史實，猶誤以疏濬小清爲韓復榘之功也。

光緒十八年，盛調補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督，外管交涉，內參戎幕，而所獲得鴻章之信任，亦有加於前。十九年九月，上海織布局廠被焚，鴻章以洋貨紗布

，進口日多，非另設機器紡織廠，不足以敵洋產而保權利，乃命盛赴滬，會同江海關道，商明前辦紳商，一面規復舊局，一面招集新股，就原址設立華盛總廠，又勸告華商分設大純，裕源，裕晉各廠，布置年餘次第開辦，而盛實以督辦負統籌之責，蓋中國紗布工業之有今日規模，盛亦開山之一人也。

在甲午以後，盛在政治上之地位既日趨重要，其所從事之建設事業，亦更與國家之命運有關，茲畧記其築路與開鑛兩事。

盛與鐵路之關係，自光緒二十二年開去津海關道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始。是年十二月，鐵路總公司即於上海成立，初所規畫者，為盧漢（後名京漢），粵漢，寧滬三線，而目光則貫注全國。盧漢借比款，粵漢借美款，寧滬借英款。盧漢自光緒二十三年開工，南北並舉，中間包括黃河鐵橋之巨工，前後凡歷八年，迄三十一年十月，始舉行全路落成典禮。寧滬工事，開始於光緒三十年七月杪，而粵漢則以與美國合興公司交涉廢約，陷於停頓。自三十一年冬，盛即已不直接與開路事，改由唐紹儀張之洞等負責。其時維新志士，本其愛國熱誠，視借款築

路如鳩毒蛇蠍，一唱百和，如中風走狂，有路成路亡之說，不問自身實力，而徒叩收回自辦之高調，蓋清季路事之荆棘叢生，實此類不健全之輿論階之厲也。迄宣統二年十二月，盛任郵傳部尚書，辛亥四月，內閣改制，仍被簡爲郵傳部大臣。時鐵路國有之議起，盛與張之洞袁世凱等固抱同一之政見，盛之言曰：

『鐵路國有民有，本屬無甚出入，今國力方艱，果由商民實力舉行，不致延曠浮糜，自毋庸遽歸官辦。無如數年來，粵則收股及半，成路無多；川則倒帳甚巨，參追無着；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脂膏，供侵漁而付浪擲，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國防空虛，交通梗阻，上下交受其害，故收歸國有，銷除商辦，實出於萬不獲已。』云云。

由今日視之，其言可謂明白曉暢，切中事情，不意川以爭路倡亂於前，武昌革命即因以爆發，清室以此而亡，盛之政治生命亦因此而絕。入民國以後，粵漢一線雖倖獲觀成，而川路則仍非大舉外債決無成功之望，可見盛固無負於路，爭路者不能無負於盛也。

盛所經手之鑛業，以光緒二十二年所開始經營之漢冶萍煤鐵公司爲巨擘。先是漢陽鐵廠，創始於光緒十六年（1890）費鉅工艱，竭公帑數百萬，閱時六七年，官本不能支持，乃議改歸商辦。張之洞以大冶鐵鑛，原爲盛所開採，而歷管輪電，又大有號召股欸之能力，於是乃以此重大責任，一諉諸盛，盛亦毅然以此自任，初不意困難艱苦，集於一身，卒以此蒙謗負累，以迄其死。然中國言兵工製造者必舉漢陽，鍊鋼之早而成績之優，亦推漢陽爲首，然則盛之勞績，固未可沒也。

張謇及其事業

(1853—1926)

張季直先生謇，字齋庵，江蘇南通縣人，生清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卒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七十四。以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會試禮部，中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時年已四十二。其後半生事業，以教育實業及發展地方自治為主，正式服官之時期不長，僅於革命後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長，及民二至民四一任工商農林部長而已。

茲將甲午後其主辦各事列一簡要如下：

- （一）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創辦通州大生紗廠。
- （二）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創辦通海墾牧公司。
- （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設立通州師範學校。
- （四）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創辦呂四鹽業公司及漁業公司。是年赴日本考察，

著有東遊日記。

(五)光緒三十年甲辰，設立新育嬰堂，創辦江浙漁業公司，創辦上海大達輪船輪步公司，天生港輪步內河輪船公司。

(六)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設立南通城鄉各初等小學，設立博物院，創立唐牖藝徒學校，吳淞商船學校。

(七)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於通州師範先後附設土木測繪工科農科及蠶科各特班。主持赴意國都朗博覽會事。任蘇省鐵路公司協理。

(八)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設立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成立海門長樂各小學，創辦崇明大生第二紗廠。任寧屬教育會會長，發表議辦導淮公司綱要。

(九)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測地方輿圖。

(十)宣統元年己酉，改造地方監獄。任江寧高等商業學堂監督，江蘇學務總會會長，江蘇諮議局議長，合十四省代表奏請速開國會。

(十一)宣統二年庚戌，設南洋勸業會勸業研究所，創設全國農業聯合會，任

地方議會議長，發表修改各省鹽法草案。

(十二) 宣統三年辛亥，設立墾牧各小校，設立農業學校，任中央教育會會長。江蘇上海鎮江江北四都督推任鹽政總理。任省議會議長，省教育會會長，臨時政府實業部部長。

(十三) 民國元年壬子，設立醫學學校及醫院。設立紡織學校，盲啞學校。設立圖書館，養老部及殘廢院。清丈全縣田畝，發表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及意見書，設立鹽場警察長尉教練所。創辦南通，東臺，儀徵三貧民工場，任導淮督辦。

(十四) 民國二年癸丑，設立幼稚園二處，設立唐牖工人公園及醫院。任漢冶萍公司總理。任工商農林部長。任全國水利總裁，發表導淮計劃宣言，並與美駐華公使芮恩施議導淮借款。

(十五) 民國三年甲寅，規設部立各種試驗場及度量衡製造所。設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於南京。主持赴美紀念巴拿馬博覽會事。組織遊美實業報聘團出發。

(十六) 民國四年乙卯，改紡織學校爲專門。查勘魯皖林牧事業。是年政府特

獲揚手創南通事業，以帝制議起，即自解各職返里。

(十七) 民國五年丙辰，改農業甲種學校為專門。

(十八) 民國六年丁巳，設立地方公園。

(十九) 民國七年戊午，改醫學校為專門。任華成鹽墾公司總理，任全國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會長。

(二十) 民國八年己未，設伶工學社，更俗劇場。設立工商補習學校。設立交通警察養成所。設立蠶桑講習所。創辦海門大生第三紗廠。創辦淮海實業銀行。任江蘇運河督辦。

(廿一) 民國九年庚申，合農業醫學紡織三專門為南通大學，女工傳習所新校舍落成。修縣路，著綉譜。

(廿二) 民國十年，設立墾牧高初等各小學。通海省道五百里通車。任吳淞商埠督辦，發表濬治長江計劃書。

(廿三) 民國十一年壬戌，設紡織鹽墾總管理處。設立第三養老院。召集治江

會議。任江蘇新運河督辦。任交通銀行總理。任華商紗廠聯合會會長。

(廿四)民國十二年癸亥，設立第三幼稚園。主席上海港務會議。任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副會長。

觀右表，已可窺見先生手創事業之梗概。當清民交替之際，國人談教育，談實業，談自治者必首舉南通，事雖發動於一隅，而影響則及於全國。民十九，余始讀先生遺著『張季子九錄』，及張孝若所述先生之傳記，乃決計一遊南通，時去先生之逝世甫四年，其事業之大部已陷於停頓，實不勝人亡政息之感。然入其境，則仍覺家給人足；參觀通州師範及女工傳習所，則見學生循循，可證其學風之良好；其餘如公園、博物院、天文台、圖書館等等，亦大抵基礎尙存，惜繼起無人，而政府亦未遑建設，故一切惟有聽其毀滅而已。

季直先生之事業，除教育實業及地方自治而外，猶有關係中國整個局勢者兩事：其一爲光緒庚子東南自保，其一則清民交替之際，促成南北之和平統一是也。東南自保一役，尸其名者張之洞劉坤一，縮其樞紐者盛宣懷，發意及奔走其間者，則

先生與趙竹君（鳳昌）何眉孫（嗣焜）沈愛蒼（慶瑜）湯蟄先（壽潛）陳伯嚴（三立）等也。時清廷倚仗岑氏，不惜與全世界宣戰，先生與其朋輩憂之，擬合張劉兩督以挽東南危局，而任赴寧說劉者即爲先生。劉以幕客有勸其持重者，頗猶豫，因問先生：「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先生應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爲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以存也。」於是劉蹶然曰：「吾決矣！」並告某客曰：「頭是姓劉物！」遂決議電鄂約張，張應，東南大局以安。

辛亥革命雖發動於武漢，但在上海南京反正以後，重心即已移至江蘇。江蘇於季直先生爲桑梓，清室則其故君；革命諸領袖大抵於先生素昧生平，而袁世凱其人則其舊友；時江蘇一省稱都督者四，諸軍又雲集南京，待命北伐，而實不名一錢。先生之宗旨既贊成共和，乃不能不調護各方，且力任籌款之艱鉅。於是一面力勸清廷退位，一面誘致袁氏與民軍合作；既促成臨時政府以爭取國際地位，實亦示南方已成統一之局，藉以促袁氏最後之決心。黃克強先生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元

，且須由先生出名担保，則當時財政之困難可知；孫中山先生復先生函解釋以漢治萍向日人抵押借款一事，稱「民軍待哺，日有譁潰之虞」，則當時軍心之浮動可知，先生處此環境，卒能從容應付，以促成南北和平統一之局，甚至清廷退位一詔，亦由先生所手草，其功在國家，為各方所傾心悅服，固決非偶然也。

附錄：張謇與沈壽

沈壽，字雪君，江蘇吳縣人，其夫余覺，舉人，清末服務於農工商部，壽亦以藝在部充綉工科總教習。宣統元年，南京開南洋勸業會，駢羅百貨，湘、魯、江、浙之綉，亦應徵而至。季直任審查長，部則以壽專任綉品審查。壽至自京師，張所綉意大利后像於會，精絕為世所未有。時季直適得露香綉董書大屏，屬別真贋，壽展首幀，即曰，此露香園綉也，問何以知，曰以鍼法知之，其精於鑑別如此。辛亥，京師綉工科解散，壽避地天津，自設綉工傳習所，藉課徒以自給。未幾，四川與南通爭相延聘，壽則捨川就通，任女工傳習所所長

時民國三年也。壽居通，五年三病，仍掙扎盡瘁於所職，卒以民國十年病歿，遺囑卽葬南通。季直之於壽也，愛憐備至，且由壽口述，季直筆受，成「綉譜」一書以傳其藝。「張季子九錄」中之文錄詩錄，爲壽而作者，亦不下十餘篇，尤以「惜憶詩」四十八章最爲纏綿悱惻。茲錄十六首於後，蓋不啻季直對此一公案最坦白之供辭也。

黃金誰返蔡姬身，常道曹瞞是可人，況是東南珠玉秀，忍聽蕉萃北方塵。

（按此言自津聘壽至南通也。）

有斐館前春水生，唐家牖外暮潮平，登樓卽席殊矜重，不似驚鴻始爲驚。

（按南通有旅館曰有斐館，頗饒花木之盛，或卽壽初至通時下榻處也。）

漢儀新覲士昏箋，習禮全憑儻相賢，但覩周旋登降節，如聞窈窕女師篇。

（按孝若結婚，壽任儻相。）

江南愛說采蓮謠，蓮葉分明接畫橋，橋有東西人宛在，是誰將淚與波消。
北戶驕陽向晚炎，商量複障與重簾，燕兒語罷旋羅袂，蜻子飛來着鏡奩。

聽誦新詩辨問多，夢如何夢醒如何，夢疑神女難爲雨，醒笑仙人亦爛柯。
輕舫時掠畫樓西，燈影常隨槳挈提，最是中秋明月夜，兩回看到玉繩低。

（按上四首可見壽初至通未病前與季直相處情況之一斑也。）

病如眠起柳孱孱，愁似蕉心旋旋攢，誰與金剛無量壽，可憐猶作健兒看。
致病非今見始今，一言頓使淚沾襟，終身自分無人覺，不道醫和是聖心。

（按此兩首言壽病後強起掙扎及致病之由，壽固似有隱痛者。）

閒房幽檻屬謙亭，更爲防風複紵櫺，南撫鴛鴦刪岸草，東看魴鯉撥池萍。
感遇深情不可減，自梳青髮手摻摻，綉成一對謙亭字，留證雌雄寶劍看。

（按季直以謙亭爲壽養病之所，壽以髮綉謙亭兩字報之。）

碧紗廚外淡無風，燈影微微帳影籠，夢淺時驚雙唳鶴，簾涼獨怯五更鴻。
秋清冬凜接春溫，弱不禁銷綺樣魂，霜露已更星月在，人天何處覓餘痕。
中元風物易中秋，扶病看燈拜月休，太息明年知在否，兩行燭淚替人流。
短詩漸漸欲成篇，小字朝朝試摺箋，不肯示人猶避我，男兒志氣女兒天。

曾指西山有有亭，亭邊割壤葬娉婷，那堪宿約成新讖，丹旆來時草尚青。

民十九，予遊南通，時去季直之死剛四年，其所手創之事業已衰相畢露，不勝「人亡政息」之感。曾參觀「女工傳習所」一有十數女童習綉其中，教師循循善導，壽執教時之規模，殆猶有存者。至謙亭小坐，設置仍楚楚，猶想像當日茶竈藥爐之景象，慨嘆不置。於博物院得見沈綉數幀，予湘人，平日亦頗誇湘秀，自見沈綉後，乃絕口不敢談湘綉矣。顧予所見者，猶非沈綉最精之品也。

壽不獨精於藝，亦有潔癖。季直之言曰：「自以濠陽小築前院隙屋借予女士爲住宅後，一切器具，詳記有冊，迨移居繡織局時，前借之物，照常歸還，無一損壞。即周覽四壁，亦無纖微污損，且未移動位置。居屋三年整潔若是，古所謂「去之日如其始至者」何讓也。最後之病，幾一百六十餘日，最重時亦幾六十日，視其几席床褥枕衾，無絲毫湯藥之污。瀕死，器具亦未歷亂，其精神貫注至死不衰又如此。……」

壽之生年不詳，惟知其生於某年之八月十二日，卒於民國十年陰曆五月初三，即以是年雙十節卜葬於南通黃泥山之東海麓。其初至通，季直年六十二，其卒之年，季直已六十九，『惜憶詩』四十八章，即作於是年也。此外季直又有爲壽而作之七律兩首，亦可誦，特再錄之。

其一、『以詩侑梅贈雪君，慰其新愈，』詩曰：「春如有訊渡江來，病起停鍼對鏡臺，弱質已知愁淺葯，新機急與致盆梅。欄前月旦哉生見，砌下花須特地栽，濛雪漸消波漸漲，翠眉因爲好山開。」

其二、『雪君髮繡謙亭字，爲借亭養疴之報，賦長律酬之。』詩曰：「枉道林塘適病身，累君仍費繡精神，別裁織錦旋圖字，不數迴心斷髮人。美意直應珠論值，餘光猶厭黛爲塵，當中記得連環樣，璧月亭前祇兩巡。」

予留南通兩日，既展謁季直先生之墓，復驅車至黃泥山憑弔此一代之藝人，以表敬意。當予立壽墓前，默念其與季直此一段因緣，終覺人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也。

南通友人告予：嘗壽與季直之關係已有風傳，余覺曾至通小住，思一見壽而不可得，「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覺乃自撰一聯張於門首，以抒積憤，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翁同龢日記，稱季直有「霸才」，國人亦頗有譏季直爲「土皇帝」者，是則覺之處境，固亦有可同情在也。惜予於覺之身世不詳，否則以此史材，結構成一劇本，得一能作內心表演之麗人飾沈壽以演出之，當不難博得世間若干兒女之眼淚也。

按余上文以去年十一月發表於香港『天文台』雙日刊，有署名『微妙』與『戒之』兩先生者，以余文於余覺身世不詳，特爲文有所補充，意至可感。茲爲使讀者得窺見此一公案之全豹起見，特將兩先生文照錄如下，或爲兩先生樂許也。微妙先生文題曰『記石湖老人余覺』，文曰『本刊（指天文台）屢載張謇與沈壽事，兩人均已逝世多年，惟另一主角的余覺，今巍然尙存，年已八十餘矣。憶我與余覺相識，在前清南洋勸業會中，我之宿舍，與余爲貼鄰，余知我爲新聞記者，乃先來訪，及我回訪時，遂介紹見其夫人，時沈壽女士已爲

三十許之中年婦人，而兩如夫人則正少艾也。厥後，時或通信，爲其夫人作宣傳。但有一次，則非常緊張。因其兩如夫人之一，（此人係娶自北京胡同中者，乃北地胭脂也。）渠本已送往日本學刺繡者，乃與一趙姓者私逃。聞趙爲演話劇者，名趙嗜淚，而又爲革命黨，已在漢口爲清政府所捕殺。其如夫人欲往營救，亦已被捕。（以上均余覺致我信中語）。意在託我致書漢口武昌各通信員，探訪此事，結果則一無所得。數十年後，有人告我，所謂趙姓者，並未被殺，卽敵僞時代，活躍東北之趙欣伯也。張謇逝世後，余覺已無情敵，加之孝若又爲兇僕所戕。時則余覺常居蘇州，館於畫家吳子深家中，石湖之傍，有一空地，余覺向子深索其地，築屋數椽，供奉其夫人靈位，棲息於此，自稱「石湖老人」。張謇之孫輩，（他們還有寄名親等關係）偶然來蘇遊玩，余覺常招待之，有時放舟石湖，互爲吟嘯，不念舊怨矣。余覺有一女，嫁我遠房一表弟，（另一如夫人所出）故知之甚詳也。』戒之先生文題曰『我亦一談張季直』，文曰：『張季直與沈壽事，本刊（指天文台）再三披露，以左舜生先生爲最詳確，然

尙有可補充者，余憶水心先生西樓清話（曾載工商日報）云：「張函沈云：汝定不回，我亦無法，惟有歸後，獨至謙亭，看可憐之月色耳，汝何由見之？十七日六時。又函云：熱日加甚，當午陽盛，切勿俯頭事繡，小臥最好，使人去，附書敬問謙亭主人安否？寒，八月廿六日九時。又題寄謙亭楊柳二詩云：記取謙亭攝影時，柳枝宛轉縮楊枝，不因着眼簾波影，東牖西鸚那得知。楊枝絲短柳絲長，旋縮旋開亦可傷，要合一池烟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緣情綺靡，老尙多情。」水心先生僅以老尙多情四字輕輕一斷，使人於言外領畧，具見深心。然就余所知，沈夫余覺所著之「余覺沈壽夫婦痛史」，係用鸚口孤鸚署名，張致沈之原函，均用銅版影印，於十七日六時之函末，有余覺註云：「按此函首語汝定不回四字，可證張審之糾纏，以男校董于晝夜延佇女校長不來，即獨自看月傷心，作可憐之浩嘆，致函表情，此種書函體，竟出諸七十老翁，其不端爲何如耶？乃意猶未盡，是日又致二詩于吾妻，詞更不堪，題爲謙亭楊柳，（筆者註卽上文兩首）閱張審此二詩，題曰謙亭楊柳，借物喻人，賦而比也，

第一句記取謙亭攝影時，及末句東鰈西鷓云云，卽知當日吾妻在謙亭東簾內，爲張謇僱人攝影，張亦在西簾內，以自己之影，同時攝入，人在簾內，祇見影像，故詩之第三四句云：「不因着眼簾波影，東鰈西鷓那得知，」噫！鷓爲比翼鳥，鰈爲比目魚，皆夫妻之喻，吾妻非張謇之妻，何可比爲鷓鰈。其第二首詩首聯云：楊枝絲短柳絲長，旋縮旋開亦可傷。明知吾妻屢違張意，不肯仍居謙亭而言，一則意短，一則情長也。兩詩皆用一縮字，縮者勾引也，一則曰柳枝宛轉縮楊枝，自言極力勾引也；再則曰旋縮旋開亦可傷，自言一再勾引不成也，故第三第四句曰要合一池烟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也。又於八月廿六日九時之函末，余覺註云：「按此函直呼吾妻爲謙亭主人，張殆永以吾妻爲謙亭主人耶？自矜文行與天下後世見者，乃如是耶？」觀此，則張季直之字裏行間，確有可議者在，更誰爲之辨乎？」

梁士詒之「生」 (1869—1933)

抗戰前讀『張季子九錄』，及張孝若所爲乃父之傳記，余始畧知張季直（謇）之生平及其事業；勝利後閱『愚齋存稿』（計奏議二十卷，電奏稿及朋僚函稿八十卷，都凡百卷。）始略知盛杏蓀（宣懷）之爲人，及其在清末建設事業中所處地位之重要，與少年時所得諸流俗之口與不負責任之報章雜誌者，乃迥然不同。頃避難來台，正苦無書可讀，友人湯君，假余『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一部，（凡兩厚冊，計一千零九十三面。）余窮五日之力涉獵一過，於清末民初若干政治內幕爲過去余所不知或知之而不詳者，乃得豁然開朗，而於梁氏一生之事蹟，亦得知其梗概焉。

論年輩，盛生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卒民國五年丙辰（1916），得年七十有三，最早；張生咸豐三年癸丑（1853），卒民國十五年丙寅（1926），得年七十四次之；梁生同治八年己巳（1869），卒民國二十二年癸酉（1933），得年六

十五，最晚。然三君爲人，大抵重實踐而不尙空談；其畢生盡瘁於實業，交通，工鑛，水利，金融，教育，亦相類似；盛於庚子東南自保一役，與張同爲盡力之人。張於甲午乃主對日作戰最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梁主張參戰最早，且曾秘輸軍火以助防香港，又主持遣送華工二十餘萬人赴法。是三君於政治以外殆又莫不注意外交焉。至若『名滿天下而謗亦隨之，』更爲三君生前同一遭遇，尤清末民初間是非得失之林也。余筆記中於盛張已有記載，茲請一談梁氏之生平。

梁名士詒，字翼夫，燕孫其號，廣東三水人。父名知鑑，字保三，師事朱次琦（南海九江人，學者稱朱九江先生），梁氏之力學實踐，殆與其家庭教育之淵源不無關係。年二十一，中光緒己丑恩科舉人（與梁啓超同榜，時啓超年十七），二十六成進士，應殿試，問河渠，經籍，選舉，鹽鐵四事，以二甲爲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至三十五，除兩度主講其本邑鳳岡書院外，餘均供職於北京。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開經濟特科，燕孫應考，爲徐尙書卮戴侍郎鴻慈所保，其考語有云：『識智明遠，樸實不浮，於中西地理，水師兵學，頻年講習，

寒暑不渝。』是科與考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於閏五月十日，皇帝親臨保和殿御試。第一場首題：『大戴禮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與近世各國學校德育，體育，智育同義論』。次題：『漢武帝造白金爲幣，分爲三品，當錢多少，有定直，其後白金漸賤錢制亦屢更，竟未通行，宜用何術整濟之策』。及揭曉，共錄一等四十八人，二等七十九人，而燕孫乃名列一等第一。時值庚子拳變以後，清廷雖多方媚外，仍無意於維新，盈廷衰衰，尤爲腐敗官僚所充斥，應試特科之新進人才，更爲此輩所嫉視，於是造作蜚語，謂其中多革命黨人。西太后於召見某軍機大臣時問之曰：『特科流品龐雜，心術不端，有所聞否？』對曰：『一等第一名梁士詒，廣東人，爲梁啓超之弟；其名末字又與康祖詒相同，梁頭康尾，其人可知。』於是西后益不悅。燕孫見清廷腐敗，遂不與覆試，卽於是年十月，應北洋總督袁世凱聘，爲北洋編書局總辦，是爲梁氏與北洋系發生關係之始。

自光緒三十年迄宣統三年清室之亡，此七八年間，梁氏除一度以參贊名隨唐紹儀赴印度辦理藏約交涉並參與日俄戰後之中日締約事宜外，其事蹟之可紀者，大

抵以鐵路爲限，交通銀行成立於光緒三十三年，爲梁氏所發動，固亦以鐵路爲緣者也。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梁氏任鐵路總文案。三十二年正月，盛宣懷辭去鐵路總公司督辦後，改由唐紹儀繼任，梁仍爲唐之助手，其所督辦者，僅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五線也。三十三年郵傳部設立五路提調處，梁被派爲該處提調，同年十一月，提調處改「郵傳部鐵路總局」專營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宜，以一事權而便管轄，梁氏被改派爲局長，梁氏之得有全權從事鐵路事業之整理與發展，實始於此。

鐵路爲清末一新興事業，以借款關係，頗啓外人攘奪路權之漸，建築管理不能不參用洋員，因之凡參與鐵路事業之華員，其待遇亦較其他衙署爲優厚，（梁氏任局長，月支薪水公費一千二百元）計在梁氏任職期間，前舉五路之正太，滬寧已全部竣工，京漢更全部贖回自辦，既增京奉，廣九爲七路，又經營展築津浦，吉長，株萍爲十路，對外則更改合同，收回主權；對內則展拓路綫，清理積弊；事業愈發

展，艷羨而嫉視之者亦愈多，舉梁氏自述，彼曾於一年之間，被參劾十六次，甚至有以合同簿據用陽曆，路員着制服，而加以「改正朔易服色」之罪名者，其困難可想見也。顧在清末七八年間先後任郵傳部尙書者爲林紹年，陳璧，徐世昌，唐紹儀，對梁氏均信任有加，至最後盛宣懷長部，梁氏卒以宣統三年正月被劾去職，而盛氏亦以其鐵路國有政策，成爲辛亥革命之導火綫焉。

清廷感於革命勢力之不可侮，不得已起袁世凱組閣，袁閣以辛亥九月二十六日成立，楊士琦任郵傳部大臣，士詒任副大臣，及楊氏隨唐紹儀南下與民軍媾和，郵部大臣卽由梁署理。時南方各省已紛紛獨立，北方革命勢力亦到處彌漫，十一月二十八日袁世凱被炸未傷，越十日，清軍諮使良弼乃爲民黨彭家珍炸斃，於是清廷大起恐慌，親貴亦相率逃避。袁氏自遇刺後卽不復入朝，所有面奏及請旨事件，均由士詒與署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三人傳述，而袁與唐紹儀間之意見，亦賴梁氏居間彌縫解釋焉。梁氏嘗言：

「當國勢危時，清廷所以餌我者甚至。御賜物件前後十餘種，又賞紫禁城

騎馬及賞紫緡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師風雲至急，入朝行禮後，隆裕皇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趙秉鈞先大哭，誓言保駕，我亦不禁泫然。」

清廷心理已至如此，共和局勢，殆已成熟。時袁氏初出，其昔日幕府散在四方，倉卒未集，致軍務政務，亦由梁氏兼為處理，梁不得已，乃援引葉恭綽施愚蔡廷幹等共參機要，而實梁總其成。蓋其時袁所恃以應付民軍者惟唐紹儀，在北方策劃一切者，則士詒與趙秉鈞輩也。

清帝退位，南北和議告成，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南京，到會者十七省，袁世凱以十七票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仍都北京，唐紹儀任為第一任國務總理，士詒則任總統府秘書長焉。

士詒任公府秘書長凡兩年有餘，其名義為秘書長，實則縮外交，財政，交通之樞紐，權所在者衆必爭，名之高者謗斯集，加以袁氏雄猜多欲，其子克定，亦儼然

以太子自居，士詒既握大權，交通銀行復在其掌握，各省軍人亦多奔走其門，袁氏欲改國務院爲政事堂，梁氏又不肯附和，於是楊士琦楊度輩，乃藉克定以進言於袁氏，謂士詒心懷叵測，勾結軍人，欲爲總統，甚至將交通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竄易一字編爲重號，以進於袁，凡所以媒孽士詒者，殆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士詒乃不得不出公府而改任稅務處督辦焉，此民國三年五月事也。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七月歐戰爆發，中國於八月六日宣告局外中立，梁向袁世凱建議：一、停付各國賠款，二、將關稅鹽稅提存於本國銀行，三、與英國合作，使英居其名，我居其實，以武力強迫德人還青島，以杜絕日本野心。梁氏並謂：『戰爭結果，德奧必難倖勝，我不妨明白對德絕交宣戰，將來對於和議中取得地位，於國家前途，當不無裨益。』卒以袁氏遲疑不決，且欲乘世界混亂之際，以達其個人帝制自爲之目的，致自動收回青島及提前對德宣戰之議，卒不果行。

關於招募華工赴歐助戰一事，發動於民國四年六月梁氏與法公使康悌在北京西山一度商討，至民五五月始見諸實行，以其時中國尙未參戰，不便公然採取行動，

不得已以私人資格，組織惠民公司，先後於塘沽，浦口，青島，香港各處募得十餘萬人，其後英國政府繼起，又募得七萬餘人，於是此一華工助戰事業，始克完成。此事在中國爲一創舉，最初頗不爲社會所諒，甚至造作種種蜚語，謂有販賣人口之嫌；工人家屬留居國內，以家用不能按時照撥，亦多與公司爲難；其實公司與法方代表所訂合同，相當完善，公司不僅未嘗藉此牟利，且賠累頗多，其困難情形非局外人所能洞悉也。民國六年八月，中國卒對德奧宣戰，且有參戰督辦處之設立，以段祺瑞爲督辦，但其時中國內爭正劇，卒無一兵一卒派赴歐洲。及歐戰將次結束，日本懼中國於和會發言，將於日不便，乃多方煽動，作種種不利中國之宣傳，且嗾各國公使向我提出參戰不力之警告！民八陸徵祥顧維鈞等赴歐參與和會，日本仍繼續破壞，幾使中國代表不能出席，於是陸顧力爭，並宣言梁士詒辦惠民公司，曾招募華工二十餘萬赴歐助戰，並作兵工種種工作，以證明日本之妄誕，於是協商各國始無異辭，卒於和會中爭回權利不少，可見此一舉措影響中國國際地位爲何如也。

洪憲帝制議起，士詒與段祺瑞熊希齡三人頗不贊同，其時軍權在段，財權在梁

，而熊亦頗負時譽，於是爲袁策劃者，主脅陸軍次長徐樹錚以迫段，脅交通次長葉恭綽以迫梁，脅財政次長張弧以迫熊，蓋三人固與段梁熊最近者也。其結果段辭職，徐張均免職，葉則停職候傳。此外又有津浦京漢京綏滬寧正太五路參案，可見所以脅迫士詒者，更無所不用其極。梁氏以環境如此惡劣，始則託病避居京西之翠微山，繼乃杜門謝客，於是京師步軍統領，乃藉口亂黨乘機入京，治安可慮，派兵保護其居宅，卽其汽車夫與內外僕從，亦易以若干新人，至是士詒之自由全失，凡署名勸進與通電製造民意，一切惟有聽人擺布，且亦無從申辯矣。及洪憲失敗，被通緝者八人，士詒乃與楊度孫毓筠顧鱉夏壽田朱啓鈴周自齊薛大可同列，但士詒亦緘默不置一辭。梁死，鄭洪年輓以一聯，其上聯云：『辛亥蓋籌，而不自表，洪憲負謗，而不自明，毀譽胥忘，公可謂大』，固實錄也。

民六十一月至翌年二月底，士詒赴日本考察三閱月，尤注意日本之經濟建設，凡足跡所至，日本朝野人士莫不予以盛大之歡迎，更樂於傾聽其意見，其紀錄固仍可爲今後中日經濟提携之參考也。民國十三年三月至八月底，士詒又漫遊歐美半年

，其言論與地位，亦爲歐美人士所重視。其遊日也，曾與松方，山縣，大隈，頭山，犬養，原敬，床次等傾談；遊歐美則與英之魯易佐治麥唐納，美之柯立芝，法之班樂權等見面，其態度固儼然一現代政治家也。

民初被刺的宋教仁 (1892—1913)

宋教仁以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夜，被刺於上海滬寧車站，以傷重不治，於二十二日四時八分，死於滬寧鐵路醫院。凶手武士英，合謀唆使者應夔丞，洪述祖，趙秉鈞，袁世凱也。時余讀書長沙定王台，見上海民立民權兩日報所登先生遺像，傷在腹部，面目如生，實爲余青年時期所留一最深刻之印象，而四十年之中華民國史，亦首先留下此最卑劣之一頁。

先生字遜初，湖南桃源人，因別署桃源漁父。光緒二十九年，年二十二，讀書武昌文普通學校，卽矢志革命，與胡經武（瑛）在湖北設機關，曰科學補習所。次年回湘，卽與黃克強劉揆一諸人創華興會。是年九月，在湖南實行革命失敗，乃走日本，初入東京弘文學校，繼入早稻田大學，治政法之學甚勤。

翌年乙巳（光三），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文筆犀利，鼓吹種族革

命甚力。是年夏，孫中山自歐抵日，與黃興等組『中國革命同盟會』，先生與焉。同盟會者，實合孫中山代表之興中會，黃克強與先生所代表之華興會，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所代表之光復會一爐而冶，爲革命勢力一大團結也。先生擬以『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爲同盟會之機關雜誌，適以該雜誌爲日政府所禁不果，因另以『民報』之名發行，而先生仍任經理。

自乙巳迄辛亥凡六年，同盟會所策動之革命行動，屢經挫失，尤以辛亥三月廣州一幕爲最慘。於是先生建革命三策：一、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佔領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往事，是爲上策。二、在長江發動，以次向南北各省推進，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是爲中策。三、以邊區爲根據，徐圖進取，乃爲最下。迄八月武昌倡義，全國風從，甫四月而滿清以倒，蓋實行先生之中策也。其時先生實居上海，躬與策劃焉。

自武昌首義迄南北和義告成，先生於各方奔走疏導甚力，卒成統一之局，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生乃任唐紹儀內閣之農林總長。時蔡元培長教育，王寵惠長司法

，陳其美長工商，以同盟會會員資格出任唐內閣閣員，合先生蓋四人焉。

唐紹儀與袁世凱私人關係甚深，然其人究爲一留學生，對現代政治非完全不懂；又以充當辛亥和談代表之故，與民黨多所接觸，因亦參加同盟會爲會員；目覩袁氏予智自雄，已視臨時約法如無物，卒以王芝祥督直問題使袁唐間無法妥協，唐乃憤而掛冠，同盟會四閣員，亦聯帶辭職，此民國元年六月間事也。中間經過陸徵祥組閣之一幕，至是年九月趙秉鈞內閣因以出現。

宋可承認袁爲總統，但對政治則主力爭，鑑於「同盟會」爲一革命組織，於政黨形態頗有不合，因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各政團，改組爲一國民黨。及民國二年春國會選舉揭曉，國民黨於參衆兩院均佔絕對多數，宋更以組織政黨內閣的總理候補者自居，由湘而鄂而皖而滬，到處演說，於時政得失，批評不遺餘力，固儼然一現代立憲國家政黨領袖之姿態也。此不獨非袁世凱所能忍受，即趙秉鈞亦痛感切膚，益以洪述祖應夔丞一輩奸人穿插其間，宋於是乎死矣。以宋案而有二次革命，結果袁勝而國民黨失敗，因促成袁氏帝制自爲之

野心；中間經過洪憲復辟兩幕，北洋軍閥割據之勢因而形成；迄十六年北伐成功，軍閥已告結束，而共匪之潛滋暗長，乃即肇端於北伐前後；故追溯中華民國之亂源，不能不自宋案始也。

章太炎於民元避南京，曾以江左夷吾許宋；及宋被狙擊，梁任公於「大中華」爲文悼之，亦謂宋有政治家風度，蓋梁與宋固有相互維繫之要約也。張季直有輓宋一聯曰：「何人忍賊來君叔，舉世誰爲魯仲連，」最能道出宋在當時所處地位，以宋固主張以總統予袁，調停南北，以求得和平統一者也。

革命前，宋著有「間島問題」一小冊，清庭與日本交涉此案，賴以不敗。又有日記六冊，記其留學日本時生活及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情形甚詳。宋不以詩名，余曾讀其五律一首，蓋癸丑元旦偕友自漢陽赴黃州舟中作也，詩曰：

曉色侵江白，輕舟發漢陽，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大地風雲鬱，長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處是瀟湘？

時去宋之被刺，已不及百日矣。

余數近世吾湘人才，必以譚復生宋遜初蔡松坡並舉；復生殉國之年三十三，遜初三十二，松坡亦不過三十五，皆英年早逝，且無一不爲袁世凱直接間接所戕。甚矣奸人禍國之可悲也。

附錄：黃遠庸論袁世凱

黃遠庸字遠生，清末少年進士，亦民初有名之記者，其爲上海申報所作之北京通信，及在其他刊物所發表之論文，均搜集於林宰平（志鈞）所輯「遠生遺著」一書。書凡四冊，近五十萬言。吾人欲考見袁世凱秉政時期之北京政象，以及張振武宋教仁諸鉅案之原委，乃至袁氏稱帝以前一切玩弄議員欺騙人民之鬼蜮伎倆，遠生之書，實爲絕好之參考資料。

遠生於民國元二年間所爲各文，見於當時北京出版之「少年中國週刊」者，於袁氏實抨擊不遺餘力，茲節錄其一段如下：

「……大抵袁總統之爲人，並非不可與爲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來，則

善日少而惡日多者，此由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於其左右及政黨政客者亦半，今試更詳言之：袁總統之爲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長一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僞，其長二也；見識宏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長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長五也。有此五長，而爲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於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願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爲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爲天下事不過如此；於是其手段日以老練，其執行日以勇往，乃至舉國之人物爲供奔走，盡中國國家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爲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爲亡國之罪魁。夫以其明達宏遠舉世難得之資，若令其左右能盡職而忠規，議院能守法以監督，言論界能秉公勸告，則向能利用潮流以立功名，不願逆潮流以取咎戾之袁總統，未

必不能進化……」

此其批評袁氏，可謂恰如分際，無溢美，亦未雜以個人意氣，必具此知人論世之識，更濟以敢言之勇，始足以進退一世之人才。洪憲議興，袁頗欲羅致遠生以爲己用，遠生心不謂然，然亦未敢峻拒，乃走上海，且遠適美洲，卒於舊金山爲人所暗殺。或曰，遠生終不爲袁用，刺遠生者即爲袁所嗾使；或曰，遠生有袒袁嫌，刺之者實爲反袁派，其真相至今不明也。

為爭人格而討袁的蔡鏗 (1882—1916)

數民國以來之軍人，富修養，明大義，持身謹嚴，時時以國事為念，而絕無黨人與軍閥之陋習者，吾必以松坡先生為首屈一指。

先生名鏗(1882—1916)，其在梁任公所主編之『新民叢報』發表有關軍事之文字，則署名『奮翮生』，湖南邵陽人也。年十四為名諸生。陳右銘(寶箴)之任湖南巡撫也，其子伯嚴(三立)實佐之推行新政，而學使江劍霞(標)，臬司黃公度(遵憲)，亦主張維新甚力；地方人士如譚復生(嗣同)，唐毓丞(才常)，熊秉三(希齡)等，亦為有力之活動分子。陳既創辦時務學堂，延梁任公(啓超)任總教習，松坡因入時務肄業。為任公高第弟子。戊戌失敗，任公避地日本，松坡乃東渡就學於任公，時松坡固猶是一年甫十八之青年也。留日習陸軍凡五年，年二十四至二十九在桂從事軍事教育。年三十入滇，任三十七協協統。是年革命爆發於武昌

，雲南旋即反正，被推爲都督。民二奉調入京，袁氏百計牢籠，初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政治會議會員，翌年任參政院參政，加昭威將軍，兼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處員，充模範軍教官，最後任全國經界局督辦。民四帝制議漸興，八月籌安會成立，主事者約人簽名，表示擁戴，松坡毫不猶豫，首先署名，大書『昭威將軍蔡鎬』！而內心實憤不可止，決計倒袁，時赴津與梁任公湯覺頓等有所密議，至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乃微服東渡，轉道入滇，而雲南卽於是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通電討袁，電文中有『成則爲一旅之興夏，敗則爲五百之殉田』等語，其氣固足以吞袁矣。翌年一月，率滇軍入川，轉戰川南叙瀘一帶，歷四閱月，艱苦備嘗。六月五日袁死，黎元洪依法繼任，被任爲四川督軍兼署民政長，以喉疾日劇，乃於是年十月東渡就醫，十一月八日卒於日本福岡大學醫院，時年僅三十五也。

予聞松坡之任滇督也，除月支六十元寄家用外，一無所取，先生之女公子，爲予友石醉六『陶鈞』之家婦，其婚禮予實參與之，除客一桌外，無任何點綴，石固先生討袁時之參謀長也；先生之夫人於抗戰中去世，除出賣其惟一之居宅外，幾無

以爲葬，凡此均可見先生之清風亮節，雖古名將何以過之。予居重慶時，友人張君自湖南以先生遺集一部見贈，編輯者劉達武，參閱者石陶鈞，李劍農，岳森，全書十二冊，於先生生平著述，具見蒐集之勤。集首有編者所輯先生年譜一卷，可以概見先生之生平。集中凡先生所手著之文告，演辭，函札，序跋，詩歌，聯語，雖吉光片羽，亦可窺見先生人格之偉大，享年不永，而成就獨多，非偶然也。

或曰，松坡居東京時，以避袁黨之忌，偶作狹邪遊，有所眷妓曰小鳳仙，籍湖北黃陂，以先生之故，人乃以之與譚鑫培，黎元洪，相提並論，目爲『黃陂三傑』，古之名士美人，以因緣偶合，往往能留其姓字於千古，大率類此也。

以身殉職的陳布雷 (1890—1948)

余識陳布雷在民國十三四年之間，其時渠任上海『商報』總主筆，余則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且正與曾慕韓創辦『醒獅』也。布雷對『醒獅』言論頗同情，且隨時有意見提出，供吾人參考。『醒獅』每期出版，必於『商報』登廣告，以布雷故，亦純屬義務性質，從未收費一文也。

渠自十六年加入國民黨後，即以全力為黨服務，余與之見面之機會不多。二十三年七月，余始於牯嶺見蔣先生，翌年即入中央政治學校任課。此後自西安事變以迄抗戰終了，無論在京，在滬，在漢，在渝，幾每月必與布雷有三兩度之接觸，願所談多以交換時局意見為限，或偶及國青兩黨關係，彼此從未以個人私事，作為話題。前年謫居台灣，得讀其遺著五十歲以前之『回憶錄』，始畧悉其學養之淵源，與身世之梗概，乃深慨余前此對此死去之友人，所知者固不多也。

布雷爲一極端謹慎之人，不矜夸，不浮躁，雖內心有不可踰越之尺度，其人格亦有不可或犯之尊嚴，然待人接物，則一以書生之本色出之，既無所謂『冷冰冰』，亦無所謂『熱烘烘』，蓋歷二十餘年，余實未見其一改常態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布雷於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後，過余京寓青雲里長談，對事變前途，表示充分憂慮，認討伐與轟炸爲操之過急；對馮玉祥態度更不放心；並告余曾力阻蔣夫人前往西安，已爲所拒。余乃根據種種事實與理由，告以決無危險；蓋張性衝動而顧慮甚多；張楊臨時偶合，決難同惡相濟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實無加害於蔣先生之必要；蔣夫人去能使騷張狀態趨於緩和，有利無害；宋子文與張私人關係不惡，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於余說雖亦首肯，但余視其出門之面色，似仍疑信參半也。次日余至政校上課，學生更紛紛以此事爲問，余卽以告布雷者告之，其後解決途徑，果一切不出余所預料，蓋事有似危險而實平易，似複雜而實簡單者，此類是也。

二十六年冬，政府西遷武漢，其時余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亦隨政府西行，寓

武昌文昌巷連貫吾家。翌年三月，國民參政會成立，國參議會防即告結束。其時雖華北淪陷，上海南京亦相繼失守，但人心異常鎮靜，國民意見亦確可藉參政會以表達於政府，頗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初不似今日之一切隔膜，一切銷沈也。是年七月某日，布雷至文昌巷訪余，適余以事赴漢口，至晚十一時後，又以車來迂，謂有要事待商，既至其胭脂坪辦公處，布雷乃出有關三青團一切文件囑余細閱，並謂蔣先生頗有意欲余擔任該團一部分工作，余以另有黨籍，恐滋誤會，婉辭謝之。其實在抗戰期間，凡所以融洽黨派以統一全國意志者，余幾無一事不與布雷岳軍協商，亦幾無一事不開誠相見而得圓滿解決，及今思之，深覺布雷調護之功不可沒也。

布雷爲一正誼感極強之人，其感覺亦至爲銳敏，凡讀其『回憶錄』者，當能知之。『回憶錄』有一段批評四川人之文字，似於川人之性格頗能搔着癢處，其言曰：

「居重慶約一月，寓上清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觀，

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甚於質，志大而氣狹。」

其批評廣西人，則謂『其特點爲樸儉勤勞，而規模不宏。』就余三十年接觸所及，實與布雷有多少同感也。

布雷體弱多病，有時必藉安眠藥始能入睡，終身與文字爲緣，生活尤爲清苦。憶勝利後，某次，渠由滬回京，余適與之同車，見其精神委頓，因問其近來身體如何，渠回答：『我這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已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修理也無從修理的時候了。』言下不勝慨然。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五十初度，蔣先生書『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八字贈之，論其宅心之忠厚，治事之勤勞，甚至竟以身殉職，雖謂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可當之無愧也。

書生建黨的曾琦（1892—1951）

慕韓到美國去養病，已近三年，我們平日所得的消息，知道他總是時好時壞，他的身體自來不行，我和他做了三十幾年的朋友，很少看見他能有半年以上不生病的時候。這次出國，我以為環境變換，醫藥的條件也比較良好，應該於他有益。而且他最近還重遊了一次歐洲，假定他的健康沒有好轉，似乎他決不會冒險跑這一趟，可是去年冬天，他從巴黎寄了我兩首詩，都是充滿悲觀，已無復當年豪氣，我着實有點替他擔心。他由歐洲回美國以後，有一封較長的信給我，表示他願意離開美國，問我究竟以到那裏去為比較相宜。我因為不明瞭他的經濟和健康實況，不敢為他決定，只好指出三條路線請他自己選擇：一、健康情況不佳，經濟勉可支持，便留美不動；二、身體尚待修養，經濟又無法維持，便去台灣休息；三、身體已好，興會又佳，經濟還勉強可以自了，便到東京或香港，來和我繼續奮鬥。我這封信寄

去已一月有餘，還不會得着他的回信，不料他於本月七日，以割盲腸不治，竟在華盛頓大學的醫院死了。他的死訊發表以後，我已經在香港的報紙上看見四篇關於他的記載，執筆的人，大概對於慕韓生平不甚了了，因此在高下抑揚之際，不免失實的記載，捧場決不是一個已死去的慕韓所需要，厚誣却是大大的不應該，無已，似乎還是不如讓我這個比較知道他的老友，來爲他描繪一個輪廓，好在他的朋友很多，明白他的家世，保存他的詩文的人還不少，因此，我把這些都劃出我的記載之外，讓知道得更詳細的人去補充，我在這裏只想談談他的爲人，和他對政治的一些看法和做法，而且只以我確實知道的爲限，凡我所不知道或知道一點而不能詳其始末的，也姑從闕如。

×

×

×

×

慕韓名琦，別署愚公，他有一本詩鈔題作『藏雲室』，四川隆昌人，生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得年五十有九，僅僅大我一歲。他的家世和他童年時期的生活，我完全不清楚，只知道他的母教甚嚴，好像他在中學時期的一位校長是

講理學的，他和他的同學對他都很崇拜，也許他從這兩方面受的影響不少。

我和他認識是在上海的震旦學院，我雖不和他同班，但我們有過接觸，當時我所留的印象，只知道他是一個士氣很重的四川人，他常常和幾個朋友在一塊，從他那一副矯矯不羣的神氣看來，他好像已經是那個小圈圈裏邊的領袖，可是我並不在他們的圈子裏面。其時是民國三四年之交，他不過二十三、四的光景。

後來他到日本留學，到上海和王宏實、張尙齡等辦『救國日報』，我都沒有和他通過信，僅在上海見過一兩面。到民國七年，他和王光祈，陳濟（愚生），周無（太玄），雷寶菁（眉生），張尙齡（夢九），李大釗（守常）等在北京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經過王光祈的一度南下，便把我介紹入『少中』做了一個會員，並且非正式的要我在南京負起了發展會務的責任。究竟慕韓是從那點上賞識了我，我自己至今也不明白，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賞識過我自己，並且看見那些裝模作樣自命不凡的人物，就根本有些討厭。

×

×

×

×

慕韓在法國留學的期間，一面讀書，一面以愚公的筆名爲上海的「新聞報」寫通訊，每次約兩三千字不等，每信報館酬以十元，後來改爲十二元五角，大概每月通訊七八次，約可得稿費百元左右，即靠此維持生活，當然是很苦的。民國九，十年之交，中國共產黨已經發起，其時留法的勤工儉學生很多，中共就憑藉這一基礎，在法頗有所活動，慕韓的反共工作，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當時在法國領導中共的便是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這班人；領導反共的，便是慕韓、何魯之、李不隲等等。聽說他們當時對壘的情形，也就是一會兒打打架，一會兒又開開談判，所謂「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他們大概在三十年前便已開始了。

慕韓所發起的「中國青年黨」係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正式成立，他所提出的兩句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所謂「強權」，在當時自然所包者廣；所謂「國賊」大概便以共產黨爲主體。其所以要提倡「國家主義」，他們自然早知道「中共」要求發展，除向蘇聯「一面倒」以外，是斷然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

十三年冬天，慕韓由法國回到上海，不久，他的夫人宋靜宜女士，也從四川出來了，他們兩夫婦便搬到靜安寺路民厚北里一七八九號的樓上，和我同居。到十四年春天，一個與青年黨的歷史不可分的『醒獅』週刊，便在這個時候出版。該刊每週出版四開一小張，用道林紙精印，『醒獅』兩個字是章太炎寫的，在報名下面，還印着一隻獅子，是慕韓由法國帶回的一張畫片翻印的，慕韓顧而樂之，覺得很神氣。這個週刊的經費，係由二十幾個朋友（有的是青年黨員，有的是同情者），每人每月担任五元，絕對沒有向外面去找過一文錢的捐款。寫稿子的完全是義務性質，無所謂稿費。慕韓任總編輯，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字，凡發行校對一切瑣務，便由我包辦，有時候也還要幫他看看稿子。發行半年，鎖數已達八九千份，再版三版的記錄也有過，等到第二年五月，我因為要籌備出國，便交給一位黃鐘聲同志接辦，其時的銷數，已超過一萬，不僅最初每人每月拿出五元的辦法早已取銷，而且在交代的時候，還贏餘了七百餘元的現款，二三百元的郵票，我生平辦過的日報期刊，不下十餘種，但在營業上成功的，却只有這一次。其時國民黨正在聯俄容共，

我們在言論上不只反對共產黨，同時也反對容共的國民黨，要在中國談『第三勢力』，我們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勢力』的老祖宗。

在國民黨清共絕俄以後，我們本應該以一個普通政黨出現，似乎沒有與國民黨完全立於對立地位的必要了；可是共雖清了，俄雖絕了，但國民黨從蘇俄學來的一套，依然未能放棄，還是要一黨專政，還是要高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我們逼得無路可走，不得已依然與國民黨對立了七八年。在這一期間，黨的領導權，大體是握在慕韓的手裏，我們可以想像他的處境是很苦的。有人責備慕韓，說他不應該和若干軍閥有所接近，甚至連黨內的同志，在這一點上也有對他不諒解的，現在慕韓死了，我們試平心靜氣想想：他所領導的一個黨，一個愛國而反共的黨，簡直弄得無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幾個軍閥，他不去和他們接近，還和誰去接近？由今觀之，軍閥在中國近年的歷史上，誠然也造了不少的罪惡，但比之于今天大陸上的共產黨又如何呢？

青年黨與國民黨關係改善是二十三年以後的事，可是慕韓與蔣先生第一次見面

，却在二十六的春天。接着八年的抗日，兩黨的合作總算大致不錯。汪精衛離開國民黨的一幕，不幸也帶走了幾個青年黨員，但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依然是異常堅定，可是這件事在抗日史上是國青兩黨的白璧微瑕，要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再拿現在的情形比較，汪精衛賣國的程度，並沒有超過共產黨；當時在偽組織下面生活的人民，比之於今天大陸上的老百姓，也真不知道要好到多少倍啊！

自從有了「國民參政會」，慕韓便想憑藉這個組織，逐漸把國家引上民主憲政的常軌，有兩個關於提前成立地方民意機構的案子，也就是慕韓所提出，而得到大多數的通過的。

慕韓所讀的中國書，比較有心得的，便是中國歷史上那些政治人物的言論和行事；他留學日本，留學法國，他所注意的，也就是日本和西洋那些政治家的政績和風度。『當代吾所師，新會與餘杭，』這是慕韓的兩句小詩，我覺得他之崇拜梁任公和章太炎，也僅僅是梁章談政治或革命的方面，並不在他們的學術方面，我敢說太炎講學的精微處，慕韓是並不太能理會的。

慕韓的政治技術或政治運用，我不怎樣恭維，可是在最近的三十年，在我的朋友圈子裏面，真正能談大政治的，我却只承認慕韓一個。我對於政治是玩票的性質，最多也不過是興趣之一，慕韓却把政治看成身心性命，無論造次顛沛，腦筋裏都是沒有把政治拋開的。要談文學的欣賞或藝術的賞鑒，我絕對不去找慕韓，可是一涉及政治，慕韓便立刻成了我一個不可少的朋友，慕韓死了，我對於政治的興趣，也許更會趨於低落。

慕韓不僅歡喜談政治，而且長於組織，試想，以他這樣一個永遠窮得不名一錢的書生，居然敢於發起一個黨，經過無窮的困難，受過無數的壓迫，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歷史，不靠他的組織能力還靠什麼呢？我想有幾句話，凡屬認識我們的朋友，一定都可以承認：只要是一個經過慕韓直接訓練或組織的青年黨員，說他還有向共產黨去投降的可能，那才真正是奇怪！

慕韓在我們的朋友中，自成一格，我舉不出另一個朋友在某幾點上像他；甚至我不能舉出慕韓的某一點與某人完全一樣。

毫無疑問，慕韓的性格是保守的，當白話詩文盛行的時候，慕韓所作詩文，依然保持老調。他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他的記憶力頗強，前人的作品，他能成誦的頗不少，可是鑑別力未必太高。他有一篇『巴黎寄妹書』，似乎是摹仿王湘綺，太炎說像習鑿齒，他很高興。慕韓的詩是志士之詩，而非詩人之詩；他的文是策士之文，而非文人之文；這是我對慕韓的詩文一個總評，儘管他自己未必同意，但我依然相信很公道。

×

×

×

×

慕韓於男女之際，在我的朋輩中算是一個極端規矩的人，假定他的第一位夫人宋女士，不是在四川中了炸彈的破片死去，他真可以做到古人的所謂『不二色』。聽說他在巴黎的時候，有一個有名的故事：一天，慕韓忽然收到某君一張約他在午後喝茶的請帖，地點是巴黎某街某號的三樓，他如約而往，頭戴博士帽，手拿『斯替克』，找到了門牌，便漫步登樓，用手仗在門上敲了幾下，門一開，乃是一間很大的『沙龍』，在紅絨的地氈上，一排站着十幾個一絲不掛的妙齡女郎！這一下

直把慕韓嚇得手足無措，回頭便跑，踉踉跄跄的幾乎滾下樓來，一直回到宿舍，還連呼『惡作劇』不止。可是雖然如此，慕韓的這種態度，僅僅用以自律，決不以之律人，青年黨的同志們，因言論和行爲的不檢，受過慕韓責難的頗不乏人，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人因男女關係受過他的責備，這種地方，也可看出慕韓並不是不近人情。

慕韓只有惟一的一個兒子，——曾憲斌，能讀書，很誠篤，現在美國的某大學肄業，係宋夫人所生。現在還留在美國的這位夫人——周若南女士，能書畫，籍浙江諸暨，與慕韓結婚已近十年，無出。慕韓於伉儷之情甚篤，我從來沒有聽說他鬧過家庭問題。慕韓以政治爲專業，他前後兩位夫人也從來不管。

看慕韓的樣子是很嚴正的，有時且近於迂腐，其實慕韓也並不是完全不懂得幽默；我們有一位老友，他在中年以前，嘗抱有物色得一個『奇女子』的宏願，偶然發見一個似乎頗有奇氣的女子，他便不惜用盡方法和她接近，但結果終無所得。慕韓交遊遍全國，頗能宏獎人才，『愛才如性命，宗法在湘鄉』，便是他的自白；然

而也常感失望，他作了一首打油詩，用以自嘲，且調侃這位老友：『君求奇女我求才，世事茫茫大可哀，安得黃金三百萬，美人名士一齊來。』可見慕韓眼中之名士美人，也不過如此如此。

×

×

×

×

慕韓的生活，清苦如老僧，除談天，出遊，或偶然做做舊詩以外，殆一無嗜好。近三十年來所流行的新文學，非慕韓所能欣賞；即電影和京戲，他也並無興趣。非極高興的時候，我從不見他喝酒，抽煙打牌更無論矣，朋輩中覺得他的生活過於單調，有勸他出去散散步或在草地上晒晒太陽的，他也頗難採納，他把身體弄得太壞，大概精神上缺少緩衝，也是最主要的的原因之一。

慕韓晚年也寫日記，有自編年譜，平日所作詩文，均能編次保存；朋友們的來信，必批明收到日期，很少不回信；朋友們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他都有小本子記錄；凡此種種，可證明慕韓決不是一個散漫而沒有條理的人。

慕韓在開會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總希望讓每一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他所要

求於大家的，便是要說得出理由，把握得着關鍵，立得起方案，提得出進行的步驟。慕韓自己對於一個重大問題，往往就利害得失先作多方面的考慮，有時且一條一條的寫出，可是一旦覺得別人的理由比他長，指出的關鍵比他明白，方案能更周到，步驟能更謹嚴，他却可以從善如流，不惜把自己的意見拋棄，單就這一點而論，慕韓已經是很够一個領袖的資格的。

慕韓自己長於文字，但關於青年黨對內對外的文告，他却常常指定燕生和我執筆，要長，要暢達便找燕生；要短，要有力便找我，現在燕生死了，慕韓也死了，我大概關於這類的東西也從此擱筆了。 民國四十年五月

附錄：曾琦的遺囑與絕筆

我在前記發表不久，又讀到慕韓去年十二月六日與台灣某同志書，其中有重要的兩段，不啻是他的一種遺囑，特再補記於此：

「弟爲貧病所苦久矣，處茲亂世，寧懸殘生，所以尙不願遽與世長辭者，

亦以生平抱負，百未一展，以國家主義倡於天下，而親見國亡於斯拉夫蠻族之手，若不及身而覩恢復，則雖死亦不能瞑目。加以自傳尙未寫成，詩文集尙待編定，政見亦未完全寫出，是以尙望壽命之稍延，非有戀於塵世也。』又云：『弟已吩咐家人，如竟死於海外，必須舉行火葬，以便他日灰骨容易運歸，屆時由兄等分配，除以一部份葬於故鄉先父母墳旁外，餘則分別撒於黃河長江珠江遼河各大流域，以示弟之忠魂隨流水以縈繞故國，此非故作悲觀之論，事實上亦饒有可能，兄姑誌之可也。』

這封信寫在他去世的前五個月，其時正入華盛頓大學醫院治療貧血症，尙非最後一次割盲腸也。

我前記提到去年他從巴黎寄給我的兩首詩，我所看見他的詩，此爲最後，大概要算是他的絕筆了，也補錄在這裏：

其一：玫瑰花开百鳥鳴，當年曾此結鷗盟，故人多少先朝露，淒絕孤鴻斷

雁聲。（重遊巴黎）

其二：鳳泊鸞飄不計年，海枯石爛欲迴天，餘生無復重來望，鐵塔低徊一惘然。（臨去巴黎）

玫瑰村在巴黎近郊，電車三十分鐘可達，中國留學生居此者頗多，中國青年黨即發起於此。我二十七年八月離開巴黎，臨走前一天，還去聽了一次「阿拍拉」，在火車上為送我的蕭石君唸了東坡的一首絕句：「淒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一番多。」我這種浪子的性格，與慕韓固自不同也。（四〇、六、六。）

記盧作孚之死

盧作孚以二月八日在重慶服安眠藥自殺，這個消息大概是已經證實了。

我認識作孚遠在二十年前，他和『少年中國學會』的朋友有過往還的不少，以作孚的才氣而論，他實在也是那個時候一個有為的青年人物。好像作孚曾正式加入過『少中』，但這事我已記不清楚，但他確曾進過青年黨，而且曾在重慶參加處理過黨務，却是事實。他後來因為專心經營民生公司，對黨無暇過問，等於無形脫離，似乎青年黨的朋友對他也很能原諒。

我究竟是那一年第一次在上海和作孚見面，也不能確指，但記得其時渾代英鄧中夏還不會死，我想至遲也不會遲於民國十六七年吧。我和他最後一次的長談，却是三十八年夏秋之際在廣州的愛羣酒店。

民生公司的重要職員，我認識的不少，因此對於公司的概況我大致明白。民生

公司在這二十幾年中，似乎隨時都遭遇過經濟上的困難，尤其以抗戰中爲然，但作孚却總有方法把這種難關度過。我曾看見作孚因公司發生困難或遭遇意外打擊，有過着急的時候，却從來沒有見過他消極的時候。以作孚的性格、作孚的頭腦，以及他那種猛勇精進的精神，確不失爲中國現代企業界的一個俊物，其對社會國家能有這樣大的貢獻，夫豈偶然。

作孚青年時，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他辦事的條理和豐富的常識，大概都是由經驗和自修積累而來，記得勝利以後，我有好幾次和他在京滬道上同車，總看見他攜帶一本『讀者文摘』或一份英文日報，隨時從懷中掏出一本翻爛了的字典，戴着老光眼鏡，在那裏細心閱讀，其不肯浪費時間，有如此者。作孚自然不以文字見長，但我偶然見過他寫的三兩種小冊子却也說得頭頭是道，其所包含的意義，大抵都從親身體念而來，比起那些食古食今兩俱不化的書櫃子，我覺得反而是作孚的見解有些道理。

作孚健談，也和其他的四川朋友一樣，但和作孚談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爲

他有問題，他總歡喜就他所提的問題和你討論，決不東拉西扯的瞎說。作孚因爲事業上有了相當的成功，爲他成功的歷史所支配，有時不免自信太過，甚至流於武斷的時候也往往而有，這是一切有過成就的人所常有的弱點，固不獨作孚如此也。作孚也頗留心政治，但他的政治見解很平凡，他平日所接近的人物，老一輩的如張表方（瀾）周孝懷（善培），同輩的如何伯衡，李劫人，周太玄之類，大抵都對政治無真知灼見，不知其人視其友，大概作孚對政治的認識，也始終跳不出這班人的圈子。我們必須從這些地方去體會，才可看出作孚卒致陷於自殺的真正原因。

所謂『官僚資本』，這個名詞是中共造出來的。平心而論，因做官而貪污找來的幾個錢，誠然是不乾淨的，但有種官僚以這種不乾淨的錢專門用去吹鴉片，討姨太太，有的却也還用以做一兩件比較有益社會的事，以這兩者拿來比較，總也還是後者較好於前者吧。中共可以特許官僚抽雅片，（現在北平便有這種被特許的官僚。）惟獨官僚的錢變成了資本，却非一律沒收不可。我們試想想，以四川這幾十年來的那種社會，除掉若干大小軍閥，和若干與這班大小軍閥爲緣的政客以外，還有

什麼人更有錢？作孚要在四川那種環境，辦一個於大眾有益的民生公司，他除掉運用這班軍閥官僚的幾個錢，又還有什麼辦法？澈底清查民生公司資本，大致要以這班軍閥官僚的為最多，這一部分資本被沒收了去，公司雖欲不關門，不可得矣。

加拿大對中國絕少直接投資，作孚居然能以公司名義，個人名譽，借得美金一千二百萬元，向加訂購門字輪九艘，在中國除經營永利久大的范旭東（銳）外，能夠對外有這種信用的，大概要以作孚為第二人。現在這九艘輪船既被中共攘奪，債款更毫無着落。作孚是以信用為第二生命的，現在既事實上已無法保持這種信用，作孚不死亦不可得矣。

民生公司航線的發展，始於川江，次及宜沙武漢，次及長江下游，而以上海為樞紐，等到門字輪到達中國以後，更拓展及於港澳一帶，以個人一種堅苦卓絕的精神，運用一內容並不如何堅實的機構，不到三十年，居然發達成為一全國性的民營事業，作孚可以說無負於國家，而中共却太對不起作孚了。我可以說，中共對作孚這種人，未必一定非置之死地不可，可是中共的政策與作風，作孚却只有活活被逼

死之一途，這是一切所謂民族資本家所應該澈底認識的，已上當的應及早回頭，還不曾被騙的，更不必再存幻想了啊！

中共標榜「爲人民服務」，作孚的一生，真不失爲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標準人物。他的身體本來不好，更有過肺病，患過嚴重的失眠，而事無鉅細，又必須親自考慮，親自處理，實在是勞苦達於極點，他居然還能活到五十八歲，可以說純靠他那種堅強的意志在那裏支持，最後受到這種無情的打擊，他在死與活着的二者之間加以選擇，大概覺得死還輕鬆多了哩。

作孚的事業，自以民生公司爲主，但他的興趣却是多方面的，記得我在農林部的時候，他曾和我交涉，要求分一部份優良的種豬，運往四川繁殖，當時撥交他的，大概大小有三十頭左右，後來在廣州和我見面，他還告我運去的豬都已安全到達，而且還飼養得很好，低徊往事，良用慨然。

太平天國史話六篇：

一、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

最近偶然翻閱大陸出版的兩種太平天國史料，其一為中共所組織的『中國史學會』所主編，書名『太平天國』，共八冊，內容分四部分：第一部份太平天國史料，凡太平天國所頒行的官書文告及諸王自述等屬之。第二部份清方記載，凡清方一切公私記載屬之。第三部份外人記載，凡外人所紀太平天國一時期事項已譯成中文者屬之。第四部份專載，則所錄者為向榮奏稿，烏蘭泰函牘，並附錄趙惠甫年譜一種。

其二為『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即李秀成於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在南京被殺前所作供辭的原文，從湘鄉曾氏所藏原本影印抄錄而得，並由羅爾綱氏加以箋證者。

關於『太平天國』（原名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一書的編者，如胡小石、鄧之誠、謝興堯、羅爾綱、向達、朱僕、鄭鶴聲諸君，過去本來都是從事歷史研究工作的，因此他們對於材料的去取，態度相當客觀，於原文無所增損，尤其妥當。可是由本書編輯委員會所寫的一篇序，却一定要牽強附會到共產黨的觀點，說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而目平定太平天國諸人爲漢奸，或地主階級的反動份子，這確實是牛頭不對馬嘴。很客觀的一種看法：太平天國的起來，僅帶得有一種很輕微的種族仇恨，再加上一點外來的宗教影響；至於人民遭受官吏的壓迫，窮極思亂，所謂『官逼民反』，這便是中國歷史上一切動亂的主要原因，絕對不包含任何階級鬥爭的因素，太平天國也決不是例外。至於少數野心人物假借一種說法以從事煽動，則當時廣西人民不懂得『天父下凡詔書』的內容，也猶之乎今天大陸人民不懂得馬恩列斯的内容完全一樣；洪秀全楊秀清等把他們裏脅來的羣衆呼之爲兄弟姊妹，也猶之乎今天大陸的中共政權，明明白白是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小奇等少數落伍的知識份子在那裏把持，一定要說由工人階級領導完全一樣。膏藥人人有賣，廣告的花樣却隨

時代而不同，時間不過一百年，說中國人民已經進步到不容易爲一種新花樣所欺騙，那當然是不合事實的。

『湘軍志』的作者王闈運，他敘述洪楊的起來是這樣的：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廣西亂始上聞。……十二月，陳亞貴平，乃討金田。金田村者，潯州倚郭桂平縣地，前史所稱大藤峽也。其西則武宣貴縣，土客民自來雜居相讎，姦民楊秀清利客豪資，說令求土民女爲妾，又自至土家激撓之，因勸豪劫女，使相攻燒，衆無所歸，秀清則悉劫之以叛。有衆數千，惡自倡亂，乃投金田，合於洪秀全。』

『自明末西夷人以數算新法詫中國，因得布其祆教，愚民傳奉，世代秘守，婦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誘，懼官吏訛索，遂拒險屯結。秀清至，自言通天語，秀全當爲天兄。咸豐元年，僭號天王，出掠旁縣。……』

這是一個最早而最簡單的敘述，也似乎是一個最近真的敘述。這裏面包括四點事實：一、當地土著的人民和客籍的人民原有一種相仇殺的習慣；二、野心家楊秀

清乃從而挑撥之、激動之，鬧到他們窮無所歸，其勢不能不跟着他走；三、洪秀全藉傳教以誘惑愚民，本來就別有懷抱；四、官吏對人民壓迫，確也逼着他們不能不從事團結。

何嘗有什麼農民對地主的階級鬥爭？又何嘗有什麼排滿的意識？少數野心人物要做皇帝，一定要裹脅民衆做他們的工具，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套造反的老方法，梁山泊如此，洪楊也如此，就是毛澤東又何嘗不是如此？

羅爾綱氏本來是一位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家，在中共佔有大陸以後，據我所知，他一共出過三本有關太平天國的書籍：其一便是上面提到的這本『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一九五一年一月開明版），此外還有『太平天國史辨偽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商務版），和『太平天國史稿』（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版）。假定他能够不放棄學者的立場，便不問他的觀點怎樣，總也不失爲一部份有價值的研究工作，可惜他經不起環境的壓迫，一提到曾國藩，便一定要屈服於流俗之見，加以漢奸兩字的惡諛。

合漢滿蒙回藏爲一大中華民族，自辛亥革命以來，這已經成了我們一個立國的基本觀念，而這個基礎的完成却是始於滿清。五族既是絕對平等，中國的皇帝漢人可以做得，蒙古人、滿州人又何嘗做不得？滿清自統治中國以後，經過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論到他們做皇帝的成績，也並不比漢族或蒙古族的皇帝來得更壞，如果說凡在滿清做過官，或爲清廷効過力的人，都得加以漢奸兩字的稱號，則今日中國人的祖若父，乃至共產黨人的祖若父，豈不都已具備了漢奸的資格？因此，只要我們確認五族平等的原則，而不繼續抱持一個漢族中心的狹隘觀念，則漢奸這一名詞，便不應在中國的文字中繼續存在。至於汪精衛一面倒向日本，毛澤東一面倒向蘇聯，這是國賊而並非漢奸，因爲他們所得罪的並不只是一個漢族，而是這整個的中華民族啊！

近二十年左右，陸續出版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會少於一百種，但我們看這類的東西，必須有幾個基本觀念：一、洪楊只是要做皇帝，談不上種族革命，也談不上政治革命；二、假借一種非驢非馬的外來宗教，這只是他們借以煽惑羣衆的一

個幌子，他們決沒有什麼新思想；三、曾胡江羅這班人，効忠清朝只是他們的一方，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以萬死不顧一生的毅力，把太平天國這一惡勢力對付下去，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二、長沙在包圍中八十天

我一直到十九歲才永遠離開我的故鄉長沙，凡長沙的一切一切，至今還很清晰的存留在我兒時的記憶。

大致在十一歲進了小學以後，我的家庭才准許我在外面亂跑：高峙在省城東南城牆上的天心閣，橫列在湘江中的水陸洲，以及那座雖不太高而兼有峨嵋之秀與青城之幽的嶽麓山，都是我的遊蹤常到之處。

在我的出生之年（一八九三），隔太平天國的消滅（一八六四），已經是三十年了，可是太平天國的故事，在我們湖南人的回憶中，依然是異常親切。記得當我八九歲的時候，住在南門外的碧湘街，同居一位張姓老太婆，年齡是七十有一，她

便是同治元二年從南京圍城中逃出的。她是湖南人，但她如何會到南京？還是本來住在當地，或者由太平軍竄出湖南時擄掠而去，這她却沒有交代明白；可是她常常爲我講『長毛』，尤其說到南京城內那般王爺們的氣燄（她當然不懂得太平天國是不許稱爺的），她更是津津有味。這個女子雖然老了，可是看她眉宇間那一段精悍之氣，和她那一雙盈尺的蓮船，我懷疑她根本就是太平軍中的一位蠻婆，或者成了湘軍中某一位軍人的戰利品，才把她帶回湖南也不一定。她身上可能有不少的羅曼斯，可惜我當時還不懂得獵取這類的資料，總算把她輕輕放過了。

十四歲，進了高小，歷史教員曹秩庸先生，常常爲我們講到曾、胡、江、羅這班人的軼事，湘潭、靖港、城陵磯、岳州這一帶的戰蹟；教地理的曹石渠先生，也偶然提到長沙周圍的一些地理上的名詞。其時長沙城內的曾文正祠、左文襄祠還很有名，席少保祠最後起（席寶田本來也是湘軍宿將，後來更以平苗功特許建專祠），也最爲宏大。偶然有人借着這些地方演戲，我也常常擠着去看，由今思之，還可令人想像所謂同治中興以後，在長沙所留下的一段殘影。

洪秀全楊秀清以道光三十年的六月（一八五〇）發難於金田，在廣西境內鬧了將近兩年之久，一直到咸豐二年的四月（一八五二），才竄到我們湖南的邊境，連陷道州、江華、永明、嘉禾、藍山、桂陽州、郴州、永興，由蕭朝貴統率一千多人先發，攻陷安仁、攸縣、經過醴陵，一直到達長沙，其時是咸豐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

原來洪楊在初起的時候，其力量是並不太大的，大致不過幾千人，假定當時在廣西境內那般從事剿辦的文武能和衷合作，說不定就在廣西把他們收拾了。可惜當時向榮與烏蘭泰不和，李星沅與周天受不相下，後來的賽尙阿也與向榮有意見，以此遷延到兩年之久，結果依然給予他們一個竄進湖南的機會。

湖南人是太平軍的死對頭，當他們開始謀竄湖南到達廣西邊境全州的時候，便給江忠源在蓑衣渡給了他們一次迎頭痛擊，據說他們的南王馮雲山便是在這一役死了的。而冒失鬼的所謂西王蕭朝貴，也就正死在長沙城下！

說到當時長沙城內的情形是很可笑的；防守的軍隊不算少，共有兵勇八千餘人

，可是統軍的將領却有好幾十，名義上是隸屬於巡撫，但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雖然仍留在長沙，已被清廷免了職，而新任的巡撫張亮基又未到任。同時有一位雲貴總督羅繞典，却也奉命在長沙治軍。當太平軍進入湖南以後，他們自然也感到省城的危險，可是究竟不知道敵人什麼時候來，更不知道從那一條路來，其時沒有郵電，當然更沒有『快郵代電』，情報工作是一點也沒有的。當蕭朝貴的一千多人到達隔省城只有十里的地方停下來，人民跑來送信，我們的官吏們看見沒有公文，以爲是造謠惑衆，預備把這個送信的老百姓殺了；可是駐紮在石馬鋪的一千陝西軍，已經和敵人接觸，敗下陣來，副將尹培立戰死，潰兵已退到城中，然後知道真正來了！才開始把城門堵塞。蕭朝貴看見天心閣那一面地勢很高，以爲是城門所在，跑去撲了一個空，折回南門，南門已經塞了，真是間不容髮！

其時的巡撫既無法指揮軍隊，長沙的城頭上有不少的秀才、舉人，你領一百人，我領五十人，在那城牆上的垛口張望，梭巡；提督鮑起豹更可笑，他把城隍的偶像抬上城樓，自己和神像對坐着，藉以壯壯胆子！城牆上原有不少的砲（這些砲我

在孩子時候還見過），然而沒有砲台，不敢開，怕把城垣震毀了！一直等到鄧紹良的軍隊守南城，才開始發砲。八月中秋，向榮的追兵到了；十九，新任的巡撫張亮基也進了城；九月重九，賽尙阿也躲進了長沙。其時援兵大集，已近五萬人，太平軍的大隊人馬由郴州趕到。向榮屯在對河的水陸洲，總兵和春和江忠源的軍隊，則屯在南門外的白沙井，與敵人的屯兵處最爲接近。可以說長沙是被太平軍圍了，官軍却也給了太平軍一個反包圍。像這樣相持了五十天，太平軍和官軍彼此都潛伏在自己的屯內，並沒有正式打仗，去屯一二里，人民仍可自由往來；長沙城共有七門，除南門外，其餘六門，也可縋以出入。長沙城內，一般居民還是照常的酒食嬉遊，甚至比較平時還來得熱鬧，這可看出咱們湖南人民相當鎮定，也可看出太平軍未到達長沙以前，威風還不太大。

太平軍攻城最大的本領，便是利用鑛伏開地道，用地雷，九月十九，地雷第一次爆發，城崩四丈；十月初二，第二次爆發，崩八丈；幸而守將鄧紹良瞿騰龍得力，兩次都沒有讓他們達到目的。太平軍看見攻城無效，又不敢在城外和向榮和春等

硬打，延至十月十九的夜半，便悄悄的溜了！計自七月二十八至十月十九，太平軍圍攻長沙共八十天，拿不了長沙，破壞不了湖南，太平軍的運命，已算決定了一大半。

三、太平軍第一次破武昌

當太平軍取道廣西全州，準備浮湘直下逕趨衡州以直達長沙的時候（其時爲咸豐二年四月），爲江忠源扼在隔全州州城水程十二里湘江上游的蓑衣渡，給了他們一次迎頭痛擊。這一打擊確出於太平軍的意料之外，不僅船隻輜重喪失殆盡，並且逼着他們不能放棄水路而改由陸路，同時在太平軍中一個在地位上僅次於楊秀清蕭朝貴的南王馮雲山，確也是在這一次惡戰中死於湘江東岸的（究竟爲全州的防軍所砲斃，或爲江忠源的軍隊所擊斃，自然尙待研究），當時江忠源本來建議在湘江東岸預伏重兵予以截擊的，可惜這一建議沒有爲和春所採納，否則太平軍沒有越出廣西一步的可能，而長江流域的人民可能免去這十餘年的浩劫也很難說。

當太平軍攻長沙不下，江忠源的老弟江忠濟也曾建議：

「官軍四面集，惟河西一路空虛，賊奪民舟，渡江掠食，食盡將他竄，宜重兵扼廻龍塘。」

當時的湖南巡撫張亮基極以這一說爲然，可是一般怕事的將領却不敢行動。江忠源爲了這件事，又親自跑到湘潭向徐廣縉陳說（其時徐已代賽尙阿爲欽差大臣），徐也沒有接受。其結果則太平軍果由廻龍塘竄陷岳州，因而攻破了武昌。

本來太平軍在未出廣西以前，聲勢是不太大的；就在圍攻長沙的時候，力量也極有限；咸豐二年的十月二十一破了益陽，十一月初三破了岳州，這一路他們搶奪了上萬隻的民船，壯丁也裹脅得不少，然後他們才浩浩蕩蕩地越過洞庭，湧出長江！

等到咸豐三年，忠源已奉命幫辦江南軍務，他在一封奏摺上論到官軍在廣西湖南的失策，曾慷慨激昂的說：

「……全州蓑衣渡之戰，寇焰已摧，宜速壁河東，斷其右臂；道州之役

，寇鋒已挫，宜分屯七里橋，扼其東趨；長沙將解圍，則宜堅壁廻龍潭土橋頭，使賊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蓮花池蓮濤灣，死地六十里而縱之使生；湘陰臨資口，岳州城陵磯，皆必爭之區，而縱之使遁；禍機在呎尺之間，流毒遂在千里之外！……」

太平軍對於武昌，四年之間，三得三失：

第一次攻破武昌，在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至次年正月初二日即自動放棄。

第二次破武昌，在咸豐四年六月初二，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爲曾國藩的水陸軍所奪回。

第三次佔武昌，在咸豐五年二月十七，六年十一月十九，又爲胡林翼所統帥的湘軍所收復。

民國二十七年秋天，政府播遷武漢後又將次撤退，有一天我個人在黃鶴樓頭喝到微醉，觀察武漢三鎮的形勢，回想八十年前我們湖南人和太平軍在這裏大戰的那些事實，真使人有『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之感！太平軍在廣西拿不下桂林，

過湖南又攻不下長沙，武漢本來是他們苦苦爭奪的一個目標，得而復失，湘軍和太平軍的勝敗便已大體決定，不必等到同治三年的南京陷落了。

下面所敘述的，乃太平軍第一次攻下武昌時的概況。

從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到十二月初四城破的這一天，武漢完全是一個淒風苦雨的天氣。其時城內的守兵不滿五千，而且是七拼八湊，毫無作戰能力。巡撫常大淳，湖南衡陽人，到任不足半年；提督雙福，本任原係江南，因鄂防緊急，臨時由大淳把他奏留下來幫同防守。這兩位大員都是庸才，只有按察使瑞元，頗有才氣，武昌知府明善和江夏知縣繡麟，相當幹練。

自從太平軍竄入湖南，湖北即着手籌備防守，其時是二年五月。則了七月，大淳並奏明把岳州劃歸湖北防區，以巴陵紳士吳士邁募洞庭湖漁戶二千人，設柵土星港防水路，提督博勒恭武率千人守州城。在大淳和雙福的意思，太平軍決難飛越洞庭，只要岳州守得住，湖北便萬無一失。等到十一月初三，博勒恭武棄岳州不守，爲吳士邁漁船所堵塞在江西的大批民船，又爲太平軍囊括以去，然後湖北才大起恐

慌。大淳和雙福惟一的決策，便是死守待援。把散在城外的零星軍隊，全數收入城中。靠城十丈以內的民房，一律加以拆毀，難民也只好紛紛擁入城內。總兵王錦繡常祿帶到援兵三千，沿路逃了一部分，只剩下兩千左右，瑞元主張飭他們扼守廠紅橋雙鳳山，與城中相犄角；但雙福以城中兵少，不聽，也一併調進城來。初八，太平軍已到達隔省城百二十里的簞洲，人心更爲惶恐。初九，將九門全部堵塞，沒有拆完的民房，便縱火焚燒，於是城外一片火光，城內謠言蠶起。十二日，太平軍水師先到，卽於是日佔領漢陽。十三日，陸路的大軍也已趕來，踞城東的砭孟山、洪山、小龜山、紫金山，進圍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各門，城中情勢已岌岌不可終日。十七以後，知道向榮的援軍已到，大營已駐卓刀泉，這便是大淳雙福所等待的惟一救星，可是向榮的軍隊從湖南一路追來，已相當疲乏，張國樑號稱敢戰，以扼於廠紅橋雙鳳山一帶的太平軍，也無法到達城邊，延到十二月初四，文昌門一段的城牆，便爲太平軍的地雷轟垮二十餘丈，武昌乃告陷落。全城文武及其眷屬全部殉難，絕少例外，老百姓被殺及自殺者，據說近十萬人。初九，

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俱已進城，城中的衙署及像樣子的民房全部被佔；財富則以『進貢』的名義，搜括一空；他們也召集羣衆大會，教人聽『講道理』、『拜上』，實際是鬼話連篇；壯丁和婦女，均被他們加以編制；城中的一班痞棍，一律向太平軍靠攏，比較太平軍尤要凶狠，老百姓叫他們爲『本地王爺』！二十五，是太平天國的除夕，他們居然選了一次妃，挑了六十名妙齡女子，分配給洪楊這班惡棍盡情享受，他們在武昌過了一個快活的年，延到次年正月初二。乃將一切戰利品滿載上船，順流東下，這便是今天中共所恭維「農民革命」的一幕活劇。

四、太平軍怎樣得到了他們的「天京」？

太平軍佔踞武昌二十八天（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至次年正月初二，惟「盾鼻隨聞錄」謂楊秀清於初三日登舟，洪秀全於初四日黎明始上船，則適爲一月）。即順流東下。三年正月九日攻破九江，十七日陷安慶，到二月初十日即攻入南京。他

們從廣西入湖南，擾湖北，沿途所裹脅的壯丁，擄掠得來的糧食、金銀、以及子女玉帛，確已不少。據說當他們從武昌動身的時候，江上的船隻銜接不斷到一百多里，兩岸有軍隊保護着隨同進行，這羣太平天國的王爺們，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新貴，便在船上盡情作樂。本來他們擄得的少女和幼童有五六千人，現在他們感到那些原有的廣西蠻婆已經不够味，只是玩弄女性仍太嫌單調，乃把這班幼童也裝扮起來，穿上花衣，着上紅鞋，面施脂粉，教他們下氣柔聲，環繞這羣王爺們和新貴的周圍，小心服侍。長江兩岸的風景不壞，他們每日三餐，所享受的不只是海錯山珍，並且還要吹吹打打奏動樂器，才吃得舒舒服服哩！（看，這便是共產黨所說的農民革命！）

究竟太平軍從武昌打到南京，他們一共有多少人馬呢？截至現在為止，這個數字我還不能正確的舉出。

據「武昌兵燹紀畧」的著者某君說：

「初賊入武昌，粵東西匪二萬餘，湖廣匪四萬餘，粵西女賊萬餘。女賊尤矯健

善戰，……：遇大戰而後出之。船數千艘，楫櫂士萬餘，大計其數，不下十萬衆，要皆烏合無紀律。……：』

據我推測，這個紀載裏面的所謂『十萬衆』，大致是近乎事實的。假定從這十萬人中，除去工匠、水手、文丐、女侍、變童，以及其他雜色人等，真正持有簡單武器勉強可以作戰的壯丁和蠻婆，最多不會超過五萬人。從洪楊發難一直到攻下南京的前夕，爲時已近三年，他們所具有的實力不過爾爾，其所以能够橫行無阻，決不是由於太平軍真有如何的了不起，實在是因爲當日的清廷及其地方官吏過度腐敗，武備過度廢弛，才醞釀出這一幕中國歷史上所稀有的浩劫。

下面所紀爲官軍一方面的情形：

『時兩江總督爲陸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陽人）江蘇巡撫爲楊文定，安徽巡撫蔣文慶，江西巡撫張芾。』

陸建瀛這個人，假如在承平時代，也許能做成一位有名的督撫：他懂得結納名流，也善事權貴，平日對於漕政、鹽政、河工也頗能留意，但軍事則非其所長。當

太平軍圍攻長沙的時候，他正在辦理河務，乃自請督師勦賊，咸豐二年十月回到南京，十一月即帶着一千多人的軍隊，前往九江防堵，而以南京防務交由巡撫楊文定與藩司祁宿藻負責。時總兵恩長領兵二千當前鋒，正遇着太平軍放棄武昌蔽江東下，甫經接觸，恩長即告陣亡。時江西巡撫張芾在九江，聞訊即引兵退走，九江隨即陷落。建瀛乃駕着一隻小船，趕忙逃竄；經小孤山，不敢逗留，過安慶，巡撫蔣文慶邀他進城商談，也不敢登岸，一直便回到南京。時巡撫楊文定，已托辭前往防守鎮江；祁宿藻本來對建瀛不滿，至是更加以面責；將軍祥厚，便帶着他的一部旗兵防守滿城；戰守負責無人，建瀛陷於束手無策，於是杜門稱病，一連三天，拒絕任何人不與見面。祥厚看見太不成話，乃聯合副都統霍隆武，提督福珠阿洪及宿藻彈劾建瀛說：

「督臣藉口江寧喫緊，趕回布置，沿途險要，並不屯紮，上駛師船，一概撤回，專守水路之東西梁山。蕪湖爲江蘇門戶，亦不設防。十八日（三年正月）隻身抵省，遂致闔城驚擾。臣等函勸速統舟師迎擊，乃督臣晏坐衙齋三日不覆。撫臣（指

楊文定）執意移駐鎮江，挽留不願，民情加倍驚惶。……現在督撫臣首鼠兩端，進退失據，以致省城震動。雖有旗兵志切同仇，無如兵力太單，賊船順流下竄，朝發夕至，守禦萬分緊迫。……請飭琦善陳金綬迅速繞出賊前，協力堵剿，以固省城根本，維持南北大局。……」

這封奏摺上去以後，陸楊均因此得罪，可是事實上毫不相干，太平軍的前哨，已於正月二十九日到達南京城下，再過三天，大軍陸續趕到，全城即告合圍。南京城周五十餘里，有門十三，守兵滿漢合計不過五千，城外有三千左右臨時募集的鄉兵，更毫不可恃。於是祥厚、建瀾、宿藻分別督守，勉強掙扎了幾天，宿藻即於二月初八日嘔血身死，延到初十，儀鳳門地雷爆發，毀城垣數丈，太平軍即蜂湧而入，雖一時曾被滿兵趕出，但水西門、旱西門、南門卒告不守，神策門也被竄入，原從儀鳳門退出者，也依然竄回。建瀾於城破時被戕，祥厚偕霍隆武退守屯駐旗兵的滿城，到第二天，這座內城也告陷落，滿人被屠殺無遺，剩下幾千滿洲婦女，也被趕到朝陽門外，一律燒殺！其餘的老百姓，被殺的似乎不算太多，但被他們認爲「

妖』的官吏和兵士，則甚少倖免。到十二日，更有三三五五的太平軍挨戶搜索，名爲『搜妖』，同時也就順手牽羊的槍奪財物，儘管家家門前貼着一個『順』字，但依然非搜不可。十三日，太平軍的告示便貼了出來，大幅黃紙，緣邊繞以龍鳳，所署的頭銜是：『真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其內容有所謂『人不知敬天，天父大怒，第一次降洪水矣』云云。又在各處張貼標語一類的東西：『人人拜上帝，個個上天堂，快來快來拜上帝！』這總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一種妖孽，而南京便從此被他們蟠踞作爲『天京』，其時間延續到十一年以上。

五、太平天國在南京的設官分職

『莫輕他北地藤支，看畫艇初來，江南兒女生顏色；儘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無恙，春時桃李又芳菲。』

這一首有名的對聯，是同治十年（一八七二）十月王湘綺先生北遊南下，路過金陵，題在新修的莫愁亭上的。其時距太平僞都的消滅已七年零四個月，（湘軍攻

破南京爲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到次年（同治十一年）的二月初四，曾國藩便已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去世，而當時題這首對聯的一代文豪，却正當四十歲的壯年，『六朝金粉，桃李芳菲，』到今天還能令我們想像大亂弭平人民已漸漸得到喘息的一種承平景象。

原來太平軍佔領南京，在咸豐三年的二月初十，被曾國荃所率領的湘軍攻破，則爲同治三年的六月十六。核算這一羣土包子窟穴在這一座水軟山溫的江南首都，爲時爲十一年零四個月。

中國共產黨說，太平軍是農民革命，我現在要求清算這班被追封爲革命黨的傢伙，在這一悠長的歲月中，究竟在南京幹了些什麼？

當太平軍在咸豐元年閏八月佔領了廣西的永安州以後，便已建號『太平天國』，其分封諸王也是在這一時期。稍後南王馮雲山，西王蕭朝貴雖已分別死於全州和長沙，但南王西王的名義却依然保留着。咸豐二年冬到了武昌以後，除『天王』洪秀全是當然的『萬歲』以外，乃更有『九千歲』，『八千歲』，『七千歲』，『六

千歲』，『五千歲』，乃至『千歲』，『五百歲』種種名目，除充分發揮帝王思想一點而外，實際都是抄襲中國的小說和戲劇。小說和戲劇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過最顯著的影響共有三次：第一次便是『太平天國』，大率以『水滸』，『三國』，『說唐』，『瓦崗寨』這一類東西的關係爲多；第二次庚子的拳匪，則以『西遊記』，『封神榜』的色彩最爲濃厚；第三次是毛澤東，他的底子雖是集綠林與神話的大成，但究竟因爲時代更近，其裝模作樣，畢竟進入了中國『文明戲』的階段。我常常有一種怪論：一個外國人，如果他的漢文程度不能讀中國的小說，語言程度不能進中國的劇場，便想冒充說了解中國問題，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太平軍到達南京，第一件表現得最清楚的，莫如他們的分配官爵。關於這一方面的紀載，以我所見到的而論，仍以張德堅等所編輯的『賊情彙纂』一書爲最詳盡而最有條理。『太平天國』的官，無論是在名目上，數量上，都是多到不得了，可是大別之却不外五類：即朝內官、軍中官、守土鄉官、女官及科目出身者是也。『賊情彙纂』上有一個『偽官等差總表』，一看便可一目了然，現在我把它錄在下面：

西	東	一	七	檢	恩賞檢點	十三等	師	恩賞師帥
王	王	等	等	點	職同檢點	十四等	帥	職同師帥
北	南	二	八	指	恩賞指揮	十五等	旅	職同旅帥
王	王	等	等	揮	職同指揮	十六等	帥	職同旅帥
	翼	三	九	將	恩賞將軍		卒	職同卒長
	王	等	等	軍	職同將軍		長	職同卒長
	燕	四	十	總	恩賞總制		兩	職同兩司馬
國	王	等	等	制	職同總制		司	職同兩司馬
宗	王	等	等	監	恩賞監軍		馬	
	侯	五	十一	軍	職同監軍			
		等	等	帥	恩賞軍帥			
	丞	六	十二		職同軍帥			
	相	等	等					
	恩賞丞相							
	平湖丞相							

從上面這個表，還只能看出一個大概情形，此外更有無數離奇怪誕的名目，須從第七等到第十六等『職同某某』的一項目求之。據『賊情彙纂』編者的統計，這類僞官的總數，共爲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我們知道，爲太平軍蟠踞較久的地方，只有南京、安慶、九江這三個大城，其餘大率是旋得旋失，究竟他們有什麼必要非設這許多的官兒不可呢？這個道理稍加分析便不難明白：第一、在太平軍未出廣西以前，本來已經裹脅得有好幾萬人，他們的首腦人物，既然是充滿着一種『打江山』和稱帝稱王的思想，這一羣『從龍』分子，當然也以豐沛子弟自居；既已到達南京，在洪楊等想來，江山總算有了一半，後來居然會有一大羣讀書人起來和他們拚一個你死我活，這當然不是他們所能想像的，於是隨着定鼎『天京』以後，乃實行對這班『老兄弟』正式酬庸，這與今天中共對一班參加二萬里長征的『老共幹』不能不加以特別『照顧』，事同一理。第二、由湖南經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南京，沿路參加的『新兄弟』更加不少，有的是威逼裹脅而來，有的是自動靠攏，太平軍既無理想，又無主義，你以爲單憑一種非驢非馬的宗教便可以把多數人煽動

得起來嗎？太平軍所假以號召的，還不是利用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歡喜作官的這一心理把他們引誘跟着走的嗎？既已到了南京，當然就必得兌現，否則人心如何維繫得住？這好比今天的共產黨，自北平的偽人民政府主席，以至各省市縣，除正的以外，還要添設無數的副主席、副市長、副縣長等等的烏官，以安插這班投機靠攏分子，也就正是一個道理。第三、『太平天國』尊為至高無上的是『天父』，耶穌是天父的大兒子，稱『天兄』，洪秀全是『天父』的第二個兒子，其餘凡男子皆『天父』之子，故一律稱兄弟，凡女子皆天父之女，故一律稱姊妹。這種怪誕的邪說，大抵與中國的大家族制有關，他們既把全國看成一個大家庭，因此對於人民的私生活，便無一不可干涉；既要澈底干涉人民的私生活，設官當然便非多不可了。凡干涉人民私生活最多的政府，便是最壞的政府，自『太平天國』一直到今天的中共，可以說是壞政府的典型，因此我們非實現民主與自由不可，民主自由非他，即不許政府自作聰明對人民的私生活作漫無限制的干涉而已。

六、太平軍對女性的蹂躪

在過去，凡是一個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大率稱許太平軍對於女性確實是相當尊重。所以如此，也不是沒有他們的理由：

一、凡太平軍所到之處，誠然免不了殘酷的屠殺，但姦淫婦女却為他們所嚴格禁止。

二、太平軍倡導一種『天父』、『天兄』、『天王』的怪誕宗教，認男子皆『天父』之子，通稱兄弟；女子皆『天父』之女，通稱姊妹；這不能不說是合於『男女平等』的原則。

三、中國女子偶然可以做皇帝，但服官、從軍、參與考試，便好像是男子的專利；太平軍一切解放，女子服官，除王侯兩級不得染指以外，一樣有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卒長、牌長等名目；至於在各王侯府第服務的，更是以女官為主體。女兵在太平軍中相當有名；女子參加考試，一樣可以點

狀元，也似乎不僅是一種傳說。這還不算「男女平等」的實例嗎？

四、婦女纏足，確實是中國一種有過相當悠久歷史的惡俗，太平軍從廣西攜帶出來的若干婦女，大抵都是不纏足的，其身體不僅十分矯健，而且孔武有力，因此他們或她們對於纏足，乃非常厭惡，所到之處，不僅雷厲風行加以禁止，甚至因此而使用嚴刑峻法也在所不惜，這對於保持婦女們的健康，豈不是功德無量？

這些說法，從表面上，自然也不能不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惜的便是沒有分析當時所表現的事實。

太平軍初佔南京，即將城內所有居民的家庭完全破壞，家人不許同居，男歸男館，女歸女館，每館二十餘人（當然也有例外），分別以「『老兄弟』或『老姊妹』管理之，稱『牌長』，職位等於『兩司馬』。他們這種隔絕男女的方法執行得異常嚴格，不只姦淫認為是『犯天條』，夫婦團聚也是『犯天條』。男子絕對不能進入女館，即母子夫婦也只能站得遠遠的說幾句話，違者輕則枷杖，重則被殺。他們爲什麼採用這種極不自然的辦法呢？其目的在加強軍事力量，年輕的男子被驅策去

當兵，女子也被迫去供應各種苦役：如挑磚石、挖濠溝、削竹簽、搗鹽、抬米，……一切由『牌長』督率，隨時加以鞭打，並且對他們說：『既吃天父飯，要替天父辦事，不要記望老公，天王打平了江山，一個人有幾多老公？』（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畧』）其凶惡無聊有如此者。

女館的管理，儘管是這樣嚴格，但住入女館的婦女是不是當真沒有被姦淫的危險呢？據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中有一條說，咸豐四年二月十三日，太平軍在南京貢院便大審過一次這類的案子：有湖南莫黃氏的三女，長十九歲、次十八歲、季十五歲，住在廖大妹管理的一處女館，即由奸徒們勾結這位廖『牌長』，實行入館姦淫。據她們的供詞：

『長女於咸豐三年四月杪，畏殺從奸，歷經二十餘人，百餘次；次女於五月畏殺從奸，歷經四十餘人，五六十次；季於七月某日拒奸一次，夜在廖大妹室洗澡，不虞追及，廖令發咒憑其作主，代為乞貸，因畏懼允許，後經三十餘人，四五十次，昨因奸過三次，且病體初愈，拒奸哄鬧被獲。』

這件案子裏面的事實，是南京初破以後就有了的，大致在當時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所以到四年的二月，不能不來一次大規模的審判。即以廖大妹這一館而論，時間是這樣短——五月到七月，『犯天條』的人數和次數已經這樣多，這還不是太平軍一種不近人情的辦法所造的當然結果？

實際太平軍對女性的蹂躪還不止此：

據說太平軍攻破南京的內城以後，凡老醜的婦女均被屠殺，剩下六七千個年青而稍有姿色的，便關閉在江寧貢院，編有號頭；凡調到外面打仗的太平軍，一旦凱旋回到『天京』，便每人有資格去領取一個，在外面姦宿一夜或三五夜，然後交還。（見『盾鼻隨聞錄』）像這種逼迫良家婦女充當營妓的辦法，難道也算是尊重女性的一端嗎？

上面這些事實，雖說可笑可恨，還不是太可笑太可恨的，真正令人髮指的，乃在手訂『天條』、禁止他們的兄弟們和姐妹們有性生活行爲的這般太平軍的王爺們！舉例來說，洪秀全和楊秀清，便是兩個十足的淫棍。

我在上面記『太平軍初破武昌』的時候，曾提到他們在武昌選過一次妃，有六十個年青貌美的女子，便被選出了充了這般王爺們的『下陳』；到了南京這一六朝金粉的佳麗地以後，這般王爺們更弄得昏頭昏腦，不知如何是好。『盾鼻隨聞錄』的作者說，洪秀全的『天王府』，有『僭稱妃嬪者四十餘人』，實際即是偽府裏面數以千計的女官或『貴使』，又何一不是供給這位『天王』發洩性慾的對象？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陷於這樣荒淫，乃是出於楊秀清想要大權獨攬的一種詭計，可是楊本人的縱慾，却又比較洪秀全有過之而無不及。

『金陵雜記』的作者記楊秀清之死，說他的偽王娘同時被殺的有五十口之多，而『東王府』內的女官『貴使』被姦有孕的，還不在此數以內。『盾鼻隨聞錄』的作者也說，『東王府』建築落成，這位『九千歲』集合男伶女樂數百人，張燈設宴，忽然火起，死者無數，單只偽王娘被燒死的便有四十多人。『金陵癸甲記事略』的作者謝介鶴說，楊秀清『逼取民女不滿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王娘，每夜八女輪宿。』原來楊秀清有一張宣淫的玻璃大床，中空儲水，養有無數的金魚。某夜

，一個不小心，將玻璃撞破，弄得洪水泛濫，金魚滿床跳躍，這位『浸不死的』東王和他的王娘們，也就大吃了一次虛驚！這一幕活劇，無以名之，名之曰『睡覺不忘養魚』，中國共產黨恭維太平軍是『農民革命』，良有以也！

讀者們看了這一段紀載，所謂太平軍對女性的尊重，大致已經可以了然，別的話似乎用不着說了；但關於『解放纏足』一點，在下次談到太平軍『狎戀童』的時候，我還想提一提。

關於「義和團」的史料

最近中共控制下的北京，有不少從事史學研究的人，組織了一個『新史學研究會』。在這個組織中，包括了一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委員中有范文瀾，鄭振鐸，翦伯贊，陳垣，向達各位參加。他們最近的計劃，是把中國近代史分成了十二個題目，就每一個題目，刊行一種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字的資料。他們所擬定的十二個題目如下：（一）鴉片戰爭，（二）太平天國，（三）東捻西捻，（四）回變，（五）洋務運動，（六）中法戰爭，（七）中日戰爭，（八）戊戌變法，（九）義和團，（十）辛亥革命，（十一）北洋軍閥，（十二）五四運動。

因爲今年是辛丑條約的五十週年紀念，所以他們把第九種『義和團』，提前在今年的三月出版了。全書分訂四厚冊，大致不少於一百萬字，售港幣五十元，由上海神州國光社發行。

這部書的內容，是從二百七十八種有關義和團書籍中的四十八種選錄出來的。關於這些材料的選擇和先後次序的排列，似乎都用過一番工夫，除翦伯贊的一篇序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和把列寧的一篇『中國的戰爭』錄在所有資料的前面，一定要把反對『美帝』擁護『俄帝』的真面目擺出來有點近於無聊以外，其餘的五十幾篇，都是研究義和團這一幕很難得也很有趣味的材料。

據他們自己在『例言』裏面說，這部書的資料，十之六七都是借自燕京大學，我們知道燕京大學便是『美帝』所辦的，『美帝』在中國辦的一個大學，居然能夠把類似這樣的重要史料好好保存，為中國自辦的各大學所不及，可見『美帝』對中國學術的研究並不是沒有相當的貢獻，你們站在史學者的立場，應該對『美帝』感謝還來不及，為什麼一定要昧着良心，對『美帝』去橫加攻擊呢？

全書的最後，有翦伯贊一篇『義和團書目解題』，就他們所看見有關這方面的二百七十八種書籍，逐一加了幾句說明，這也可以說是一篇力作，非常有用。我們站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決不反對任何人研究學問，也不反對任何人站在他

自己的一種觀點去研究學問，我們只希望大家多保持一點科學態度，不要顛倒事實去過分的淆亂是非便完了。

讀「庚子西狩叢談」

「庚子西狩叢談」四卷，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吳字漁川，浙江吳興人，曾紀澤之女婿。甲午中日戰爭後，李鴻章張蔭桓先後辦理日本換約事宜，吳以直隸試用知縣調充文案委員，事後經張密保「堪膺方面」，但仍以知縣留原省補用，丁酉補懷來縣，戊戌九月到任。庚子七月，聯軍破北京，慈禧偕光緒帝出奔，吳於是月二十四日於去懷來縣城二十五里之榆林堡迎駕，一切供應，均取辦倉卒，頗稱旨，因得慈禧眷注，並命開缺以知府隨扈，督辦行在糧台。由是而太原，而西安，迄翌年八月自西安啓蹕回鑾，至十一月吳自開封途次奉命赴廣東雷瓊道新任，計歷時一年有餘，凡拳亂之始末，行在之起居，與內外大臣鉅璫貴胄之言語風概，以及小朝廷中人事上之磨擦擠排，吳君無不一一得之耳聞目擊，誠一幕可歎可愕，可歌可泣之絕大悲喜劇也。記者劉君，浙江蘭溪人，光緒壬寅進士，文筆暢達，能曲狀一切

複雜事象，讀之逸趣橫生。全書凡七萬餘言，第一卷，自義和拳發難，迄於兩宮出狩；第二卷，則述吳永本人先在懷來禁遏拳教，與後來所受之種種危險；第三卷，自兩宮駕抵懷來，沿途扈從，至於太原駐蹕；第四卷，則自西安起程回鑾，至黃河南岸登舟北渡爲止。首尾完備，叙次整然，實爲研究庚子拳變一役之第一等史料。

清室之亡，非亡於辛亥，而實亡於庚子，蓋自庚子一役，清廷一切腐敗愚昧之真相始暴露無遺；亦自庚子以後，革命風潮始日趨劇烈而無法遏止。當時有人以爲慈禧經此一度刺激，於創鉅痛深之餘，必將一反前此所爲，但實際則制度已成定型，心理習慣尤牢不可破，除一二敷衍外人或塗飾耳目之事項不得不表示順應潮流以外，在精神上則大抵因仍舊貫，不獨親費用事，閣宦擅權，人以倖進，政以賄成，一切無異於庚子以前，而奢侈泄沓之風，或且變本加厲；又不獨戊戌以來之新人絕對不能引用，甚至內而朝廷，外而各省，其用人標準，求如往日且不可得。迄光緒三十四年，慈禧與光緒帝同時殞落，政權落於一輩少壯親貴之手，更假借集權之名，而有所謂『皇族內閣』之出現。地方較有爲之督撫，亦必以去之而後快。因之武

昌義旗一舉，而全國土崩，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讀吳永此書，回思四十年前之往事，真使人感慨萬千也。

讀「驢背集」

驢背集四卷，胡思敬撰。作者自云：「庚子之變，予隨扈不及，絮室避居昌平，嘗孤身跨一蹇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既又繫以小詩，皆實錄也。」詩凡一百三十餘首，均詠有關拳亂一役之人與事，而每首之後，均附有注釋甚詳，其體裁與王壬秋詠太平天國一役之「獨行謠」相類似，爲研究庚子一幕甚可貴之資料也。

茲錄詠賽金花一首及其注釋於後，與曾孟樸「孽海花」張某「續孽海花」及樊樊山「後彩雲曲」所述固相照合也。詩云：

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庭雙宿野鴛鴦，韋娘半老風情在，十斛明珠負石郎。

（註）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絕一時，兵部侍郎洪鈞奉命使德奧，道出上海，以七千金購爲侍姬，挾以西行，寵之如嫡室，西人亦以夫人禮待之。嘗與柏林公議

，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爲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貲，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瘵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爲賽金花，久之復還京師，諸貴人輳集其門，有藉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好，春初，拳匪未亂時，公使循例入賀，擬假金花西服，僞爲公使夫人，內廷微有所聞，遣許景澄峻拒之，乃止。瓦德西佩八國兵符，僭居儀鑾殿，召金花入宮，與同臥起，如夫婦。金花居柏林久，通曉德意志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姣艷如初遊泰西時。其裝束雜采中西服飾，以新法改之，奇詭出人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遭疾幾死。在胡氏筆底，頗視賽金花如禍水，其實曹本妓女，洪死而重操舊業，無所謂負不負；瓦德西來中國時，年已六十八，所謂『遘疾幾死』，亦無足異也。樊山『後彩雲曲』及張君『續孽海花』則稱賽金花於當時北京人民頗多保全，樊山『後彩雲曲』自序云：『因思庚子之亂，彩雲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鑾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殘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雲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蓋賽金花原名傅彩雲，曹夢蘭亦其初作妓女時之別稱也。

曹亞伯與「武昌革命真史」

曹亞伯，湖北陽新縣人。早歲曾參加湖北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亞伯與焉。旋由日赴英留學，仍於革命工作多所盡力。民元歸國，曾一度入黎元洪幕。民二討袁失敗，孫中山在東京有「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亞伯亦東渡參加。後以所受刺激過多，厭聞時政，乃售去其所自辦之亞林臭藥水廠，於崑山購地數十畝，經營農業以自給。

民十七，亞伯出其多年所珍藏之「日知會」文書筆記，及辛亥武昌起義時之一切有關文獻，輯爲一書，題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數十萬言，交由中華書局出版。時余任中華編輯所新書部主任，總經理陸費伯鴻，以稿交余審查，問是否可以出版。余大體翻閱一過，即告伯鴻，謂以史料視此書，則價值頗高；以著作體裁論，則大可商榷。蓋此書所蒐集之資料，無一而非真實，然僅側重兩湖，於其他方面，則

不免掛一漏萬。如題曰『辛亥革命史料』，則毛病尙小，斷不能名之曰史，更不能曰『真史』。伯鴻早歲曾參加『日知會』，與曹君有舊，誼無可却，卒爲印行。但出版不久，即爲政府所禁，且令將剩餘之數百冊，每本切去一角，絕對不許流行。其實書名可以變更，史料乃斷不容湮滅，願政府必以鹵莽滅裂之姿態出現之，亦適見其輕率而已。假令今有人焉，欲就辛亥一役，成一完整之著作，如不得曹書參考，余真不知其從何着筆也。余當時以職務上之方便，仍得保留未切角者一冊，且曾携以入川，惜居重慶鄉間，一夜被竊去書籍一千餘冊，此書以精裝之故，亦同被竊去，（偷書者係一笨賊，專偷洋裝書，線裝書一本未動）余實不勝怏怏。勝利後回滬，一日，偶至愛文義路某舊書店，則見此書赫然在焉，余乃以法幣三萬元得之，且喜出望外。可見中華民國不可亡，革命史蹟終不容毀，有不解事之政府胡亂禁止，即有好事者之多方搜求，天下事往往如此也。

聞亞伯晚年學佛，頗有所得，在民國二十六年十月，日軍未進佔崑山以前，病歿於其所自營之農舍。

假定魯迅還活着

魯迅已死去十五年了，他的逝世之年是五十六，假定他現在還在，也還不過七十二，比起沈鈞儒黃炎培這班靠攏份子，他並不算是太老。

在中國，一個有名的人物，他在生前往往隨時都有挨罵的可能，可是一經死了，却又最容易走運。最近中共爲了魯迅逝世的十五週年紀念，特別大吹大擂了一番，甚至爲他發行了紀念郵票，魯迅的死運總算很過得去了。

可是魯迅對於中國的舊文學，根柢頗深；他的趣味又是多方面的；他晚年雖然也歡喜談談蘇聯的文藝，但只能作爲他趣味的一方面，我們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一面倒』的傾向；他愛好自由，他反對暴力，他對從前國民黨特務那種濫捕濫殺，尤其深惡痛絕，『一道同風』的觀念，在他是完全沒有的。他死了，中共要把他如何捧，他自然沒辦法；假定他還在的話，他會不會向毛澤東去學習，總還是問題。

吧。

「藝術的價值，是在破壞因襲這一點。」這句話是 本的文學者森鷗外說的。假如這句話含有一部分真理，我想魯迅在中國文壇之所以能獨步一時，即在他死後的十五個年頭，而他所寫的小說和雜文，也還爲一般的青年所樂於閱讀，便可看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魯迅這一部二十冊的全集所代表的精神，假如要用一句概括扼要的話來表示，便是『破壞因襲』。

魚迅對於『破壞因襲』這一點的用力之勤，在中國這半個世紀的時間，所有一切受過近代西洋科學和文藝洗禮的人們中間，大概是更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他上的。

魯迅對於中國舊社會因襲下來的許多病象，真可說是暴露得毫髮畢現，同時也可以說是破壞得體無完膚，再加上他那一種倔強的個性，和他那一枝鋒利無比的健筆，也實在能使他的這一工作做得分外的出色。中共對他生前之所以打了又捧，和對他死後之所以大捧特捧，其原因大概也就是因爲他的這一工作，確實是爲中共鋪

下了一條平坦的道路吧。

魯迅自民國十五年出版了『彷徨』以後，就很少繼續發表像樣子的創作，只是咻咻不已的寫了許多短文，關於這一點，似乎有不少的人表示過惋惜。其實魯迅所賴以不朽的，也許就正在他的這些短文。假定三五十年後，有人願意知道中國在抗戰前十年左右，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當時的教育界和文壇方面的種種怪狀和醜態。我想他們一定可以從魯迅的這些短文中，得到不少的參考。

假定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不會去向中共靠攏，誠不可知，然則我現在也來紀念紀念他，大概總也無所謂不可吧。

郁達夫與徐志摩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

我對於民國九、十年左右搞『創造社』的幾位——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我是比較的喜歡郁達夫。我在上海和達夫見過好幾次；大概就在民國十年，我還在民厚里他住的地方去看過他一回；一直到他和王映霞結合以後，某次在田漢的『魚龍會』上，我還看見他們倆聯袂偕來。其時正是王映霞的盛時，皓齒明眸，愈樸素而愈顯其美。當時我心裏想：以具有達夫這樣一個性分的文人，居然有這樣一段姻緣的成就，足見冥冥中的主宰者還是很公道的，不禁爲他們暗暗祝福。現在回想起來，大概這就是我看見達夫最後的一次了。

達夫本來是東京帝大政治經濟學部畢業的，假定他有機會去參加政治，我想他

也並不會拒絕，而且在抗戰前的福建，抗戰起來以後的武漢，似乎他還是非正式的參加過來的。可是，他所特別愛好的，畢竟是文學。他的英德日文都有根柢，讀過不少歐美的文學書；更難得的是他對於中國文學的修養頗深，乃至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因此郁達夫乃成功了一個郁達夫，既不是郭沫若，也決不是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之類更無論矣。我在前面錄的那首七律，是他在二十二年攜帶王映霞由上海回到杭州去住的時候寫下來的，看樣子似乎確有一些頹唐或消極，甚至不免牢騷，然究竟不失為中國傳統文人的吐屬，他到底不能像他那班朋友的無所不為，這種地方乃正是達夫的可愛處。至於他和王映霞的關係後來何以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他個人在抗戰中何以會跑到新加坡，蘇門答臘，乃至在蘇門答臘開了一家酒店，而終不免在日本投降以後，依然遭了敵人的毒手？這些詳細情形，我完全不大明白，也至今還沒有看見任何人能對達夫遇害的經過提出一篇詳盡可靠的文字。不過就現在已經知道的事實而論，這件事是當時日本在新蘇一帶駐軍的一犬恥辱，已大致是無可疑了。

當『創造社』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們似乎早就內定了一條宗旨，便是對『五四』以後那班『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的人，決定正式開砲。於是胡適之、魯迅、徐志摩等乃首當其衝；尤其以黑旋風成仿吾那一對板斧，更是殺氣騰騰，令人不可向邇。達夫在十一年的『創造』上發表了一篇小說『采石磯』，借着黃仲則和洪稚存的口吻，大大的罵了一頓戴東原，雖說也是在罵胡適之，但究竟還有他個人的性靈表現，即以罵人的藝術論，也比成仿吾高明多了。

我和徐志摩僅僅見過一面，記得是上海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請客，我和他都是被請的客人，究竟在什麼時候，我現在已不能確指了。

我在見着他以前，已看過他不少的作品，我有理由多少可以了解他；至於他，除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朋友以外，他似乎很少機會可以了解我；可是，在那樣一個第一次的見面，不，同時也就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他卻便是那樣的親熱，而且親熱得那樣的自然，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

現在隔志摩之死已經是十六個年頭，在這個十六年當中，我每見一度飛機失事

的紀載，照例要引起我好幾天的難過，而且照例要使我聯想到志摩，像這樣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乃起因於一面，佛家喜歡講因緣，像這樣的『緣』，還是有好還是不有好呢？也真難說了。

志摩有不少的詩是絕美的散文，也有不少散文是絕美的詩，自有新文學以來，真正能做到『美』之一字的，我想來想去，總還是要推志摩第一。志摩不只有一顆詩人的心，更天生就一副詩人的體貌，假定他不死，現在也還不過五十四五歲，他會不會是中國的拜倫，中國的雪萊，誠不可知；但最低限度，他不會是異代的黃仲則，總是可斷言的。

像成仿吾在『創造』那樣的謾罵，在中國那樣一個剛剛有一點生氣的文壇，實在是不必有的，志摩大概是最熱心和他們去打擁的一個，他在民國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記，有下面這樣的一段：

『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敝服（舊學士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

，入門時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間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驕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也須父揩拭，皆不能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卽其日婦。坐定寒暄，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所齊枯窘，而主客似有冰結，移時不渙。沫若時含笑諦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端啓。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云上次有達夫時，其居亦稍整潔，談話亦較融洽。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其實『新月』文人，與『創造』本另是一路，要勉強打攏也是勉強不來的。不過從志摩這篇寫實的短文，也可看出達夫又是一種氣象，假定志摩達夫至今還在，志摩自然不會去喊『毛澤東萬歲』，就叫達夫去喊『親愛的鋼』，大概也是喊不來的。

謝六逸與「日本之文學」

謝六逸教授，我和他在復旦同了三年的事，但僅於上課前後在休息室中彼此點過頭，至於交談的事，大概是一次也不曾有過的。

今年春天，在東京看過好幾次戲，對於歌舞伎的演出，有若干方面我不甚了了，最近乃取謝教授這部『日本之文學』翻了一遍，希望得到一些指點。

這部書是一部相當完整的日本文學史，從日本文學的起源，一直敘述到最近一次中日戰爭的前夕，早國二十九年二月由商務出版，但看著者的自序，知道他是在二十六年七月完成的。

全書共分五編：第一編總論，第二編詩歌，第三編小說，第四編戲劇，第五編散文。共七百三十餘面，都三十萬言。所佔篇幅，以談小說的爲最多，散文次之，詩歌又次之，戲劇最少。

我對於日本文學，完全是門外漢，僅僅把近三十年來十幾位日本留學生介紹過若干種日本現代的小說，戲劇，隨筆之類的東西，涉獵一部分。看完謝教授這部書，乃能畧畧了解日本文學發展的過程，以及它和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的一些關係，確實使我非常愉快。

這部書在敘述上沒有普通歷史書那樣枯燥的毛病，無論是談詩歌，談小說，或談戲劇，談散文，凡是有使我們畧畧知道原作內容必要的時候，他總舉例的翻譯一首兩首，或一段兩段，雖說只是鼎嘗一臠，但究竟能使我們有一種接觸原作的親切之感。

關於日本的『古事記』，謝教授有一萬五千字的介紹，他並且指出『古事記』的精華，全在神代卷（第一卷），因為這是一個有趣的日本民族建國的傳說。衛挺生教授近年出版了三本新著：（一）『日本神武開國參考』，（二）前書的『補編』，（三）『徐福與日本』。我因為看過衛教授這三本書，再讀謝教授介紹的這個傳說，乃更覺得親切有味。

『源氏物語』成於一個名叫紫式部的女作家之手，係日本一部古典文學的傑構。全書分兩部：第一部從桐壺到河竹凡四十四帖，所佔時間約六十年；第二部從橋姬到夢浮橋凡十帖，又稱宇治十帖，所佔時間約十三四年。其內容係以平安朝的貴族爲中心，而反映其時代及其生活；在女性的描寫上發揮了無上的手腕。日本學者對這部古典傑作的研究至今不衰，其看法亦極不一致。據謝教授說：『「源氏物語」創作的本意，並無一定的理想，（係以若干男女關係爲中心），描出許多愛與憎的葛藤。並在流動的時之漩渦裏，敘述不斷地變動的不可思議之人間的運命和社會。這部戀愛小說從橫的看來，那活潑的個性像浮彫似的並列着，這些羣像，一個一個地向我們微笑，叫喚；從縱的看來，有病、老、死、權勢、失意、榮華、陰謀、鬥爭等的許多人世間之姿態。……』』

今年四月，我在日本國立美術館看見一軸以『源氏物語』爲題材的繪卷，係成於一女畫家之手，畫與題字俱佳，匆匆瀏覽一過，所得印象仍甚深也。

在談詩歌的一編，謝教授把日本古代和現代的詩歌原作也介紹得不少，但這些

東西我不大歡喜，我至今還抱着一個成見：認爲詩歌是不能譯，或至少是難譯的。

日本的現代小說，在戰前介紹過來的亦已不少，例如三十年前周作人所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便收得有國木田獨步、夏目漱石、森鷗外、鈴木三重吉、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長與善郎、志賀直哉、千家元麿、江馬修、江口渙、菊池寬、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十五家。收在黃源所譯『現代日本小說譯叢』的，則有橫光利一、須井一、有島生馬、小川未明、林芙美子等各一篇。此外如島崎藤村、谷崎潤一郎等的作品，也有過很好的介紹：例如島崎藤村的長篇『新生』，二十年前即已見有譯本；（忘了爲何人所譯）李漱泉譯了谷崎潤一郎的一本『神與人之間』（包括『神與人之間』、『前科犯』、『麒麟』、『人面瘡』四篇小說，和『御國與五平』一篇獨幕劇。）附得有作者的評傳和年譜，尤爲難得。其他如謝教授譯有『志賀直哉集』（包括小說六篇），沈端先譯有『有島武郎集』（包括小說兩篇），崔萬秋譯有夏目漱石的長篇『三四郎』等等，也都是極有價值的介紹。上面所舉，只是把我手邊所有的這幾本書來作個例，實際則日本現代小說被譯

成中文的，何止十倍於此。

日本現代戲劇被介紹進來的也不算太少，例如田漢便譯過一小冊日本戲劇選，收在這個冊子裏面的有菊池寬的一個獨幕劇『父歸』，便曾在上海上過演，頗博得好評。崔萬秋尤其是武者小路實篤的熱心介紹者，既譯有他的一個三幕劇『孤獨之魂』，同時還出了一本『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包括『父與女』（三幕）『野島先生之夢』（一幕）『畫室主人』（三幕揚飛雲譯）三篇。此外章克標譯有一本『日本戲曲集』，裏面包括山本有三的『同志』（兩幕），中村吉藏的『星亨』（九場），久米正雄的『阿武隈心中』（三幕），久保田萬太郎的『短夜』（一幕），岡本綺堂的『修禪寺物語』（三幕），小山內薰的『第一的世界』（一幕），共五篇。此亦不過畧舉數例，以見一斑。

日本現代散文被介紹進來的似乎不多，我能舉的例只有魯迅所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兩種，和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一種。

凡上面所舉這些小說、戲劇、散文的作家及其作品，在謝教授這部『日本文

學』裏面，都已一一提到，像我這樣一個歡喜涉獵這類東西的人，有這樣一部書來給我作一番系統的說明，確實有些益處。

今年春天，我在東京神田書店街跑了五六趟，知道這班老作家生存者已不太多，近二十年間究竟有多少後起之秀？萬秋曾爲我略略談過，我希望他能有一篇『近二十年的日本文壇』這樣的文字發表，可惜他爲使館的職務所羈，恐怕一時還沒有交卷的餘暇。

武者小路實篤還健在，且有新作出版，頗受歡迎，萬秋笑他是老樹開花。

谷崎潤一郎生於明治十九年（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民國七五（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天，我曾在上海見過他，其時他還只四十，穿着中國花緞的袍子馬褂，一幅很神氣的樣子，現在他已經是接近七十的老人了。這位日本的波多芮爾，他不單只歡喜着中國衣服，在他的書房裏，也有不少中國的小陳設，同時，他對於中國的女人，似乎也有他的一種獨到之見。據他在某種隨筆中，有一段西洋、中國、日本女子的比較觀說：

『總而言之，從男人方面來說，西洋婦人是適於觀賞甚於擁抱的，但東洋婦人則相反。據我所知，皮膚之滑，肌理之細，以中國婦人爲第一；日本人的肌膚要比西洋人精細得多，色彩雖不白皙，但在某種場合上，帶有種淺黃色，却能更增深味，添加含蓄。……』

佐藤春夫也還存在，我不記得那一年也會在上海見過他，好像比谷崎氏畧畧年青一點。他現在除從事『水滸傳』的全譯以外，似乎沒有其他的新作發表。他這部全譯的『水滸』，分訂十二冊，據我今年四月在神田所見，已出到第七冊，幾乎每家書店都有得買，可見是很風行的。每冊定價日金二百五十元，全書出完，則須售港幣五十元左右，可謂甚貴。但裝訂頗精，裏面有若干日本風的插圖尤美，以佐藤對中國文學的修養，其譯筆總也應該是不壞的。

鶴見祐輔出版他那本『思想·山水·人物』，已經差不多是三十年的事了（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今年我在東京，還見他在上野公園門前站在那一部汽車上作參議員競選的演說，看樣子已經是六十左右的人了。他這次已當選爲參議員，屬

重光葵所領導的改進黨。

有一件出我意料之外的事，則經過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一位文壇老將德富蘇峯氏，現在還居然健在，大約年齡已在九十以上了。最近他還出了一本書，書名好像是『我所讀過的書』，篇幅不多，所舉的書，也只寥寥十數種，這也許是他最後的產品吧。當盟軍進駐日本時，此公會以甲級戰犯的嫌疑被捕，何時釋放，則我不大明白。

日本的舊戲中有所謂『能』的一種東西，據說是中國元曲的變化，一說是日本固有的民俗舞蹈，融合了唐樂高麗樂以及其他一切舞蹈雜藝而成。今年我在東京的歌舞伎座，看過一次『隅田川』，大致便是這種東西，一種極端閉靜的表情，配以甜適的三味線，演來楚楚動人。

又有所謂『淨瑠璃』一種，最初以演奏有關『淨瑠璃姬物語』的作品得名，亦配以三味線，有時亦以『人形』（木偶）來表現。發達以後，以演奏歷史故事或男女戀情為主，據說現在已就衰微。

日本最早的隨筆，有所謂『枕草子』這一名稱，解釋這個名稱的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比較合理的，便說草子只是一種冊子綴本，可隨意置於枕畔或枕上，用以雜紀種種事物的小冊子。

我的太太是謝教授的學生，據她說：謝教授已於抗戰中病逝於他的故鄉貴陽。大概他去世的年齡不過五十左右。現在看了他這部介紹日本文學的力作，甚佩他的績學，回想他那白皙、圓圓的面孔和一種十分穩重的姿態，深悔像這樣一個可以結納的朋友，當時竟失之交臂！

關於田漢

田壽昌和我同過一個時候的學，——長沙師範——也同在一個學會裡做過關係相當密切的會員——少年中國學會——同時還共過一時期的事，——中華書局編輯所。因此在抗戰以前的田漢，乃至他的公私生活，我大致是很清楚的。到了抗戰以後，他和我的關係才漸漸疏遠，爲什麼會疏遠起來，其原因我確實不明白，所以只好聽之。

照我一個很客觀的看法，他在『五四』以來一般的新文人中，確實是天分很高，個性很強，工作也很努力的一個；在『五四』以後，抗戰以前，中國的話劇運動能表現一種蓬蓬勃勃的氣象，壽昌的功勞，尤其不可埋沒。

記得我在高小剛剛畢業轉入到長沙師範的時候，同時開始了圖書館的生活，學校功課在我只是次要，圖書館才是我的根本。長沙定王台有一個省立圖書館，雖說

不上怎樣完備，但舊書不少；辛亥前後所出版的新書，總也算是囉有盡有；即英文日文的書籍，也有一部分；而日報更在十種以上。定王台這個地點是相當偏僻而且幽靜的，尤其是閱覽室外的那幾棵芭蕉，遇着風風雨雨的天氣，更足以增加讀書的興會。其時熱心看報的人，每天還有十來個，經常在那裏看書的，則往往不出三五人，而田壽昌和我，却常有機會在那裏見面。可以說，我之所以和壽昌混得很熟，並不是由於學校生活，而是由於圖書館生活。其時壽昌所看的書，大致已偏重文學的方面，而我却還是一個亂翻亂看的時候。像這樣一種生活，我們大致經過了兩年之久，其時的『長沙日報』（主編的是傅熊湘，字君劍，別署鈍根，南社人物。）便偶有我們的文字在上面出現，我寫的是論文，壽昌便發表過一齣改良的湘戲『新三娘教子』。這大概就是壽昌從事他編劇生活的萌芽。

我是民國二年便離開了長沙，壽昌是什麼時候由湖南到日本去的，我却不大清楚。但民國八年壽昌帶着他的未婚妻易漱瑜第二度去東京路過南京的時候來看我，這却是我記得很清楚的，大概他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也就正在這個時候。我

們相處得很親熱，我把南京的幾位朋友也介紹和他見了面，劉伯明（經庶）覺得他讀書很用功，以後還隨時在讚美；老實說，我對他那種甜甜蜜蜜的戀愛生活，實在也是非常的欣羨。

壽昌進的是東京高師，但他所專心的，却在文學。他第二度回到日本以後，爲『少年中國』寫了不少的稿子，也發表過他最早的創作，這個時候爲一個學會寫稿子，無所謂稿費，壽昌重意氣，講興趣，對金錢確是不太計較的。

壽昌和漱瑜在東京一時期的生活似乎很愉快，但不久他們却遭遇了一個絕大的不幸，卽漱瑜的父親，同時也就是壽昌的舅父易梅丞（象），爲了地方的政治關係被犧牲了。易梅丞是湖南的一位名士，詩文都很好，當他半夜被拖出慘遭槍斃的時候，還提筆寫了一首絕命詩：『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點付浮沉，愛鄉愛國都成夢，留得來生一恨吟！』可看出他的修養之一斑。大概我們要了解壽昌，對他的這位舅父之爲人，是有多多少少知道的必要的。易梅丞曾擔任過湖南留日學生的監督，壽昌之能到日本去讀書，好像也得着他舅父的幫助不少。

壽昌在民國十年後回到上海，便到了中華書局編輯所，和我在一個部門工作，除偶然請他看看文學方面的稿子以外，工作也並不繁重，他依然有時間去做他自己所歡喜的工作。他在這一時期譯得有莎翁的『哈孟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王爾德的『莎樂美』，『菊池寬戲曲集』等等。他自己的創作如『咖咖店之一夜』，『獲虎之後』，『古潭裏的聲音』，『蘇州夜話』等多種，好像也都是在這一期寫成的。

其時壽昌的家庭住在上海的民厚北里，和我同一街堂。那個時候上海的生活雖還便宜，但除他夫婦兩個和一個小孩——海男以外，還有他的老母和兩個弟弟同住，一家六口，全靠壽昌一人支持，經常收入只有書局那一點點，其窘迫的情況是可以想像的。湫瑜之病，之死，雖說她父親的不幸事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與壽昌的生活環境，大概也不無關係。

湫瑜死後，壽昌乃先後與黃大琳，林莎菲結婚，現在又與安娥結合，這些經過很複雜，我知道得不太詳細，只好不去說它。最後，我必得要提一提的，便是他在上

海辦『南國社』的一段工作。我不知道壽昌從那裏找了一點錢，居然租了一所很像樣的房子，有一間容得下兩百人的大廳，可以演戲，也可以跳舞。而且常常舉行酒會，真是上海一般文藝工作者的一個樂園。壽昌雖深知道我對這一方面是完全外行，但他依然每次都找我去，實際也把我對文藝的興趣——尤其是對戲劇的興趣提高了不少。

壽昌現在雖和中共搞到一陣了，但我知道他既不長於恭維人，更不願汨沒他的個性，他的精神上會不會感到愉快？能不能繼續寫作？我是很懷疑的。

談「西林獨幕劇集」

三十年來，中國作家所寫的劇本也不算太少，但十之八九，都是暴露中國社會或家庭黑暗的一些悲劇，而且是把結局寫得越悲慘的便越能吸收較多的讀者與觀衆。這個趨勢以曹禺（即萬家寶）代表得最清楚。不僅中國人自寫的劇本爲然，即翻譯進來的少數西洋和日本劇本，其情況也正復如此。這大概是中國這個時代的背景使然，「強笑者不歡」，也真是一件無可如何的事。

香港這個地方實在太沉悶，對於我這樣一個歡喜看看戲的人，更加不利：京戲只有一個張君秋劇團，廣東戲聽不懂，話劇和阿拍拉壓根兒便沒有，無已，便只好去看看電影。近來我也偶然看看笑片和歌舞片，我覺得美國人就在拍片子的時候，也似乎在假戲真做，確有一些快樂的實感，因而把我們這些在低氣壓下生活着的觀衆，也勾起了一點暫時的愉快，大概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這也許是一種不可少的娛

樂吧。

在中國若干較有地位的劇作者，能獨闢蹊徑多寫喜劇的，以我所知道，大概要以丁西林首屈一指。在十多年前，我便看過他寫的『一隻馬蜂』，『親愛的丈夫』，和『酒後』三個獨幕劇，印象很不壞，可惜從來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在舞台上的演出。最近偶然在香港一家書店買了一本『西林獨幕劇集』，一共收了他的七個劇本，即於前舉的三個以外，再加上了『北京的空氣』，『瞎了一隻眼』，『壓迫』，和『三塊錢國幣』。這七個獨幕劇一色都是喜劇，在筆調上，結構上，韻味上，也表現了作者前後一致的作風。讀起來清脆爽口，讀完了也回味無窮，以丁先生那樣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對文學乃有這樣的興會，不能不令我聯想到歌德和森鷗外這類的人物。

以我一個外行的淺見，喜劇的難寫，決不下於悲劇。悲劇可以用『重筆』，有時在故事的演進上愈複雜，其所包含悲劇的成分乃愈深刻。喜劇却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既要交代明白，又不許囁嚅；少不了諷刺，但刺得太痛

，便減損了喜劇的價值；離不開幽默，但稍一過火，又失去了喜劇的意義。我以這樣一種見地，去讀了先生這幾個劇本，覺得都很滿意，懷疑的便是丁先生留在今天中國的大陸，還能不能寫出比這個更好的東西？

談「雷雨」

中國自有所謂『新文學』發生以來，以寫戲劇著稱，擁有多數的讀者與觀眾，而又確能博得廣泛的好評的，以我所知，大概要以曹禺為首屈一指。其餘在戲劇方面的作者如田漢，洪深，歐陽予倩，郭沫若，丁西林等等，雖然也偶有可稱道的地方，可是比之曹禺，畢竟不成家數。

『曹禺戲曲集』已經印行的共有八種：（一）雷雨，（二）日出，（三）原野，（四）北京人，（五）家，（六）蛻變，（七）橋，（八）曹禺獨幕劇集。除第七種『橋』和他的獨幕劇以外，前面的六種，我都曾看過公演，尤以『雷雨』看過演出的次數最多，現在我就來談談『雷雨』吧。

『雷雨』這個劇本的寫成，已經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現在我手邊有的這一本，係第二十七版，我想發行的數字，總不會少於十萬冊。以中國一般的教育水準之

不高，而能欣賞新文藝的人又如此的不普遍，居然能到達這樣一個數字，總算是不容易的。

我第一次看『雷雨』的公演，是由上海的『復旦劇團』演出的，我記得扮劇中『四鳳』那一角的，是復旦的女生封季壬，即後來在文藝界頗有小名氣的鳳子。這次演出的角色，配搭得很整齊，自始至終，都能把觀衆的注意力緊緊吸住，確實難得，固然劇情的發展是一幕比一幕緊張，但假如不是演員們排演得很純熟，也不一定能夠給予觀衆一個很完整的印象，而且可能是劇本一個很大的損害。這一回的公演，我看了兩次，第一次是我個人去看的，第二次是約着黃仲蘇劉大杰幾個朋友一陣去看的，我承認這個劇本在舞台上是十分成功，其所給予我一個較深刻的印象，是使我感到道德問題的嚴肅。

這次以後，凡其他劇團在上海公演這個劇本的時候，我總是去看的，記得有一次唐槐秋演『周樸園』一角相當成功，但他的女兒唐若青演『魯侍萍』卻是失敗的。這個劇本中一個最難演的角色，便是『周樸園』的妻子『蘩漪』，我記得在我看

過的七八次公演中，只有一次某劇團一位姓趙的，才把這個角色的個性表演得近乎理想，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

有一次，中央政校預備公演這個劇本，我知道有兩個學生去參加這次公演的是頗有文學興趣的，聽了很高興。但不幸經過預演以後，却被陳果夫所禁止了。我問起什麼理由，據說這個劇本的內容，只是一種亂倫和男女苟合的故事，實在太不道德！我笑笑，心裏想：『難道世間一切不道德的事，只許大家偷偷摸摸去做，一搬到舞台上來公開，便會十分壞事嗎？』

『雷雨』這個故事的結構，實在是太巧了，不一定是巧得不近人情，但多少有點巧得難於令人置信。本來，一個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例如少年時代的周樸園）看上了家裏女用人的一個女兒（如梅侍萍），不止和她發生了性的關係，而且和她生了兩個兒子（周萍，魯大海），這是很尋常的；周家要為周樸園正式娶一位門第人家的小姐（繁漪），因而在年三十夜，把梅侍萍趕出大門，可是她抱着一個生出才有幾天的孩子去跳水，不僅沒有死，居然又嫁了一個人（魯貴）；既把帶去的

這個小『拖油瓶』撫養大了，而且和魯貴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四鳳），這也沒有什麼稀奇。我所以說它『太巧』，便是經過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因為周家從無錫搬到了北方，乃為魯貴造成一個到周家充當一名聽差的機會，同時魯貴又把他的女兒四鳳引進周家做了一名用人，還介紹梅侍萍帶來的這個兒子魯大海在周家的礦山找了一個位置，於是乎梅侍萍也就很自然的有機會再到周家。

這個時候周家的主人一共是四個，即周樸園和蘩漪兩夫婦，梅侍萍留下的大兒子周萍，蘩漪親生的一個小兒子周冲。

蘩漪以後母的資格和大少爺周萍發生了苟且的行爲，可是等到四鳳進入周家以後，同時為周家的兩位少爺所鍾愛。周萍四鳳這兩個同母兄妹既正式有了肉體關係，蘩漪的愛乃為四鳳所奪！

綜括起來，可以說這個劇本是在交織的五個三角關係中發展的：蘩漪與周萍四鳳之間，最是主要的一個；四鳳與周家兄弟之間，是次要而極自然的另一個；周氏父子與蘩漪之間，算是很不自然的第三個；還有兩個為一般人所忽視的，乃儼然存

在於周樸園、繁漪、梅侍萍與周樸園、梅侍萍、魯貴之間！

普通的小說或戲劇有一重或兩重的三角關係已經够緊張，這個劇本乃運用了這五重的關係，而且運用得十分緊湊，其把一般觀衆的情緒簡直壓迫得喘不過氣來，這是無怪其然的。

在中國小說中，善於明明暗暗直接間接製造多重三角關係的，莫如『紅樓夢』，沒有想到曹雪芹後三百年，乃又有了這位曹禺先生。

文學是離不開傳統的。無論你所表現的是怎樣一種意識形態，假如你在風格上，故事的結構上，文字運用的技巧上，過分與傳統相遠，這在一個文學遺產相當豐富的國度裏，是不容易生得起根來的。

二三十年來，把原封不動的西洋劇本搬上中國舞台的事實，已不算是太少了，但除掉『茶花女遺事』，『羅蜜歐與朱麗葉』，『少奶奶的扇子』，『復活』等幾種而外，能在中国觀衆中留下較深印象的，似乎便不很多。甚至，同是王爾德的劇本，經過稍稍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便相當成功，反之，未經改編的『莎樂美』

便只好失敗，更無論『哈孟雷特』或『浮士德』那一類的東西了。其原因何在？不值得我們去體味嗎？

曹禺的幾種劇本，在意境上所受外來的影響如何，我不敢判斷；但他能夠『去跡存神』，巧於接受中國的傳統，這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吧？

例如他在『原野』上寫『焦母』和『焦花氏』間的婆媳衝突，這是在中國文學上最有傳統的色彩，同時也就是為觀眾所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又如寫『焦母』帶着『白傻子』去捉『仇虎』與『焦花氏』的姦，我們就再說得恭維一點，也只能說它和『武大』帶着『鄆哥』打到『西門慶』與『潘金蓮』幽會所在的情景，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這個劇本的第三幕，表現得那樣神秘，沉悶和單調，很難得着舞台上的成功，那是必然的。

再如他在『北京人』裏面會寫『曾文清』和『愫方』；在『家』裏面寫『高覺新』，『錢梅芬』，『瑞珏』；我們總覺得對這類人物的面孔和性格都很熟悉，不難在中國那些老作品中找到類似的例子。至於在『北京人』裏面寫『陳奶媽』和『

小柱兒』，何其類似『劉老老』和『板兒』；在『家』裏面寫『馮樂山』之於『鳴鳳』，又何其類似『賈赦』之於『鴛鴦』！不過他的好處在『去跡存神』，曹禺先生畢竟不是一個尋常的抄書匠就是了。

『雷雨』在人物個性的描寫上，故事的結構上，總算是最富有創造性的了，然而寫得最成功的，也僅僅只有一個『繁漪』，我們除掉從『尤三姐』和『晴雯』這類女人身上微微嗅得出一點『繁漪』的氣息而外，我實在不能在中國的文學遺產中，發現這一個類似的人物。不過在『雷雨』的第三幕，寫周冲周萍弟兄在一個雷電風雨交作的深夜，先後跑到『四鳳』的家裏，還是令我聯想到賈寶王一個人跑到襲人和晴雯家裏去探望她們的那種景象。但他寫到周萍跳進四鳳家的窗子，兩個人的表情和談話正在萬分緊張之際，忽然窗子被風吹開，在電光閃閃大雨滂沱中，乃突然發見『繁漪』也追蹤而至站在窗子外面，而且順手把窗門向外面反扣起來，這才是曹禺最大胆也是最有力量的所在，甚至我們可以說在這種地方曹禺已經超過了曹雪芹，也不算是過譽吧！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一集)

這是今年由大陸出版的一本好書，梅蘭芳自述，許姬傳筆記。以體裁論，算是梅的自傳，但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却不啻是清末以來一部『中國戲劇發達史』，至少至少，也是敘述有關京劇崑劇一部極有趣味的故事書。

從去年開始印行的『毛澤東選集』，和最近出版宋慶齡的『爲新中國奮鬥』，我爲了加強我自己反共的信心，自然也得買來偶然的翻翻，可是總是看不到一兩段，便已昏昏欲睡；但梅的這本自傳，（現在還只出版第一集）我却在兩天的工作之餘，把它一氣看完了。在我眼中，一個大獨裁者毛澤東，加上一位革職了的『國母』宋慶齡，其價值的總和，乃趕不上中國四大名旦之一的一個梅蘭芳，中國政治之糟糕，中國政治人物之無聊，也就概可想見了。

梅蘭芳是甲午中日戰爭這一年出生的，他今年也算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從他十

一歲第一次登台起，一直到現在，他還隨時在平津一帶演出；他曾到過美國，到過日本，到過蘇聯，能戲之多，享名之大且久，表演的時期之長，恐怕在近代的戲劇史上，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並論了。

他這本書的敘述，是從他的祖父梅巧玲開始的，關於他的家世，乃至他的父親梅竹芬和他的伯父梅雨田，（一位胡琴名手，笛子吹得也好，還能打鼓。）都有詳盡的記載，而他本人，現在正和他的兒子梅葆玖隨時在配戲。梅氏不只是伶官世家，而且四代都是演旦角，這真可和譚鑫培的一家四代都演老生的比美了。

這本書如果給一個內行看，我想可供他們參考的地方一定很多；即在我這樣一個稍稍留意中國現代史的人，也覺得有多方面的趣味。這本書的內容，自然以敘述梅本人演劇藝術的淵源和他在這幾十年演出歷史上所得到觀衆的反應爲主；可是除掉與戲劇有關的一切敘述以外，即清末民初北京上海兩地一般社會情況，以及人民一般的經濟力量，也有極可靠而極有趣味的紀載，其足以引起我們注意當時社會實況的材料，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當孫菊仙，汪桂芬，譚鑫培，劉鴻昇這班鬚生盛極一時的時候，社會的風氣何以會由重生角一變而爲重旦角？這本書上的解答，認爲是由婦女在逐漸解放中，婦女觀衆逐漸加多的一個結果，這一點確實是我從前不曾想到的。

民國初年梅蘭芳和王鳳卿初到上海演戲，當時戲票最高的價格不過一元二角，後來逐漸加到三四元至五六元不等，其時的幣值並沒有多的變化。可是物價及一般社會對於享受的追求，却大大的起了變化了。

我是民國三年春以一個土頭土腦的湖南青年跑到上海去讀書的，除學費以外，我的大哥每月只能供給我十元錢作伙食和零用。其時上海的生活確實很便宜，學生在學校附近吃包飯，每月只要四五元，因此我居然還有餘錢偶然的去看看戲。其時上海有名的旦角是馮子和（春航）賈碧雲，毛韻珂之類，老生則有小楊月樓（此君後來改唱旦角）劉漢臣（即八歲紅），雙處，小達子之流。花旦粉菊花（高秋顰）的戲我看得頗多，小生以朱素雲，花臉以劉壽峯郎德山等爲最有名，而專演紅生的，則以三麻子（王鴻壽？）首屈一指。其時上海星期日的白天是演戲的，而且票價

低於夜戲，（我記得前排的官廳是五角錢）這對於我這樣一個窮學生，也頗覺方便。

我曾在當時的戲場中看見過吳昌碩，聽說況夔笙，朱古微，趙竹君，狄平子（楚青）等也歡喜看戲，可惜我不認得他們。（後來我認識了狄平子，但這是我辦醒獅週報時候的事。）

梅蘭芳和王鳳卿第一次在上海的丹桂第一台演戲，是民國二年的冬天（其時梅二十歲），我沒有機會見到。大概我看梅劇，已經是他三十以後的事了。然而我見過的也不過是他的『四郎探母』，『霸王別姬』，『貴妃醉酒』，『武家坡』等等，至於他最得意的如『宇宙鋒』，『金山寺』，『穆柯寨』以及『遊園驚夢』，『刺虎』這類的崑劇，我都不曾看過，現在想來也還是覺得頗可惜的。

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演戲，包銀不過一千八百元，這與後來動以萬元計算的是迥然不同了。可是據他自己所述，他這次在上海所得意外的收穫還是很多。其時不僅已有夏氏兄弟（即經營九畝地新舞台的夏月潤和夏月珊）一類的文明戲。而歐陽

予倩所發起專演話劇的『春柳社』，也正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偶有演出。梅對這類的鮮玩藝頗能欣賞，同時上海的舞台，燈光，佈景，以及化裝等方面，確實也給了他一種新的刺激。

民國初年，上海有所謂『髦兒戲』，演員一律都是女孩子，我也看過，但自來便不懂『髦兒』這兩個字的意義，自從看了這本書，才得了一個正確的解釋。

替梅蘭芳這本自述作紀錄的這位許姬傳先生，我很佩服，他不只懂得找尋史料的方法，文筆生動，優美，細緻，而且所用的是道地的北京口語。我相信，不用這種純粹的北京語體文來記載這班京劇演員的生活，是無法傳神於阿堵的。

同時我也很奇怪，像梅蘭芳這樣一本書，中共何以會讓他出版？我們從梅的這本書裏，除掉偶然也看見採用幾個共黨常用的字眼以外，實在嗅不出半點共產黨的臭味，而梅氏敘述他的家庭生活，確實充滿了一種溫情，可以說和中共的作風是不倫不類，難道因為毛澤東特別歡喜聽戲，或因為梅的羣衆太多，便破例加以容許嗎？然而我還是爲梅老板十分担心，等着瞧吧！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二集)

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我是兩年前看過的，當時我會寫過一篇筆記，編入我的『萬竹樓隨筆』第一冊。現在這本第二集，又已於去年十二月出版，一直到前兩天我才抽暇翻了一遍。

二集的篇幅比第一集稍多，其重要性也很難軒輊，替他筆錄的這位許姬傳先生，依然是這樣勤勤懇懇，把一部份有關中國近代戲劇的重要史料，像這樣一絲不苟的紀錄下來，這一工作確實值得我們加以讚許。

我知道有不少的反共朋友，他們好像抱得有一種鴛鴦式的阿Q精神：不問是怎樣性質的一本書，只要是在大陸出版的，他們便不願看。我覺得這個態度應有相當的修正。

在過去的五年，大陸印行的新書確也不少，除一部份中共的黨八股和若干顛倒

事實的宣傳品我們不必去多予理會以外，爲了從側面去了解這幾年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和若干留在大陸的學者文人那種侘傺無聊的心情，我們反而應從大陸的出版物中去用心的加以體會。

梅這本書共分七章，其主要的內容如下：

一、敘述梅本人對時裝新戲和新編古裝戲的一種嘗試。

二、敘述崑曲衰落的情形，也提到了穆藕初所創辦的那個『崑曲傳習所』的始末經過。

三、說明『京戲的產生，是混合了徽，漢兩種地方戲，再吸取一部份崑曲的情華，』而後成功的。

四、介紹了若干老伶工如程長庚、余三勝、譚鑫培、孫菊仙、楊小樓、蕭長華、余叔岩、姜妙香、王鳳卿，……以及漢劇方面的余洪元諸人的演劇藝術及其私人生活。

五、尤其敘述到梅本人對演劇藝術的不斷改進和多方面的觀摩，更使人感到一

個在任何方面成功者之真不容易。

單看了這一些，已經是很够味了，而梅又把他幾齣常演的新舊劇如『女起解』『貴妃醉酒』『思凡』『黛玉葬花』『嫦娥奔月』『春香鬧學』『佳期拷紅』『抗金兵』等等，就演出的技術，作了極詳盡的說明和介紹，這不僅於他們的同行有益，乃至對於我們這些看戲的人，也增加了新知不少。

我在介紹第一集的時候，曾說它充滿了温情，現在這個第二集也還是如此：梅提到某次在北京東安市場他和他的前輩譚鑫培分別在兩個舞台演出，梅因於舊戲外加演新戲，曾使得譚老板的賣座爲之減色，他至今還深悔他當時的孟浪。他又說到譚老板民國六年之死，實因當時北洋軍閥爲了歡迎陸榮廷曾強迫他在病中演了一齣『洪羊洞』，以致弄得他掙扎回家後便一病不起。梅在述完這個故事以後，曾憤慨的說：『一個七十一歲的老藝人（指譚），在病中還要壓迫他表演，……這哪兒是愛好藝術，尊重藝術，分明是摧殘藝術！不怪當時外邊有「歡迎陸榮廷，氣死譚鑫培」的傳說。從這兩句話裏，就足够表示一般的輿論，因爲同情這位老藝人的遭

遇，不自覺的對惡勢力提出了抗議。」

梅蘭芳現在也是六十以上的老人了，儘管中共對他表面很客氣，可是從他的這本書，可看出他工作的忙迫，確實也早已超過了他的可能。他敘述譚老板的這一故事，恐怕也正是不自覺的爲他自己再度向惡勢力提出的抗議吧！

不過，以我所知，大陸近年出版的新書，無疑的梅這一部是必傳之作，而『毛澤東選集』不與焉，僅此一點，梅蘭芳也足以自豪了啊！

梁祝影片及其他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大陸出產的一部影片，大致是把舞台上的越劇搬上銀幕的。

最近這部片子在香港九龍的四家戲院連續放映，賣座之盛，超過了已往中外任何一部片子的紀錄，這是事實。

我聽說，有不少的人爲這一事實展開了一種研究。

有人說，這是緣於一種好奇心，因爲最近兩三年，共產黨不斷的大吹大擂宣傳他們在各方面都有如何如何的進步，但很難得到事實上的證明，現在據說有一部共產黨搞出來的影片，居然還不錯，因此大家『一窠蜂』的跑去瞧一瞧，瞧過之後，大家便也覺得沒有什麼。

另有人說，凡中國的一切舊戲，雖因地方色彩各有其不同，但大體上的相似之

之處究竟不少。尤其越劇和粵劇，似乎在唱做方面，更多可以相通之點。大家既以看越劇的心理去看這部影片，即算成功，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越劇的成功，決不是這部影片具有什麼了不得。

也還有人說，這部片子的演出，既一切依照越劇的規模，因此在導演方面，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高明之處，其所以能夠吸收較多的觀眾，大致是因為在取景，採光，錄音，設色，剪裁，以及音樂，道具，字幕等等方面，確實是達到了相當水準。同時這個片子的故事，原已在中國流傳了一千六百年（從東晉穆帝永和年代算起），本來是家喻戶曉，雅俗咸宜，早已成了一種不必用腦筋的消遣品，這大致也是適合一般觀眾的條件之一。

上面的幾說，我承認各有一部分的理由，可是並沒有說出這部片子所以叫座的基本原因安在。據我看，這部片子其所以為大家所不討厭，其最主要的理由，乃是由於共產黨根本的拋開了他們的共產主義！乃是由於他們的黨八股，對中國固有的歷史文化高高地樹起了一面降旗！這部片子的內容，只多少意識到四十年前大家所

爭吵的『男女不平等』，『婚姻不自由』，同時也還隱隱約約提倡一點『男女之防』，和『殉情自殺。』這類東西，原來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家常便飯，共產黨居然已退却到了這一步，實在是大大可驚異的！

最近港九的共產黨書店，已為翻印的舊書所充塞：什麼史料的編纂，什麼古典文學的研究，乃至舊有的小說，戲劇，甚至中國的醫書，這一切幾乎無一不在大量出籠之列；而且這類東西的銷路，又確實遠在他們的黨八股之上，這個趨勢是值得和梁祝影片這一事實加以同等注意的。

聽說梅蘭芳預備把他所常演的六齣戲，『梁紅玉』、『宇宙鋒』、『霸王別姬』、『貴妃醉酒』，『金山寺斷橋』、和『洛神』，逐一製成彩色的影片，我相信果成事實，也還是有人要瞧一瞧的，可是這一樣不是說明共產黨的成功，而只是說明共產黨對中國舊有東西的屈服！

哥德論革命

愛克爾曼（F. P. Eckermann）所著的『哥德對話錄』（原名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二年之間與哥德的談話），是詳細紀錄哥德晚年言行的一部書，周學普氏所譯的雖只是一種節本，然已在十五萬言以上。我匆匆的翻閱一過，不僅感到異常的愉快，且無形中引起我一種尊師重道之感。就我所知道，中國一個學生紀錄他先生的生平或一片段的言行，似乎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寫法。假定中國少數的聖哲和若干的老師宿儒，能够由親炙他們的弟子，把他們中某一位的嘉言懿行及其日常生活與治學過程，像這樣精詳的紀錄下來，其所給予後人的影響，更將如何的深刻呢？

哥德有幾段批評法國革命的話，我在今天讀起來，尤其感到驚心動魄，他說：

『我不能是法國革命的友人，這是真的；因為革命慘酷在我是印象太深，時刻使我憤激，……當時我對於有人要把在法國是重大的必然性結果的事情，人

工的在德國弄起來，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哥德又說：

「只有不模仿其他民族，而從其自己的精髓和一般的需要出來的東西，是於國民有益的。因為對於立在某種時代階段的國民，可作滋養物的東西，對別的國民，或許是毒物！所以大凡要把改革的要求，不是根據於本國國民的心髓的某種外國的改革輸入進來的一切企圖，都是愚蠢的；這一種革命的企圖是都沒有效果的。……」（以上是哥德在一八二四年一月四日所談）

中國人正式着手謀國家的改革，已有了六十年以上的歷史，其所以把國家弄成如今天的這種景象，大抵由於若干從事改革運動的人物，既不能深澈明瞭中西文化所以異同之故，而又毫無意識的要把某一外國的改革方式或制度強迫的移植到中國來，始而是學日本，學英法，學美國，既而又學德意，學蘇聯，一輩子在學習中，所以一輩子也是那樣一副毫無把握的癡愚面孔！當其學得不像的時候，為害尚小；一旦學得有幾分像真的時候，為害乃更大！中國總也算是在一定空間度過幾千年文化生活的一個民族，難道就準備長此模仿他人以終古嗎？當代有兩個既能進取而又

能保守的國家，其一是英國，其一是日本，英國有她一種不流血革命的光榮：日本是既能勝利亦復經得起失敗；這不值得我們加以深長的考慮嗎？

哥德還有一段從正面去反對暴力革命的話，說得更為澈底，他說：

『……人家都說我總不是人民的朋友，我當然不是那些以掠奪，殺人，放火爲事，而在公衆利益的招牌後面亟亟於營私舞弊的革命暴徒的朋友。我既然不是這些人的朋友，同樣也不是路「下五」的朋友。我憎惡暴力革命，因爲如若實行暴力革命，好的事物被得到和被毀壞同樣的多。我憎惡實行暴力革命的人，也憎惡給以原因的人。……』

『……任何強迫的，突飛的行動，都是我所嫌惡的，因爲這是不自然的緣故。』

『我是植物的愛好者，我愛玫瑰……但我並不那樣傻，會要求我的園子在現在的四月裏就須給我以玫瑰。我現在看到最初的綠葉，心裏滿足；我看見葉子一片片地，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漸次形成莖子，心裏滿足；我在五月裏看見

蓓蕾，覺得快活；又在六月裏玫瑰本身極華麗而芬芳地的向我開放，我覺得欣幸。但凡是不耐煩等待季節的人，他須要到溫室裏去。』

革命是一個不祥的名辭，一個國家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宜輕言革命。但不幸中國在最近的五十年，革命乃成了無上的美名，好像凡革命都是對的，凡不革命或反革命都是該死的，自革命職業化而天下皆亂人，自革命功利化而天下皆強盜，於是乎革來革去，乃把一個國家革成了如今天的景象！哥德還只說『實行暴力革命，好的事物被得到和被毀壞同樣的多，』在這個六十年中，我真不知道所得到『好的事物』是什麼？而一切被『毀壞』掉的，乃真不是我們所能計算得了的啊！

最近一年，中共在大陸殺人，以千萬計，其所加人主要的惡名之一，便是『反革命』，既有這樣多的人要反對他們的革命，則他們的所謂革命，其不為人民所需要可知。

從前國民黨在大陸秉政已達二十年，我每每聽到一般要人們，在講台上發表言論，還是滿口的『革命』，『革命』，當時我總覺得奇怪：究竟叫誰革命？革誰的

命？

今天要消滅共產黨，這只是一種警察剿匪的行爲，無所謂革命，我相信，要有十年二十年，我們不再聽到這個不祥的名辭，中國或者庶幾乎有希望了。

關於「威廉退爾」劇本

去今二十六年前，即民國十四年，馬君武先生，即譯有德國十九世紀文豪席勒（Schiller）所著『威廉退爾』（William Tell）一劇本在中華書局出版。其時余正在中華編輯所任事，凡此類書籍出版，均由余經手，余當時曾一讀馬先生之譯稿，殆無疑義。顧其時余對此所留之印象並不甚深，僅恍惚記得有此事而已。

近讀愛克爾曼所著『哥德對話錄』一書。（周學普譯，商務出版，）始知哥德與席勒間友情之深厚，而『威廉退爾』一劇之寫成，乃與哥德有密切之關係。據一八二七年五月六日哥德對愛克爾曼所述，渠於再度遊覽瑞士時，爲其地湖光山色之自然美所感動，擬以此舉世無與倫比之風景區爲背景，就有關退爾之傳說，構成一篇長篇敘事詩。已着手矣，顧以牽於他事，卒未成篇，因將全部題材讓於席勒，是即席勒寫成『威廉退爾』一劇最主要之助力也。余因有感於此一事實，因取馬譯本重

讀之。馬先生譯是書時，正僦居瑞士之茵夢湖邊，目睹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處瞻仰威廉退爾之遺像，更陶醉於其環境之美，其所感觸者，殆類似哥德之當年，故其譯本中亦時有神來之筆。

是劇啓幕時，首由漁兒牧童獵人更迭歌唱，馬譯此種歌辭，仍以韻語出之，其摩繪景色，讀之令人神往。茲錄如下，使不得讀此一劇本者，猶可鼎嘗一嚮也。

「湖波含笑招人浴，兒童酣睡草茵綠，忽聞短笛一聲鳴，有如樂園天使聲。空氣芳馥兒童醒，湖水澄甘聊可飲，有人呼汝聲低微，兒今既醒其來歸。」

（漁兒所唱）

「暫與芳草別，長夏已將歸，來往山谷間，風景當復非。一朝布穀鳴，歌聲會更起，滿地布新花，山前看流水。暫與芳草別，長夏已將歸，來往山谷間，風景當復非。」（牧人所唱）

「雷聲忽起山谷怒，獵人徬徨失歸路，山頭白雪亦崩摧，稻草不綠春色微。城郭人民不可識，脚下但見白雲飛，聊自雲隙望世界，綠原遠在湖水外。」

(獵人所唱)

馬先生自述其譯是書時，『不知墜過幾多次眼淚，』其實當時奧皇所派駐瑞士之總督格思勒 (Gessler)，不過命獵人退爾於八十步外遙射其子瓦得頭上所置之蘋果，暴虐誠暴虐矣，然以較今日史太林所派駐中國之總督毛澤東，必命他人之子女於稠人中手刃其父母，其殘酷無人理又何如耶！

關於「茶花女」劇本

大概在民國四五年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便看見毛韻珂在天蟾舞台演『茶花女』。其時中國的話劇還沒有脫離『文明戲』的時候，毛等所演出者，大致係就林琴南譯『茶花女遺事』小說所改編，其時他們或者還不知道小仲馬原有一個『茶花女』的劇本哩。

真正把小仲馬『茶花女』劇本搬上中國舞台，這是民國二十四年的事。最初把這個劇本譯成中文的是劉半儂（復），因為有不少的錯誤，所以後來『中國旅行劇團』上演的時候，却用的是陳綿的譯本。

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遺事』，出版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隔原著的出版，也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原著出版於1848）。林琴南譯這部小說，不僅開了中國翻譯西洋小說的風氣，後來林先生以二十年的時間，譯出外國的小說一百七十餘部，也

算是由最初這部『茶花女遺事』打出來的天下。儘管有人批評林譯小說與原文不盡照合，但『茶花女遺事』在中國文學界生了不小的影響，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茶花女』劇本出版於一八五二年，算是小仲馬二十幾個劇本中最成功的一個，陳綿先生的譯本儘管出版於八十多年以後，可是一經上演，却依然是風動一時。就我當時在上海看旅行劇團的演出，飾茶花女的是唐若青，飾阿芒的是陶金，後來在電影話劇界有名的人物如白楊，趙慧深，唐槐秋之流，好像都是參加的。我連續的看了兩次，不敢說他們在演出的技術上是怎樣成功，但觀眾却是滿座；在三五兩幕中，感動得流淚的，確也不少。

像茶花女這樣一個故事，何以能使得中國看小說和戲劇的人都非常感動呢？這是不難了解的：大凡一種外來文學，能與其本國固有的文學遺產多少發生關聯，即理解與感應都比較的能够深入，反之，便不能無所隔膜。在中國流傳最廣的故事和戲劇，如『玉堂春』，『花魁女』，『杜十娘』……之類，其性格與處境，乃至所以構成戲劇的種種因素，都與茶花女不無相似之點，茶花女所以能在中國人的情

感上一拍即合，夫豈偶然？中國人應該一面要好好吸收新知，一面也要好好的寶愛着自己固有的遺產，不論在任何方面，我們的態度總是與共產黨相反，即文學也不是例外。

茶花女小說與茶花女戲劇，在內容上是有多不同的。在小說上，阿芒不及見茶花女之死，所以一開始，便用倒裝法寫阿芒為茶花女改葬，但戲劇則茶花女却是在阿芒的懷中死去的。在戲劇上又穿插上居司打夫和尼曬脫兩個成功的幸運兒，給阿芒與馬格里特作一對照，這也是小說所無，正與『花月痕』以韓荷生杜采秋與韋癡珠劉秋痕作一對比是同樣手法。要把一個悲劇的氣氛特別加重，文人們在構思上往往是相通的。

談『溫莎公爵自傳』

我平日喜歡看看『年譜』『傳記』這類的東西，尤其看到一個特殊人物的『自傳』，往往更能給我一種深刻的印象。

中國『正史』中的列傳，自然是很重要的部分，可是除掉極少的若干篇寫得特別好以外，有許多却是只有研究到某一問題有特別需要的時候，才不得已去翻一翻，說到如何的興趣，當然是談不上。

讀外國史像教科書一類的東西，往往失之太畧；專門名家的著作，又往往失之太詳；至於讀後有無心得，這又要看各人的本領，不可一概而論。

近年日本人和中國人寫的傳記，都是受了西洋傳記作家的影響，比起中國從前那種列傳式的東西，却是親切有味得多了。

這一部『溫莎公爵自傳』，最初的節本，是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過的。

現在南洋商報館印行的這種譯本，倒是很完整的，而王仲廣先生的譯筆，確實也異常的流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也是一個令人值得回憶的日子：英國的一位新君，愛德華八世（即溫莎公爵），即位不到一年，因為要和一個離了婚的平民女子結婚，被一位保守黨的首相鮑爾溫，憑藉憲法的壓力，輿論的非難，宗教的督責，以及各自治領的不同意，在萬般掙扎之後，卒不能不出於宣告退位的一途。當十二日這一天早晨二時，他乘着一條驅逐艦，以一種黯然銷魂的心情，離去他祖國的時候，也就正是在這一天，遠東的中華民國一位最高統帥，被兩個狂妄無知的將領所威脅，乃引起了一場為舉世所注目的『西安事變！』我不是故意把這兩件偶合的事拿在一塊來相提並論，實際在我們一個研究歷史的人看來，這兩件事都代表着濃厚的時代色彩，正象徵着世界將臨到一個大起變化的前夕哩！一葉落而知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狂風巨浪的到來，才能使我們警覺到時代性的嚴重呢？

愛德華八世生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到他一九三六年一月登極，他已經是四十一

歲了。他猶及見他的曾祖母維多利亞女皇，其次是他的祖父愛德華七世，又其次便是他的父親喬治五世，在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世界不知有過了多少的變化，英國也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滄桑哩！

英國的宮廷究竟是怎樣一種景象？一個王子的長成與教養究竟經過怎樣的一種過程？皇室與本國貴族間的關係如何？與歐洲若干君主國家廷宮間的關係如何？與各自治領間的關係又如何？我算是從溫莎公爵這本自傳，才得了一個更強烈更清晰的印象。

溫莎公爵是一個活潑好動而興趣多方的人，看他離開學校以後到登極以前的一段生活，便可以知道他的性格與英國那種偏重保守的習慣決難融洽。

他畢業海軍學校，曾參加第一次的大戰，遊歷過好幾十個國家，對於美國式的生活，頗為傾倒。他覺得美國人的奢侈享樂，是歐洲人所望塵莫及的。他在自傳上敘述他遊美後的感想說：

『我到美國的一切行動所生的反映，也可以說是我和保守英國的思想發生了第

一次衝突。』

他對於騎馬，打獵，擊球，游水，跳舞，等等，幾乎無所不能，他並且歡喜過夜總會那種生活。

他一直到四十一歲放棄王位以前，他還是一個獨身者，我們不難想像當時有資格和他結婚的那班女子，和他的性格實在是格格不入。

溫沙公爵（當時是威爾斯王子）和辛博生夫人相識，是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事，其時她是和她的丈夫恩斯特一同由美國到英國來作客的。她和這位威爾斯王子間的友誼，一直經過五年之久；她是一位有夫之婦，但他們何以會由友誼而進於相愛相戀，以至使得這位王子寧可放棄大英帝國的寶座，也非和她結婚不可呢？

據溫沙公爵所述：辛博生夫人是一位儀態大方而又富有天然風韻的美國少婦。她所住的地方，小巧精緻，陳設雅潔，而又好客健談；因為她自己精於烹調，因此她餽客的飲食之美，在倫敦無出其右。猶不止此，她既機警而又慎重，對社會上一種起作用的思想 and 實力，她都有明確的認識；對時局既非常留意，消息也異常靈通

，倫敦所出的四大報紙，她幾乎每天都讀得很詳細；即最新名著的出版，她也往往能先睹為快；甚至對劇院的組織和表演，她也常識豐富，能給以適當的批評。因此，一經和她接觸，一聽她的言論，便不知不覺的能使你感到衷心的傾佩。果如所言，其人為一位絕代風神的尤物，殆無疑義。

『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這是袁子才調侃中國那位風流皇帝李三郎的兩句名句。當愛德華八世為他這個婚姻問題和鮑爾溫發生激烈衝突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我曾每天於報紙上予以密切的注意，其時我的同情確實是完全寄於這位苦戀的主角的。現在讀了他這部自傳，則對於當時一切曲折複雜的情況，自然更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儘管愛德華八世對於王位的犧牲不無戀戀；儘管他對鮑爾溫咄咄逼人的態度，不無憤懣；但他卒能對於一個國家的傳統精神表示屈服，寧棄大位，必使公私得以兩全，這種磊磊落落的風度，也使我覺得決不是一個尋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啊！

記中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女子

一 西施

『休提起蛾眉聲價，算和親輪到奴家，便長留兩臂宮砂，怕難忘一縷溪紗。』

『承謝你不識面的東君擡舉咱，恰相逢盈盈未嫁。』

『現如今故國天涯，杜若溪邊，苧蘿山下，何日重停踏？』

『況姑蘇臺畔多俊娃，怕老君土看不上貧家裙衩。』

『望吳山那答，別越山這答，殘陽暮鴉，迢迢路遐。』

右錄吳瞿安（梅）『擬西施辭越歌』。西施的故事，流傳了兩千多年，在歷史家，小說家，戲曲家，詩人的筆底，也不知加了多少的附會，添了多少的想像，然大致這樣一件事是很尋常，這樣一個人我們也是寧信其有的。

當時越國境內這個苧蘿山，和靠近山邊的東西兩村子，都在今天浙江的諸暨，

像這種地方能產生一個採薪和浣紗的小家碧玉，樣子確實長得不錯，這自然是很可能的；說這東西兩村姓施的很多，而這個女子却住在西村，因而便叫她作西施，也未嘗不合理。凡一個流傳的故事，總隨時都要添枝添葉使它趣味化的，既然西邊村子裏有了一個西施，說東邊村子另有一個東施，又有何不可？不過西施既然是美不可言，東施便非醜到十分不可。可是聽你怎樣醜，眉總也會皺，心總也會捧，於是便又有了所謂『東施效顰』一說。

司馬遷的『越王勾踐世家』，並沒有提到西施這樣一個人，可是當時勾踐曾以美女寶器向吳國去請和，他却是說到的。越國既然物色了西施這樣一種美女，即令就被吳國賞收了，然也不一定就能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作用，可是事前必得加以相當的訓練，總是一定的。大致當時選擇這類美女和監督這類的訓練工作，范蠡至少是參與的，因此說後來越國把吳國滅了，范蠡仍然把西施奪回，也就大有可能。

可是這裏又有兩說：一說吳亡以後，范蠡便感到勾踐這個人很靠不住，他毅然辭了越國，而且變更姓名，載了西子去遊五湖；一說越王把西施帶回越國，越王的

夫人怕奪去了他的寵，因而把西子負着石頭，沉到江裏去了，而且附上一個理由，說這是亡國妖物，留之無用。這兩說我覺得前一說比較有趣味，即就范蠡這個人的性格講，也是有可能的。總而言之，越國和吳國的興亡，另有其原因，西施這個女子的關係，可以說是微末不足道的。

二 虞姬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謹居然百戰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

吳梅村

司馬遷的『項羽本紀』實在寫得太好，中國人歡喜崇拜失敗的英雄，大概和這類的紀載不無關係。中國人又有兩句常講的話：『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大致也就是受了項羽和虞姬這類故事的暗示。司馬遷在『項羽本紀』和班固在『項羽列傳』上所提到的這位虞美人，文字都不很多，更沒有一個字從正面去描寫這位美人究竟是如何如何的美，不過因為我們讀『史記』『漢書』的人，對項羽已經有了先入

爲主的同情，以爲一個女子能被這樣一位英雄所鍾愛，乃至到了死生之際還不忍相離，總覺得美不可言就是了。

故事的本身是這樣的：項羽兵敗垓下，被漢軍和諸侯兵重重疊疊的包圍，已完全陷於絕境，而張良又運用一種心理的宣傳，叫人從四面八方都唱着楚歌，項羽覺得大概是楚地已經全失，不然便不會這樣多的楚人，因此失望到了極點。其時這位虞美人還在項王的身邊；有一匹名叫騅的駿馬，也是他常常騎着的。現在他自己知道已死在眼前，面對着這平日相依爲命的美人名馬，乃悲歌慷慨的高唱着這樣一首詩：

『力拔兮山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反覆唱了幾遍，虞也以歌和之，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楚漢春秋）
於是項王哭了，虞也哭了，左右更哭得不能仰視。於是項王上馬，率數百騎突圍，卒刎於烏江之上。虞是自殺還是死於亂軍之中，「史記」並無明文，但這幕大

悲劇中的一個美人影子，却永留於天壤。

三 李夫人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這首歌是李延年在漢武帝面前起舞的時候所唱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更能作一種新聲變曲，聽的人都很感動。當時武帝聽他唱這個歌，便慨歎的問：「世上真有這樣的人嗎？」他的姐姐平陽公主回答：「延年有一個妹妹，便正是這樣一種人。」於是武帝召見，果然「妙麗善歌」，因此寵幸備至，並且生了一個孩子，是爲昌邑哀王，這便是李夫人最初的歷畧。

李夫人年紀很青便死了，當她已經病得垂危的時候，武帝親自去看她，她便把被扯來蒙頭蓋了，並且說：「我的病已經很重，形貌也全毀了，實在不願再看見皇帝，死後只希望皇帝看顧我的這個孩子，和我的兩個哥哥。」武帝說：「你的病也

許難好，你把囑託我的事，當面向我談談，不也好嗎？」夫人回答說：「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我實在不敢以這種樣子和皇帝見面。」武帝說：「只要你和我見一面，我便加賜千金，而且給你兩個哥哥的大官。」夫人說：「把不把大官給我的哥哥們做，這完全看皇帝的意思，並不在這最後的一見。」武帝依然戀戀，非強迫一見不可；於是夫人乃長歎一聲，翻身向裏面睡下，連話也不說了。武帝不得已，只好悵悵的退出。

武帝走了以後，夫人的姊妹便埋怨她，「你爲什麼這樣恨了皇帝呢？把你哥哥們的事當面拜託他，豈不也很好嗎？」

夫人說：「你們那裏知道啊！我之不和皇帝再見，正是因爲要深深的託他；我本來是很微賤的，他之所以這樣對我好，完全是因爲我的容貌，大凡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我現在病到這一步，顏色已完全不同於往日，假如讓他看見了，他便會害怕而吐棄我，怎樣還會因懷念我而錄用我的兄弟呢？」夫人死後，武帝果然思念不已，把她的形貌圖畫於甘泉宮。當時有方士齊人少翁，說他能够

召致李夫人的魂魄，於是於夜間張燈燭，設帷帳，陳列着酒肉，要武帝立在另一帷帳的後邊，武帝便居然看見一個宛如李夫人的好女子，在對面帷帳中出現：一會兒坐坐，一會兒又起來走走，只是不能和她接近。於是把這位皇帝弄得顛顛倒倒，因悲感不能自己，便作了這樣的一首詩：『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後來的唐玄宗，因楊貴妃死了，也會要方士演過這樣類似的一幕，漢武帝的文治武功，遠非唐玄宗所能及，要之同為千古風流人物也。

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後來做到貳師將軍，封海西侯，李延年也做了協律都尉，比楊國忠總算好一點。

四 卓文君與紅拂

歷史上的卓文君和一個傳奇式的人物紅拂，總算是中國舊時代兩個突出的女性。卓文君之私奔司馬相如，相如是主動，文君不過是被動；紅拂之私奔李靖，則靖

乃爲被動，而紅拂反居主動。

卓文君究竟美不美，至少在司馬遷和班固的筆底並無明文，但知音，且能詩，也許都是事實。紅拂是隋煬帝時司空楊素家裏的一個侍妾，據世所傳『虬髯客傳』，則固十八九麗姝也。

因爲司馬相如李靖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卓文君和紅拂的故事乃流傳不衰。故事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司馬相如字長卿，四川成都人，他不但歡喜讀書，也學過擊劍，少年時有個小名，犬子；後來因爲羨慕藺相如之爲人，才改名爲相如。他在漢景帝的時候便做過武騎常侍，但因爲他性近文學，這個官不是他所歡喜的，因此他便到梁孝王那裏去作客。在梁孝王那裏的著名文人如鄒陽，枚乘，莊忌之流，都成了他的朋友。等梁孝王一死，他這班食客，便只好星散，相如也回到成都，他的家境是清貧的。

其時臨邛這地方有一個著名的濶人，名叫卓王孫，他是以前開礦冶鐵起家的，單就他家所蓄的僮奴而論，便多到八百個，至於田池射獵之樂，更是擬於王者。相如

和臨邛令王吉是好朋友，因此他對卓家的情形也很清楚，既知道卓王孫是臨邛的首富，而且知道王孫有個愛女名叫文君，才出嫁不久丈夫便死了，寡居在家。他於是與王吉合謀：第一步由王吉把相如接到臨邛，奉爲貴賓；第二步相如也裝做很瀟綽的神氣，車騎衣飾都很考究；第三步王吉天天去朝見相如，最初他還見見，後來就簡直稱病不見，可是這位縣太爺依然不敢怠慢，就不見也還是天天往朝如故。大家要知道，大凡有錢的人，總是歡喜結交官府的，尤其在一個小地方更是如此。卓王孫聽說縣令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貴客，便和另一位濶人程鄭商量，發起請容，席便設在卓家，相如是主客，縣令被請作陪，其餘地方上稍稍有點地位的，也一律請來，一共有百人以上。臨到入座的時候，相如忽稱病不到，於是大家慌了，乃由縣太爺親往迎接，好容易才把相如勉強接來，大家看見相如那種雍容閒雅的儀態，乃莫不爲之傾倒。

卓文君懂得鼓琴，是王縣長和相如早知道的，喝過幾杯酒以後，縣太爺便把預先準備好的一張琴取了出來，對相如說：「聽說長卿好此，請奏以自娛。」相如初

尙辭謝，卒爲一鼓再鼓。

實際相如這一天要來鼓琴，空氣早已放出，文君好琴，必來竊聽，也是勢所必然，相如其所以裝模作樣，其目的原在以琴心挑文君也。

司馬相如不只以琴心挑文君，而且還賂賄文君的侍者，表達他的殷勤之意，於是這位風流寡婦禁不起這種誘惑，居然於當天晚上，私自跑到了相如的住所。相如把文君拐到成都，文君才發見相如『家徒四壁』，前日的那套排場，不過是臨時做出的誘騙手段而已。卓王孫聽到這個消息，大怒，他知道不只是誘拐，而且帶得有竹槓性質，因發誓不給一錢。文君和相如在成都窮困不堪，兩口子乃定下一條苦肉計，把馬車賣了，跑到臨邛，開了一爿酒店，『文君當釭，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一個有了錢的人，究竟要愛一點面子，卓王孫看見女兒快要墮落到當文招待，女婿就簡直去做堂倌，實在太不成話，於是經人勸告，才分了他們一百個僮奴，錢一百萬，於是司馬相如人財兩得，居然有了這點政治資本。後來相如做到中郎將，建節往通西南夷，道出蜀中，卓王孫以及臨邛這班濶人，才

又跑到門下來獻牛酒，卓王孫而且後悔他的女兒嫁相如太遲了哩！

紅拂的故事，我覺得是更有趣味的：當時隋煬帝幸江都，楊素以司空在西京任留守，權重望崇，真是不可一世。李靖以布衣往獻奇策，見素長揖不拜。並責素既以收羅豪俊爲心，即不宜踞見賓客，素不得已起立，斂容謝之。當靖對楊素清辯滔滔陳述他意見的時候，素身邊站着一個執紅拂的女妓，既驚詫靖的儀表，又傾聽他的意見，不覺入神，把靖望了一望，及靖告辭退出，這位執拂女郎，又追蹤出來，叫人問明來客的住址，暗暗記下。李靖回到逆旅，睡到五更，忽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乃是一位紫衣着帽的少年！靖驚問：

『你是誰呀？』

『妾楊家之紅拂妓也，』來人這樣回答。靖連忙把客人請了進來，帽子去掉，外衣脫掉，乃是一個十八九的妙齡女郎，素面畫衣，深深而拜，肌膚儀狀，言辭語氣，真天人也。靖又追問：

『你怎麼跑到我這裏來了呢？』女郎回答：

「我待候楊司空已經好久了，看見天下的人也真不算少，昨天聽了你一席談話，覺得只有你，才真是我的意中人，所以我下了決心，跑來就你！」

靖且喜且懼，對她說：「楊公權重京師，你不怕有人來追問嗎？」女郎說：「楊公屍居餘氣，怕他幹嗎？」但靖終覺不安，住了幾天，果然也不見有人追索。於是女郎依然服男子服，乘馬，隨李靖奔太原，助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功封衛公。或曰紅拂姓張，行一。

（最近偶檢『西京雜記』有下面這樣一段，果若是，文君固美不可言也。雜記說：「……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卒以此疾至死。……」）

五 班昭與蔡琰

班昭籍扶風，屬今天的陝西；蔡琰籍陳留，屬今天的河南；本來當她們的時代

，中國北方的文化要比南方高得多，這兩位才女都出生在中國（黃河以北，這是無怪其然的。

班昭一名班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因此，她自身也成爲了一個文學家兼史學家。蔡琰字文姬，她是東漢末年一位大文學者蔡邕（字伯喈）的女兒，蔡邕是因爲接近董卓而爲王允所害了的；而她的一生，更是極人世之慘痛，她的環境如此，所以她成爲了一個純文學者。

班昭的丈夫曹世叔，所以她又被稱爲曹大家（讀姑）。班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還沒有寫完，便已死了，漢和帝乃詔班昭就東觀的藏書閣，替她的哥哥完成這部偉大的著作，而且叫皇后和諸貴人以師禮待她。漢書出版以後，當時的許多人都看不懂，乃至連馬融這樣的大儒，還伏在閣下向她請教。去今一千八百多年以前，中國的女子便已享着這樣最高的榮譽，誰敢說女子的智慧便一定不及男子呢？

等到和帝死了，鄧太后臨朝，班昭更出入宮禁，與聞政治。因爲她的奉職之勤，她的兒子曹成，也就封了一個關內侯，官至齊相。

班昭的著作頗多，但在中國流行了一個很長時期而且具有相當權威的，便是有名的『女誡』七章。以今天教育哲學的眼光來看，『女誡』究竟應該給以一個怎樣的估價，這是另一問題；但我覺得她解釋女子的『四行』，就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平易近人，她說：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

大凡一個接觸過西洋和日本高尚家庭的人，他一定會發見他們的婦女，對於班昭所說的『四行』，幾乎是無不講究，而且講究得非常澈底：至於那些都會上的名女人，以及電影上大腿女郎之類，這究竟只是一種病態，而決非正常，假定你一定

要說像班昭這種思想實在過於落伍，今天中國的女子，一定要向丁玲史良這類的貨去看齊，而且要把一羣一羣的青年女子趕到大街小巷去歪着屁股扭秧歌，然後才叫着『前進』，那末，老子們便斷然『後退』，讓你們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去『前進』好了。

以蔡琰的身世和班昭相比，其榮枯真不可以道里計了。「後漢書」爲她寫的一篇畧傳，稱她『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的『幼童傳』上說：

『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大概文姬青年時的家庭環境，在蔡邕未死以前，原是很好的。她第一嫁嫁給河東衛仲道，不久她的丈夫死了，沒有生下兒女，不得已回到娘家，其時她的父親雖還存在，可是天下已經大亂。董卓挾獻帝由洛陽西遷長安，不久董卓爲呂布所殺，蔡邕也就爲卓所牽累而遇害。大致由董卓遷都所引起的大紛亂，正是文姬所親歷的，她描寫說：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合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當時董卓的兵，內容原是很複雜的，裏面雜得有南匈奴的『胡騎』，自屬意中事。文姬爲這種胡騎所擄得，因此沒入南匈奴左賢王。從此她在胡中住了十二年，被強迫與胡人苟合，而且生下了兩個兒子，這與蘇武娶胡婦生子，恰好是一個對照。

曹操和蔡邕的私交甚深，他看見蔡邕沒有兒子，乃出金璧把文姬從匈奴贖回中國。文姬描寫和她兩個兒子分手的情形說：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在另一首中更說：

『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歸，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

折戟沉沙鐵末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

大凡詩人或小說家，每遇到一種涉及女人的題材，總不免造出許多節外生枝的附會，這大致是無分中外古今，事同一律的。

二喬，陳壽三國志喬本作橋，周瑜傳云：

『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孫策和周瑜同年，這個時候，他們兩個都只二十四歲。史稱：『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袁術也曾歎息着說：『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以上見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這可看出孫策是一個如何可愛的青年了。至於周瑜呢？三國志說：『瑜少壯有姿貌』。又說：『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一曲有誤，周郎顧」。』這便更不難想像他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物了。

當他們兩個分別娶了橋家這兩位小姑娘以後，『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見裴注引江表傳）。也可看出他們兩個對這件事是如何志得滿意。可是不幸得很，孫策二十六歲便死了，周瑜死較策遲十年，也不過三十六，這兩個青年喪偶的姊妹，後來的歸宿如何，則史無明文，我們也惟有付之歎息罷了。

三國演義的作者運用這個題材是頗具匠心的。原來曹操築『銅雀臺』新成，曾叫他的兒子曹植，做過一篇『登臺賦』，演義的作者，以爲在赤壁之戰以前，諸葛亮覺得東吳並無抗曹的決心，他因而將曹植這篇賦改動兩句，把原文『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蝮螭』，改爲『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當面唸給周瑜聽。周瑜一聽，果然以爲曹操豈有此理，孫劉合力破曹之局，因以完成。（按演義所引的這篇賦，內容與分量較『曹子建集』及『魏志』曹植本傳注所引者，大有出入，不知何所本。）實際這只是小說家言，不僅是厚誣了孫權周瑜魯肅這班人，乃至把諸葛亮也寫成一個過於淺薄的策士了。但就小說論小說，演義的作者因見『三

國志」二喬之喬本作橋，乃把這篇賦上的「二橋」改過來作「二喬」，究不能不認爲是一種小聰明的表現也。

總而言之，孫策和周瑜娶了橋家的姊妹兩個，自來的詩人詞客多少是不勝其妬羨的，我前面所引杜牧的這首絕句，固然說東風如不給予周瑜以方便，這姊妹兩個真有被曹家搶去的危險；即蘇東坡那首有名「赤壁懷古」的「念奴嬌」，又何嘗不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而言外若不勝其艷羨之意呢？因此，我想像橋家姊妹當孫策周瑜的生前死後，一定還有不少關於她們的艷事軼聞，可惜史有闕文，我們在今天已無從發現出來作爲談話的資料就是了。

七 綠珠與石崇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杜牧。

金谷粧成愛細腰，避風台上五銖嬌，身輕好向君前死，一樹穠花到地消。——

吳梅村。

自來詩人詠綠珠墮樓這一故事的，真是多到不可勝數，其原因便是這個故事的本身，確實是異常淒艷。元明以來，有不有人把綠珠這個題材寫成傳奇或雜劇的，我記不得；近年有不有人把它寫成劇本的，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把有關她的這些材料，好好的剪裁而附以想像，寫成一個話劇或歌舞劇，甚至構成一部影片，一定是很能動人的。

究竟是石崇因綠珠而傳，還是綠珠因石崇而傳，這且不去管它；但石崇因為有一個綠珠，而綠珠以一個感情熱烈的南方女子，能够反抗強暴，而又死在像金谷園那樣的一種環境，因此相得益彰，使得他們兩個都成了歷史上活生生的人物，却是事實。

石崇是渤海南皮人。他的父親石苞，是晉朝的開國功臣之一，石崇是他六個兒子中最小的一个，因此他號季倫。石季倫這個名字，在中國的若干文學作品上，要比石崇這兩個字更為常見。

史稱石苞『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見晉書石苞傳）石崇的性
格，大概和他父親的遺傳是有關係的。

綠珠姓梁，博白人，這個地方本來以產珠著名，因此生的小孩子，女的往往叫
珠娘，男的往往叫珠兒，綠珠之名，便是由此而來的。

石崇因為家庭的關係，從二十幾歲起，便開始作官，綠珠便是他做交趾採訪使
的時候以珍珠三斛換來的。石崇有一座有名的別墅，在河南的金谷澗，因名金谷園
，窮極侈麗，既得綠珠，便把她藏在這個園子裏面。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
。明君者，漢明妃名王嬙字昭君者也，後人憐其遠嫁異族，作此曲以哀之，石崇即
把這個曲子叫綠珠歌唱，又自製新歌曰：

『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悲涕別，轅
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
，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
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

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數，甘與秋草并。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讀此，我們可以想像綠珠入金谷以後的生活一斑，亦可藉此窺見石崇斐然之文采也。

石崇是晉初的豪門之一，爲人『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當他做荊州刺史的時候，因劫奪遠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世說新語』和『晉書』本傳，記載他豪華汰侈的事實甚多。拿他與現在有錢人的生活相比較，自然也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當時確也駭人聽聞，現在姑舉幾條在下面，以見其概：

一、王愷是王肅的兒子，晉武帝的舅舅，因爲他要和石崇以豪富相誇街，武帝便每每幫助王愷。某次，武帝賜愷一株高三尺的珊瑚樹，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王愷心想，這一下總可把石崇壓倒了吧？可是送給石崇去看，崇乃把鐵如意一下把它打碎，王愷覺得太可惜，還以爲石崇是嫉妬他，正鬧得聲色俱厲，石崇乃叫左右把他所藏的珊瑚樹搬出六七株，王愷一看，覺得比他的更好，

更高，乃感到非常慚愧。

二、又史稱『愷以糒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

三、樂史『綠珠傳』，說石崇蓄『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縷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過着這樣一種奢侈糜爛的生活，却也有他的一種人生觀：『晉史』上說他一次和王敦同入太學，看見顏回原憲的象（孔子兩個最窮的學生），他便歎道：『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意思是說他也儘可趕得他們上）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既要享大名，又要生活過得很舒適。以他這種態度，處在那樣的亂世，更遇着趙主倫和孫秀那樣的亂人，其召致殺身之禍，本來大有可能，而穿插上

綠珠這樣一個故事，也就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

當孫秀派人到金谷園指索綠珠的時候，石崇堅執不予，來人對他說：『君侯博古通今，遠照邇，願加三思，』石崇依然不聽。於是孫秀乃勸趙王倫殺崇，石崇也自知不免，因與歐陽建潘岳密謀，勸淮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被孫秀知道了，因派人收捕崇與歐潘，皆棄市。當收捕的人到金谷園的時候，石崇正在樓上歡宴，因對綠珠說：『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石崇以爲他的罪狀，至多不過流徙交廣而已，及以車載赴東市，才發覺因爲貪他的家財，乃更非要他的性命不可。

石崇死的時候年五十二，死後清算他的家產，計有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其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謾藏誨盜』，『多藏厚亡』，這大致無間古今，都是這麼一回事啊！

八 江采蘋

江采蘋，福建莆田人，論到中國的女性美，本來以福建的平均分數最高，能產生一個像江采蘋這樣的美人，當然是一點也不稀奇的。

在楊玉環未入宮以前，據說唐玄宗所最寵愛的一個妃子，便是江采蘋。采蘋善屬文，以謝女自比，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因爲平日最喜歡梅花，玄宗每呼她「梅妃」；在最親暱的時候，也偶然叫她「梅精」。

玉環雖生於四川，但實察卻是北地胭脂，豐碩修整，擅舞，能歌，而且能自作譜；又長擊磬，爲梨園之妓所不及，琵琶更妙絕一時。

玄宗自從有了楊妃，對梅妃的愛，便漸漸爲她所奪；玄宗原也沒有要與梅妃完全疏遠的意思，可是禁不起楊妃的媚與妬，不得已才把梅妃遷到上陽東宮去住了。

有一次，玄宗秘密叫小黃門把梅妃召到翠華西閣侍寢，至日出仍未視朝，爲楊妃所知，乃親自跑去，當面和玄宗搶白了一頓。梅妃雖被玄宗抱起，藏在夾幙中躲過，可是從此被屏，雖想和玄宗見面也沒有可能了。

梅妃住在上陽東宮，自作「東樓賦」以自寫幽怨，警句有云：

「……樓上黃昏兮，聽風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憾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船之仙丹。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

雖然不是怎樣了不起的文字，可是很像女子的吐屬，大致總不是後人所假托的吧。據說楊妃見了這篇賦，便說她怨望，要求玄宗把她賜死，但玄宗究竟沒有執行。

某次，夷使來貢，玄宗命封珍珠一斛，秘密賜給梅妃，妃不受，作小詩一首，囑使者代呈玄宗，詩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安祿山反，玄宗偕楊妃西幸，以軍士譁變，楊妃死於馬嵬；等到事平東歸，梅妃也早死於亂兵之手，後來於溫泉傍邊的梅樹下，掘得其屍，脇下刀痕宛在，乃改用妃禮把她葬了。

楊妃因爲牽涉到一種政治關係，而且她的家庭因她之故，也弄得聲勢煊赫，再加上幾位姊妹穿插其間，因此無論正史野史的敘述，或詩人所詠歎，關於楊妃一方面的，乃異常詳盡，而梅妃則很少有人提及。可是我們把「太真外傳」「長恨歌傳」和「梅妃傳」這類的材料比照一看，便可看出她們兩位才情性格，顯有不同，究竟誰美於誰，大概也是很難判斷的啊！

九 才女李清照（1081—1140?）

在宋朝南渡的前後，中國山東的濟南一地，產了中國文學史上兩個最偉大的詞人，前者爲李易安（清照），後者爲辛幼安（棄疾）（1140—1207）。易安的『漱玉詞』，流傳到現在的，不過五十首左右；幼安的『稼軒詞』在數量上雖十倍於她，可是我們要從藝術的見地去強分軒輊，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事實上也無此必要吧。

易安的父親名格非，『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

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見宋史本傳）她的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也能文章。易安有這樣的家世，對她文學造詣上的影響，自然是很大的。

易安二十歲，嫁給太學生趙明誠（字德甫，山東諸城人）。明誠雖是宰相趙挺之的兒子，可是他並沒有普通執袴子弟的習氣；自己曾做過幾任官，但也仍能保持一個讀書人的本色。他曾以所藏三代彝器和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著有『金石錄』三十卷。易安在『金石錄』後序裏敘述他們夫婦那種讀書和賞鑑的生活，真是令人艷羨，

『……每獲一書，即共同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子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又俞正燮在他所寫的『易安居士事輯』裏敘述易安夫婦間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易安）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這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厨，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我們看她的自述，和所流傳的這類故事，可想像她的家庭生活是非常良好，而這種環境對她文學修養上之大有幫助，當然是更不待言的。

易安不僅以詞名，而且能詩能文，也能畫，（宋濂『學士集』說明人陳查良藏有她的『琵琶行圖』，『太平清話』說莫廷韓買得她的墨竹一幅。）不過都為詞名所掩罷了。

易安和趙明誠結婚，在一一〇一，而他們舉家南渡，則在建炎丁未（一一二七）。他們這次到南方來避亂，是相當倉卒的，因此所藏的書畫古器，只好大部拋棄在他們的青州故居，可是攜帶到南方來的精華，也還有一十五車，可見依然不少。不幸南來後只有兩年，即建炎己酉的八月（一一二九），她的丈夫便死了，其時她已經四十九歲，度過二十八年的結婚生活，從此便一直寡居，而且並無子女。我們所知道她最後十幾年的生活，是非常淒涼的：她奔走於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一帶，大致在六十以後，便死在金華；所攜帶南來的古物，在流離中也陸續喪失；國家受着異族的蹂躪，家室也弄得殘破不完，其給予我們這位詞人的影響，是不難於她的字裡行間看出的。

她爲她丈夫寫『金石錄後序』，在紹興壬子（一一三二，即明誠死後的三年）其時她已五十二，其文字已够淒苦；次年癸丑五月，她有『上海樞密韓公工部尙書胡公』的兩首詩，在給胡松年的一首裏說：『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爲流人五！欲將血淚

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這便更令人不忍卒讀了。在她的詞裏有一首『武陵春』，一首『御街行』，我們顯然可以看出是她的悼亡之作，這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御街行）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煙斷玉釭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蕭人去玉樓空，腸斷有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在她五十二歲寫『金石錄後序』的時候，尙自稱『易安室』；五十三歲做詩的時候，尙自稱『嫠家』；到她晚年住在金華的時候填詞，還在念念她死去的丈夫不已；（上面武陵春一首裏面的雙溪，便在金華）甚至到她六十一歲的時候，還有人

稱她爲『趙令人李』；（見俞正燮所說謝伋『四六談塵』的自序）可是却有人一定要栽誣，說她晚年改嫁了張汝舟！本來在今天看來，一個女子的丈夫死了，另外改嫁一個人，原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當時卻不失爲一種誣蔑他人有力的武器，何況被誣的是一位名士的妻子，一位名門的閨秀，更是一位才氣無雙的才女呢？自己不努力，卻偏偏嫉妬別人努力，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劣根性，俞正燮、李慈銘、胡適之幾位，對易安被誣改嫁的這事件，不斷的有所辯正，我覺得這是很應該的。

『南來尙怯吳江冷，北去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在易安的詩裏，有着這樣的句子，可見她對當時南渡的人物，批評是相當嚴格的。本來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對於女子往往是要想方設計去加以陷害，何況易安的態度又是這樣咄咄逼人，其足以召人之忌，更何待說？

談到詞的起源，這也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但說北宋是詞的一個開花結果的時代，大致便不會有什麼異議。可是易安對於北宋若干有名的詞人，却給了不多的指摘：

「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研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稼軒詞』幸而晚出，否則恐怕也是逃不了她的批評的。幼安有一首『醜奴兒近』，標題是『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這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覷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

來莫是別有說話？」

『稼軒詞』比之『漱玉詞』儘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格調，但易安的作品爲幼安所愛讀，且進而摩擬之，不能不說是詞壇的佳話了。

詞之美者，在能寫難寫之景而豁人耳目，能狀難狀之情而沁人心脾；能謹守繩墨而不覺勉強，能放手鋪敘而又無半點火氣；在一首詞中，把這些條件能一一顧到的，我們終不能不推易安這首『聲聲慢』爲出色當行之作：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在這樣一個短短的篇什中，能連用十八個疊字，說它是千古絕唱，誠然是不錯的；可是假如我們能體會出她當時那一種尋尋覓覓的心情，則能一氣貫注的流走下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